

三联
耳关

生活®

2017.10.16
2017年第42期
www.lifeweek.com.cn

周刊

2017诺贝尔奖
改变世界的人



958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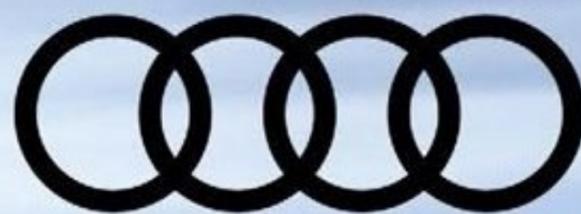
敬请登陆奥迪官方网站

一汽·大众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中国·长春

璀璨于形，叱咤于心

奥迪A6L 三十周年年型，焕然问世



突破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心态。
它让非黑即白的商务基调，大胆过渡为璀璨的斗牛士红和爪哇棕，过渡为旗帜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
它为沉稳造型带来更动感、凌厉的变化：新的S-line外观、高亮黑前格栅、红色制动卡钳；
它赋予力量更多元的可能，从1.8T、2.0T、2.5L到3.0T，从自然吸气到机械增压，时刻激荡于心。

奥迪A6L 三十周年年型，突破既往，风貌一新。

详情敬请垂询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官方网站。

www.audi.cn

Audi 突破科技 启迪未来

背负杀戮的收藏一文不值

请做文化的传承者，而非生命的终结者。犀牛已经极度濒危，请拒绝收藏犀牛角制品



马未都

野生救援公益大使



野生救援
WILDAID

没有买卖 就没有杀害
when the buying stops, the killing can to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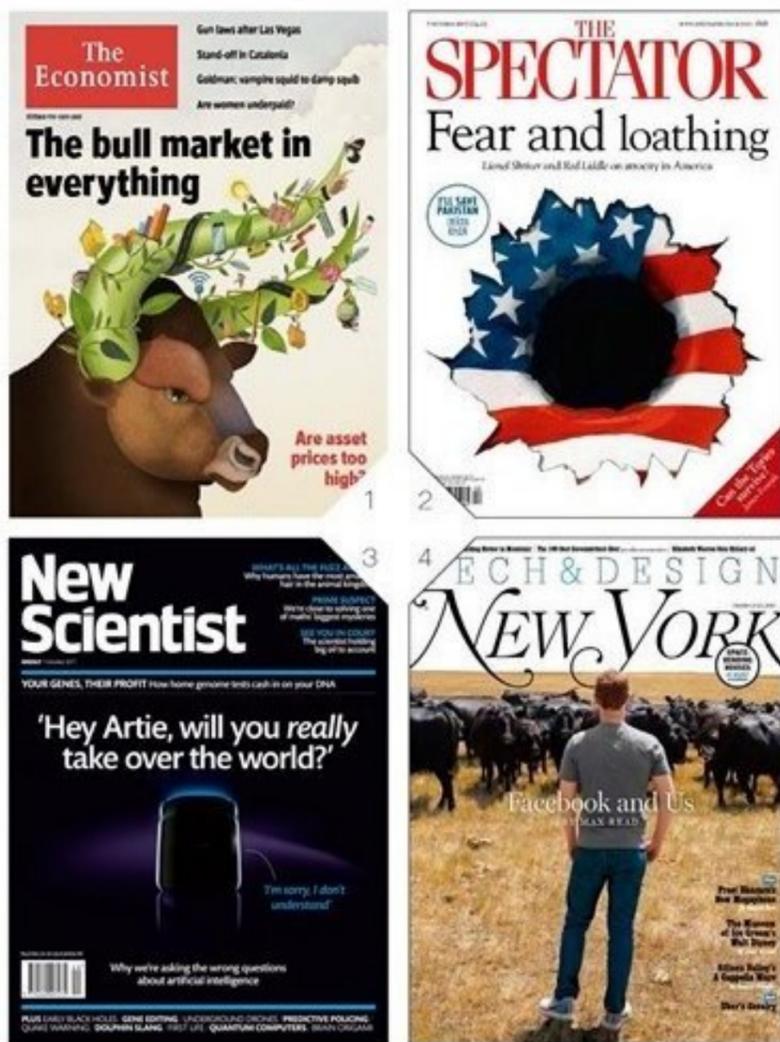
wildaidchina.org



《时代》(美国) 2017.10.16

控枪讨论

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会影响公民的持枪权利吗？拉斯维加斯惨剧过后，人们对枪支管控问题议论纷纷，但讨论的深层核心并不在于枪。反控枪者认为对枪支进行管控会削减他们的政治权利，控枪并不能减少暴力事件的发生。而现在的问题是，犯罪分子试图制造军事级别的大屠杀，我们如何划分权利的界限。对此，特朗普尚未表明立场。



《经济学人》美国 2017.10.7

1 / 全球牛市

金融危机恢复以后，全球各类资产牛气冲天。资产上涨振奋人心的同时也暗藏危机。首先，牛市持续的背景是全球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资产价格是由央行的慷慨解囊支撑的，那么泡沫的终结将引发巨大的调整。其次，有迹象表明基金经理为获得更高的收益率，开始变得越来越不谨慎。在一片繁荣之下，需谨记投资教父的箴言——“寻找安全边界”。

《新科学家》(英国) 2017.10.7

3 / 如何正确面对人工智能？

当人工智能越来越渗透到日常生活时，它一方面可以成为人类的助手，一方面令人感到不安。因为机器可能会像人类一样做出反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人类，它在监视我们，破坏我们的隐私，妨碍正常的公共对话。现阶段，“偏执”是大多数人对人工智能“性格”的认知，它会无条件地执行一种命令，人工智能的真正风险体现在更细小的棘手问题上。人类大脑与人工智能的和谐相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旁观者》英国 2017.10.7

2 / 枪击案的背后

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 10 月 1 日晚间发生史上最严重枪击案，事件导致至少 59 死 527 伤。对此，《我们需要谈谈凯文》的作者莱昂内尔·施里弗认为，犯罪分子的暴行是为了博取人们的关注，我们不能过度解读暴徒心理，或将动机简单归结于单一因素。美国未控枪是一方面的原因，但并不能解释暴行的发生，犯罪分子的心理无从知晓。

《纽约客》(美国) 2017.10

4 / 扎克伯格真的了解 Facebook 吗？

现在的 Facebook 注册用户达 20 亿之多，不仅有强大的用户群，如今的渗透范围也早已超出了前两年。9 月 21 日，扎克伯格发表声明，承诺将增加 Facebook 的安全性，并向选举团队倾斜资源，“积极地加强民主进程”。既能给你生日的提醒，又可以成为德国大选中重要的社交推动方，Facebook 究竟是怎样的一家企业？



国际高端家电品牌



我的卡萨帝人生

“没有捷径，只有永不止步的前行为完美，永不妥协”



真正懂得爱的人，值得拥有每一天怦然心动的生活。卡萨帝家电，孜孜科技、精致、艺术的完美协一，并以整套创艺家电创造家的心动感。以至臻品质诠释生活的无限美好，以创新演绎爱的熠熠生辉，以高端之造敬生活与爱的艺术。爱，无需妥协，生活，总有新意。



www.casarte.com | 服务热线: 4006399699

ARTI
创艺科技体系

Casarte
REFINED LIVING



扫描二维码即刻加入卡萨帝会员
享受高端会员权益



P32 封面故事

2017 诺贝尔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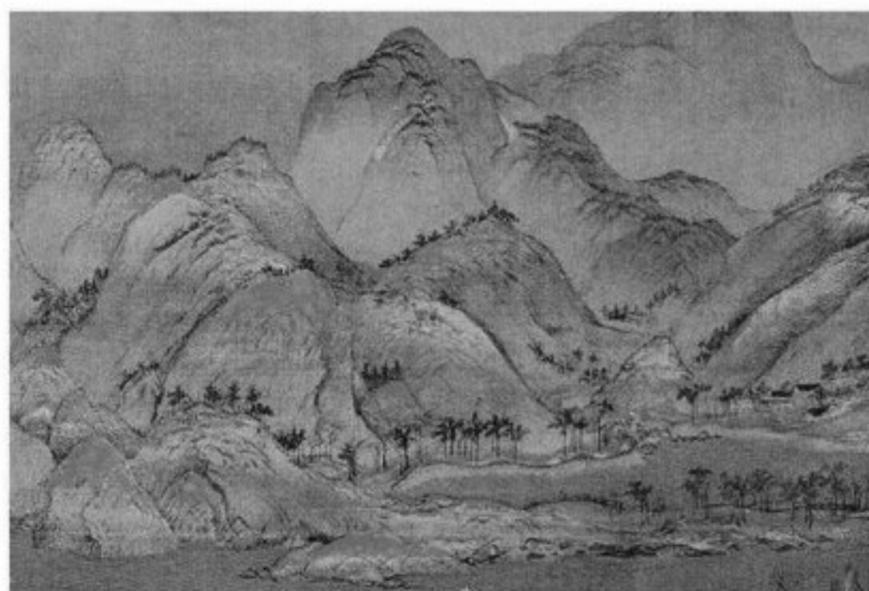
改变世界的人

- 34 生理学或医学奖：了解你的生物钟
- 40 物理学奖：倾听宇宙的声音
- 43 化学奖：观察生命的细节
- 46 文学奖：记忆、时间和自我欺骗
- 50 和平奖：禁止核武器：理想照进现实
- 52 经济学奖：非理性的经济人

P84
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之后，控枪会有进展吗？



P106
《千里江山图》何以“独步千载”？



特别报道

- 沙姆之地，流浪或回归 54
现代叙利亚的缔造 62
一名自由摄影师的中东记录 76

社会

- 时事：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之后，控枪会有进展吗？ 84
热点：寻找旧城更新的密码 90

经济

- 市场分析：定向降准的含义 82

专题

- 平等与质量并重的加拿大教育 94
在麦吉尔，追求杰出就在 DNA 里 101
发展科学研究就是我们的教育方式 104

文化

- 文化：《千里江山图》何以“独步千载”？ 106
文化：西北科学考察团，西行纪念 90 年 116
艺术：世界剧场：面对争议的古根海姆和中国艺术展 124

- 电影：贾樟柯：《时间去哪儿了》的现实追问 130
戏剧：万方的 20, 40, 60 134
话题：不一样的《福斯特医生》 140
设计：飞翔的玻璃 142

专栏

- 邢海洋：港股的底气在哪里 16
袁越：吃饭倒时差 146
张斌：体育让政治走开，别开玩笑！ 148
宋晓军：中国军舰首访伦敦杂感 149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 150

(封面供图：视觉中国)

环球要刊速览	2	声音	21
读者来信	8	生活圆桌	22
天下	10	好东西	26
理财与消费	18	个人问题	152
好消息·坏消息	20		

2017年第42期，总第958期，2017年10月16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主编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谢先凯 Xie Xiankai 袁越 Yuan Yue
陈晓 Chen Xiao 蒲实 Pu Shi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o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曹玲 Cao Ling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丘谦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张雷 Zhang Lei 苗千 Miao Qian

记者 Reporter

孙若茜 Sun Ruoxi 杨丹 Yang Da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宋诗婷 Song Shiting
孙璐璐 Sun Lulu 王海燕 Wang Haiyan 王梓辉 Wang Zihui
刘周岩 Liu Zhouyan 刘畅 Liu Chang 王珊 Wang Shan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鲁伊 Lu Yi 赵潇 Zhao Xiao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执行图片总监 Executive Photo Direc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菲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潘海艳 Pan Haiyan 张富伟 ZhangFuWei

发行服务 Circulation Service

李卫红 Li Weih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乔龙宁 Qiao Longning
王霄 Wang Xiao 王荻 Wang di 金宇迪 Jin Yudi 姚贺梅 Yao Hemei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执行总监 Financial Executive Director

袁玉兰 Yuan Yulan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商务推广合作电话：(010) 84681038

联系人：连华伟

E-mail: lianhuawei@lifeweek.com.cn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 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 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51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0063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

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上海：上海汇敦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21) 63769858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 (025) 83327129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2100585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阳：新中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883566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 (0791) 88820509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993043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 (0551) 64252409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封面拉页 · 奥迪

封二~扉1 · 野生动物基金会

3 · 卡萨帝

17 · 三联全媒体

30~31 · IBM

89 · 生活周刊

147 · 三联中读

151 · 三联书店

封三 · 熊猫茶园

封底 · IWC万国表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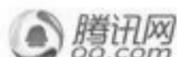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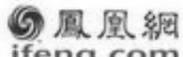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
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与商务运营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

中电发展大厦B座

邮编：100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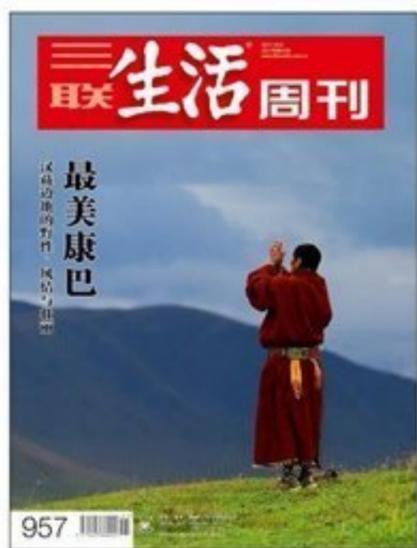
电话：+86 10 84681038

传真：+86 10 84681396

电邮：jingying@lifeweek.com.cn

网址：www.lifeweek.com.cn

三联
生活
传媒有限公司



最美康巴

本科期间多次背包行走藏区，对康巴最为留恋。提起康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里高山峡谷的地貌和性格鲜明的康巴人。大江大河从青海发源顺流而下，在横断山区切割出深深浅浅的高山峡谷，形成立体式的景观带。雪山、森林、湖泊、草原的完美拼接，使这片地区成为藏区风景最富于变化的地方。同样地，这片土地的主人康巴人是有个性的：他们豪爽达观、勇猛彪悍。作为藏区的“犹太人”，他们可以为了生意走遍藏地，积累巨额的财富；同时也会一掷千金把金钱捐给寺庙，靠流浪甚至磕长头的方式到达圣城拉萨。这也正好印证了藏族的谚语：“法域‘卫藏’、马域‘安多’、人域‘康巴’。”这期杂志带我再次回到康巴，重拾那种强烈的炽热感，这种炽热来源于和四川盆地迥然不同的阳光，来源于康巴汉子心灵的不羁与放荡，来源于世俗化的表象下对宗教最执着的坚守与虔诚。

(@李越)

做快递员的经历

老乡的儿子小张在一家快递公司做快递员，因婚期临近便找我代替他一段时间，答应了之后我就高高兴兴地上班去了。

刚开始由一位师傅带我熟悉派送线路及工作流程，三天后自己觉得可以胜任此工作了，便一个人驾车送快递了。没了师傅的带领，自己忙得手忙脚乱顾此失彼。按规定，所送出的派件在中午两点之前必须签收，否则视延误被罚款。可我仅才送出一半的派件，公司客服为了不影响业绩，全部帮我签收。不一会儿，电话不断，都是同一个声音：“我的快递还未收到怎么就签收了，东西呢？”我赶紧解释：“对不起，一会儿就送到，再等一会儿。”本来半天的活儿，我竟忙活了一整天，不仅滴水未进饭没吃一口，还累得要死。昔日曾那么羡慕快递员的工作，认为开着三轮车四处跑很风光很轻松，不干不知道，一干才知道里面的艰辛。

第二天7点准时来到公司，全部到齐后，大家开始卸车分拣来自不同地域的物件。派件扫描后，大家伙各自驾车去自己的派送区域工作了。我手忙脚乱地装好车后，最后一个离开公司。路上车流量大，自己驾驶的快递车不仅破旧，且没有喇叭没有转向灯，刹车还不太灵，自己只有小心翼翼地行走在既定的派送路线上。

由于是新手，自己不仅像一只无头苍蝇四处乱撞，而且还丢三落四。虽说有师傅带了我几天，那也仅是熟悉一下大致的范围，具体的地址还得自己摸索。送件时，不仅要仔细确认收件人地址，还要核实派件是不是有收现金的，否则一旦送错，全部损失都由快递员承担。我送的区域，机关单位倒好说，直接送到门口传达室通知一下就行了。最令人头痛劳累的是居民楼住户，住在五、六楼的一般都下不来取，不是让我送上去就是搁在楼道间水表箱木门里。送一件快件，

甭管大小酬劳一律是一块钱。为了这一块钱，爬上爬下累得我双腿发酸气喘吁吁。

有经验的快递员告诉我，派件时，低层的送上门，高层的先按门铃或是打电话让他下来自己取，否则不送；他还说，有些住在五、六楼的住户，打电话说自个儿不在家，让快递员把物件放在某个地方，快递员前脚一走，他随后就开门取件。我按他说的方法试了一下，打电话让一位住在五楼的大爷下来取件，谁知大爷在楼上这样说：“你把快递给我送上来，要不你就拿走！”一听这话，我赶紧爬楼梯送了上去。等所有的派件送完后，天已黑。我又是滴水未进饭没吃一口，人累得快虚脱了。自然，上午的派件又是客服在两点前帮我签收。几天下来，总是着急上火，自己牙疼嗓子疼。一问另一位新来的伙伴，他说：“我刚来时，跟你一样着急上火，鼻子都发炎溃烂输了四天液才好，过一段时间适应了就好了。”

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派件时送错了地方。前天下午我送件时，接到电话说自己订购的一双鞋没收到，但手机上显示早已签收，并把订单截图发到我手机上。我一看顿时蒙了，一天送一百多件，谁知道送哪了？他说你先别着急，看看是不是落在公司了，我说回去找找吧。回到公司翻了底朝天也未见踪影，无奈只好跟公司经理说了此事。经理一听，上网查了一下，果然是我扫描派送的。就对我说：“你仔细想想送错哪了？实在想不起来找不到你要赔偿人家。”其他快递员知道此事后，说：“这很正常，我们都遇到过这种事，就当花钱买教训吧！”

几天的快递经历告诉我，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难处，可别看别人“吃豆腐嘴快”。

天津 农夫

小留学生在美国

目前，大约7万名中国小留学生

在美国上初中和高中，大部分小留学生是在学校读书，住在“寄宿家庭”。这些寄宿家庭被称为“住家”，家中的男女主人被称为“住家爸爸”和“住家妈妈”。

纽约一住家妈妈卡瑞萨 (Carissa) 告诉我，目前美国经营寄宿家庭的中介大约有两三百家，美国没有政府机构管理，也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协调，都是各自独立运作。

小留学生中有很多好学生，因为寄宿家庭比较满意，不会向中介报告，因此关于好学生的故事很少。而如果小留学生出现问题，寄宿家庭反映的就很多。由于小留学生年龄较小，远离父母，也有可能走上歧途。父母很少与寄宿家庭交流，不了解孩子的实际情况。例如，有的孩子不去上课，抽烟、喝酒、有网瘾、赌博。

有的孩子交男女朋友，去法拉盛开房。他们自己不会说的，都是通过其他迹象发现的，如有的身上出现红斑，说是过敏，带去给医生看，医生看过说是不像，应该是臭虫咬的。这说明他们去开房了。“有的女生问我，如果怀孕了，是否能够延长签证？”许多小留学生一般不会提前告知旅行计划，他们暑假都会回国度假，然后返回美国读书，往往是人到美国机场了，才给寄宿家庭打电话，要他们去接机。有的小留学生认为有钱就能办事，请人帮助代考 SAT，听说有的学校可以交钱买分数，如要想拿 A，就交 1500 美元，就有小留学生敢买。

由于沟通问题，还会

产生寄宿家庭和学校的矛盾。一名上海来的小留学生读 10 年级，住在新泽西州一个美国人的家里，小留学生和寄宿家庭关系不错，“小留学生还送给男主人一瓶茅台酒”。有一次，老师举办课堂讨论，这个学生就讲到寄宿家庭爸爸酗酒。“这在美国是很严重的事情。”于是，学校派人去帮学生搬家。“男主人开门后，他们也不打招呼，径直上楼搬东西，走时也不与住家爸爸打招呼，让学生暂时住在老师家里。”住家爸爸很伤心。她去了解才知道，原来是做过手术后，住家爸爸服用止痛药止痛，有一次止痛药没有了，就喝了酒。“由于学校这样无情，我们决定不与这个学校合作了。”

中国大陆小留学生还有一个问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申请大学，许多人都是到了 12 年级才开始准备，实际上他们应该一进入高中后就要准备。这主要是因为很多小留学生还没有了解美国的语言和文化。他们虽然在美国，但是天天看中国电视剧。

美国 渝文

外来人口的苦恼

我离开家乡快 20 年，曾去过多个城市谋生，经历过寻工作要暂住证、身份证、上岗证、健康证、毕业证齐全的年代，现已定居西安 10 年并娶妻生子，亲身体会城市发展，也感受了城市的人情化进程。眼下的外来人口、城郊农民进入城市生活、打工、经商，确实越

来越方便，治安秩序越发良好，城管执法更文明，不过，众多外来人口的生活仍然面临较大压力，离诗意栖居尚存相当距离，依然很难摆脱城市边缘人的位置。

房子事宜首先就是一个大问题，绝大多数外来人口买不起城市商品房，无法享受体制内的购房优惠，想当房奴都没资格，只能租房栖息，居住条件明显偏次。外来人口集聚的房屋，多半没有独立的厕所和厨房，保暖和隔音效果不好。而随着城中村大幅减少，城市延续对外扩张态势，不论是住房还是商铺，房租都在不断上调，即便是这样，适合外来人口的房子还是不大好找，即使找到了，住一段时间，多半就该考虑搬迁。

其他的生活成本偏贵且只升不降。比如电价，外来人口用的是高价电，1 元 1 度属于常态，他们的商铺、摊点，1.5 元 1 度的情形也不少见；又如，近年城市禁止城区烧煤炭和蜂窝煤，要求住户、商家和店铺使用环保炉具、清洁能源，外来人口换炉具、改用气（电），又无补贴，相应的费用立即增添；倘若外来人口将孩子接来上学，因不属于本市本辖区户口，须缴纳不低的择校费；另外，外来人口一旦生大病住院，除“新农保”支付部分医疗费用外，自身掏出的钱较多。

外来人口的收入普遍

不高且劳动时间偏长。一些外来打工者一月休息 2 至 4 天，单位（机构、商铺等）不发中班、夜班津贴，许多单位依旧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没有特殊技能的外来打工人员，除掉各项必需开支外，节俭者一年仅落下 2000 至 4000 元。外来人口经商做小买卖，哪怕是摆地摊，也要交一些费用：早市临时摆摊，得交 5 至 15 元的费用；外来人口在城中村摆地摊，若是零星摆摊，一天交 10 元，若是相对固定的摊位按月交，则按摊位面积和摆摊地点，摊位费、管理费、卫生费三费合一，每月每个摊位 600 至 1000 元，摆摊者还得不时送给收费人一点儿好处，即使是超市、商铺门前，经营者每月也至少要交卫生费 100 元。除了春节外，外来经商者通常节日不休息，不少人一天干活十几小时，进城的农村籍老年外来人口，往往仍要寻活摆摊找挣钱路子。

由于缺少休闲时间、手里不宽裕、文化素质偏低、城市党政工团妇联组织不大过问等情形，外来人口的文化娱乐生活相当单调、枯燥，始终难以真正融入城市圈，实质上不能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城市、对社区全无发言权、建议权，自身不能独立发出响亮的声音，尽管外来人口数量庞大，却犹如一盘散沙。

西安 一读者

本期截稿时间：10 月 9 日 19 时

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索马里 | 戏水

10月6日，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城内，当地儿童在戏水。







英国 | 艺术

(右图) 10月5日, 装置艺术家瑞贝卡·罗 (Rebecca Louise Law) 的最新作品《生死消长》(Life in Death) 在伦敦邱园雪莉·舍伍德植物园艺术画廊展出, 该作品由 37.5 万朵鲜花制成。



美国 | 舰队周

(左页上图) 10月5日, 旧金山“舰队周”开幕前一天, 美国海军“蓝天使”特技飞行队和“甲骨文”队在旧金山湾上空拍照。一年一度的旧金山“舰队周”始于1981年, 是美国海军、海岸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的传统之一, 除了飞行表演, 还包括舰船巡游、参观军舰、军民人道主义救援联合训练和公众教育活动等。

北爱尔兰 | 越野赛

(左页下图) 10月1日, 在北爱尔兰拨达丹, 一名男孩参加由麦维他佳发蛋糕赞助的第11届疯狂泥浆越野赛, 他正穿过蓝色烟雾弥漫的轮胎障碍。该比赛分为专业组、业余组和儿童组。

英国 | 电影节

(右图) 10月7日, 电影《性别之战》在第61届伦敦国际电影节上举行欧洲首映, 影片主演安德丽亚·瑞斯波罗格出席首映礼。

印度 | 十胜节

(下图) 9月30日, 印度昌迪加尔举行“十胜节”庆祝活动, 演员装扮成印度教神罗摩和拉克斯曼参加庆典。具有几千年传统的“十胜节”来源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庆祝印度教教徒心目中的英雄罗摩与十首魔王罗波那大战10日, 最后大获全胜, 故称“十胜节”。





港股的底气在哪里

文 / 邢海洋

“十一”长假，缺席了A股的亚洲新兴市场股市高涨，势头甚至盖过了美股和欧股。得益于中国央行的定向降准释放的宽松信号，香港恒生指数涨破2015年的高点。目前挡在港股面前的只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的31958点的历史纪录了。短期内这一历史性高度是否能被轻松越过还是未知数，但相比于内地市场港股走势强劲，个中缘由还是颇值得玩味的。

A股尚在“度假”，还未开市，A股与港股可资比较的还是9月底的数字。截至9月末，上证指数今年以来上涨了8%，恒指则上涨了26%。如果说上证指数作为综合指数与恒指这样的成分股指数相比有失偏颇，也可用与恒指选股标准类似的上证A50指数来比较，结果是17%，虽比综指高出很多，可仍追不上恒指的步伐。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个股而言港股就是比A股好，其实市场整体环境是一样的。这可以通过在两地都上市的A、H股的比价来判断，年初恒生AH股溢价指数在134左右，到了9月底为131，意味着相比于A股与H股的价格更靠近了，但靠近幅度并不明显，港股的估值涨幅，只比A股多出3%而已。

就个股而言，港股并未出现如2015年的“国家牛”中老千股、妖股辈出的火热景象，那时候经常有券商股一天涨一倍，“妖股”汉能每天尾盘都拉升，频创纪录。这一次，甚至港股传统的中流砥柱长江实业和汇丰控股的表现也乏善可陈，长江实业股价只上涨了15%，与它2015年乃至2007年大牛市中的表现判若两人，汇丰控股涨了23%，也仅勉强跟上了大盘的步伐。真正引来恒指的是腾讯控股，今年来腾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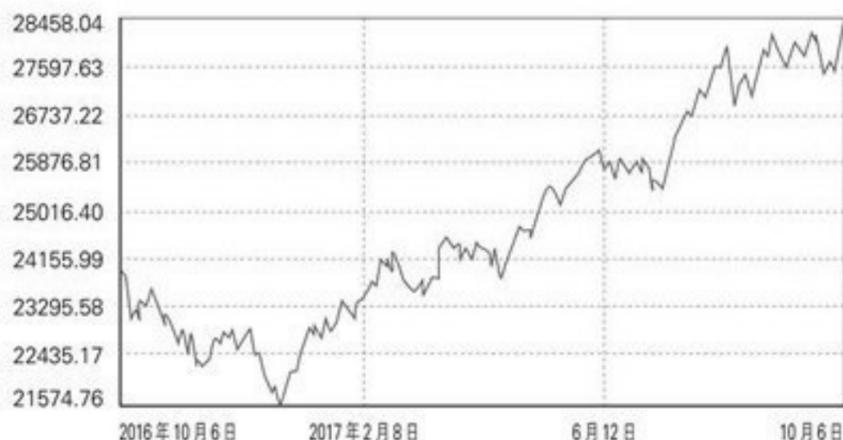
涨超过了80%，虽然年中恒指调整了成分股比例，将腾讯的比例人为地压低，但腾讯每上涨10%，恒指就能上涨300个点。这里不妨假设，若恒生指数公司今年5月末将腾讯控股占恒生指数比重由11.78%降至10.00%，而是任由其“膨胀”下去，虽然指数会变得一股独大，会更具波动性，但借助腾讯下半年更为凌厉的暴涨，恒生指数或离其历史性高度更近了一步。而今年表现最亮丽的恒大地产，甚至还没有机会晋身到恒生指数的50家成分股中。

不同于腾讯等VIE构架的中概股不得不出走海外上市，恒大等内房股离A股更近一些，其实是完全有可能在A股上市，并给A股投资者带来更多的财富分享的机会。只是国内房地产调控是常态，不用说发行股票，房地产发债的窗口都时常关闭。除了国资背景的地产商，能进入A股的也唯有那些早期踏足房地产的民营企业。可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宏观调控，反而是那些甘冒市场风险，大举囤地的民营企业大获成功。今年以来，恒大地产的价格已经上涨了5倍，尤其是“十一”期间的上涨更把其老板许家印稳稳地推上首富的宝座。

如同社会的发展，资本市场的脚步也是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也正是凭借市场吐故纳新的代谢机制，成熟的资本市场得以吸收实体经济的各种新生力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维持资本机器的持续运转。年中，香港证监会释放出整治老千股的信号，多只老千股集体崩盘，最高的跌幅达九成以上。对于老千股，港交所给出的定义是，大股东不以做好上市公司业务来盈利，而主要通过玩弄财技和配股、供股与合股等融资方式损害小股东利益。本来，老千股在市场中早形成了自己的投机氛围，蓝筹股投资者与仙股的买卖者生态相隔，互不相扰，可随着沪港通和深港通的开通，南下资金捕风捉影，捕捉“快钱”机会，这给市场带来困扰，也强化了股市管理者“闪退”老千股的决心。整治老千股之外，港交所也在瞄准新经济修改上市规则，避免阿里巴巴远走美国的情景再度发生。

港股之所以创新高，底气正来自其海纳百川，并且吐故纳新的能力。■

香港股价的重要指标“恒生指数”一年来走势图



生活在碎片时代



生活在碎片时代，
不能像碎片一样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



节气



新知 WISSEN





栏目插图 | 范薇

“大象起舞”

内地犹在长假中，受央行“定向降准”影响，港股大象起舞。10月3日恒指一举收复28000点失地，大涨2.25%，国企指数也大涨3.62%，其中，工行大涨7.93%，建行大涨5.86%，分别为恒指贡献了107点和130点。除了内银股，内房股同样大受追捧，恒大大涨8.81%，令许家印以412亿美元的身价重新夺回中国首富宝座。港股之暴涨，除了消化9月末出现的利好，内地休市挤出了资金，也提供了助力。

“延迟性降准”

9月30日，为支持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业务，人民银行决定向那些对小微企业贷款超一点比例的商业银行实施定向降准。因条件宽松，几乎所有大中型银行、90%城商行及95%农商行均有资格获得50个基点的降准，理论上可释放至少7500亿元人民币流动性。定向降准略出乎市场意料，显示中央在去杠杆的同时亦希望维持经济短期稳定。不过，此次降准3个月后才施行，可谓“延迟性降准”。

加泰罗尼亚独立

躲过了荷兰、法国、德国三国大选的暗流，但今年这个欧洲大选年似乎依然将孵化出意想不到的黑天鹅。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在举行了当局并不承认的公投之后，又将于10月8日宣布独立，导致这个欧盟成员国更加接近分裂，令该国历时不长的民主基础受到威胁。宪政危机令西班牙公债收益率大幅飙升，触及3月以来高位，意大利和葡萄牙主权债的损失对冲成本也跳涨，暗示整个欧元区或受波及。





10月的警报

30年前的1987年10月19日，道一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短短一日就崩跌了22.6%，这一天被称为“87年股市大崩盘”。如今，有“里根经济学之父”的戴维·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发出重磅警告，特朗普政府的税收改革计划以及美联储的政策，可能会令股市遭受严重的抛售。不过，曾数次预测到市场崩盘的Arora报告中，目前股市的人气非常乐观，但不是极度乐观。极度乐观的情绪往往是一个相反的指标，多出现在市场下跌之前。

矿机大甩卖

继中韩之后，美国证监会也几度出手打击ICO融资中的不法行为。不过比特币依旧坚挺，价格重上4400美元。唯一不同的是，在中国，一度紧缺的比特币矿机价格一落千丈。在二手“矿机”交易网站彩云比特和二手交易平台“闲鱼”上，曾经一台上万元的“矿机”，如今只要2000元就能买到。矿都不挖了，并非比特币不值钱，而是因为挖出来也卖不出去。比特币虽能洗钱，可大批量卖到国外毕竟会引来监管。

波多黎各危机

9月，波多黎各遭受了玛丽亚飓风袭击，半个月后，只有8.6%的居民有电力供应，移动手机服务已经被完全切断，许多山区、偏远地区依然处于与世隔绝状态。更糟糕的是，今年夏季波多黎各已经宣布破产。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将“清除”波多黎各的债务，帮助这个美国领地从飓风的重创中重建，可没有电力，没有电子支付，这里的居民急需的是现金。

抢手的共有产权房

北京有史以来第一家共有产权房锦都家园的427套房子吸引了12万多户家庭摇号。该项目均价2.2万元/平方米，远低于周边二手房五六万的价格。政府产权份额与购房人产权份额比例各为50%，意味着，即使仅拥有一半的产权，此批次的共有产权房仍物超所值。未来共有产权房的个人产权份额比例按照5个百分点一个档位，即50%到95%，一共10档。问题是，如果共有产权供不应求，将既不能平抑房价也不能提供住房保障。





拼在“孕区房”

等到娃出生了才开始考虑学区房问题？你可能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研究小组日前发现，在新生命孕育之前，一个安全、绿化良好、儿童游乐设施完备、学校教学质量优异的街区就已经部分预测了居住者子女未来的发展前景。发表于《社会科学与医学·人口健康》上的最新研究指出，与住在较差街区的社会经济地位相似的对照组相比，与受教育程度较高、相对富足的人为邻，可以显著减少母亲生下低体重儿或早产的风险，而这通常被认为与孩子将来的语言能力、学习成绩和整体身心健康密切相关。

好消息



减排大计，收费第一

汽车尾气是大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在过去几十年中，各国政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挖空心思、花样百出。但根据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最新分析结果，在 22 种现行交通管控措施中，按使用频次征收过路费是缓解拥堵、减少尾气排放、提升道路安全的最有效办法。



懂你牌创可贴

老龄化社会中，糖尿病患者的慢性感染伤口护理消耗大量医疗资源，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发表于《高级功能性材料》上的论文指出，一款新研发的智能绷带或许是更好的解决方案。绷带内嵌的微控芯片可根据伤口状况自动释放抗生素、组织生长因子和止痛剂，从而加快愈合速度。

坏消息



走出非洲的真相

在距今 7 万年到 5.5 万年间，非洲大陆上的人类祖先开始大规模向欧亚大陆迁徙。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地质学研究小组日前指出，这可能并非出于寻找美丽新世界的勇敢，而只是在气候变化导致急剧干旱下不得已的逃命之举。地质数据显示，当时非洲旱情甚至比现在还要严重。



祸起中层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琳达·特维诺在《组织科学》上发出警告，当一家公司过于看重 KPI（关键绩效指标）的时候，一场始于中层的弄虚作假风暴很可能便在孕育当中。针对某通信公司的调查显示，中层管理者面对不现实的业绩压力时会采取一系列欺瞒手段，导致整个公司跑偏崩溃。

我的阅读经历中有两个神一般的人物：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现在为止，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我更多地追求契诃夫的风格：简单、精确，谨慎、克制的语气。但我有时会嫉妒陀思妥耶夫斯基彻底的混乱。生活是混乱的。书该那么整齐、有型吗？我需要探索我的写作中的另一面：混乱、不守纪律的一面。

——石黑一雄

没有别的世界，你目光所及的范围便构成了你所处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你努力获得重要性，却以为这是世界的重要性。至少你有一种幻觉，觉得这个世界是比较重要的。这种狭隘和无知在主流或时尚文化的渲染中更甚。不假思索地与亿万人共时同在；或者以卓尔不群者自居，依然与千万人声气相通。殊不知，大全之世界是没有中心的，也不永恒。一个人若有重要性，早已潜伏在与万物平等的微不足道中。

——韩东

楼下卖炒栗子的阿姨，微信支付用户名是荷塘月色，文艺女中年。烟摊买烟，微信支付用户名是齐天大圣，动漫女中年。

——微博用户老蒋等

海拔 2100 米处的气压会延长人们的反应时间，这对那些喜欢在飞行过程中玩电脑游戏的人来说是个坏消息。

——BBC,《坐飞机如何严重扰乱你的心智》



(插图 山羊明)



读小说和写小说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方式，一种对话和竞争的形式。是一种为人之道和成长之道。

——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论自传体小说》

+/-
数字

63.2

万英镑

影星奥黛丽·赫本的 246 件遗物，包括洋装、大衣、太阳眼镜、手套、耳环、信件、照片和画等在伦敦一共拍得 463 万英镑。其中奥黛丽·赫本做了注解的《蒂凡尼早餐》剧本以 63.2 万英镑成交，创造了剧本拍卖的新纪录。

1234

种

《英国药理学》杂志发表了香港医生的一项研究报告，称在病人提交的 487 种中药保健品中发现了 1234 种掺杂物，包括获批或被禁的西药以及动物的甲状腺组织，其中最常见的是抑郁抑制剂西布曲明，在 155 种产品中都能找到。

1

%

据调查，在美国，26% 的儿童曾受到霸凌，在德国是 30%，秘鲁是 47%，最低的是摩洛哥，只有 1%。

你身体里最伤不起的器官

文 / 菠萝万岁

图 / 谢驭飞



总有些时候，你会遇上那些意外：赶车扭到脚，缝扣子扎到手，甚至吃饭咬到舌头。但好在疼过之后你很清楚，这些小伤很快就会自己愈合。

我们是如此习惯于这不可思议的能力，以至于从没有认真地意识到它是多么神奇。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你失去了愈合的能力，哪怕是割伤了手指也会留下终生的伤口，全身上下所有零件都成了一次性的，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并非只有皮肤、肌肉这样的软组织拥有愈合的能力，坚硬的骨组织在骨折后也可以自我修复。如今我们可以将断指接上，可以吻合神经、血管，可以给人移植器官，这些都得益于机体的愈合能力。

有例外存在吗？那些不给你一丝悔改机会，一旦受伤就再也无法挽回的最最伤不起的器官。答案之一是牙齿。是的，你压根没往这上面想，有谁会在意牙齿呢？你见过有谁牙齿烂了个洞，哪怕是再小的洞，贴上创可贴就能长好的？你只有老老实实用非生物的，和你的肉体没有一毛钱关系的补牙材料把洞给填上。你如果用你的牙齿咬核桃、开瓶盖，崩成两半了怎么办？缝合？你有本事缝一个？哈，哪怕你用一个铁箍把崩裂的牙齿箍上，就算过一百年，裂开的牙齿也不可能长起来一丝一毫。

在我还是个牙医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那就是来看牙的病人牙齿越差越觉得自己的牙还挺好，反而是那些牙齿总体情况不错的

人总是说自己牙齿不行。

为什么？贱人就是矫情？就像学霸考了149分就哭丧个脸喊考砸了，说到底无非是个重视程度的问题。就像有些人现在勉强接受了牙齿没法愈合这个设定，但他们还是觉得牙齿的疾病根本不如其他疾病那么重要。

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听上去是多么可怕。不管哪个科室的大夫都遇到过那些紧张到不行恨不得主动申请住院的病人，但口腔科的医生只是想让他抽空按期复诊，都会收到一堆推三阻四的理由。这种人实在是太多了。

我国平均每万人仅有牙医1名，乍听上去好像还行。但让我们来算一笔简单的账。假如1万人每人每年洗牙1次，那么平均每天的门诊量就超过了27人，按每人半小时算也要13个小时了。再加上补牙、根管治疗、拔牙、矫正、种牙……这些治疗耗时更长，有需求的人数也不会少。那么1个医生就算24小时不吃不喝也是搞不定的。我们的牙医之所以没有全体累死，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大部分有治疗需求的患者没有选择就诊。

凡是找我咨询牙齿的朋友，最后的结果都是我比他们着急，他们反正不是忙着工作就是忙着玩，总之不乐意费时费钱费力去看牙。“牙齿嘛，反正那么多颗呢，有问题就拔掉呗。”

在不同的情境下，同一个人会很自然地说出这种互相矛盾的话，其原因是普通人对口腔科、对牙齿的无知。■

扫地改变人生

文 / 老虎油

图 / 谢馥飞



我是个懒散的人，平时不爱劳动，无论是上学还是上班，好像都很少主动扫过地，有时还会觉得那些扫地的人瞎积极。

我知道这样不好。后来看到一些人的故事，我觉得自己更不好了。

读武侠小说时，常神往那些神龙见首不见尾式的人物，像《天龙八部》中的扫地老僧，他在少林寺藏经阁外持一把扫帚出场，三言两语之下，便显出气度、见识、身手皆非常人能及，直令萧峰等几大高手都甘拜下风，可说独步江湖。但他的身份，却不过是扫地打杂的服事僧。

扫地的人竟然这般厉害。我不知道这是金庸的原始想象，还是受了经书语句的启发：“凡扫地者，有五胜利。一者自心清净；二者令他心净；三者诸天欢喜；四者植端正业；五者命终之后当生天上。”看看，扫地的多么伟大。

不只无名的扫地僧，还有不知不觉间学会了一身上乘功夫的觉远和尚，以及他的好徒弟、后来成为一代宗师的张三丰先生，都是扫地的行家里手。觉远当年在华山之巅对杨过说的一句话，暴露了他的工作和平时的活动：“小徒姓张，名君宝。他自幼在藏经阁中助我洒扫晒书。”

相传张三丰发明了太极拳，在武侠小说史上名声不小的《偷拳》的主角杨露蝉，就一心想学太极拳。为此，他不远千里，从河北跑到河南陈家沟，装成乞丐，天天到太极拳名师陈清平的门前扫大街。几回下来之后，总算接近了一度将之

拒之门外的太极陈。

扫地让杨露蝉得以学到不凡的身手，也让大诗人陆游锻炼了身体。在漫长的冬日，闲居斋中的陆游“一帚常在傍，有暇即扫地”，他觉得这项活动，可以平血气。而那些所谓的按摩和导引术，都“不如扫地法”。陆游一口气豪迈地活到了85岁，一生写了数量惊人的上万首诗，或者跟扫地大有关联。

扫地给陆游带来了健康，也给另一个诗人王安石以写诗灵感。住在南京的老王看到他的邻居湖阴先生的住所打扫得相当整洁，诗兴大发，不由得在人家墙壁上挥笔写了开来：“茅檐长扫净无苔……”

正是这样，扫地成全了这些人，让他们的人生变得不同，可说是一项适合居家、访友、出行的有益活动，颇得大家喜欢。至于反面教材，据个人所知，大概只有在成都郊区盖了座第二年便被无情的秋风所破坏的草堂的杜甫了。他称“花径不曾缘客扫”，我们可以认为他是一个不爱打扫、不爱劳动的人。但杜甫也可能像住在辋川别墅的王维那样，“花落家童未扫”，并非他不爱干净，不过是“莺啼山客犹眠”，自有着闲云野鹤般的自然意趣。或许，真正不常扫地的，是哈利·波特和他的魔法世界里的人。他们的扫帚不是用来清理地板墙面的，而是让他们进行球赛的飞行器，是带给他们速度和激情的交通工具，所以他们不在乎扫帚的外形和材质，就像在乎一个会飞的汽车那般。■

深山食堂

文 / 二公子

图 / 谢驭飞



过去的十年，启明每年出差都有两百多天。别人向往的各种远方，就是他去做项目的所在。最长一次，启明窝在一个山沟里埋头仨月，青山绿水之间，太阳星辰之下，断网断剧是日常。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说的就是他这样的项目员。

偶尔从山里出来的启明，不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吐槽中国风的深夜美食电视剧。有说剧里男主不如日剧原版沧桑的，有说故事不如韩版改编得深刻的，有说里面演员各个言语表情夸张的，愣是没有人觉得速泡面可以出现在深夜美食里的！要知道，对于经常身处深山、工作通宵达旦、饥肠辘辘又几乎无处觅食的项目员，速泡面就是情怀，哪怕只有红烧牛肉这一个口味儿。

而泡面之外的深山食堂，选择不多，曲折不少，让人欢喜也让人忧。

曾经在广东，启明半夜被客户拉去吃土法烤排骨。黑咕隆咚的村子里，砖窑一般大的泥炉子红通通地燃烧着，烧烤师傅不断把整扇整扇的生猪肋排挂进去，同时再把炉子里不同成色的排骨挑出来刷酱料。明火被滴下来的热油惹得噼里啪啦响，围坐的食客个个瞪着眼睛咽着口水摩拳擦掌。等到烧好的排骨被一根一根趁热撕开，大家都顾不得烫就一口咬了下去，感受肉食最原始的味道带来的齿颊留香。虽然美味，但那天启明没好意思多吃，主要是怕吃相难看，下次客户就不带着来了。谁知启明的项目中途夭折，之后再也没机会见到客户。无人引路，深夜里的美食山村，便无处可寻。

启明第一次吃全鱼宴，是在一个水电站项目

开工会上。在一眼看不到边的水库边，农家养的大小鲜活鱼，成就了一大桌子鱼菜。清蒸、红烧、干炸、鱼生之外，令他念念不忘的是一盘花椒鱼唇和一碗带骨鱼丸汤。当时启明一边吃一边想，是不是要把这个项目拖一拖做，也好隔三差五就能这么吃一顿。

项目里的伙食，让启明水土不服的也不少。有一家工厂食堂，中午特别给几个项目员开小灶。有一天是做海鲜面线，结果启明海鲜没吃到几口，倒是吃出了小强（蟑螂）尸体。咬不断的小强细腿，仿佛是活的，游弋在嘴里，让人感觉吐也吐不干净。为了避免惨剧再次发生，项目员们改为早上在酒店拼命吃，然后揣上几个煮鸡蛋出来当中饭。晚上酒店餐厅不营业，大家就到附近村子买点大葱大蒜回来就着泡面嚼，因为这样既补充维生素还不会拉肚子。

还有个为期半拉月的项目在中部山村，距离最近的市区也有几十公里。周末启明吃够了泡面想换换样，结果沿着公路走了一小时才找到一家饭馆。也不知道是累到了，还是被山风吹到了，还是菜里辛辣调料放太多，启明吃完就觉得不对劲了，晚上他开始上吐下泻加发烧。那附近也没医院，启明仗着年轻咬咬牙硬扛两天挨过去了。后来一周，启明还是乖乖泡面了。

所以一个好的项目员，都知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一个能坚持下去的项目员，也都知道深夜的深山里，没有面孔沧桑会烧菜会劝酒的大叔救赎人心，只有难寻的食堂让人一言难尽。■

酒店生存指南

文 / 贝小戎

图 / 谢馥飞



有时候你决定花很多钱住豪华酒店，想放松享受一下，至于能不能如愿，多半是靠运气的。美国作家贝恩德·布伦纳在《如果墙壁会说话》一文中说：“酒店房间是很奇怪的地方：它们给我们提供庇护，但并不是我们的家。它们把居住、睡觉和工作压缩到一个小的空间。第一晚很少会是舒服的。床垫可能会太软或太硬，太短或者总是咯吱咯吱响。你是否曾经幸运地找到了灯的开关而不会关掉吵闹的通风设备？在一些比较老的酒店，你可能会发现有一个门通往相邻的房间。你要确定门锁好了！不要多想谁有钥匙可以从另一侧进入你的房间。在酒店度过最后一夜的作家、艺术家和政治家有很多。酒店房间能让你发现自己的极限。”

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有一位老妇人抵达巴尔贝克大酒店，窗帘要换成自带的，然后摆上自己的屏风和家人的照片。“她不去适应外部世界，而是在它和她本人之间竖起了一套由习惯组成的隔板，好像是她的家而不是她在旅行。”1907到1913年，普鲁斯特自己在德国科堡这样的酒店中过了七个夏天，在四层订了三个房间，写他的小说。

要想成为酒店达人，你应该读读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小说。在他的小说《魔山》中，主人公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一个肺结核病疗养院住了一年，那种地方就等于是高端酒店。托马斯·曼

另一部名著《死在威尼斯》的背景是威尼斯的贝恩斯大饭店，托马斯·曼1911年在那里住过。他没写完的小说《大骗子克鲁尔的自白》讲述的是一个花花公子的故事，主人公克鲁尔曾经在里斯本一家豪华酒店当服务员。他能在酒店雇员和客人之间随意转换，通晓老派大酒店里的各种事情。

布伦纳提供了一套酒店生存指南。首先，入住时要跟接待员搞好关系，因为他有权决定是否受欢迎。如果他无须你示范就能准确地读出你的名字，这是一个好兆头。如果你不尊重他，你可能会发现他会是你的头号敌人。如果你经常去某一家酒店，跟其中一位工作人员熟悉了，他会告诉你一些通常不会告诉客人的内部运营的内幕。你能否获得这些内幕，要看你认识的这个工作人员的级别，他的级别越低，你获知内幕的可能性越大，比如哪些房间受到了破坏，酒店有哪些著名的或不受欢迎的客人，哪些房间“不吉利”。打扫房间的人会看到一切，从客人的习惯到他们在服用什么药。切记要给他们留下丰厚的小费。☑

本栏目投稿邮箱更改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诗人”浮标

伦敦数码设计工作室 Six:Thirty 和互动设计师 Matteo Loglio 联手打造的智能系统，内置各类环境监测器的浮标将被投放至运河中，以收集光线、温度和运动轨迹等数据。这些数据随后会通过人工神经网络被翻译成诗句，并从专用的机器中导出。



悬浮式监控

The Moon 1-Ring 悬浮式安防监控利用磁悬浮原理，可实现 360 度无障碍监控，同时可遥控空调等支持红外线开启设备，通过底部基座为其提供无线充电。在监控环境的同时，它还能提供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环境数据，并能通过声音及携带的蓝牙设备实时识别进入监控范围的人，并发送识别信息到手机 APP 中。

美学轮椅

雅马哈提出了一个名为 02GEN 的轮椅概念，看起来稍小的座位和纯白色的车身让人联想到精致的婚纱。除了“婚纱轮椅”之外，雅马哈还邀请设计师广川玉枝推出了以粉金色为主的合作款 Taurs，坐垫表面配有装饰花纹。

自然灯具

工业设计师 Fernando Laposse 的这件名为 Mineralia 的新作，借鉴了 19 世纪矿工所使用的煤气灯，利用电石遇水即燃的反应设计了这盏取之于自然的灯具。通过这种需要耗费大量水资源才能提供照明的方式，他希望能促使人们反思金属矿开采对生态造成的影响。



锁水收纳

台湾的设计团队 Tronnovate 开发了一款名为 STIKY 的多功能织布，它既是一条毛巾，也是轻轻一包就能完成收纳的轻质背包。STIKY 的名字来源于专利的黏贴特性，不需要额外使用别针、只要轻轻一卷就能贴合在一起。它还具有锁水功能，能够让另一面维持干燥，因此可以直接用来打包湿的衣物。

奶酪陶器

为了减少浪费，设计师 Tessa Silva-Dawson 将被浪费的脱脂牛奶转化成酪蛋白塑料，随后加入染料，打造成一批有机陶器。由于它和奶酪的加工过程颇为相似，这也意味着现有的奶酪工厂可以同时这种环保材料的生产。



NBA 计时系统

天梭专为 NBA 设计的计时系统由 24 秒计时器、综合计时计分系统及多功能计时操作终端组成。其计时器整合显示了 24 秒、暂停及比赛时间，其 LED 玻璃使电子线路及导体等完全隐藏，在使用时近乎透明，任何角度均可清晰读数。计分系统的最高精准度可达 0.15PPM (百万分率)。优化处理的软件设计与功能，减少了误操作和操作延迟的可能性。



凡尔赛花园

迪奥 2017 夏季高级珠宝系列中的“凡尔赛花园”戒指，灵感来自这座皇家宫殿花园的自然与建筑元素，石榴石、祖母绿、黄钻、红宝石等包围着中间的巴西碧玺。

香水旅行箱

路易威登 200 毫升旅行箱用于保护旅行中的香水玻璃瓶，黄铜搭扣紧紧扣住圆筒状的箱体，使用者可以要求烫印自己的名字字母缩写。



别担心

稀奇艺术品牌的作品《别担心》，艺术家向京塑造了一个怀抱娃娃的小女孩形象，正闭着眼睛、吟唱摇篮曲哄娃娃入睡，她是温暖与安全感的化身。



月相腕表

宝格丽 LVCEA 月相腕表具备月相、时针、分针与秒针的显示功能，夜光珍珠母贝的圆形表盘上方是弧形红宝石月相视窗，每个时标上镶嵌了一颗钻石。



层压木管椅

瑞典品牌 Lamhult 的 Penne 椅将斯堪的纳维亚式的简约设计与新颖材料结合在一起，彩色椅腿由轻质层压木管制成，减轻重量的同时提供了与传统木椅一致的高度稳定性。



老式“电视机”

丹麦品牌 Design Letters & Friends 的“电视”托盘系列用彩色镀漆钢板制作，圆角造型的灵感来自老式电视机屏幕，凸起的边缘可以防止托盘中的物品掉落下来。



无线便携灯

Marset 品牌的 Follow Me 无线 LED 灯可以随身携带，天然橡木手柄搭配白色聚碳酸酯制成的摆动式灯罩，构成小巧清新的外观。



知识的无限可能 科技的无限可能 你的无限可能

数据正在改变你的工作,成为竞争力的核心。

但从未有人能将所有数据一览无余、运用自如。现在,IBM云计算和IBM Watson能做到。

这是一个崭新的商业平台,由IBM员工和技术鼎力支撑,成就你一生的事业,成就最好的你。

这,就是你与IBM的无限可能。

我是金融顾问,我能把气象数据 和社交媒体数据转化为高额回报。

借助IBM云计算和IBM系统,金融顾问能在一个安全且合规的环境中,把交易数据与结构化、非结构化的数据相结合,从中发现过去无法察觉的模式,打造出全新的金融产品。这就是金融业与IBM的无限可能。



you ^{IBM}
你与IBM的无限可能



想知道你与IBM的无限可能?
快来一探究竟

我是医生，我能每天跟进5,000项新的医学研究，并照常接诊。

借助IBM Watson和IBM服务，世界各地的医生能充分利用临床指导、医学文献和患者的数据资料——相当于近3亿册书——提供先进的个性化诊疗方案。这就是医疗业与IBM的无限可能。



我是程序员，我能帮助275,000位司机减免停车罚款。

借助IBM Watson和IBM云计算，一名年仅20岁的程序员创建了一个聊天机器人，为驾驶员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帮助其成功申诉，节省了超过400万美元的停车罚款及相关费用。这就是编程与IBM的无限可能。



我是工程师，我能同时“出现”在3,000万个工程地点。

借助IBM云计算和Watson物联网，工程师能利用来自数百万个传感器的物联网数据预测故障，让一切——无论赛车还是风力发电机，都能运转自如，防患未然。这就是制造业与IBM的无限可能。



我是IT分析师，我能每秒应对100万起安全事件。

借助IBM安全和IBM Watson，数千家公司IT分析师能每天监控并处理超过350亿起安全事件，比以往速度快60倍。这就是IT安全与IBM的无限可能。



我是客服专员，我能同时解答33,000位客户的33,000个不同问题。

借助IBM服务和IBM Watson，数以万计的客服人员能将解决问题的速度加快70%，每年为企业节省1120万美元，同时提高客户参与度和忠诚度。这就是客户服务与IBM的无限可能。



我是物流经理，我能全程掌控7,000万次物流运输的每个环节。

借助IBM区块链和IBM Watson，面对跨越数千英里、数十个国家的全球供应链，物流经理能准确预测其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及时协调交易，降低成本，并提高可预测性和效率。这就是物流业与IBM的无限可能。





(图为中国网)

10月9日，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它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表彰其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贡献

改变世界的人

2017 诺贝尔奖

记者 苗千

10月初的斯德哥尔摩正处于最为绚烂的时光，植物五彩斑斓，由大大小小的岛屿组成的城市或许是因为其地处高纬度的原因，混合着天空与海水的蓝色，反射着阳光，总体呈现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除和平奖外，负责评选和颁发诺贝尔奖的各个机构就隐藏在这座城市的波光树影之中。2016年的10月初，我曾赴斯德哥尔摩负责报道诺贝尔奖揭晓的情况，身处诺贝尔奖的核心区域，所感受到的反而是低调、宁静、毫不张扬。即便是瑞典皇家科学院也给人一种简朴的感觉。这正是瑞典人给世界的印象，他们谦逊、公正、民主，保证这个奖项百余年来始终维持在高水准。

在1895年11月27日，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在巴黎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签署了他的遗嘱。到了1896年12月10日诺贝尔去世之后，这份被公开的遗嘱无论是在诺贝尔的家族内部还是国际社会都激起了各种争论。这位生前以炸药发明人和企业家闻名于世的瑞典人把自己的全部资产分为五份，设立为诺贝尔奖，分别授予那些在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与和平领域“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这份最初引发了诸多争论的遗嘱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忠实地执行，它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最崇高的奖项之一。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不仅是一种极高的荣誉，也是为全人类共同的福祉做出卓越贡献的证明。

在100多年的时间里，诺贝尔奖更多是被看作一个有关自然科学的奖项，但实际上，诺贝尔奖在自然科学领域只涵盖了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等一小部分。其余如文学奖更多体现了诺贝尔的个人趣味——他在进行发明和经商之余，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而设立和平奖，或许是因为诺贝尔作为炸药的发明人，一直对于炸药可能为人类造成的危害而惴惴不安。

在增设了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这个奖项也只涵盖了六大领域。“菲尔茨奖”和“图灵奖”分别是数学领域和计算机领域的国际最高奖项，但其声誉都远远无法与诺贝尔奖相提并论。时至今日，诺贝尔奖因

为其上百年来的高水准、客观性和国际声誉，已经成为人类理想的象征。这个奖项也成为了代表瑞典王国形象的最好的名片。

诺贝尔奖何以成为今天的诺贝尔奖？实际上，诺贝尔委员会也逐渐意识到随着各种名目的国际奖项越来越多，诺贝尔奖的地位也正受到挑战，它也需要经营以保持自身的影响力。每年有瑞典王室参加的盛大颁奖典礼，乃至典礼晚宴的菜单，都会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在每年10月初，全世界都不知道有多少名杰出的科学家彻夜不眠，等待那一通“改变命运的电话”。

一旦获得诺贝尔奖，荣誉和财富必将如潮水一般涌来，这对于一名研究者、作家，或是社会活动家来说可能是一个绝佳的机遇，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学术资源、资金支持或是写作素材，也有可能命运自此转弯，被金钱和掌声所淹没，从此远离自己之前所从事的领域。

在科学领域，诺贝尔奖基本上都是授予了最杰出的科学家，结果令人信服。诺贝尔委员会始终坚持以事实为唯一的判断标准而很少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英国科学家皮特·希格斯，他早在1964年就提出了“希格斯机制”，预言了“希格斯波色子”的存在。这套理论虽然早被物理学界所接受，但是直到欧洲核子中心在2012年宣布真正探测到希格斯波色子的存在，希格斯才获得了201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正是诺贝尔委员会的严谨态度，让希格斯等待了将近半个世纪才获得这份荣誉。

刚刚过去的2017年10月初，在全世界的瞩目之下，又有11个人和1个机构成为诺贝尔奖得主，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总共有881人和23个组织获得过这项荣誉（有人曾多次获奖）。相比于科学领域有相对客观的评价体系，诺贝尔文学奖与和平奖两个奖项的评选相对更加主观。来自各个方面，对于这两个奖项的种种争议和质疑每年都必定会出现在诺贝尔奖揭晓之后。即便如此，每一年我们关注诺贝尔奖的颁奖状况，实际上就是关注我们自身。诺贝尔奖已经成为一个人类之梦，这里有着人类探索自然界和自己精神世界的勇气。■



[东方IC供图]

2017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了解你的生物钟

主笔 / 曹玲

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解开了其中的秘密。

2017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获奖领域就和生物钟有关，三位美国遗传学家，杰弗里·霍尔 (Jeffrey C. Hall)、迈克尔·罗斯巴希 (Michael Rosbash)、迈克尔·杨 (Michael W Young) 得奖，因为他们发现了昼夜节律的分子机制。所谓昼夜节律，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生物钟。

我们知道，包括人类在内的很多有机生命都拥有一种特殊的内部时钟，这种时钟能够帮助他们预

料并且适应每天的节律，但这种特殊的内部时钟既无齿轮，也无指针，它究竟是什么？又是怎样工作的呢？

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生物学家西摩·本泽 (Seymour Benzer) 就开始寻找可以控制果蝇昼夜节律的基因。他发现，有个当时还不知道的基因如果发生突变，可以将果蝇的生物钟调快、调慢，甚至关闭。他给这个新基因起了个名字，周期基因 (period gene)。那么，这个基因是如何影响节律的呢？

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研究的就是这个问题。1984 年，三位获奖者紧密合作，成功地分离出了 Period 基因。他们把这个基因编码的蛋白起名为“PER”。他们发现，在晚上 PER 蛋白会在果蝇体



【东方IC供图】

左图：美国遗传学家迈克尔·罗斯巴希

右图：美国遗传学家杰弗理·霍尔

内积累，到了白天又会被分解。所以 PER 蛋白的浓度会循环震荡，周期为 24 小时，和昼夜节律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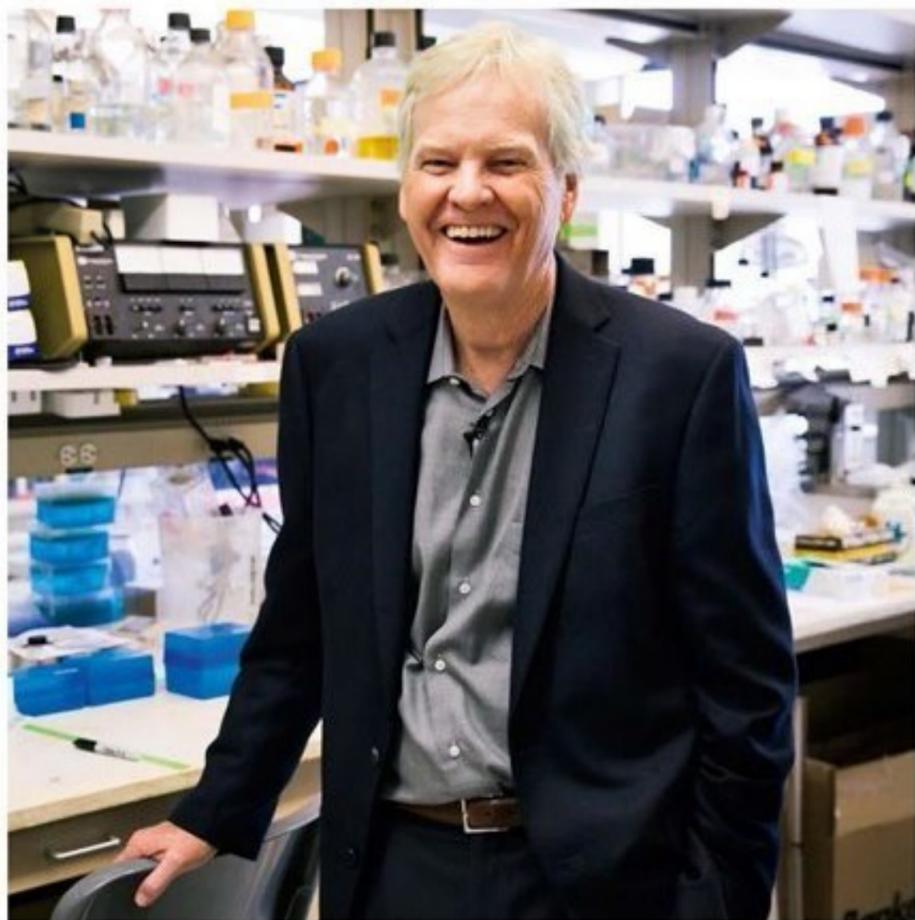
那么，PER 蛋白如何保持稳定的震荡周期的呢？杰弗理·霍尔和迈克尔·罗斯巴希提出了一个假说：PER 蛋白可以让 period 基因失去活性。换句话说，PER 蛋白和 period 基因形成了一个抑制反馈的环路，PER 蛋白可以抑制基因合成自己，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连续、循环的节律。

杰弗理·霍尔和迈克尔·罗斯巴希的研究表明，每当晚上的时候，PER 蛋白会在细胞核里积累。接下来，研究人员问它是如何进入细胞核的？1994 年，迈克尔·杨发现了第二个节律基因，被命名为 Timeless（不受时间影响）。Timeless 基因可以编码 TIM 蛋白，同样为正常节律所需。迈克尔·杨做了一个漂亮的实验，发现 TIM 蛋白会结合到 PER 蛋白上，然后两个蛋白可以一起进入细胞核，并且在那里抑制 period 基因的活性。

以上的研究揭示了蛋白水平为什么会出现震荡，这种震荡的频率周期为什么维持在 24 小时呢？迈克尔·杨又发现了一个基因名为 Doubletime（双倍时间），可以编码 DBT 蛋白。DBT 蛋白可以延迟 PER 蛋白的积累，这解释了为什么震荡的周期为什么会稳定在 24 小时左右。

这三位新科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阐述了生物钟的理论基础，奠定了生物钟研究的基础。目前，全世界的研究者已经发现了数十个与生物钟有关的基因，进一步解释了生物钟的机理和稳定性。

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物钟的张珞颖教授说：“生物节律获奖是个让人挺高兴的事情。这个领域一直是一个比较小的领域，虽然挺重要、挺有趣，但是如果一个人生物钟紊乱，他也能够活下去，只是活得不那么理想，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相比一些不治疗就会死的疾病，可能大家就没有那么重视。”生物节律获得诺奖，很可能会引起大家对这一领域的关注。



美国遗传学家迈克尔·杨

[东方IC供图]

复杂的生物钟网络

事实上，生物钟是一门古老的学科。179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法国天文学家让·雅克·德奥图·德梅朗发现含羞草已经“睡觉”了，它的叶子合上了，而白天时它的叶子是张开的。他好奇如果含羞草持续处于黑暗环境中会产生什么变化，之后他发现，尽管没有日光照射，含羞草的叶子每天仍然保持其正常的规律性变化。显然植物能够“知道”太阳的位置，知道什么时候是白天，什么时候是黑夜。德梅朗是发现昼夜节律的第一人，他的报告出现在一篇重要的科学论文中，只有350个单词，组成7个很长的句子。

后来，其他科学家发现不只植物，动物和人类也有生物钟帮助自身生理状态适应环境的日常变化。地球每24小时绕地轴自转一周，或沐浴于阳光中，或湮没于黑暗里。对生物体而言，“吃喝拉撒睡”皆有定时，随着地球日夜更替的节拍发生适时地演变。

一天24小时并不是地球上唯一的时间结构，除了它之外还有潮汐时间、月亮周期和以年为单位的周期。生活在海里的动物受潮汐影响较大，以年为周期出现的现象有候鸟南飞、鲑鱼洄游、爬行动

物冬眠等等。还有一些生物的生活周期令人费解，比如珊瑚虫会在繁殖季节满月的午夜一齐产卵。后来，科学家发现珊瑚虫体内有一种光传感器，能感知满月时的光线，从新月到满月，月光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体内的传感器基因随之渐渐活跃，充当了满月之夜产卵的触发器。

上世纪70年代，科学家找到了哺乳动物生物钟的位置所在。动物眼睛后面的小丘脑有两个很小的区域，现在被称为视交叉上核，这个区域的神经元连接视网膜，负责对光明和黑暗的周期性反应，让肌体随着白天和夜晚的时间活动或休息。视交叉上核只有四分之一米粒大小，由大约20000个神经细胞组成，这两个区域向大脑和身体发出信号，控制激素释放、调节体温和食欲，被称为中央生物钟。

曾有病人因患脑瘤接受手术切除，在切除肿瘤组织的同时，也切除了一块视交叉上核组织。手术后，这个病人的体温、睡眠—觉醒的昼夜节律特性就消失了。

除了中央生物钟外，人体还有很多外周生物钟。2014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学家约翰·霍格尼斯(John Hogenesch)发现，哺乳动物近一半的基因活性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他绘制了小鼠12个不同器官中成千上万基因的24小时表达模式，包括心脏、肺、肝脏、胰腺、皮肤和脂肪细胞，制作出哺乳动物基因振荡“图谱”。

令人惊讶的是，控制基因活性随时间变化的信号并不一定来自大脑。如果把肝脏细胞养在培养皿中，它也会很快进入24小时节律。“人体只有一个生物钟”的概念已经成为过去时。目前的研究认为，人体中数以千计甚至百万计的生物钟，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它们各行其是，相互通话，相互协调，完全改变了人们对生物钟的认识。

“此次得奖内容研究的是生物钟的核心机制：钟是什么，有哪些成员。除此之外关于生物钟的研究还有很多，比如哪些因素可以调控生物钟，生物钟是如何调控生物的行为和生理过程的；几乎每个细胞都有一套生物钟，不同的组织和细胞是如何协同来调控行为和生理过程的。”张珞颖说。

她的研究主要针对生物钟是如何调控生物的行为和生理过程的，有一部分关于生物钟对情绪的影响。她在美国做博士后的时候，实验室发现一个奇怪的家族，他们每天晚上七八点就睡觉，凌晨三四点起床，生物钟显著提前，被称为家族性睡眠相位

提前综合征。这个家族还患有季节性情感障碍，每年的12月到次年2月抑郁症发病率最高，到了第二年5月疾病会自发好转。医生认为冬季抑郁可能是由于冬季日照较短导致的，通过每天给患者清晨半个到一个小时的光照可以缓解抑郁症，而傍晚光照是没有效果的。研究人员怀疑发病和生物钟有关，结果发现此家族携带Per3基因突变。Period (per)基因家族是生物钟调节基因的主要成员，哺乳动物有Per1、Per2、Per3三个基因。

他们对携带Per3基因突变的转基因小鼠进行研究，发现携带了这个突变的小鼠昼夜节律改变，出现抑郁行为，可以用来研究生物钟和情绪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用幸福指数来衡量情绪指数，发现情绪的昼夜节律和人体体温的节律类似，傍晚时达到最高点，凌晨时达到最低点。”张珞颖说。但是目前，生物钟是如何调节情绪的还不清楚。

生物钟的出现给生物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的优势，其中最经典的一个是蓝藻实验。1998年，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卡尔·约翰逊(Carl Johnson)发现用一种叫蓝藻的单细胞生物进行研究。正常蓝藻的生物节律是24小时，基因突变的蓝藻生物节律可以缩短也可以延长，比如22小时或者26小时。这些基因突变的蓝藻和正常蓝藻等比例混合培养，处于12小时光照，12小时黑暗的条件下，之后发现突变蓝藻基本消失了。

如果把它们放在11小时光照，11小时黑暗的情况下，生物钟是22小时的突变蓝藻生长较快；或者在13小时光照和13小时黑暗的情况下，26小时生物钟的蓝藻生长较快。无法适应光照更替环境的蓝藻，生存竞争力显著降低了。

在生物钟的作用下，蓝藻在日出之前即可提前动员光合作用系统，在阳光一出现的时候就可以摄取能量，比那些纯粹依靠光线启动光合系统的生物领先一步。与之类似，日落之后，蓝藻的光合系统会遵循生物钟的指令而关闭，避免了夜间无用的能量等资源被无谓浪费。这些实验第一次清楚地显示：内部的代谢节律与环境周期相匹配会增强物种的适应性。

也有人做过动物实验。正常的松鼠夜间视力不好，一般白天出来活动。研究人员把松鼠体内调节生物钟的视交叉上核破坏掉之后，松鼠的生物钟消失了，白天晚上都会出来活动。把这样的松鼠放归自然界，一个月后，它们被天敌捕食的数量远远超

过正常松鼠。

长期研究生物钟的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郭金虎教授说，在正常的自然界，对于多数动物来说，如果没有或者不按照生物钟规律活动，根本无法生存。比如美洲的黑脉金斑蝶，生物钟对长途迁徙的方向定位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破坏了生物钟，它们将无法正确判断迁飞的方向。

生物钟和健康

对于人类而言，生物钟紊乱也会引发很多问题，最常见的就是倒时差。得过时差综合征的人们充分理解若想使生物钟与头脑达成一致该有多痛苦。时差综合征的一个症状是尽管非常疲惫，但晚上还是会失眠，此外还会导致注意力减退、协调能力变差、认知能力降低、情绪波动、胃口变差等问题。研究发现，生物钟失调甚至会导致生殖周期紊乱，以及多种生殖系统相关的疾病，在跨时区飞行的女乘务员中超过30%的人出现月经失调。

19世纪以前，人类的社会生活时间与当地太阳时间是一致的：中午是太阳到达最高点的时间。理性的时间划分规则在铁路被发明之后受到了冲击，突然间人们可以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走过很长的路程，导致当地的太阳时间完全不能用了。因此1884年很多国家共同实行了一套体系：把世界分成24个时区，把穿过伦敦附近的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设定为本初子午线。

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包括飞机发明以前的人，根本没有倒时差的问题，也就没有进化出快速和大幅度校表的机制。由于多数生物的生物钟与地球的24小时节律相差无几，每天也就调整十几分钟左右。“这就像以前的手表走得不准，每天晚上对着收音机对对表，并不妨碍使用。”郭金虎说。

而大型喷气式客机的出现，使得人们从太平洋西岸的上海飞到东岸的洛杉矶，只需要12个小时左

19世纪以前，人类的社会生活时间与当地太阳时间是一致的：中午是太阳到达最高点的时间。理性的时间划分规则在铁路被发明之后受到了冲击。

右，时间“后退”16个小时。这样在一天之内造成的时差不是任何生物钟可以立即适应的。

现代生活方式很少能与我们的生物钟保持一致。如今社会中，对人体生物钟产生最严重负面影响的工作就是倒班工作。倒班工作意味着，人们吃饭的时候，并不是身体最适宜消化的时间，相反胃在需要食物的时候，却吃不上饭；睡觉的时候，并不是体内生物钟希望的睡觉时间，工作的时候，是身体需要休息的时候；在大脑和眼睛希望处于黑暗的时候，它们却暴露在光线中；身体和大脑持续存在压力，因此不得不依靠诸如咖啡之类的东西来平衡疲惫感。有假说认为，持续的身体压力降低了机体抵御疾病的能力。

持续几十年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从事倒班工作的人比从事传统工作的人患病的概率更高，其他负面影响还包括睡眠障碍、抑郁、心脏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以及其他代谢类疾病。数据显示，在倒班工人中，乳腺癌的发生率高达36%~60%，夜间过度照明可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这可能是引起肿瘤高发病率的原因。

科学家们已经开始制作人体各组织器官的活动时间线。例如，我们的身体为迎接一天的繁忙工作，心脏会率先经历一阵紧张活动。黎明前那段忙碌时分是应激激素皮质醇的分泌高峰期，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心脏病容易在清晨发作。

同样，肺也会在我们最活跃、最需要它的时候提高效率，同时免疫功能也会增强。甚至有迹象表明，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症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生物钟的变化有关，可以解释为什么症状往往在下午和晚上更严重。医生逐渐认识到，打乱人体生物钟还会增加患精神疾病的风险，包括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

一些公司正在瞄准外周生物钟来开发药物。以肺举例来说，肺在夜间活性降低，哮喘病在夜间更易发作，生物钟紊乱引发的最致命的症状之一就是夜间哮喘。几年前，爱尔兰地平线制药公司获得批准，研制了一种能缓解哮喘症状的类固醇药物，强的松缓释配方。还有研究表明，如果人们在睡觉前服用降压药缬沙坦，比醒来时服用效果提高60%，还能降低糖尿病的发病风险。所以有研究者认为，夜间给药是促进大众健康经济有效的方式。

很多药物都在不同程度上考虑了人体的生理节律，比如100个美国最常用的药物中有56个、250

个世界卫生组织基础药物清单中有119个都考虑了这一点。这些药物中许多都有6小时左右的半衰期，也就是说，服药约6个小时后，药物在体内的浓度会下降一半。2014年，约翰·霍格尼斯发表了这一研究成果后，美国多家制药公司纷纷向他求助，想知道有些以前被定为有毒或者低效的药物，是否只是因为检验的时候选错了时间。

张珞颖说，时间是影响药物效率的一个重要但却被低估的因素，目前有一个新兴的领域叫“时间治疗学”。我们的细胞中存在一种时钟，调控着药物的新陈代谢，因此一些药物适合在夜间给药，一些适合在白天给药。时间疗法遵循患者的生理节律，从而减弱了治疗的毒性，并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时间疗法已经被用于癌症治疗领域。一旦细胞癌变，癌细胞的生物钟要么昼夜颠倒，要么完全紊乱。科学家们在一项针对老鼠的实验中发现，清晨接受癌症药物治疗的老鼠，没有下午接受治疗的老鼠存活率高。在针对人类的研究中也发现，许多治疗癌症的常用药物随着给药时间的不同以及患者生物钟的不同，药效也不一样。在合适的时间服药，药物对肿瘤的杀伤力会大一些，而对身体的伤害会小一些。

在风湿性关节炎领域，针对时间疗法的研究也在进行。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症状通常在早晨更严重，在这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免疫系统T细胞攻击自身所致。这些细胞都有自己的生物钟，它们的炎症反应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一些风湿性关节炎的药物疗法相对来说毒性较大，产生严重的副作用，比如肝损害、掉头发等等。如果能确定最佳给药时间，药物就可以在有需要时才对免疫系统进行抑制，降低副作用。

“生物节律研究领域的规模虽然小，但是非常有趣，里面还有很多的未知等待我们的探索。”郭金虎说。他的研究还包括太空里人体生物钟的变化规律等内容，“比如国际空间站里的光照强度比白天地表的强度低很多，而光照强度对于生物钟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此外，重力的改变也会对生物钟和睡眠产生影响。航天员还要执行一些临时性的突发任务，也会影响睡眠。这些都会使宇航员的反应能力和操作能力严重下降，从而降低工作效率，增加事故发生的风险。所以要实现人类的飞天梦，深入研究生物钟的变化规律和调节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热门人选

奖项颁布之前，各路人士往往乐此不疲地预测哪个领域及哪个人会得奖。专业信息服务提供商汤森路透每年都会提前发布“引文桂冠奖”，以预测今年或不久的将来可能获奖的科学家。“引文桂冠奖”自2002年首度颁布以来，已有共43位该奖项得主荣膺诺贝尔奖，是用数据说话的预测。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通过“诺奖风向标”进行预测，比如拉斯克医学奖、阿尔伯尼生物医学奖得主有很大可能获得诺奖。

基因编辑技术

2015年，《科学》杂志将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评为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之首。目前，科学家们已经证实，利用CRISPR可以治疗小鼠的肌肉萎缩、罕见肝脏疾病，甚至使人类细胞具有免疫HIV等功能。虽然此领域较新，但很多业内人士认为得奖只是时间问题。



德国亥姆霍兹传染研究中心的埃马纽埃尔·卡彭蒂耶

热门人选：1.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詹妮弗·杜德娜（Jennifer Doudna）和德国亥姆霍兹传染研究中心的埃马纽埃尔·卡彭蒂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2.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德研究所华裔科学家张锋以及哈佛医学院的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

这两组科学家之间的CRISPR-Cas9专利之争已经持续了4年，至于诺奖会花落谁家尚未可知。2015年汤森路透预测是第一组会获奖，2016年的预测则变为第二组。

肿瘤免疫治疗

肿瘤免疫治疗由于其卓越的疗效和创新性，2013年被《科学》杂志评为年度最重要的科学突破。CTLA-4、PD-1、Car-T等肿瘤免疫机制的突破，给肿瘤的治疗带来划时代的变化。业界认为，肿瘤免疫治疗有望成为继手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后肿瘤治疗领域的一场革新。目前，肿瘤免疫治疗已在一些肿瘤类型如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等

的治疗中展示出了强大的抗肿瘤活性，已有一些肿瘤免疫治疗药物获得美国食药监局的批准。

热门人选：德克萨斯大学安德森免疫学学院癌症中心癌症免疫学家詹姆斯·埃里森（James Allison），他今年获得了拉斯克医学奖，他的研究聚焦一种叫做CTLA-4的特异蛋白，这种蛋白能够抑制免疫系统攻击肿瘤细胞的能力。如果阻断CTLA-4，可以“释放”免疫系统中的T细胞，使之攻击肿瘤。目前，这种疗法已经帮助了成千上万的晚期黑色素瘤患者。

表观遗传学

为什么近乎拥有完全一致遗传信息的同卵双胞胎，有时一个会患有白血病、红斑狼疮等疾病，另一个却不会呢？研究人员发现，双胞胎中不同个体对遗传信息的“表观修饰”存在大量差异——DNA甲基化水平不同。甲基分子（-CH₃）就像一顶帽子：带上它，基因关闭；摘掉它，基因表达，被分别称为甲基化和去甲基化。这意味着即使基因本身不会发生改变，其他因素也会导致生物的基因表达有所不同，即表观遗传学。

热门人选：1. 英国爱丁堡大学遗传学家艾德里安·伯德（Adrian Bird）和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研究人员霍华德·锡达（Howard Cedar）、阿亥龙·拉辛（Aharon Razin）。锡达和拉辛第一个解释了DNA甲基化发挥作用开启或关闭基因表达的机制，促成了表观遗传调控研究的兴起。伯德则通过阐明两种不同的甲基化类型扩展了这一研究工作。2. 洛克菲勒大学大卫·艾利斯（David Allis）教授，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迈克尔·格伦斯坦（Michael Grunstein）教授。他们对组蛋白修饰，以及其在组蛋白调控中作用的基础性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

肠道微生物

作为寄居在人体肠道内微生物群落的总称，肠道菌群成为近年来微生物学、医学、基因学等领域最引人关注的研究焦点之一。科学家的研究逐渐揭示了肠道菌群的构成、数量如何进入人体、如何辅助消化、如何影响肠道发育，以及肠道菌群失衡如何影响整体健康。

世界各国的研究人员在对不同的慢性疾病研究时，发现基本所有慢性疾病的进程都与肠道微生物密切相关。人体有70%以上的黏膜免疫发生在肠道，通过复杂的免疫机制，肠道和肠道菌群与全身各部位各器官发生紧密的联系，甚至和心脏病、精神疾病也有一定的关联。

热门人选：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教授杰弗里·戈登（Jeffrey Gordon），通过对肠道菌群的长期和细致研究，他揭示了人与肠道微生物间的复杂关系，发现肠道菌群失调与营养不良、肥胖症、糖尿病等疾病息息相关，为我们理解肠道菌群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微妙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野。



(东方IC供图)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基普·索恩

2017 诺贝尔物理学奖 倾听宇宙的声音

记者 苗千

2017年10月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本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三位在引力波探测中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莱纳·魏斯（Rainer Weiss）将获得二分之一奖金，来自加州理工学院的巴里·巴里什（Barry C. Barish）和基普·索恩（Kip S. Thorne）将各获得四分之一奖金。

近些年来，本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归属算得上是最没有悬念，也最为众望所归的一次。这关系到人类对于广义相对论一百多年来的不懈验证，以及对于宇宙时空中所产生的极其细微的波澜长达数十年的探索。

人类能够把整个宇宙作为一个对象来研究，起源于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随着对广义相对论的认识逐渐深入，人类也逐渐开始理解整个宇宙的时空和物质之间相互作用要受到一套基本原则的约束。另一方面，通过推导和求解广义相对

论的方程，科学家们也得出了一些令人吃惊的结果，例如一些剧烈的天体活动可能导致时空本身产生振荡，这种振荡会以波的形式通过时空本身以光速传播，这就是广义相对论所预测的引力波。

爱因斯坦本人一开始并不相信引力波的存在，当他后来开始相信引力波确实可能存在，又因为这种时空的振荡在地球上可能造成的效果太过微小而预测人类可能永远都无法直接探测到引力波。尽管对于引力波的直接探测非常困难，但天文学家们首先通过宇宙观测间接探测到了引力波的存在。1974年，美国天文学家约瑟夫·泰勒（Joseph Taylor）与他的学生拉塞尔·赫尔斯（Russell Hulse）发现了一个脉冲双星系统 PSR 1913+16，这两颗相互围绕运转的中子星的公转周期不断变小，说明这个双星系统正在损失能量。根据广义相对论的预测，这个系统所损失的能量正是以引力波的形式辐射出去，并且观测数值与计算相符，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引力波存在的间接证据。这对师徒也因为这个发现获得了 1993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发现引力波存在的间接证据是一回事，在地球上直接探测引力波则是另外一回事，两者的难度完全不同。人类尝试在地球上直接探测引力波的努力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马里兰大学的物理学教授约瑟夫·韦伯（Joseph Weber）悬挂了多个高 2 米、直径 1 米的圆柱形铝块作为引力波探测器。韦伯相信，当引力波经过这个探测器时，会使铝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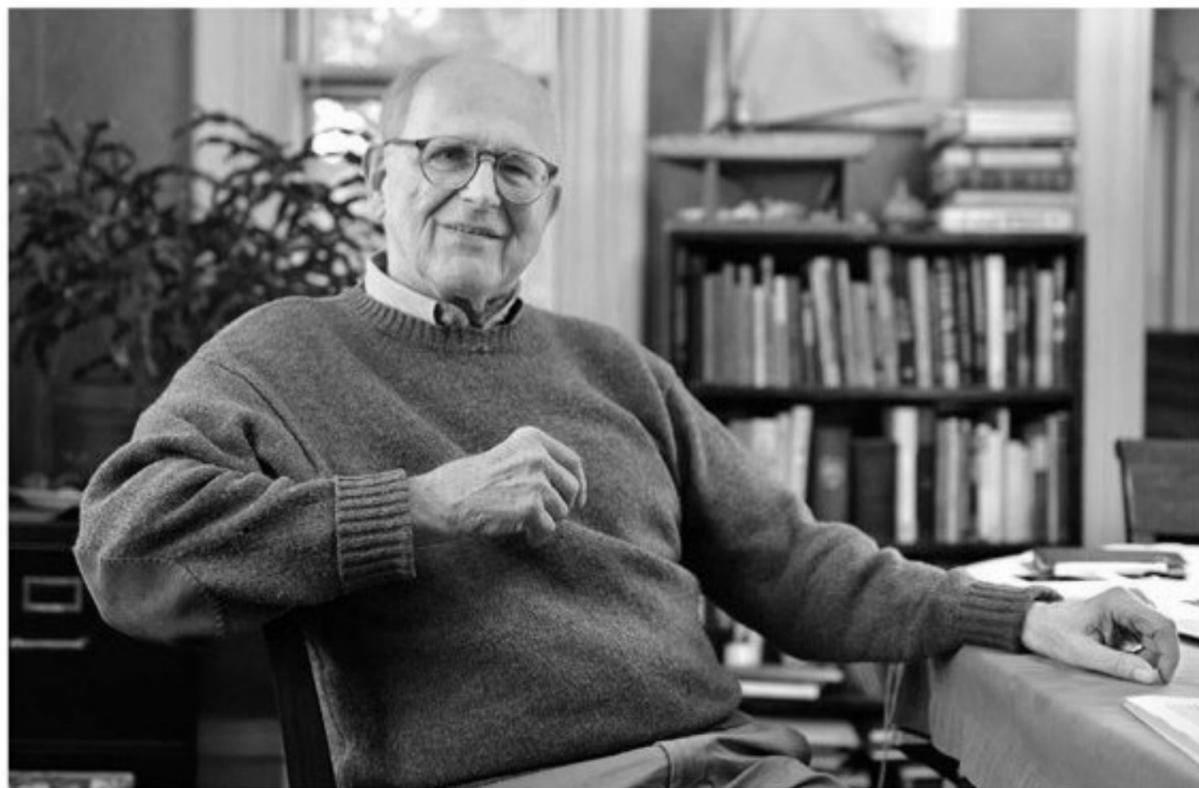
产生百万分之一纳米的形变，有可能引发铝块产生出可以被探测到的电信号。韦伯几次声称他通过这种引力波探测器探测到了引力波信号，但是因为没有人能够重复他的实验结果，这个结果始终没有得到科学界的承认。

人类对于引力波更加精密的探测始于激光干涉技术。莱纳·魏斯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相信人类有可能通过精密的激光干涉技术在地球上探测到引力波，他也曾经亲自设计过激光干涉引力波探测器。几乎与此同时，基普·索恩和已经于 2017 年 3 月去世的英国物理学家罗纳德·德雷弗（Ronald Drever）也在设计类似的引力波探测装置。1999 年，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投资建造的两个巨型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aser Interferometer Gravitational-Wave Observatory）完工，这两个形状相同的各有一对相互垂直的长达 4 公里的悬臂的巨型引力波探测装置简称 LIGO，彼此相隔 3000 公里，从 2002 年起开始进行引力波探测工作，有来自 20 多个国家的超过 1000 名科学家在这里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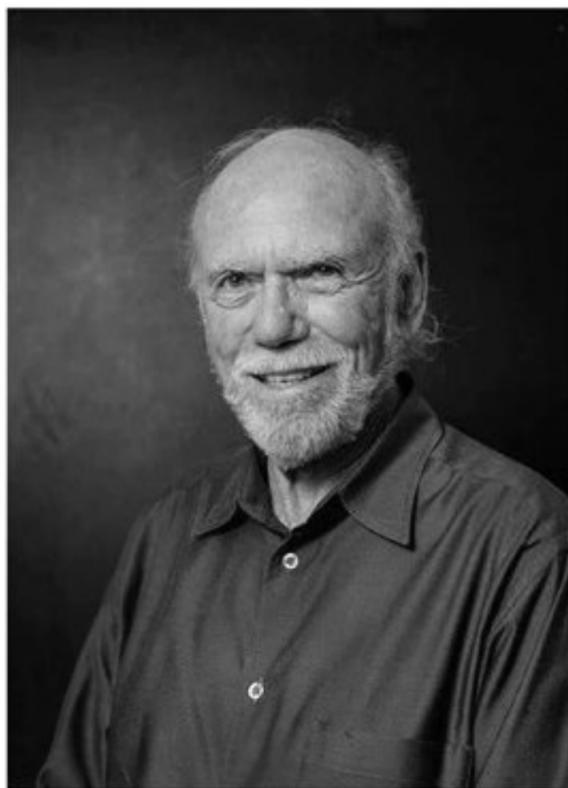
从 2002 到 2010 年的引力波探测期间，LIGO 并没有获得任何引力波的信号。科学家们并没有放弃，他们改造了 LIGO，大幅提高了探测器的精度，LIGO 也改名为“先进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aLIGO）。人类用这样的庞然大物，探测着宇宙时空不到一个质子宽度的变化，这不仅展示了人类在物理学领域的辉煌成就，也是工程学上了不起的奇迹。

左图：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莱纳·魏斯

右图：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巴里·巴里什



（东方IC供图）



（东方IC供图）

通过灵敏度更高的探测手段，科学家们终于在2015年9月第一次接收到来自宇宙深处的引力波信号。经过几个月的数据分析，aLIGO的科学家们相信这个信号是距离地球13亿光年之外，两个中等质量的黑洞发生碰撞时所释放的引力波。引力波的强度虽然极其微弱，但是其频率恰好在人类的听觉范围以内，所以人们可以把引力波信号直接转换为声音信号播放，这样可以获得对于引力波这种宇宙时空的涟漪更为直观的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探测宇宙中的电磁波和高能粒子相当于人类望向宇宙的目光，那么在地球上的引力波探测器就相当于人类的耳朵，聆听来自宇宙深处细微的声音。只有通过不同的感官相互协作，人类才有可能真正地了解宇宙。

诺贝尔物理学奖只能授予个人而非某个集体或组织。引力波探测属于耗时耗资巨大、多人协作才得以完成的一项大科学研究。只有在21世纪的高精度工程建设、紧密的国际合作等各种条件支持下，人类才有可能完成aLIGO引力波探测这样复杂的科学项目。诺贝尔委员会想要从中选出三位具有代表

性的科学家领取诺贝尔奖并非易事。莱纳·魏斯与基普·索恩是最早意识到人类有可能直接探测到引力波的物理学家，他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积极地设计建造各种引力波探测天线，尽管经历了数十年的失败却始终没有放弃；巴里·巴里什从1994年起担任LIGO的主任，他把一个只有40人的研究小组转变为一个有上千人参与的国际合作项目，也正是他提出了提高天文台探测精度的“aLIGO计划”，使得探测到引力波信号成为现实。

这三位物理学家赢得物理学界的最高荣誉实至名归，但完成引力波探测而最终被人们铭记的，除了这几位获奖者之外，还应包括所有在aLIGO工作的科学家们。引力波探测算得上是人类对于已经有上百年历史的广义相对论的最终验证，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随着越来越多的引力波信号被探测到，引力波天文学正在成为现实。人类正在地面上或是在太空中建设更多的引力波探测装置，倾听来自宇宙深处的声音。宇宙那层神秘的面纱正在被徐徐揭开。✍

（本文写作参考了诺贝尔奖网站的报道）

热门人选

诺贝尔物理学奖大概是最容易预测的诺贝尔奖项之一，而在2017年由三位致力于引力波探测的科学家获得此奖项也可以说是毫无悬念。根据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评奖标准，此奖是颁给科学家的某一项成就，而非其终生成就，因此一些对于物理学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也会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例如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约翰·惠勒（John Archibald Wheeler）一生成就斐然，门下更是出了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和基普·索恩（Kip Thorne）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可他本人却从未获得过这项荣誉。而爱因斯坦因为其相对不重要的一项工作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也是人们多年来争论的话题。

每一年诺贝尔奖揭晓之前，汤森路透公司（Thomson Reuters Corporation）都会根据科学家的论文引用数量做出各个领域诺贝尔奖的预测，其准确率也相当高。它从2002年到2016年间预测的

278人中已经有43人获得诺贝尔奖。虽然2017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引力波探测属于众望所归，但根据汤森路透的预测，也有其他几组科学家是这个奖项的热门人选。虽然今年与之失之交臂，或许在未来的几年里仍有机会获得这项荣誉。

希腊化学物理学家，美国IBM公司研究员费顿·艾文瑞斯（Phaedon Avouris）；科内里斯·德克（Cornelis Dekker）荷兰代尔夫特科技大学卡弗里纳米科学研究所（Kavli Institute of Nanoscience）所长；保罗·麦克尤恩（Paul McEuen）康奈尔大学教授三人在碳基电子学（carbon-based electronics）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

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教授米切尔·费根宝鲍姆（Mitchell J. Feigenbaum），在非线性和混沌物理系统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俄国物理学家拉希德·苏尼亚耶夫（Rashid A. Sunyaev）在人类理解宇宙的起源、星系的演化过程、黑洞吸积盘以及其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参考了汤森路透公司的报道）



【东方IC供图】

英国剑桥大学的理查德·亨德森

2017 诺贝尔化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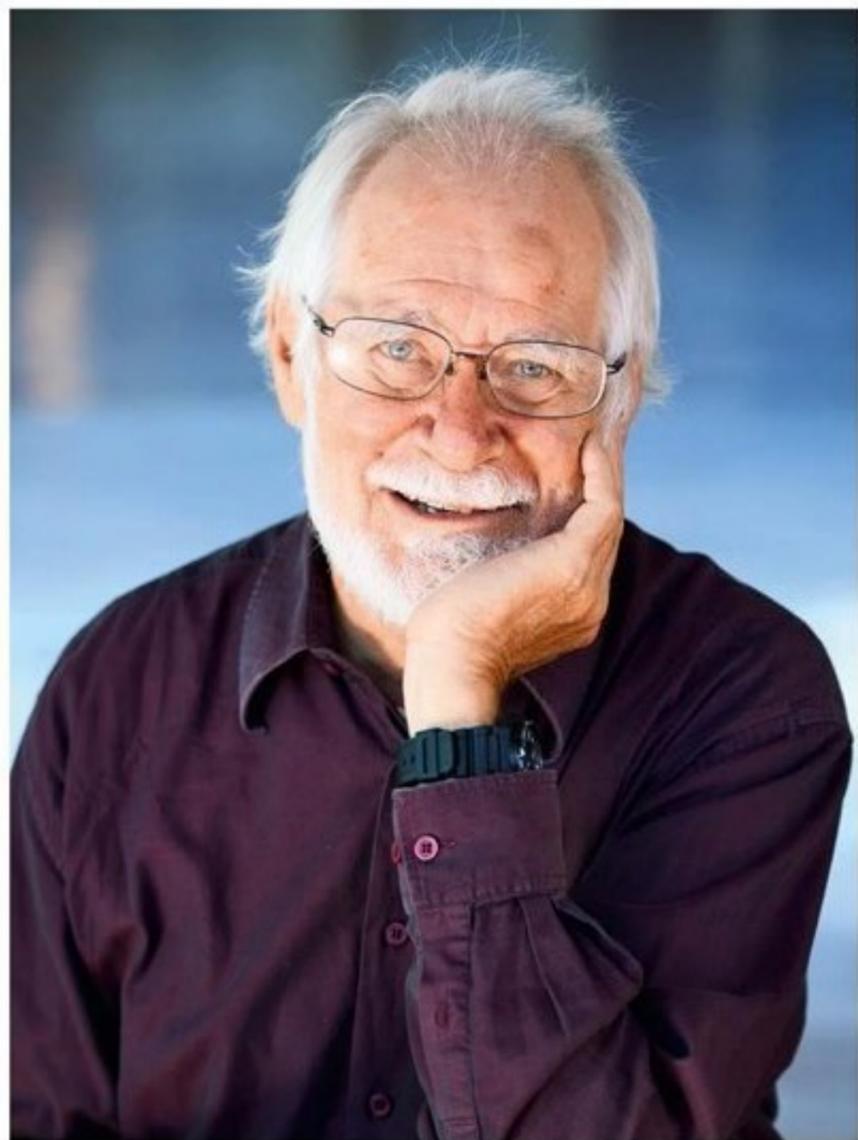
观察生命的细节

记者 苗千

2017年10月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本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三位发展了冷冻电子显微镜技术（Cryo-Electron Microscopy），使人类得以通过极高的分辨率研究溶液中的生物分子结构的三位科学家：来自瑞士洛桑大学的雅克·杜波切特（Jacques Dubochet），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乔基姆·弗兰克（Joachim Frank），以及英国剑桥大学的理查德·亨德森（Richard Henderson）。这三位科学家将各获得奖金的三分之一。诺贝尔委员会给出的授奖理由是：因为这三位科学家的贡献，人类将可以很快以原子级别的清晰度观察生命运行的机理，使人类终于获得生物细胞的三维图像，这对人类理解生命的本质具有重大意义，“把生物化学推动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认识各种蛋白质、DNA、RNA，乃至病毒的真实结构，对于人类研发药物，乃至理解生命的本质都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冷冻电子显微镜技术发明之前，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人类此前经常使用X射线晶体衍射的方法来探究物质的微观结构，但是这需要物质以晶体的方式排列——这对于蛋白质来说很难实现，而且通过这种方式也无法研究蛋白质的活动特性。人类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发出了电子显微镜技术，但是这种技术只能适用于没有生命的物体——高能粒子束会使生物细胞丧失水分，破坏细胞的微观结构。

剑桥大学的细胞生物学家理查德·亨德森的博士课题与X射线的晶体衍射技术相关。为了探索蛋白质的结构，他一开始也试图利用X射线成像，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就转向了电子显微镜技术，



(东方IC供图)



(东方IC供图)

左图：瑞士洛桑大学的雅克·杜波切特

右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乔基姆·弗兰克（右）

希望能够有所突破。想要利用电子束来对生物细胞进行成像，面临着许多实际问题。电子显微镜通常需要在真空环境中进行工作，如何制备样品，如何保存生物细胞中的水分，又如何让电子束不会破坏掉样品的结构，都是需要解决的难题。

最初科学家们想利用电子显微镜获得生物细胞的图像，需要先使用一种特制的薄膜包裹住样品，然后用强度极低的电子束对其进行成像。这种手段获得的图像精度有限。在20世纪70年代，理查德·亨德森与他在剑桥大学的合作者奈杰尔·安温（Nigel Unwin）做出了一个重大突破，他们使用葡萄糖溶液替代样品中的水分，并且采取了新型的样品制备方式，可以在常温下用极低强度的电子束进行样品成像，使电子束对样品的损害降到最低，从而首次获得了清晰的样品结构图像。

乔基姆·弗兰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一种图像合成算法，可以将同一样品在不同角度拍摄的二维电子显微镜图像合成为三维图像——这需要对于每一个样品的位置和朝向都做出准确判断。对于

生物样品来说，不同的样品很少有完全相同的结构，而且在样品中还有可能含有杂质。因此想要进行判断和计算，就需要能够辨别同一样品各种各样的不同状态。在1981年，乔基姆·弗兰克与合作者马林·凡·黑尔（Marin van Heel）得出一种方法，可以将样品图像根据不同的朝向归类，同时分析样品的结构特点。乔基姆·弗兰克在此基础上开发了众多用于样品图像分析的算法，他将这些算法综合起来，形成一套被称为“SPIDER”的电脑程序供科学界使用。这些算法对于低温电子显微镜技术至关重要。

如果能够在低温条件下观测样品，会防止样品中水分的蒸发，电子束对于样品的损害也会降低。但另一方面，在低温条件下样品中的水分有可能凝结成晶体，这种晶体结构会对电子束造成强烈的散射，影响成像，而且样品中水分的晶体结构也有可能破坏样品自身的结构。这些技术上的困难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被人注意到，逐渐有人开始意识到，这些难题可以通过对样品进行快速降温，使样品中的水分无法结晶，而是呈现出一种玻璃化的状态来

解决，这样就有可能在低温条件下获得样品高精度的图像。

在理论上，让水在低温状态下维持一种玻璃化的固体形态，可以使样品在电子显微镜中更清晰地成像，这已成为科学家们的共识。但在实际操作中，是否有可能让大量的水分达到这样的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还众说纷纭，很多人对此充满怀疑。直到1981年，这个问题才被真正解决，雅克·杜波切特与合作者阿拉斯戴尔·麦克道尔(Alasdair McDowall)终于在实验中得到了玻璃化的固态水。他们把水喷洒在碳薄膜的表面，然后将其浸入到温度为-190摄氏度的液态乙烷中，再使用液氮保持低温状态。这种玻璃化的固态水在低温电子显微镜中可以非常均匀地吸收电子，达到一种理想的观测状态，而这种状态在其被加热到-140摄氏度的条件下又会被破坏，玻璃化的固态水会转变为晶体。理查德·亨德森认为，雅克·杜波切特所完成的正是低温电子显微镜中“低温”这一部分，他是这个领域真正的开拓者。

如今低温电子显微镜已经成为结构生物学的关键技术，这项技术仍然在不断进化，所能够达到的分辨率也在不断提高。现在这种技术已经可以为科学家们提供生物细胞原子级别的清晰图像。在2016年，人类正是通过这种技术得知寨卡病毒的结构，理解病毒攻击细胞的原理。人类也正在通过低温电子显微镜技术理解生命更深刻的奥秘。而这三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也会让人们开始思考化学这门学科的本质。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先生本人就是一位化学家，但近年来诺贝尔化学奖的光芒常常被物理学奖所掩盖。就连很多化学家们也会开玩笑说，诺贝尔化学奖从来不颁发给真正的化学家，而是会颁给物理学家或是生物学家。化学的研究领域确实没有物理学广阔，它是一门专注于分子层面的科学。2016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发给了几位发现新型化学键的科学家，而本年度的化学奖颁发给几位开拓出全新的方法观察分子结构的科学家，这几位科学家通过不同的手段，都让人类在分子层面对自然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正是化学的迷人之处。■

(本文写作参考了诺贝尔奖网站的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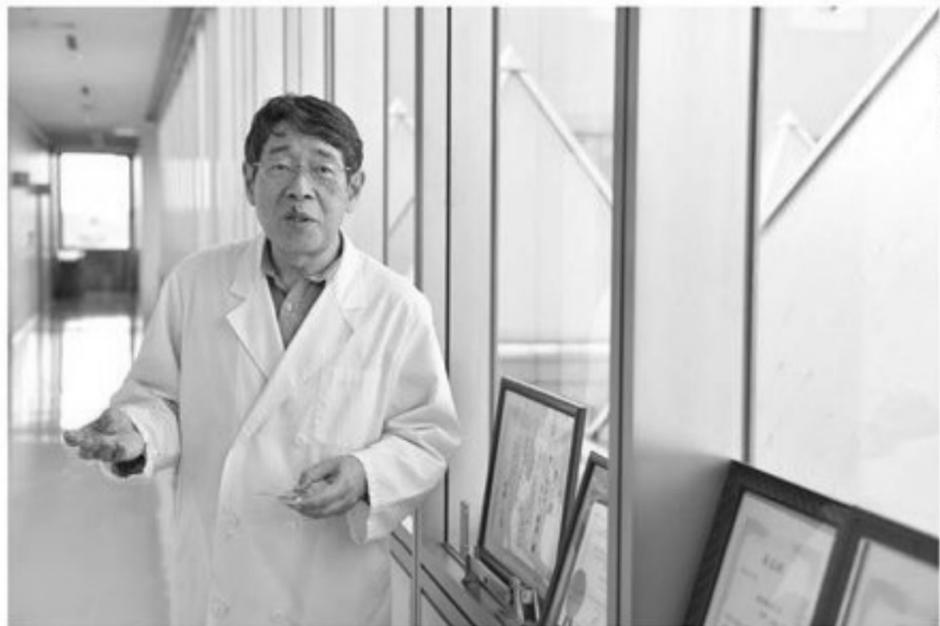
热门人选

对于化学奖，汤森路透今年给出了这样的预测名单：第一组：美国加州理工大学退休教授约翰·伯考(John E. Bercaw)、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特聘教授罗伯特·伯格曼(Robert G. Bergman)、俄罗斯科学院谢苗诺夫化学物理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格力盖伊·舒尔平(Georgiy B. Shul'pin)等三人对C-H键官能团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三位科学家都是著名的有机化学家，在金属有机催化剂研究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的研究成果早已应用于工业生产领域。

第二组：出生于丹麦的理论物理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教授、普雷科特能源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杨·诺斯科夫(Jens K. Norskov)。他在固态表面非均相催化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基础性突破。

第三组：日本桐荫横滨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工学研究生院光电化学与能源科学教授宫坂力(Tsutomu Miyasaka)，韩国成均馆大学化学工程学院教授朴南圭(Nam-Gyu Park)，英国牛津大学克拉伦登实验室物理学教授亨利·斯奈思(Henry J. Snaith)。汤森路透给出的获奖理由是，高效能量转换效率的光伏材料的发现及应用。

不过，名单上的几位科学家并没有出现在获奖名单上。201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在冷冻电子显微镜技术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三位科学家。汤森路透的预测是基于科学家的论文引用次数做出的判断，引用次数的高低反映的是一位科学家近些年的活跃程度以及某些学科近些年的热度。而在评奖方面，瑞典皇家科学院是比较保守的，轻易不会冒险授予未经时间充分检验的成果的。毕竟在这方面，瑞典皇家科学院是有过教训的。



日本桐荫横滨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工学研究生院光电化学与能源科学教授宫坂力

(东方IC供图)

2017 诺贝尔文学奖

石黑一雄：记忆、时间和自我欺骗

主笔 / 薛巍

“石黑一雄是描写失落的诗人，在简单、温和的文本之下，创造出了令人痛苦的情感落差。”

理解过去

诺贝尔奖委员会把今年的文学奖颁给了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颁奖词说，石黑一雄的小说“具有强大的情感力量，揭示了我们与世界虚幻的融合感之下的深渊”。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长萨拉·丹尼乌斯说，石黑一雄的作品是简·奥斯丁、卡夫卡的综合，“但还要加一点普鲁斯特，然后搅一下，但不要搅得太厉害，然后你就得到了他的作品”。她还说：“他是一位非常完整的作家。他不会往旁边看，他发展出了自己的审美世界。”

丹尼乌斯说她最喜欢的石黑一雄的小说是《被掩埋的巨人》，但她说《长日留痕》是一部真正的杰作，开始时像是伍德豪斯的小说，结束时却非常卡夫卡。“他是一个对理解过去非常感兴趣的人，但又不是一个普鲁斯特式的作家，他不是要去挽回过去，而是探索作为个人或社会，为了首先活下去必须忘掉什么。”

在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之前，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跟去年一样，是热门人选，但最后得奖的是石黑一雄。石黑一雄说：“我向阿特伍德道歉，因为不是她获得这个奖。我真的认为她很快就会获奖。我从没想过我会获奖。”但事实也许是，石黑一雄的获奖会降低阿特伍德获奖的可能性，因为他的一部小说《千万别丢下我》跟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写的是类似的“科幻”主题。

虽然石黑一雄的获奖让一些人感到意外——62岁的他相对来说还比较年轻，但他的获奖不会像以前那样引发很大的争议。《纽约时报》说：“瑞典学院以前被批评利用文学奖来发表政治声明，但今年的评审专注于纯粹的文学成就……石黑一雄成为第29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跟以前的一些获奖者不同的是，他的文字非常好懂。他是一位罕

见的同时受到评论家、学者的喜爱并且商业上很成功的作家；他的作品很著名、读者众多，曾经被改编为电影。在美国销售了250多万册。在他35年的写作生涯中，石黑一雄凭借他朴实、克制的风格，赢得了广泛的认同。他的情节经常靠潜台词赢得共鸣——没有明说的东西，以及讲述者的感知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英国《卫报》说：“在石黑一雄的小说中，纸面上的文字是冰山的尖顶：其下发生了很多事情，往往人物对那些事情浑然不觉。他从没写过两本一样的书：《千万别丢下我》写的是逐渐意识到自己是作为器官捐献者被创造出来的克隆人，它是对死亡和意义的哲学探索。他的作品以复杂的、让人吃惊的方式阐明现实，他配得上诺贝尔奖。”

《泰晤士文学增刊》编辑罗泽琳·迪宁说，在石黑一雄的小说中，“人生被简单的误解、错误的希望和残酷的习俗所毁。人物误以为他们理解了历史事件。在平静的、没有变化的、令人愉悦的表面下，存在着一个无声的、暴力的体系。那里有渴望，有痛苦，以及表达这些的手段。石黑一雄是描写失落的诗人，在简单、温和的文本之下，创造出了令人痛苦的情感落差”。比如《长日留痕》中的男管家史蒂文斯，总是躲避各种感情，因为他认为抑制真实的自我才能成为伟大的管家，所以他冷漠地处理父子亲情，盲目忠实于其主人达林顿却无视后者一度与纳粹交往甚密甚至帮助极右势力的现实。这种盲目甚至使他失去了与心爱的女管家肯顿小姐的情感。

从英国到日本

石黑一雄1954年11月8日出生于日本长崎，父亲是一位海洋学家，5岁时随家人移居英国，就读于一所语法学校，在那里体验了一种已经消失的英国社会的滋味。70年代末，他毕业于肯特大学英语和哲学专业，之后在东英吉利大学学习创意写作，很早就在文学界脱颖而出，1983年跟麦克尤恩、拉什迪一起，被《格兰塔》杂志列入最佳英国青年作家名单。

2008年他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说，他母亲很日本，但他父亲不是典型的日本人，因为他是在上海长大的，有一种中国人的特征：当遇到麻烦时，他会微笑。2005年，《明镜》周刊问石黑一雄在文学上受了谁的影响，他回答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我年轻时读的作家，还有一些英国作家。但没有日本作家。日本一些电影导演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但不是日本小说。我发现翻译过来的日本作品让我非常困惑。直到村上春树的小说，我才发现了我能理解的、跟我有关系的日本小说。他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作家。”

诺贝尔委员会官方的介绍说：“石黑一雄从出版他的第一本书《远山淡影》（1982）起，就成了全职作家。他的处女作和随后的《浮世画家》都发生于“二战”几年后的长崎。他最常写到的主题已经出现：记忆、时间和自我欺骗。这一点在他最著名的小说《长日留痕》中尤其突出，该书后来被改编为电影，安东尼·霍普金斯出演其中痴迷于尽责的管家。他的作品还有一个特征是，表达形式非常克制。同时，他比较新的小说还有幻想特征。在反乌托邦小说《千万别丢下我》中，他将冷酷的科幻小说的暗流引入了他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以及其他几部作品中，还能看到音乐的影响。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他的短篇小说集《小夜曲》中，音乐在描写人物关系时起了重要作用。在他的最新小说《被掩埋的巨人》（2015）中，一对年老的夫妇游览英国古老的风景，希望跟他们分别多年的长大的儿子重聚。这部小说以感人的方式探索了记忆跟遗忘、历史与现实、幻想和现实的关系。”

《纽约客》说，石黑一雄的多部小说探索的是同样的主题，但给出了不同的解答。关于1989年出版的《长日留痕》中，他说：“我认为，最终面对你最黑暗的记忆是好事，所以这本书最后算是解决了问题，叙述者最后接受了他压抑或选择去错误记忆的东西。”在《不要让我走》中，讲述者凯茜认为，记忆是一个人的全部，没有记忆的人就是没有身份的人。“即使你最珍贵的记忆也会以惊人的速度消退，但我不会跟它一起消退。我最珍视的记忆，我从未看见它们消退……无论待在哪个他们把我送去的康复中心里，我的心中都会和黑尔舍姆在一起，让它安全地留在我的脑海里，那将是没人能够抢走的一样东西。”《被掩埋的巨人》在国家层面思考记忆问题，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说：“国家和社群是非常脆弱



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

的事物。它们会解体。它们陷入内战。它们会陷入绝对的混乱。我能理解，有人说最好赞同去遗忘。”

在《被掩埋的巨人》中，一片奇怪的“遗忘之雾”充盈着英格兰的山谷，吞噬着村民们的记忆。一对年迈的不列颠夫妇想要赶在记忆完全丧失前找到此刻依稀停留在脑海中的儿子，于是匆匆踏上了一段艰辛的旅程。他们渴望让迷雾散去。他用雾来比喻对记忆的遮蔽：“我们的记忆受到媒体、流行娱乐、历史教科书、博物馆的控制。学校教科书是一个人们努力去控制社会记忆的明显的例子。在日本经常唤起这个问题。日本的教科书不提日本人‘二战’时期在东南亚的行径。我写的是一种雾降临在了一片土地上。你可以说这样做是出于好的目的：为了阻止复仇的循环。有时只能强制实行失忆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法新社供图)

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



(法新社供图)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热门人选

在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博彩公司的赔率榜上，前三位依次是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西班牙作家哈维尔·马里亚斯。

恩古吉·瓦·提安哥

2010年，提安哥在文学奖得主赔率榜上的位置就排到了第一，但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秘鲁作家略萨。随后英国比较文学学者祖伊·诺力基在《卫报》上撰文说，提安哥本应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他“终生致力于描写、讽刺和动摇权力走廊……索因卡在1986年成为第一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作家。索因卡和提安哥的童年都是在殖民主义时期度过的，受到了去殖民化的影响，抗议之后的政治幻灭，为他们在监狱中的写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两人都致力于通过表演他们的戏剧来动员公众；两人都感人地描述了他们的信念的后果。提安哥跟他的前辈不同的是他的勇敢，以及他决定用自己的第一语言吉库尤语写作，1977年他放弃用英语写作，他说他想用他

的母亲和普通人能读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

提安哥 1938 年出生于利穆鲁一个农民家庭，1964 年毕业于乌干达马赫雷雷大学，后入英国利兹大学续修文学。1967 年回国，在内罗毕大学任教，改英国文学系为非洲文学和语言系。主要作品有《孩子，你别哭》、《大河两岸》、《一粒麦种》、《血色花瓣》、《十字架上的魔鬼》、《乌鸦魔法师》等。

提安哥在 1962 年创作了戏剧《黑隐士》，1964 年发表了小说《孩子，你别哭》，小说的时代背景是肯尼亚独立前的 1952 年，当时肯尼亚正处于白人殖民统治之下，为了夺回白人强占的土地，黑人农民发动了震撼非洲大陆的“茅茅起义”。小说细腻生动地描写了恩戈索一家和一对青年恋人在这场战斗中的苦闷和彷徨。

1965 年出版的《大河两岸》是提安哥用本土语言吉库尤语写作的作品，描写吉库尤族敌对村落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1967 年出版的《一粒麦种》描写的是肯尼亚独立后的社会、道德和种族问题。

诺力基建议，对提安哥的作品不熟悉的人可以先看他 2006 年出版的小说《乌鸦魔法师》，不要被它 700 页的篇幅吓倒，它的开头探索了一个虚构的国家第二任统治者生病的五种可能的原因，写得非常有趣。

在出版《乌鸦魔法师》之后，提安哥写了三部回忆录，第一部《战时的梦》从他的祖父母写起，然后讲述了他自己身为没有土地的劳工的童年。第二部《在翻译的家中》，讲述他在茅茅起义期间上英国人办的寄宿学校的经历，他的家被夷为平地，哥哥被囚禁到英国人的集中营。第三部《梦的诞生》记述了他在大学里的四年，那时肯尼亚即将独立，他开始写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10 月 3 日，《新共和》杂志编辑艾利克斯·谢泼德在预测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时说，“在特朗普的年代，作为《使女的故事》的作者是一件好事。但是身为加拿大人，这对阿特伍德不利，因为（她的同胞）艾丽丝·门罗四年前刚得过文学奖。”但期望她能得奖是有理由的。她是当代最

多才多艺、最多产的作家之一，她出了五十余本书，既有诗歌、长篇小说，也有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和评论。其中小说最为著名，有 1969 年出版的《可以吃的女人》，1981 年出版的《身体伤害》，1985 年出版的《使女的故事》，1988 年出版的《猫的眼睛》，2000 年出版的《盲刺客》。非虚构作品有 2002 年出版的《与死者商谈》。1997 年两位加拿大历史学家出了本书《20 世纪最有影响的 100 个加拿大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排在第五位，对于一个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工业巨头、而是职业作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高的排名。

阿特伍德 1939 年出生于安大略省渥太华。她父亲是一位昆虫学家，母亲是营养学家。她父亲在魁北克北部有一个昆虫研究站，每年春天，她们一家都会前往北部的荒野。她曾经写道：“六个月大时，我被装在背包里带到森林中，这种风景就成了我的故乡。”她跟哥哥没有玩伴，也没有电视和电影可看，读书、画漫画、游戏成了他们的主要活动，8 岁起才接受全日制学校教育。读高中时她就意识到她要成为一名作家，后就读于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1966 年她出版了诗集《圆圈游戏》，该书获得了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奖，从此阿特伍德成为加拿大文学界领军人物。

阿特伍德强调，她的小说《使女的故事》和《羚羊与秧鸡》等不是科幻小说，而是幻想小说，“科幻小说中有恶魔和太空船；幻想小说可能真的会发生。”

在阿特伍德看来，诗歌和散文依赖神经系统的不同功能。“诗歌更接近大脑中音乐的部分，小说更接近叙事和谈话的部分。”两者的创作过程也不同，诗歌九分靠灵感、一分靠努力，小说则相反。所以人们觉得诗人很烦人，“他们说，我不是在看窗外，我是在工作。”

除了关心人类的未来、关心生态危机，阿特伍德的作品也有风趣的一面。她曾经说：“小说是由语言写成的，而人类的语言是混乱的。简而言之，小说是含混的、多方面的，不是因为它有意跟人作对，而是因为它努力去把握过去所说的人类的境况，它用的媒介又是像油滑的律师一样不可靠、像旧式的裤带那样有弹性、像果冻那样按不住的语言。”

2017 诺贝尔和平奖

禁止核武器：理想照进现实

主笔 / 徐菁菁

摆在诺贝尔委员会面前的是一份包含 215 位个人和 103 个组织在内的历史第二长候选人名单。这份名单里有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有俄罗斯总统普京。最终，非政府组织“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 ICAN）行政总监比阿特丽斯·菲恩（Beatrice Fihn）接到了那个电话。“我整个人都在颤抖。”她说。

2007 年，一批呼吁禁止核武器的社会活动家在澳大利亚创立了“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过去十年里，这个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非政府组织将全球 101 个国家的 468 家非政府组织组成联盟，致力于通过提高全球对核裁军议题的认识对政府施加压力。包括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先锋艺术家小野洋子、联合国前任秘书长潘基文在内的知名人士为之发声。ICAN 在联合国扮演公民社会协调者的角色，参与所有联合国有关销毁核武的谈判与策划。

诺贝尔和平奖官网公布的颁奖词中说，人类至今没能通过一项类似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或《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等条约的国际公约对使用核武器的行为设禁设限。ICAN 多年来致力于说服世界各国政府，使他们承诺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推动对核武器的批判、限制和禁止，并作为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引领了旨在实现在国际法框架下禁止核武器的运动，“有助于填补法律上的空白”。

今年，ICAN 的十年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果。7 月 7 日，联合国大会以 122 票赞成，1 票反对和 1 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禁止核武器条约》，规定缔约国不应发展、生产、制造或以其他方式获得、拥有或储存核武器，也不应使其领土或其管辖的任何地方存在其他国家的核武器；条约还规定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应当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消除核武器，并规定了具体的核查机制。联合国当时在一则官方新闻稿中写道：“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第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核武器的国际法文书，是国际核裁军机制向前迈出的积极步伐。”主持条约谈判的哥斯达

黎加常驻联合国代表戈麦兹（Elayne Whyte Gómez）当天在纽约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充分肯定了 ICAN 在其中的作用：“民间社会的积极性、知识和集体经验在数十年来保持了这种压力，使得国际社会走向了禁止核武器。”

诺贝尔委员会的选择复合一贯的“诺贝尔逻辑”。自第一枚氢弹于 1954 年 3 月 1 日由美国在太平洋的比基尼珊瑚礁上进行试验爆炸后，核控领域就一直是和平奖的热门。1962 年，美国化学家莱纳斯·卡尔·鲍林（Linus Carl Pauling），因为“自 1946 年以来不断奔走，不仅反对核武器试验，反对传播这些武器，反对他们的使用，还反对一切把战争作为一种解决国际冲突手段”而获奖。从那以后，至少有 4 个组织或个人因为反核扩散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其中包括日本前首相佐藤荣作、波兰物理学家约瑟夫·罗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1985 年，在苏联和美国军备竞赛的背景下，诺贝尔委员会将和平奖颁给了国际防止核战争医生组织（International Physicia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这个组织正是 ICAN 的发起者。

2013 年，诺贝尔委员会曾将和平奖颁予“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rganis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当时的背景是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那是 16 年来世界范围内最受瞩目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而就在奖项揭晓的同一天，联合国安理会正式同意组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国联合代表团。那时，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已经有 27 人在叙利亚进行化武销毁的相关工作。

ICAN 的获奖具有相似的背景。用诺贝尔委员会颁奖词中的话说：“人类目前面临的使用核武器的风险比以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要大，有更多的国家试图获得核武器，核武器的威力也比以往更加具有毁灭性。”

美国芝加哥大学校园内设有一面“世界末日钟”。1945 年，参与研制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的一些美国科学家和 17 位诺贝尔奖得主，共同创办了一份《原子科学家公报》，旨在反对使用核武器。1947 年，在科学家的推动下，该杂志牵头设置了这个具

有象征意义的“世界末日钟”。它只有钟摆，没有任何机械结构。科学家们最初将指针定格在23时53分，寓意人类距离象征“世界末日”的午夜只有短短的7分钟。根据全球风云的变化，“世界末日钟”此前已经历了20次调整。1953年，当时由于美国和苏联相继进行了氢弹试爆，“末日钟”被调到了23时58分。今年1月26日，美国原子科学家协会(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将指针拨到了距离“午夜”2分30秒的位置，仅次于1953年。该协会主席、理论物理学家克劳斯(Lawrence Krauss)在记者会上表示：“对几乎每个在这个房间里的人来说，现在是他们一生当中最接近末日钟的时刻。”

目前全世界有大约15000枚核弹头。其中美国和俄罗斯都各持有近7000枚，比1970年《核武器不扩散公约》(NPT)签订时削减了80%，但近年来，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都进行了核武器现代化。

此次和平奖的热门人选还包括促成伊朗核协议达成的两名功臣——伊朗外长穆罕默德·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欧洲委员会副主席费德里卡·莫盖里尼(H.E. Federica Mogherini)。本月中旬，伊朗核协议将迎来一个关键节点。届时，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伊朗核问题协议审查法案，特朗普将再次向国会提交报告，审查认定伊朗是否遵守伊核协议。如果特朗普认定伊朗“违约”，那么国会在60天之内做出判断，并决定美国是否全面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且重启伊核协议谈判。2015年7月，在经历漫长艰难的谈判后，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终于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武器发展，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对其制裁。协议中规定：在10年内，伊朗最多只能使用5060部提炼浓缩铀的老旧离心机；至少15年内，伊朗拥有的低浓缩铀库存将会削减98%，从10000公斤减至300公斤，且不得以位于福尔多的铀浓缩工厂进行浓缩铀的活动和研究，也不得储存任何可裂变物质。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份协议是目前处理伊朗核问题的最佳方案，但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美国对伊朗政策改变，协议危在旦夕。尽管今年8月31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出台最新报告，再次确认伊朗履行了协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也强调，伊核协议得到了完全执行，没有违反的情况，无需重新谈判，但特朗普依然对伊核协议表态强硬，



非政府组织“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行政总监比阿特丽斯·菲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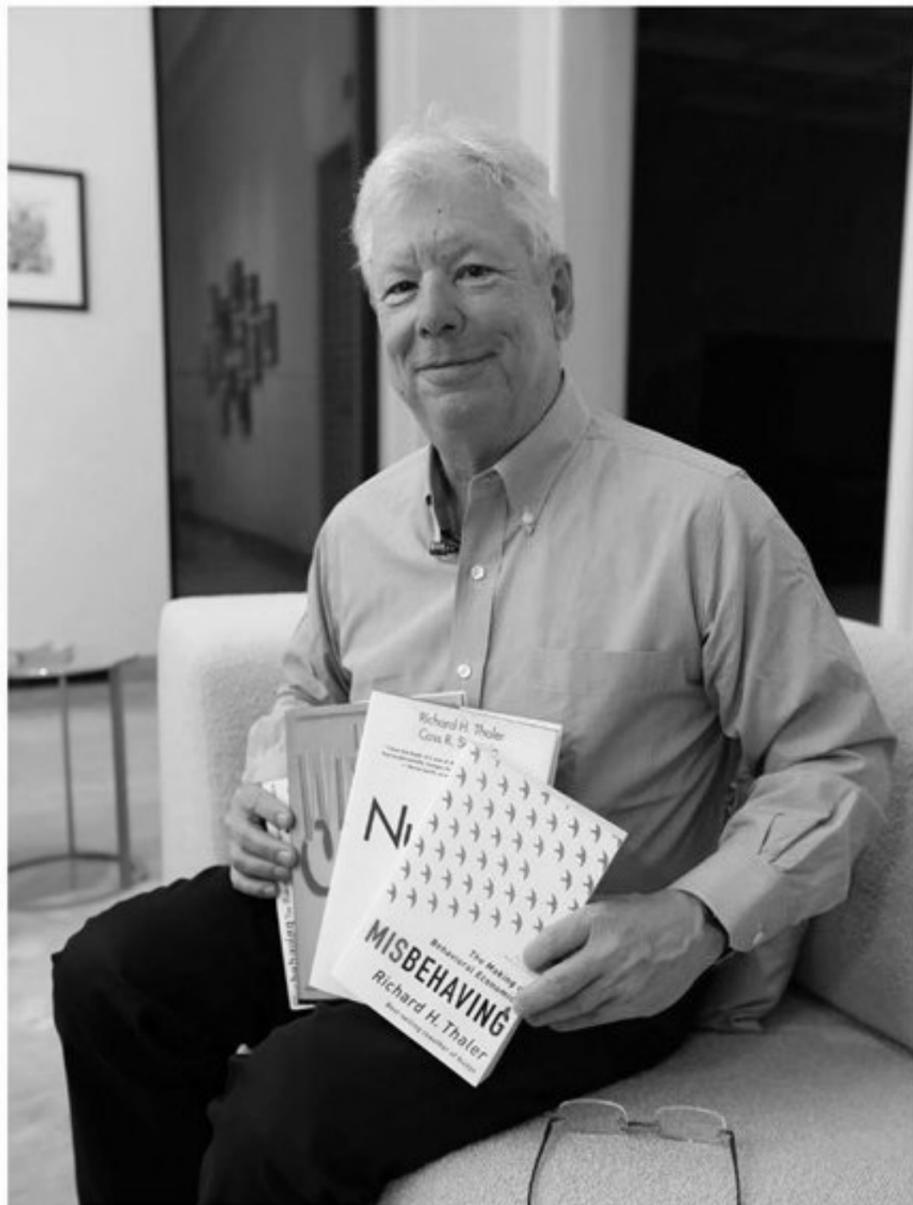
(东方IC供图)

称它是“一边倒”的协议，是对美国的“羞辱”。

ICAN推动的《禁止核武器条约》将从今年9月20日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开放供各国签署。条约将在获得第50份批准书之日起90天后生效。但一份国际条约距离一个真正无核的世界依然具有遥远的距离。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合法拥核国，以及任何一个在事实上掌握核武器的国家参与了该条约的谈判和签署。尽管ICAN行政总监菲恩承认，消除核武器不可能一蹴而就，弃核公约的目的是使得核武器更站不住脚，给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增加压力，《禁止核武器条约》本身也仍然充满了争议。瑞典前首相卡尔·比尔特指出条约中理想和现实的悖论：条约中“明确禁止使用核武器作为威慑”的条款在事实上禁止了核威慑，这可能导致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全——没有了延伸威慑，无核国家有可能认为应该拥有自己的核武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从芬兰到葡萄牙都不想毫无保护地暴露在俄罗斯核弹头的打击范围之下。唯一曾经遭受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也没有支持该条约，因为它要依靠美国提供的延伸的核威慑。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唯一参与制定禁核条约的北约国家荷兰最终投了否决票。☑

2017 诺贝尔经济学奖 非理性的经济人

文 / 小晓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

(视觉中国供图)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获得 201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理由是他对于行为经济学的贡献，“让经济学更为人性”。

穷人和富人谁更愿意在经济上冒险？有人认为，穷人更倾向于冒险，因为他一无所失，而富人冒险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机会成本更大；也有人认为，富人更倾向于冒险，因为他能负担得起风险，而穷人对风险几乎没有承受能力。哪个解释更有力呢？可能并没有确定的结论。这是一个行为经济学的问题。

2017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在行为经济学方面成就很高的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 (Richard

Thaler)。他现在执教于芝加哥大学的布斯商学院，这所学院曾经出过五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塞勒被认为是现代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领域的重要先驱者。很多人对他的名字可能并不陌生：2002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丹尼尔·卡内曼曾将自己的获奖归功于塞勒，称他是“首位将心理学引入经济学，开创了行为经济学”的学者。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畅销书作家。他最近的一本经济学著作《“错误”的行为》，是 2015 年高居《纽约时报》排行榜的经济类畅销书。他把经济学从“象牙塔”带回日常生活的现实，故事引人入胜，不乏诙谐幽默，他循循善诱的行文特色，通俗易懂的魅力语言，感染了经济学界的学者们，也改变了大众读者对经济学的很多看法。

纵观理查德·塞勒的学术研究生涯，可以说，他的研究是围绕着“并非理性的经济人”这个概念展开的。也就是说，经济行为的主体并不一定是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理性人”，而可能是行为可预测、且容易犯错的个体。对于整个建立在“经济理性人”假设之上的西方经济学帝国来说，他的研究无疑是开疆拓土型的。进入经济学研究不久，塞勒意识到，人类与不懂情感的理性人完全不同，我们不仅存在偏见，会判断失误，而且会受到种种心理因素的蛊惑，实际所做出的经济决定与经济学家假设的标准理性模型相去甚远。换句话说，我们的行为并不理性，甚至是“错误”的。在他的《赢者的诅咒》一书中，他指出，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偏好理论、有效市场假说等一些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假设存在着一些缺陷。因为无论是企业理论、金融市场还是消费者选择理论，个人在所有经济现象分析中均被假设成是自利的、信息完全的，同时会尽可能地追求最大利益。然而，现实中的个人往往依靠直觉来解决问题。理性的经济人只是一种假设，真实的人应该是非完全理性的个体。

塞勒对“理性人”的主要怀疑包括：因为时间和脑力的有限，人们倾向于使用简单的“经验法则”做判断，而不是经济学里的最优化，“经验法则”下存在着“可预测的错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不是像经济学描述的理性经济人那样有着无限的理性；统计模型中的误差并非像传统经济学所说的是随机的，而是可预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学和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得到规模应用和发展，经济学家们也越来越强调数学结果和理想化假设下的研究结论。塞勒从社会心理学、行为经济学角度，呼吁经济学家们从理想化假设中解脱出来，可以说延续了一种始于亚当·斯密的传统经济学。过去，经济学家并不屑于研究人们的错误判断及其对市场的影响，认为这只是一种引人发笑的琐碎谬误，无足轻重。如今，这些关于普通人行为的研究却能帮助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做出更好的决定。在理论研究上，塞勒对“反常行为”“经济人假设”“禀赋效应”“跨期选择”“心理账户”等研究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应用上，塞勒通过“助推思想”和“选择设计”，分析和解释了消费者行为和包括社会福利政策和储蓄投资研究在内的政府政策行为。

20世纪70年代，塞勒在罗彻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的第一个研究方向是经济行为学。从那时开始，他养成了在生活中观察周围的亲朋好友，并通过观察来收集经济学中反常现象的习惯。有一次，他邀请同事参加晚宴，晚宴的开胃菜是腰果，每个人都喜欢吃，但当他把这道菜撤回厨房时，客人们却为他的这一决定叫好。他用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结论是：人由两种心理控制，一种希望获得立即满足，另一种理智权衡现在与未来。日常生活中，很多人愿意选择牺牲9个月的价值以换取未来12个月的价值；很多人相信价格是随机波动的，却又试图在股票市场进行波段操作；从历史看，债券的长期回报率低于股票，但人们还是倾向于把退休基金投资于债券。人们的“反常”选择源自什么呢？

转到康奈尔大学后，塞勒进一步对如何运用前景理论解释人类行为做了更深入的探索。诸如“A先生邻居的儿子愿意以8美元的价格帮他除草，他选择拒绝，同时，他也拒绝以20美元的价格帮邻居除草”，“B先生付了300美元会费加入了网球俱乐部，虽然肘部受伤但仍坚持练习”这些日常生活的选择问题均在塞勒的研究范围之内。1976年，塞勒在《科学》杂志上读到一篇题为《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试探与偏见》的文章，从中获得灵感，为那些关于决策选择时不太严谨的事实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霍华德·昆鲁斯的“前景理论”对塞勒的研究有更大的推动作用，他由此想要建立准确描述人类行为的经济模型，并发现价值函数可以为他所研究的反常行为找到理论解释。于是，运用预期理论中的价值函数替代传统经济学中的效用函数来进行行为经济学研究，成为他此后几十年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并由此诞生了创新的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他提出“禀赋效应”，认为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对利害的权衡是不均衡的，对“避害”的考虑远大于对“趋利”的考虑。传统经济学理论往往会假设决策制定者把损失的成本等同于机会成本（潜在损失的最大成本），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更重视自己看得见的损失。禀赋效应的提出引起了人们巨大的争议，因为它挑战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消费者选择的分析基础，也冲击了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科斯定理。他也提出了“心理账户”的概念，它假定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会在心里记账，它是一种普遍存在但并不被自知的心理状态。比如，消费者在不同来源收入下的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不同，一个拥有20万元股票投资组合的人不太可能会因为投资组合增值2万元而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但如果这2万元的收入来自于赌博、奖金或者税收折扣，那他很可能在短期内增加自己的消费。又比如，企业为了控制支出，订立不同项目的预算，在需要购买一项重要的东西时，如果原先购买该物资的预算账户不够，那就不会购买。“心理账户”就是在我们心里设立一条无形的界线，让我们在不同区间内最大效益地安排生活。

塞勒在行为金融研究学方面也做出很多贡献。比如，对“股票溢价”，塞勒解释说，当投资者经常回顾他们的投资组合时，对短期损失的厌恶会令很大一部分投资者放弃长期投资这些投资组合，而投资具有稳定回报率的债券。这就是“输者赢者效应”，即投资者对过去的输组合过分悲观，对过去的赢组合过分乐观，导致股价偏离其基本价值。塞勒认为，过度反应产生于投资者对历史概率的忽略，和高估短期新信息的重要性，这导致了市场价格与基本价值产生过高或过低的偏离。这个结论激励了更多学者来研究和解释均值回归现象。

塞勒的这些理论研究在实际应用中也发挥了作用。比如，在解决美国器官移植难的问题上，他提出运用选择设计来提高捐赠率。提高捐赠率所面对的主要障碍是获得家属的同意。原先在美国多数州，采取的是明确同意原则，即民众必须采取登记等具体的行动来表明愿意捐赠。塞勒指出，惰性给人们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他提出新的规则，即“认定同意制”，根据这项规定，所有民众都被认定为同意捐赠，但可以登记不愿意。当民众必须表态同意才捐赠时，只有42%的人会去做；但如果必须同意才不捐赠时，会有82%的人同意捐赠。2006年，伊利诺伊州通过第一个同意登记法，吸引了230多万人登记器官捐赠。这就是塞勒所说的“助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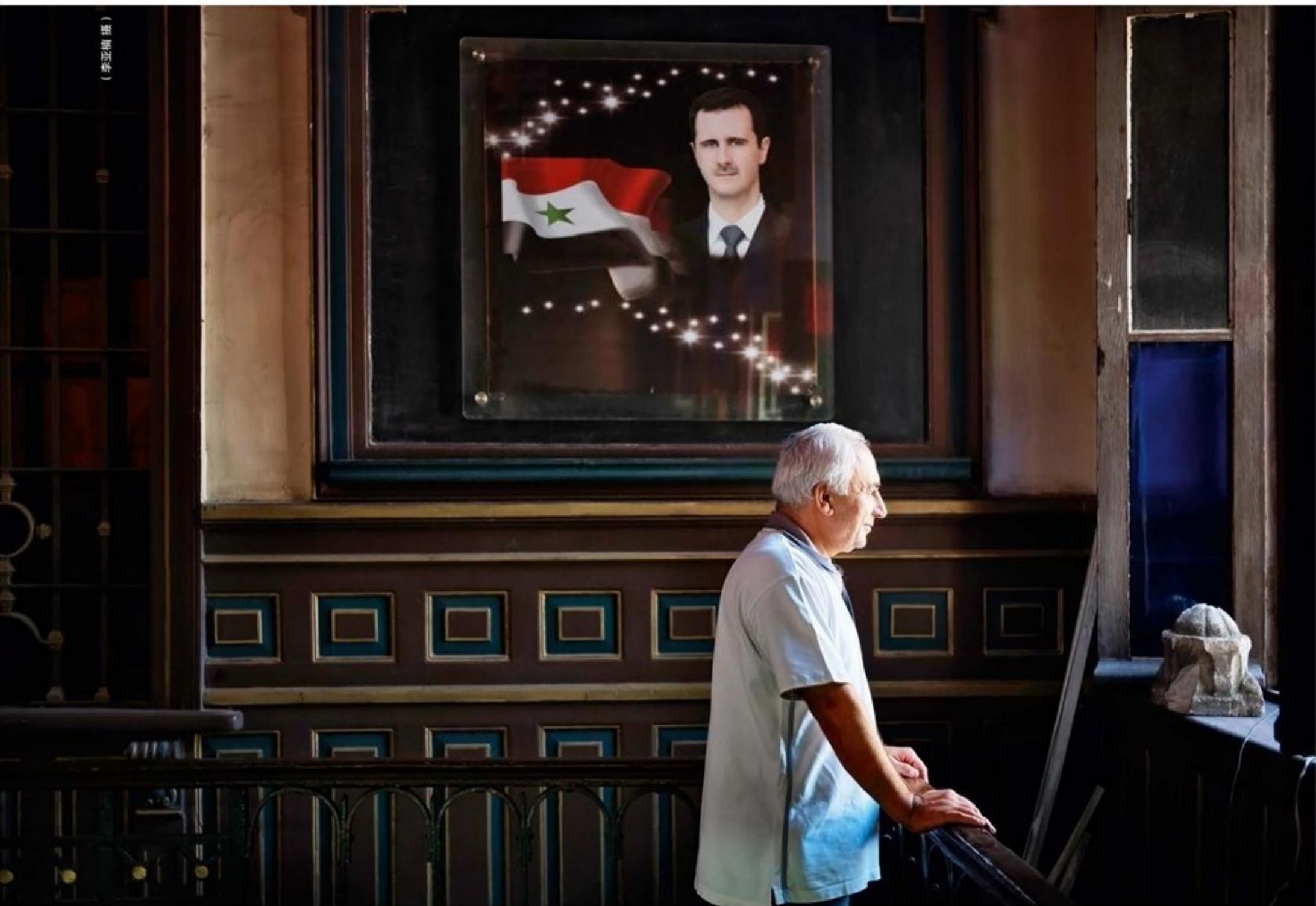
行走沙姆之地



(视觉中国供图)

2013年11月11日，几名从叙利亚北部重镇阿勒颇逃出的难民被临时安置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一处收容所。截止到2017年夏天，因叙利亚内战造成的难民累计已超过500

(竖排文字)



在拥有 109 年历史的汉志铁路大马士革始发站内，工作人员站在巴沙尔·阿萨德总统的画像前观察窗外的机车调试状况

沙姆之地，流浪或回归

文 / 刘怡

在阿拉伯语中，沙姆指的是北方和左侧；在地理学上，它指的是汉志（Hejaz）以北、地中海东岸曾经为三大哈里发国所统治的新月形领土。

“最小的大国”

汽车驶过迈斯纳（Masnaa）以东的黎巴嫩口岸之后，安蒂黎巴嫩山脉（Anti-Lebanon Mountains）间镶嵌着的居民点和松树林突然消失了。视线两侧的色调骤然变为灰黄，高速公路上奔驰的车辆渐渐屈指可数。巴沙尔·阿萨德总统褪色

的画像以及红白黑三色的叙利亚旗帜从高处探出头来，俯瞰着我们。

叙利亚国旗属于典型的20世纪初设计品，水平排列的三个矩形色块是对彼时欧洲国家旗帜的忠实模仿。它的创意来自一位富于艺术气质的伦敦政治家马克·赛克斯爵士（Sir Mark Sykes）——英国战时内阁中东事务顾问委员会成员，也是今日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三国边界的划定者。1916年，当英国政府开始策动阿拉伯各部落发起针对其宗主国土耳其的大起义时，一厢情愿的赛克斯主动为阿拉伯人提供了一份在他看来饱含“阿拉伯民族性”的设计稿：自上而下的黑、绿、白三个水平色块分别代表公元5~13世纪统治过中近东的正统哈里发、法蒂玛、倭马亚三大政教合一王朝，左侧的红色小三角代表领导起义的麦加圣裔哈希姆家族。由于此次起义系为建立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国家而发动，红白黑绿四原色随后也被尊称为“泛阿拉伯色”。

关于单一阿拉伯国家的梦想在1919年被赛克斯亲手终结，但泛阿拉伯色保留了下来，成为埃及、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等十余个中东新国家国旗配色的来源。1952年，革命成功的埃及共和派军官将四原色中的绿色降为点缀，以红白黑三色组成了新的“阿拉伯解放色”，这一做法很快为后来的叙利亚所效仿。1958年，埃叙两国合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AR），三色旗中央缀上了象征两大成员国的两颗绿色五角星。即使这场失败的联姻仅仅持续了三年半，已故的哈菲兹·阿萨德总统在1980年依旧要求恢复这面“名实不副”的国旗，以重申大马士革当局对阿拉伯各民族联合的承诺。正如颁布于1973年的叙利亚《宪法》中保留至今的第一章第一条：“阿拉伯叙利亚地区是阿拉伯祖国的一部分，阿拉伯叙利亚的人民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

在阿拉伯语中，沙姆指的是北方和左侧；在地理学上，它指的是汉志（Hejaz）以北、地中海东岸曾经为三大哈里发国所统治的新月形领土。而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来说，沙姆是一片在最近100年从未获得过统一的疆域：北抵托鲁斯—扎格鲁斯山脉，南到红海，西及塞浦路斯，东到波斯湾，涵盖了今天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的全部版图。只有当叙利亚国的边界抵达了这些天然地理关隘，它才称得上是一个整全的实体。在大马士革书店中出售的地图上，甚

至连土耳其南部城市安塔基亚（安提阿）和伊斯肯德伦（亚历山大勒塔）也被标记为叙利亚领土：历届叙利亚政府从未承认过1939年土耳其当局在两地举行的归属权公投。

普林斯顿大学阿拉伯史泰斗菲利普·希提（Philip Khuri Hitti）把叙利亚称为“地理上最小的大国”。这不单是指沙姆地区可以上溯至希腊—罗马时代的文明历程，它作为人类最古老城市带的地位，以及穆斯林和基督徒在此地共处、斗争、融合的数千年风云，也是对叙利亚身为现代中东世界政治弄潮儿的褒扬。在大马士革诞生了阿拉伯半岛第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阿拉伯叙利亚王国是第一个基于民族自决原则建立的现代阿拉伯国家。出于光复沙姆之地和团结阿拉伯世界的使命感，使得历届叙利亚政府每每主动揽起重任。大马士革街头林立的巴勒斯坦国旗可以作证：这个被群山和沙漠覆盖的小国，却有着了不起的雄心。

“但那些都是过去时了。”外交官之子、新闻记者胡马赫告诉我，“我们曾经视邻国为兄弟，却并未自他们那里收获同等的厚待。”大马士革以贝鲁特的兄长自居，单方面给予黎巴嫩人堪称优厚的交通和贸易便利，后者却只关心何时能告别国土上的叙利亚驻军。2011年之后，当数百万叙利亚难民艰难地穿过山地、抵达黎巴嫩境内时，当地人令他们大失所望。“我们花费了几十年才认清一条简单的真理：国家首先应当致力于改善它自己人民的生活。”胡马赫感慨道，“但太晚了。如今我们每天所做的不过是挣扎着活下去。”

民族主义的浪漫热情使得人们可以暂且忍受家族政治和父死子继，忍受物资短缺以及不定期的供电、供水中断，忍受亲人、朋友的神秘失踪，只要承诺尚有兑现的可能。然而结局却是令人难堪的幻灭：世界舞台上的游戏规则已经全盘更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比遥遥无期的“民族解放”更能引起共鸣；最终，平衡被“阿拉伯之春”打破，血与火从北到南席卷整个国家，沙姆之地退回到了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

始于一个多世纪前的浪漫理想，以一种残酷的方式得到了延续：在今天的叙利亚领土上，活跃着俄罗斯人、伊朗人、阿富汗人、黎巴嫩人、土耳其人、伊拉克人、沙特人、约旦人和美国人，各自服务于

不同的势力，以他人的鲜血浇灌自己的私利。叙利亚人曾经真诚地相信，本国的自由只能以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统一为前提才能实现；但在今天，却有更多国家期待沙姆之地的动荡和纷乱继续维持下去。

诸神与恺撒

“试试本地产的拉克酒（Raki）吧。”瓦利德把一杯散发着茴香味的乳白色液体推到我跟前，“用葡萄酿造，算是传统饮料。”在这位逊尼派穆斯林看来，偶尔和外乡人分享被称为“狮子奶”的拉克酒算不上亵渎宗教，只是源自19世纪末的传统民俗。同一张桌子上还坐着一位来自霍姆斯的德鲁兹派穆斯林和一位基督徒女士，轮流吸着一壶水烟。与此同时，清真寺宣礼塔和教堂十字架投下的灯光正在我们前方交会，毫无违和感。

叙利亚人有理由为他们的多元文化观和多元宗教观感到自豪。大马士革作为定居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至距今约4000年前，那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还不曾诞生。当它在《圣经·旧约》的第一卷《创世记》中被初次提及时，已经是阿拉米人（Arameans）治下一个颇具规模的城邦国家了。闪米特人的先祖亚伯拉罕曾在此与阿拉米王国的军队交战，大卫王和他的后裔数次征服过这里，《阿摩司书》中的耶和華判决它“不再为城，必变作乱堆”。基督徒与穆斯林最初的交集，可以说便和叙利亚有关：在《创世记》中奉耶和華之名向迦南“应许之地”迁徙的亚伯拉罕，同样被《古兰经》尊为伊斯兰教先知之一；他的庶出长子以实玛利和嫡出幼子以撒，分别被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视为彼此的祖先，而以实玛利又与父亲一道在麦加修建了克尔白（天房）。

在安蒂黎巴嫩山脉与沙姆沙漠之间，适合作为定居地的河畔平原屈指可数；更何况身为红海—地中海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之间的通衢，大马士革还承担着中近东世界贸易与人流走廊的功能，因之近乎不可替代。波斯人、罗马人和奥斯曼人的入侵都不曾毁灭它，只是给原有的文明与宗教底色加上了新的堆叠物。亚伯拉罕时代的房屋和关于阿拉米王国的记忆一同沉入了2.4米深的地下，使徒保罗踏足过的罗马直道渐渐被两旁伸出的美什拉比亚式飘窗遮挡住轨迹，朱庇特神庙的残垣断壁改建成了哈密迪亚集市，圣约翰大教堂

被加盖上了清真寺的圆顶。在夏夜的倭马亚大清真寺中庭，基督徒和穆斯林会并坐乘凉，分享多渣的阿拉伯咖啡；与此同时，在北部重镇阿勒颇的露天市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和土库曼人正在激烈地讨价还价。

军事征服之后的和平共处并非自然生成，而是统治者有意识调控的结果。奥斯曼帝国延续了四大哈里发时代的宗教保护制度，允许犹太教徒、基督徒以及穆斯林中的德鲁兹派、阿拉维派等“异端”分支继续沿用自己的律法。沙姆地区的领土则按照民族、教派分布和交通重要性的差异，设置了阿勒颇、贝鲁特、大马士革三大州（Vilayet）以及祖尔、黎巴嫩山、耶路撒冷三大自治旗（Sanjak）。阿勒颇对应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云集的多民族混居区，祖尔对应贝都因人游牧区以及逊尼派腹地的边缘，大马士革南部云集着德鲁兹派穆斯林，与黎巴嫩接壤的山区和海岸则是阿拉维派的大本营。沙漠、山川和河谷的阻隔妨碍了沙姆之地的人民形成统一共同体的机会，却也使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压迫被稀释了。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黎明期，基督徒和穆斯林知识精英至少两次并肩作战：第一次是为了结束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第二次则是要求驱逐法国殖民当局。

进入20世纪50年代末期，复兴主义（Ba'athism）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勃兴改变了整个格局。与工矿企业国有化、农村土地改革以及金融—贸易领域的管制同步。从1979年开始，受兄弟会支持的暴动、暗杀、罢工和反政府示威开始席卷全国，兄弟会武装人员在民众的支持下占领中西部重镇哈马，宣布当地为“解放区”。政府军出动两个装甲师和一个特种师进行正面弹压，用三个星期时间将哈马古城夷为平地，造成上千名武装人员和众多平民丧生。这一事件之后，甚至连过去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者、复兴党老党员和西部农民领袖也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历时不到一个月的“哈马事件”，内里已经隐含了2011年诱发叙利亚内战的一切关键要素：阿拉维派对政治现代化和世俗权力的垄断，长期输出泛阿拉伯主义带来的财政紧张，经济发展停滞造成的高失业率和贫富分化，政府对旱灾和农业歉收救济不力。唯一的区别在于，在1982年，是老阿萨德介入黎巴嫩教派冲突的主动行为导致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暴动；而在2011年，来自中东世界其他国家的逊尼派极端分子试图在叙利亚展





2017年8月31日，一群叙利亚球迷聚集在一家餐厅内收看“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叙利亚队对阵巴林队的比赛，并为主队的进球喝彩

开反对世俗政权的“圣战”——当恺撒所代表的世俗政权经营的政治—经济秩序濒临瓦解，自会有人转向真主。

“内战爆发之前，我们用沉默回避表态；但在战争开始后，AK-47和火箭弹强迫我们公开站队。”从逊尼派名城霍姆斯逃出的大学生萨利赫告诉我。在恺撒的威权统治下，逊尼派、什叶派、德鲁兹派和基督徒都不过是权利被剥夺的受压迫者；但来自国外的“圣战者”却要求他们按照教派差异区分敌我，相互展开厮杀。“城外的政府军在向市区开炮，而控制内城的各派反政府武装和民兵没有一天停止过自相残杀。”萨利赫回忆道，“我看到了范德卢特（Frans van der Lugt）神父的尸体。他是一位在霍姆斯居住了30多年的荷兰老人，耶稣会士，自愿留在危城中帮助受困的平民，却被自诩为‘解放者’的‘基地’组织武装人员杀害。”

逃离与死守

宰牲节前一晚，我在大马士革老城边缘的一家水烟馆和巴勒斯坦商人阿巴斯聊天。阿巴斯是1967年“六月战争”的遗民，从耶路撒冷逃难来此，转眼已是50年光阴。“我的四个儿子分别在荷兰、比利时和美国读完了大学，将来也会留在那里。”他告诉我，“但我本人只能永远留在叙利亚这个寄居地。1948年逃离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拿的是英国殖民当局颁发的护照，1995年之后生活在加沙地带的阿拉伯人能申领新的巴勒斯坦国护照，唯有我们这代人被遗忘了。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收容了我的叙利亚有一天竟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

类似阿巴斯这样的巴勒斯坦流亡者，在叙利亚足有50万人之众。相比困坐在黎巴嫩难民营中、无法平等就业和读书的那些同胞，他们在叙利亚的境



(视觉中国供图)

左图：2016年5月4日，时任德国外长的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右）在柏林会见投奔反对派阵营的叙利亚前总理里亚德·希贾布（左）

右图：从沙姆宫旅馆顶层的旋转餐厅俯瞰大马士革市容。画面左侧的白色圆顶建筑为叙利亚人民议会，右上角可见国家银行大楼

遇一度要好得多。然而半个世纪之后，叙利亚人却不得不开始向他们的巴勒斯坦食客学习如何当难民——根据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统计，截止到2017年8月，战前叙利亚的2200多万人口中至少有516.5万已经出走国外，超过四次中东战争造成的巴勒斯坦难民之和。他们大部分会经陆路进入黎巴嫩和土耳其，稍事安顿，随后再寻求转赴经济较为发达的西欧和北美。不过平均每五个人中才有一个能最终踏上欧洲的领土，大部分难民在土耳其和黎巴嫩就会被当地移民局发现，送入临时搭建的帐篷群。没有公民权，没有在当地就业的机会，无法自由迁徙和租赁房屋，所余的仅仅是生存而已。

有两类人会把主动出走视为改变境遇的机会：既得利益集团的边缘人，以及完全的赤贫者。叙利亚外交部前发言人杰哈德·马克迪西（Jihad Makdissi）属于前一类。美国《新闻周刊》中东版编辑雅尼娜·迪·乔瓦尼（Janine di Giovanni）对我描述了她2011年在大马士革见到马克迪西时的情景：“虽然有一个穆斯林式的名字，但杰哈德其实是个基督徒。他在索邦读过书，理性、聪明、深思熟虑。老阿萨德在他生命的最

后几年，认为有必要改善一下叙利亚政府的国际形象，因此挑选了这位文质彬彬的温和派来装点门面，一干就是14年。”但马克迪西还是在2012年底叛逃到了阿联酋。他在邮件中告诉我：“在叙利亚外交部任职的那些年，我就像是个被强行指定了委托对象的律师，绞尽脑汁为政府做口舌上的辩护。如今我终于可以像个真正的外交官那样说话和行事了。”毕竟，无论是联合国还是叙利亚反对派，都会需要这位法国国家行政学院高材生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和他走上同一条道路的还有叙利亚前总理里亚德·希贾布（Riyad Farid Hijab）：2012年夏天，在被任命为总理仅仅一个多月之后，这位复兴党要员带着全家老小逃去了约旦，并很快摇身一变，成为了反对派在日内瓦和谈中的联合组织“高级谈判委员会”（HNC）的头面人物之一。在遭受过冲击的每一个国家，都存在这类长袖善舞的变节者：原本就衣食无忧，而出走能带来更可观的回报。

战争给予了他们逃离简陋的山区住宅和面容严峻的征兵官员，在另一个国家开始新生活的机会。意味深长的是，体力和健康状况更佳的青壮年男子成为第一批出逃者：他们被紧急征召入伍的概率更



(李亚楠摄)

大，因之离开的愿望也更迫切。随后是他们的妻儿和家人，再紧接着是变卖了房屋和家产、将最后一个叙利亚镑也支付给“蛇头”的中年人。在校学生、和父母失散的年轻女性以及多病的老年人被遗弃在了大马士革，使得当地男女比例达到了1比7的悬殊数字。“女同性恋现象在最近几年正变得公开化。”瓦利德告诉我，“即使是留在死城里的姑娘，也会需要生活和精神上的伴侣。人口学家年复一年地渲染沙姆地区的人口爆炸，他们意识不到，因为这场内战，若干年后叙利亚将不再有新生儿。”

与欧洲通讯社签下一份短期合同的瓦利德属于大马士革最不“主流”的主动死守者——中产阶级。“我的许多老同学、亲密朋友和亲属都已抵达欧洲，但我选择留下。”拉克酒的后劲让这个略显疲惫的年轻人有些激动，“我是新闻学硕士，不愿在德国作为卡车司机或者烤肉小贩度过余生。留在这里依然有随时被征召入伍的风险，但至少维持着表面上的‘体面’。我有能力赡养父母和妹妹，会因为工作的专业性受到尊重，而难民的身份将使这种尊重荡然无存。我仍在祈祷和平能尽快到来，但和平之上的内心安

宁，或许永远不会到来”。

宿醉造成的头痛过去之后，我参加了倭马亚大清真寺在每年宰牲节的例行晨祷。内战开始之前，清真寺和哈米迪亚集市之间的空地日出时分就会被数以万计的民众淹没；但在2017年9月1日，寺院中庭只有冷冷清清的一二百位穆斯林现身。那些不曾出现的人，大部分已经在黎巴嫩、土耳其、约旦、西欧和北美找到了他们的下一站，而其中有很多人，也许在余生都不会再归来。

即使你回来，哦，奥德修斯；
即使空间围绕着你合拢来，
领路人在你过去的脸上
或在你友善的恐怖里
烧成了灰烬，
你仍将逗留在一段流浪的历史里，
你仍将逗留在—块未被应许的土地上，
你仍将逗留在—块无法返还的土地上，
即使你回来，
哦，奥德修斯。

——〔叙〕阿多尼斯《—块无法返还的土地》



现代叙利亚的缔造

文 / 刘怡

理想主义的激情、传奇英雄的登场和富于开创性意义的游击战功勋，在帝国主义者近乎轻率的拨弄面前显得如此不堪一击。

即使是在拥有悠久建筑堆叠历史的大马士革，寻找仅仅存在了4个半月的叙利亚第一王国的遗迹依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威廉二世、艾伦比、费萨尔等历史名人曾经下榻和举行会议的维多利亚饭店，在上世纪60年代的城市改造中已经荡然无存；被用作艺术和民俗博物馆的阿兹姆宫（Azm Palace），刚刚结束内战爆发以来的第一次修缮，地面仍旧布满灰尘。尤素夫·阿兹马生锈的铜像孤独地矗立在萨利西耶十字路口，甚至连



2

1. 1916年，参加阿拉伯大起义的贝都因部落骆驼骑兵
2. 位于叙利亚德拉附近的汉志铁路雅莫科大桥。1917年春天，劳伦斯和他的爆破小队曾多次试图炸毁这座大桥
3. 马克·赛克斯爵士，他是1916年臭名昭著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始作俑者，也是四色泛阿拉伯旗帜的设计者



3

本地人对这位将军的名字也显得极为陌生。现代叙利亚历史中的君主制篇章，似乎被整个地剔除出去了。

然而轨距仅有1.05米宽的汉志铁路（Hejaz Railway）依旧存在，甚至仍在继续运营中。这条全长1308公里、建成于1908年的窄轨铁路，最初被设想要连接君士坦丁堡和麦加，以使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对其阿拉伯属地建立更加直接的控制。然而财力紧张的土耳其人负担不起如此高昂的成本，实际建成通车的区间仅仅是从大马士革到麦地那，令叙利亚州的影响力得以深入阿拉伯半岛的濒海部分。停放在大马士革起点站门口的德制阿诺德·荣格964型蒸汽机车头暗示了这条铁路的血统：德意志第二帝国向东方输出经济影响力的血管；但它的生命力远比那个帝国来得持久。在关闭已逾13年之后，2017年9月1日，大马士革站恢复了运行。9辆修复的蒸汽机车头将拖着货车车厢穿越叙利亚南部山区，经过135.7公里的行驶，进入约旦北部。

但汉志铁路之于叙利亚独立的意义，并非在

其建设，而在于破坏。为了使驻扎在叙利亚领土上的土耳其军队被孤立和消灭，整整100年前，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汉志铁路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沙漠游击战。阿拉伯人尽他们的最大努力影响了战争的军事进程，却未能迎来“天然叙利亚”的诞生。现代叙利亚的历史从第一天起就被分裂、被切割联系在了一起，并成为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心头之痛。而由英法两国主导的对战后中东领土新格局的安排，还包含有犹太人问题的滥觞，直接通向未来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之间的五次全面战争。

一切始于大马士革，一切却未能在大马士革画上句号。时隔近100年，当人们回顾正在愈演愈烈的库尔德人问题、“伊斯兰国”对叙利亚—伊拉克国界的否定、叙利亚政府之于安塔基亚的领土要求乃至巴勒斯坦问题的是非曲直时，会发现时间仿佛被永远封印在了一个世纪以前的节点，无从挣脱。而沙姆之地的未来，也注定仍须经历对过往历史的重审；哪怕百年的光阴，已经使中东以外的世界变得如此不同。



老人与新人的结盟

穆罕默德·法鲁基 (Muhammed al-Faruqi) 中尉走进英军战壕的这一天，是 1915 年 8 月 20 日。距离土耳其参战已经过去了 10 个月，协约国仍未能找到在东南战线取得突破的有效方法。为了使奥斯曼帝国退出战争，英国陆海军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加里波利半岛发动了一场登陆战，损失 16 万人，依然一无所获。而主动投诚的法鲁基告诉对方：自己背后有一支强大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渴望借英国之手摆脱土耳其的奴役。

尽管阿拉伯历史学家和政治宣传家乐于将光复沙姆之地的理想追溯到 1000 多年以前，但阿拉伯民

族主义和单一阿拉伯国家的愿景基本上要到 19 世纪末才会现出雏形。东方危机的加剧和新殖民主义浪潮的兴起在中近东世界的三个政治中心埃及、土耳其和波斯催生出了最早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想；而 1908 年奥斯曼帝国爆发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严苛土耳其化政策，则使一批早慧的阿拉伯知识分子生出了脱离土耳其统治、建设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想法。早在 1875 年，叙利亚新教学院（今贝鲁特美国大学）的 5 位校友在黎巴嫩建立了第一个基督徒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并逐步影响到他们的穆斯林同胞。1913 年，一批留学欧洲的穆斯林大学生在巴黎发起了“青年阿拉伯人组织” (Al-Fatat)，要求奥斯曼帝国给予其阿拉伯臣民以更大的自治权。嗣后



(视觉中国供图)

左图：1915年，在加里波利前线的战壕中，一名英军士兵试图用遮阳帽作为诱饵吸引土耳其狙击手开火，借以确认对方的位置

右图：1915年4月，在加里波利半岛抵御英军进攻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步兵

在大马士革也出现了阿拉伯军人秘密组织“同盟会”(Al-Ahd)，法鲁基即是其重要成员。

和东欧以及东亚的民族觉醒运动相比，所谓“阿拉伯民族主义”更像是一种含混的文化观念：多种异质文明共存的历史，以及始于16世纪的奥斯曼征服，使得阿拉伯人更愿意自视为叙利亚、贝鲁特、耶路撒冷等具体政治单位的成员，而不是一个更大的阿拉伯人共同体的一分子。在1904年之前，大马士革的城市居民甚至认为“阿拉伯人”一词是对贝都因游牧部落的专属称谓，带有轻蔑和野蛮的意味。而早期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从来也没能回答包括多民族共处、教派团结和地方权力分配在内的一系列复杂问题，他们只是基于对土耳其统治的愤懑，提出了一种含混的理念：所有居住在沙姆之地，在历史上受过四大哈里发王朝统治、会说阿拉伯语的人群，无论其宗教信仰为何，具有哪种民族背景，都应当联合起来推翻以征服者自居的土耳其人。

与此同时，在位于阿拉伯半岛西陲的汉志(Hejaz)，一位年过六旬的老者、先知穆罕默德的直

系后裔，也在筹划一场针对土耳其人的起义，但却是基于更加复古的理由。侯赛因·伊本·阿里(Hussein bin Ali)所属的哈希姆家族自13世纪起就统治着伊斯兰教圣地麦加，他本人早年在君士坦丁堡当过苏丹的人质，1908年被新上台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任命为麦加谢里夫(Sharif，意为“贵裔”)，负责管理汉志境内的贝都因游牧部落。与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不同，老侯赛因反对土耳其人完全是基于其保守性：他认定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现代化改革对神圣的《古兰经》构成了亵渎，自己在汉志州的尊贵地位和传统民政权力正因君士坦丁堡的集权措施而变得岌岌可危；一路向南延伸的汉志铁路是土耳其人剥夺汉志准独立地位的象征，属于彻头彻尾的阴谋。双方围绕着政治自主权展开了一系列钩心斗角，但老侯赛因的实力尚弱，不足以对冲君士坦丁堡的强势。

倘若按照自然逻辑发展下去，无论是民族主义者的跃跃欲试，还是谢里夫侯赛因的心怀不满，都只不过是土耳其宏大改革事业的一段插曲。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一切：为了给开战初期对俄



(视觉中国供图)

上图：“青年土耳其党”三巨头之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驻大叙利亚总督杰马尔帕夏（左）

下图：1917年，英军第47信号兵中队的人员和装备由“尼罗河号”运输船送抵埃及亚历山大港，准备参加艾伦比将军发起的巴勒斯坦战役



(视觉中国供图)

攻势的失败寻找替罪羊，土耳其政府对其境内信奉东正教的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展开了令人发指的大屠杀，使同样属于弱势群体的阿拉伯人备感恐惧。通过查抄贝鲁特法国领事馆内的保险柜，驻叙利亚的土耳其当局发现其军队内部的“同盟会”已经在和欧洲人秘密联络，因此展开了一场大搜捕，将数十名民族主义分子逮捕绞死。在德国政府的怂恿下，青年土耳其党三巨头之一、土耳其驻大叙利亚总督杰马尔帕夏（Djemal Pasha）还制订了一项野心勃勃的作战计划，准备以叙利亚和耶路撒冷为基地，越过西奈半岛进攻英国控制下的苏伊士运河。

对英国政府来说，维持苏伊士运河的畅通对其全球战略乃是不可或缺的支柱，无论如何都须阻止杰马尔帕夏的阴谋。但无论伦敦、开罗（英国驻埃及及民政机关）还是埃及远征军（中近东战场的英军主力）都对新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一无所知，他们感兴趣的唯有谢里夫侯赛因：汉志州的位置恰好在杰马尔帕夏的前进基地耶路撒冷自治旗以南，直接控制着汉志铁路最南端；倘若能在那里开辟一条抵抗土耳其人的新战线，驻叙利亚的土军将因为两面受敌而丧失进攻能力。因此，双方很快展开了接触：1914年春天，侯赛因派次子阿卜杜拉前往开罗，与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基钦纳元帅进行了两次会面，试图从英方获取军事援助。从1915年7月到1916年3月，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正是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的始作俑者）以通信的形式与侯赛因进行了一系列磋商，英方承诺为汉志当局提供金钱和军事援助，以协助其发动一场起义。

如果说到这时为止，双方讨论的还只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那么1915年春天的两次秘密会议则使整个事件的性质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变化。为了打探土耳其人的虚实，老侯赛因派他的三儿子、以思想开明著称的费萨尔（Faisal bin Hussein）出使君士坦丁堡；后者不仅会见了阿拉伯反抗者的动向尚无了解的青年土耳其党领导层，还在大马士革私下面晤了“青年阿拉伯人组织”以及“同盟会”的负责人，得到了后者关于未来中东政治的完整规划《大马士革草约》。这份草约的目标已经不再是恢复奥斯曼人征服之前的传统王朝，而是要建立一个囊括整个沙姆地区，拥有现代议会和财政体系、奉行君主立宪制的单一阿拉伯人国家。费萨尔很快就被这份方案所打动，要求父亲在和麦克马洪的通信中明示阿拉伯人的诉求。而随着法鲁基投向英军，

中东问题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因多种宗教和民族共存带来的层出不穷的矛盾，与外部觊觎者对它的误解和蔑视同样有关。

麦克马洪对哈希姆家族作为新旧两派阿拉伯人势力共主的地位也有所知晓。到了1915年10月，英国人做出了承诺：只要汉志的阿拉伯人同意发动反土起义，伦敦愿协助其在战后建立“从阿勒颇到亚丁”的独立民族国家；但黎巴嫩沿海地区、巴格达和巴士拉之间的伊拉克领土以及巴勒斯坦的地位须留待战后再做商讨。

进入1916年，随着加里波利攻势的失败，运作阿拉伯人参战的步骤陡然加快。以法鲁基为代表的抵抗派阿拉伯军官纷纷脱离土耳其军队，经埃及前往汉志加入侯赛因的部队。当年6月5日，老侯赛因登上他在麦加的宫殿的塔楼，用一支旧步枪朝城里的土军要塞开了一枪，揭开了阿拉伯大起义的序幕。紧接着，1500名效忠哈希姆家族的部落骑兵控制了整个圣地，自称汉志王国陆军，开始向北进军。到当年秋天，起义军已经攻克了麦加、延布、腊比格、塔伊夫等大城市，扩展到7万余人的规模。当年10月，麦克马洪决定依照先前的承诺，为汉志提供价值5万英镑的黄金援助，并从埃及派出一个英国军事顾问团，指导阿拉伯人的行动。

两个自大者

中东问题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因多种宗教和民族共存带来的层出不穷的矛盾，与外部觊觎者对它的误解和蔑视同样有关。在促成1916年阿拉伯大起义的两个盟友中，南辕北辙的看法比比皆是：和真诚接受了新兴民族主义思想儿子费萨尔相比，老侯赛因虽然乐于坐享阿拉伯世界各派势力领袖的地位，却从未真正理解现代民族国家与专制王朝的差异。从后来的一系列举动看，他所钟爱的依然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复古阿拉伯人王国，并急于获得整个穆斯林世界哈里发（政教合一领袖）的头衔。这就给统一的阿拉伯人国家的前景投下了最初的阴影。而在英国方面，尽管麦克马洪代表驻埃及的民政当



(视觉中国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

左图：1949年8月18日，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中）在访英期间与其侄孙、年幼的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二世（左）会面。费萨尔二世的祖父即是阿拉伯起义军的主要指挥官费萨尔王子

右图：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哈伊姆·魏茨曼。他后来成为独立的以色列国第一任总统

局做出了支持阿拉伯人建国的承诺，但他从来也不是最终决策者。这个棋局里还有另外几股势力：代表白厅的英国外交部，负责中东战区军事行动的埃及远征军，名义上统揽埃及问题的印度事务部，以及英国在埃及的本地驻军。每股力量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也都对中东事务有一定的建议权。就像在任何一个现代科层制国家中出现的情形一样，这些官僚机构和利益集团热衷于互相争权夺利，把中东事务视为自己的禁脔。对阿拉伯人的背叛，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伏笔。

马克·赛克斯爵士（Sir Mark Sykes）并不属于典型的政治阴谋家：他是一位出生于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伦敦绅士，牛津毕业生，从小在拥有3万英亩土地的约克郡庄园长大。和所有老派的英国贵族一样，赛克斯具有某种尚武和游历的喜好，在布尔战争中获得过上尉军衔，也曾在中东四处旅行，写过几本军事学和土耳其政治观察记。从1912年起，

他就是保守党在赫尔中央区的下院议员，与社会名流和政府高层交往热络。从对阿拉伯世界的实际了解程度看，赛克斯远称不上一位专家，但这对白厅不构成问题——在拥有世袭贵族头衔并对现实政治足够投入的那个精英群体里，他已经是不折不扣的明智之士了。1915年夏天，赛克斯以阿斯奎思内阁中东事务顾问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前往埃及，代表政府对中东世界的未来前途做长期观察。

作为朋友和沙龙召集者，赛克斯机智幽默、能言善辩；但涉及到政治问题，这恰恰成了一场灾难：出于急欲出人头地和标新立异的心理，加上对中东诸民族怀抱一种英国式的傲慢，赛克斯对麦克马洪基于现实政治需要拉拢汉志王国的计划不屑一顾。在提交给内阁的报告中，他就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谱系作了一番简单粗暴的概括：以费萨尔及其民族主义同志为代表的“现代派”虽然较为灵活，但对欧洲人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仇视态度，故不值得信赖；

而以老侯赛因为盟主的“守旧派”同样是顽固僵化、沉迷于宗教热情的糊涂虫，不堪大用。总之，阿拉伯人并无能力决定自己的政治走向，这项重任应当由伦敦基于自己的利益需要来完成。

更加不幸的是，赛克斯在开罗碰上了另一个渴望建功立业的自大狂：原法国驻贝鲁特总领事弗朗索瓦·皮科（Francois George Picot）。正是皮科先生遗忘在保险柜里的信件招来了土耳其人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大搜捕，现在，他又开始向赛克斯兜售巴黎当局的方案：由英法两国共管战后中东，将靠近英国传统势力范围波斯的伊拉克领土交给英方统治，而让法国获得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主体部分。1916年1月初，两位冒险家仅凭在地图上随手勾勒出的几条直线，就炮制出了臭名昭著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从巴格达延伸到巴士拉以南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将由英国直接吞并，法国则可占领从安条克（安塔基亚）到贝鲁特的整个叙利亚海岸线，以及锡瓦斯以南的安纳托利亚领土。留给阿拉伯人的“自治”版图仅剩下了从阿勒颇—摩苏尔一线到叙利亚沙漠之间的内陆地区，并且同样划分成两块，分别由英法两国作为托管方。两位阴谋家甚至还替不在场的俄国盟友预留了一块占领地：君士坦丁堡，以及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若干领土。当年3月，协定正式签字生效。

如果说《赛克斯—皮科协定》还只是一份帝国主义者习以为常的分赃文件，那么把犹太人问题牵扯进未来的中东版图安排，就纯属赛克斯的自由发挥了。这位标新立异者认定，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地区不属于“纯阿拉伯”领土，应当由英法俄三国共同托管。而他对以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教授为首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素怀好感——从19世纪末开始，魏茨曼等人就致力于在巴勒斯坦的锡安故地建立犹太人社区，以使全欧洲犹太人免遭长久以来的政治迫害。由于魏茨曼发明的人工合成丙酮法大大增加了英国无烟火药的产量，英国有意将援助犹太复国主义作为对他的回馈。在赛克斯看来，帮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获得一块保护地不仅可以提升伦敦的道义形象，还能把拥有众多犹太裔公民的美国拉到协约国一边，可谓一本万利。《赛克斯—皮科协定》中为巴勒斯坦问题留出的“后门”，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也埋下了新的冲突诱因。

英国外交部并不是中东这局盲棋中唯一的出手者。埃及远征军为了建立自己的军事功勋，极力主

张将阿拉伯起义军的推进范围限制在红海沿岸，而由英军自己承担越过西奈半岛、向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腹地进军的任务。自认为长期遭受冷落、因此愤愤不平的印度事务部则提出了更加危险的计划——1916年2月，他们在仅限高级官员阅读的中东情报内参上发表了一篇居心叵测的文章，把哈希姆家族及其起义军贬得一文不值，极力褒扬自己物色的新代理人：统治着阿拉伯半岛腹地的内志（Najd）苏丹国领袖伊本·沙特。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法，伊本·沙特及其笃信瓦哈比派教义的追随者具有某种“清教徒式美德”，和英属印度具有长期合作关系，也同样对土耳其人的统治不满。假使以沙特家族而不是谢里夫侯赛因作为战后中东的领导者，对英国的利益将会有更妥善的保障。这项建议在当时尚未展现出其价值，但到了上世纪20年代，当老侯赛因与伦敦彻底决裂之后，伊本·沙特的军队在英国人的默许下占领了汉志全境，建立起新的沙特阿拉伯王国。

“阿拉伯的劳伦斯”

1963年，由大卫·里恩执导的史诗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在奥斯卡奖评选中斩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配乐等7项殊荣。这部222分钟的长片满足了英国人对孤胆英雄形象的全部想象：身着白袍的骑士驾着骆驼奔驰在叙利亚沙漠中，指挥其阿拉伯伙伴赢得了一场以寡敌众的辉煌胜利。尽管不无美化和夸张，但《阿拉伯的劳伦斯》的确阐明了一项事实：在中东这个被视为“一战”配角的战场，劳伦斯以极其有限的资源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巧合的是，他还是赛克斯在牛津大学基督学院的学弟。

爱尔兰贵族之子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与叙利亚最初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09年夏天对沙姆地区十字军古堡遗迹的寻访。为了完成自己的毕业论文《12世纪末前十字军东征

1916年1月初，两位冒险家仅凭在地图上随手勾勒出的几条直线，就炮制出了臭名昭著的《赛克斯—皮科协定》。



左图：史诗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1962)剧照

右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身着阿拉伯长袍、腰挂弯刀的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



(视觉中国供图)

对欧洲军事建筑样式的影响》，他徒步深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腹地，跋涉上千公里，考察了36座古堡遗迹。这次斯巴达式的远行不仅帮助他通晓了阿拉伯语的各种方言，连带对沙漠地带战争模式的通则也有了若干思考。毕业之后，劳伦斯以考古学家的身份重返叙利亚，参与阿勒颇以北卡赫美士古城遗址的发掘。也是在那里，他最初见证了渗入到奥斯曼帝国每一个角落的德国军人和工程师，以及与阿拉伯人矛盾重重的土耳其官员，并开发出了与阿拉伯人部落缔结友谊和同盟的诸多实用技巧。在素来对阿拉伯半岛事务不甚关心的英国，这些知识和经历都是极其罕见的财富。因此一俟大战爆发，劳伦斯立即被帝国总参谋部征召，负责绘制战区地图；接着在1914年底被分配到埃及远征军的情报部门，负责校勘地图、分析机密信息和起草各种内参。

身高不过1.65米的劳伦斯上尉，尽管已经因其头脑和阅历而声名鹊起，却不甘心待在遥远的埃

及做战争的旁观者。出于长期以来对阿拉伯人的朴素好感，他也深深不齿于当时还属于高度机密的《赛克斯-皮科协定》，而乐于为已经开始的阿拉伯解放运动提供某种帮助。因此在1916年10月，劳伦斯争取到了成为英国驻汉志军事代表团成员的机会，前往汉志与起义军的主要领袖费萨尔会面。从第一分钟起，他就认定这位瘦削沉静的王子比他的父亲和兄弟更适合担任阿拉伯解放运动的最高领袖，并且有能力承担比目前更加重要的角色。但阿拉伯起义军并不适合像欧洲军队一样进行正面阵地战——费萨尔麾下的部队分别来自数十个部落，管理松散，火力和总兵力与土耳其人相比都处于劣势。假如强求他们进攻严密设防的大城市，一场败仗就有可能导致整支队伍的溃散。但阿拉伯骑兵在机动性和灵活程度上远远胜过他们的对手，只需依靠几处隐蔽的水源便可在叙利亚沙漠中来去如风。劳伦斯为他们制订的新战略是运动战、游击战——不再倾全力

进攻麦地那，而是在红海海岸和安蒂黎巴嫩山脉之间频繁机动，打击敌军的薄弱位置，使杰马尔帕夏的部队无法有效追击。

对汉志铁路的价值，劳伦斯也有他独特的看法。当时埃及远征军正计划越过西奈半岛进军巴勒斯坦，英方指挥官希望阿拉伯起义军能由南向北控制汉志铁路的关键路段，与英军形成策应。但劳伦斯认为，假使把阿拉伯骑兵固定在暴露的铁路上，土耳其军队将可以从大马士革和麦地那两个方向对其进行夹击，胜算太小。明智的做法是对铁路进行不间断的破坏，使轨道和过往列车蒙受中等程度的破坏，但不至于使其彻底中断。如此一来，土耳其人将把大部分精力用来维修铁路，无法将滞留在孤立城市中的部队撤走，集中到北方组织重点防御。而被阿拉伯骑兵分隔孤立的南部守军，由于其补给线濒临瓦解，最终将会不战而溃。

打定主意之后，1917年1月初，身着白色阿拉伯长袍的劳伦斯和费萨尔一起，率领5000名骆驼骑兵和5000名步兵穿过汉志沙漠，向红海沿岸的港口瓦季（Wajh）进军；他们的弹药和一支策应部队则由英国军舰运送，经海路北上。1月25日，瓦季被攻克，并被改造为袭击汉志铁路的后方基地，主要战场自此转移到了土耳其控制区。接着，在5月初，劳伦斯亲自指挥45名轻装简从的贝都因骑兵，从瓦季向内陆推进。他们频繁穿越马安（Ma'an）和麦地那之间的汉志铁路，对路轨和电报线加以爆破，使守军完全晕头转向。在进入锡尔汗谷地之后，劳伦斯还说服了颇有影响力的豪威塔部落酋长奥达·阿布塔伊和他联手，使远征队的规模一举增加到600人。随后他们再度南下，沿着罗马帝国时代的大道和水渠遗址一路狂飙，如神兵天降般出现在约旦最大的港口城市亚喀巴（Aqaba）背后。7月5日，亚喀巴守军缴枪投降，红海东岸的全部港口都已落入阿拉伯起义军之手。为了完成这场壮举，劳伦斯在沙漠地区不间断地活动了两个月，行程超过500公里。

驱使他如此亢奋地投入作战的动力，远不止于对建功立业的狂热。从一开始起，劳伦斯就是极少数知晓《赛克斯—皮科协定》详情的内部人员，为了阻止该协定生效，他努力向费萨尔灌输一种观念：法国人没有在中东战场投入过一兵一卒，根本无权置喙沙姆地区的未来。只要阿拉伯起义军能向英国政府证明：他们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共同体，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大势或许还有更改的可能。而为

了证明上述结论，起义军需要在战场上做出更多的实绩。因此，在攻占亚喀巴湾之后，阿拉伯起义军开始向汉志铁路沿线派出越来越多的游击分队。劳伦斯亲自指挥这些破坏小队，携带炸药、雷管、机枪和少量补给品，对马安、巴勒贝克、德拉、安曼等铁路要点之间的轨道、桥梁和机车进行不遗余力的破坏。在1917年最后一个季度，他们平均每个月炸毁至少4列火车，使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铁路交通陷入一片混乱。在由大马士革向南开出的列车上，土耳其军人和富商甚至愿意付高几倍的价格购买最后一节车厢的座位，以免被炸毙。

艰苦的沙漠游击战并不总是和胜利相伴随。为了协调部落成员的关系，避免他们开小差或者互相攻击，劳伦斯需要在进军途中随时主持法律诉讼、婚礼和战利品分配，并寻找在大漠中走失的士兵。而土耳其人正在叙利亚全境悬赏2万英镑取他的人头。1917年12月下旬，当他在德拉附近执行侦察任务时，被土耳其巡逻队捕获。尽管劳伦斯成功隐瞒了自己的身份，还是遭到了敌军的鞭笞和虐待。与此同时在英国，他已经被视为传奇英雄，获颁巴斯勋章，并被晋升为陆军少校。唯有最重要的问题答案依旧不明：随着土耳其人的战败成为必然，英国政府打算如何兑现他们在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中许下的承诺？

通往分治之路

1917年10月底，新任埃及远征军司令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上将指挥英国正规军穿越西奈半岛，在加沙和耶路撒冷之间发动了全面进攻。在他们东面，劳伦斯指挥的阿拉伯起义军游击队和费萨尔麾下的北方军一直在牵制着土耳其人的援军。12月11日，英军进入耶路撒冷，劳伦斯也受邀参加了入场式。但和军事上的节节胜利相比，政治问题造成的祸患正暴露得越来越充分：11月2日，英

劳伦斯需要在进军途中随时主持法律诉讼、婚礼和战利品分配，并寻找在大漠中走失的士兵。而土耳其人正在叙利亚全境悬赏2万英镑取他的人头。



(视觉中国供图)

1971年2月1日，时任叙利亚总理兼国防部长哈菲兹·阿萨德中将（挥手者）访问莫斯科。这位阿拉维派穆斯林实际统治叙利亚长达30年之久

国外交大臣贝尔福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领导人沃尔特·罗特希尔德勋爵，公开承诺“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成其实现”。5天后，俄国革命爆发，新上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将《赛克斯—皮科协定》的细节公之于众，劳伦斯和费萨尔规划的独立蓝图正在一步步地走向崩解。现在，他们被迫将希望寄托在一个身处万里之外、对中东问题一无所知的美国人身上——伍德罗·威尔逊总统。

在1918年1月8日公布的《十四点宣言》中，威尔逊提出了他关于战后中东前途的见解：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各民族，都有基于自决（Self-determination）原则自行决定其政治前途的权利。倘若能证明其已经具备独立建国的条件，则应承认其建国权。看上去，一切又可以回到先前的老路上：阿拉伯人以战场上的表现证明他们已经具备了

建国的能力，随后等待协约国对他们的命运做出裁决。因此，费萨尔和劳伦斯重新投入战斗：在1918年9月下旬艾伦比发动的美及多战役中，阿拉伯起义军的一个步兵旅和一个骆驼骑兵营加入了英国正规军序列，以6万余人的兵力攻击困守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境内的3个土耳其集团军，土军兵败如山倒。9月27日，阿拉伯起义军在塔法斯村追上了从德拉撤出的6000名土耳其残军，在两天内打死了其中4000人。9月30日，大马士革上空飘起了阿拉伯军队的四色旗，劳伦斯和费萨尔同乘一辆缴获的轿车凯旋入城。

10月26日，即叙利亚北部第一大城市阿勒颇被英阿联军解放的同一天，土耳其海军大臣拉乌夫登上停泊在希腊利姆诺斯岛的英国战列舰“阿伽门农号”，开始商讨停战事宜。四天后，双方缔结《穆德洛斯协定》，土耳其在巴勒斯坦、叙利亚、也门和

美索不达米亚境内的残军受命向协约国投降，同时彻底取消君士坦丁堡当局在当地设立的一切行政管理机构。奥斯曼帝国对中东四个世纪的统治就此告终。但短短一天之后，劳伦斯和费萨尔最担忧的情况终于发生：英国战时内阁知会艾伦比，中东新收复领土的管理权将由英法阿三方分担，黎巴嫩和叙利亚西部海岸由法国管理，叙利亚东部和外约旦由费萨尔的阿拉伯起义军管理，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其他地区由英国管理。这一照会等于默认了《赛克斯-皮科协定》依然有效，并且英法政府就将按照这一方案重订战后中东边界。12月1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与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的会晤中重申了这一立场；鉴于俄国已经退出战争，他们现在决定让另一个小伙伴希腊吞并色雷斯、君士坦丁堡和小亚细亚西部。

费萨尔和他背后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依然在孤军奋战；这一次，他们同时寄希望于犹太人和美国人。1918年6月，费萨尔在亚喀巴会见了魏茨曼，提议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基于对彼此自决权的认可展开合作。1919年1月3日，两人在巴黎签署协议：魏茨曼代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支持费萨尔在包含黎巴嫩、叙利亚以及外约旦在内的沙姆地区建立统一的阿拉伯人王国，并利用经济力量帮助阿拉伯人发展经济；费萨尔则表示愿意接受1917年11月的《贝尔福宣言》，同意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并建立自己的国家。1919年3月3日，费萨尔以叙利亚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份声明，宣称：“我们（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打算为近东的变革和重建共同奋斗。我们这两个运动是相辅相成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民族运动而不是帝国主义运动。沙姆拥有我们双方发展的天地。我真心地认为，要想成功，我们谁也离不开谁。”

1919年暮春，美国总统威尔逊组建的金-克雷恩代表团（King-Crane Commission）终于抵达费萨尔的大本营大马士革。按照最初的设想，这个代表团将帮助正在进行的巴黎和会评估阿拉伯人的自决意愿，以决定是否批准其建立独立的国家。在大马士革、贝鲁特和阿勒颇，美国人听到了同样的声音：阿拉伯人不愿再作为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附庸而存在；他们希望取得彻底的独立，最低限度也要由法国以外的国家来行使托管权。与此同时，在巴黎，已经升任上校的劳伦斯正陪伴费萨尔举行各种

记者招待会和演讲，宣传阿拉伯人的独立权利。伦敦当局对此恼火不已，甚至一度禁止劳伦斯继续出现在和会上。然而事实证明，无论是犹太人还是美国人的善意都不足以发挥决定性影响：魏茨曼始终必须依靠英国政府的支持才能建立他的犹太民族之家，因此对阿拉伯问题缄口不言；威尔逊则把国际联盟的成败视为比倡导民族自决更重要的使命，当他希望争取伦敦和巴黎的支持时，立即把金-克雷恩代表团起草的报告锁进了保险柜，直到离任也不曾公布。

最终，1919年6月28日签订的《国际联盟规约》第22条关于中近东领土委任统治（Mandate）问题的条款，几乎原样照搬了《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安排：法国获得从亚历山大塔勒（伊斯肯德伦）延伸到巴勒斯坦以北的地中海东岸和阿拉伯半岛北部的托管权，并按照居民宗教信仰的差异，将其划分成黎巴嫩和叙利亚（“小叙利亚”）两大板块。英国获得美索不达米亚以及整个巴勒斯坦（相当于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之和）的托管权。阿拉伯人一无所获，依然是殖民统治之下的二等公民。1920年4月下旬，英法两国在圣雷默（San Remo）会议上就瓜分委任统治地的细节达成一致，并将之纳入同年8月与奥斯曼帝国签署的《色佛尔和约》。根据这些条款，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何时获准独立须由英法两国裁断，毫无转圜的余地。

消失的“大叙利亚”

在巴黎与劳伦斯分别之后，费萨尔以及团结在他周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彻底丧失了对协约国集团的信心。在攻占大马士革之后，他们原本已经在为筹建一个涵盖整个沙姆地区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而进行各种准备：“青年阿拉伯人组织”中的新老两个派别分别组建了政党特征更强的“阿拉伯独立党”

费萨尔宣布，他将在沙姆地区建立一个基于平等和正义原则的阿拉伯人立宪政府，包容一切宗教信仰和民族。

和“叙利亚国民党”，准备参加议会选举；费萨尔则宣布，他将在沙姆地区建立一个基于平等和正义原则的阿拉伯人立宪政府，包容一切宗教信仰和民族。如今，英法两国政府既已拒绝履行承诺，他们便决定以强对强，自行宣布建国。

1919年5月，来自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数百位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大马士革的阿拉伯俱乐部集会，宣布成立带有议会性质的“叙利亚国民大会”。7月2日，第一届国民大会选举“青年阿拉伯人组织”成员哈希姆·阿塔西（Hashim al-Atassi）为主席，并通过了作为临时宪法的大会纲领，宣布包含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在内的“天然沙姆”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不承认《赛克斯-皮科协定》，并拥戴费萨尔为叙利亚国王。由于英国政府在巴黎和会结束后中断了对阿拉伯起义军的财政和军事援助，“青年阿拉伯人组织”和“同盟会”还在大马士革成立了国防人民委员会，募集资金、组织民兵武装，准备对即将到来的法军实施反击。

素来以温和立场示人的费萨尔在最后关头依旧考虑过妥协。1920年1月，他在和克列孟梭会谈之后，一度打算接受法军进占沿海地区和亚历山大塔勒，只要巴黎当局愿意承认叙利亚内陆部分的完全自治。但这个方案在法国和叙利亚的强硬派那里都得不到支持：前者得寸进尺，进一步要求取消阿拉伯人自主建立的一切行政机构和民族主义团体；后者则斥责费萨尔丧权辱国。在回到大马士革之后，这位王子受到独立党人的鼓动，再度转向强硬：1920年3月8日，第二届叙利亚国民大会正式宣布“大叙利亚阿拉伯王国”为主权独立的君主立宪国，以费萨尔为国王，领土范围包括“小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同一天，巴格达的伊拉克国民大会也宣布拥戴费萨尔的哥哥阿卜杜拉为国王（后遭拒绝），并与大叙利亚组成统一的联邦。由独立党组建的国防政府在全国颁布了戒严令，宣布每位叙利

“与其让欧洲人把事情搞得有条有理但当地人什么都学不到，莫不如让阿拉伯人自己去搞；即使事情最后变得一团糟，但只要有改进的空间，就能造就真正的进步。”

亚公民皆有加入军队、武装保卫国家的义务。

但法国人显然不愿接受这种自行其是的独立。已经按照国联决议进占贝鲁特的法国黎凡特集团军司令亨利·吉罗（Henri Gouraud）在1920年7月4日向叙利亚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后者无条件接受法军入驻，终止征兵和扩充武装，并立即逮捕对法国心怀不满的民族主义者。叙利亚陆军部长兼总参谋长尤素夫·阿兹马（Yusuf al-'Azma）拒绝了费萨尔的妥协提议，决心以武力抵抗法国人的进攻。他在贝鲁特一大马士革公路东端集结了3000余名志愿军和贝都因骑兵，誓要以血肉之躯对抗装备有坦克和轰炸机的1.2万名法军。

7月24日，决战在大马士革西郊的麦萨伦（Maysalun）隘口爆发。叙利亚军队以猛烈的炮火痛击法军坦克和作为侧卫的两个塞内加尔连，使对方遭受了超过200人的伤亡。但以游击战起家的阿拉伯军队显然不适于执行阵地防御任务，当吉罗以重炮和航空炸弹猛击叙利亚人的中央防线之后，阿兹马的部队溃散了，伤亡在1500人以上，他本人被法军坦克的机枪击中殉国。25日，法军攻入大马士革，将费萨尔国王及其政府驱逐出境。8月30日，吉罗宣布黎巴嫩脱离叙利亚，成为独立的大黎巴嫩州，并在两年后获得国联的追认。

在费萨尔的独立事业遭遇重创之后，刚刚被任命为英国殖民地大臣顾问的劳伦斯为他提供了最后一点折中性的补偿。1921年8月，伦敦在伊拉克托管地组建的国民政府宣布拥立费萨尔为该国立宪君主，史称伊拉克第一王国，在1932年获得彻底独立。不过费萨尔一直坚持自称“叙利亚及伊拉克国王”，这一头衔也成为到今天为止，哈希姆家族费萨尔分支法定继承人的传统称谓。至于一度被推举为伊拉克国王的阿卜杜拉，他在1920年率领一支500人的志愿军占领了安曼。英国随后说服阿卜杜拉接受了外约旦埃米尔国君主的头衔，统治约旦河以东的巴勒斯坦土地。接下来的30多年里，外约旦一直是“大叙利亚”理想最坚定的支持者。

费萨尔和阿卜杜拉的父亲老侯赛因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谢里夫同样不愿接受巴黎和会的安排，1919年，他宣布将汉志州更名为汉志王国，自封国王，同时还给自己加上了“诸阿拉伯国家之王”的头衔，这招来了另一个企图统一阿拉伯半岛的强力人物伊本·沙特的忌惮。1924年，老侯赛因在土耳



1918年6月，费萨尔（右）在亚喀巴与魏茨曼（左）举行会谈，后者特地戴上阿拉伯头巾以示尊重

其废除哈里发制度之前两天自行宣布加冕为“全穆斯林世界的哈里发”，遭到伊本·沙特指挥的内志军队的进攻，被迫让位给长子阿里，同时逃往外约旦避难。一年后，内志军队攻陷麦加，灭亡了汉志王国。

在1918年那个风云变幻的秋天过后，劳伦斯再也没有返回过大马士革。由于自觉辜负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信任，他拒绝了英王乔治五世授予他爵士头衔或出任海外殖民地要职的邀请，以“列兵托马斯·肖”的身份加入了皇家空军，度过了十多年异常低调的军旅生涯。即使是费萨尔以伊拉克国王的身份到访英国、点名要求与他相见时，他也只是低调地略作寒暄。1933年，费萨尔在瑞士死于心脏病；两年后，劳伦斯在驾驶摩托车高速奔驰时发生事故，当场遇难。他们的合影至今保存在大马士革阿兹姆宫曾经的会客厅里。

令人唏嘘的是，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马克·赛

克斯爵士几乎完全推翻了他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沙姆统一理想的偏见。1919年1月，在结束对中东的另一次长达三个月的考察之后，他最终承认：由英法两国分治大叙利亚和整个中东的设想是完全错误的，“与其让欧洲人把事情搞得有条有理但当地人什么都学不到，莫不如让阿拉伯人自己去搞；即使事情最后变得一团糟，但只要有改进的空间，就能造就真正的进步”。但他本人不会看到那一天了。1919年2月10日，赛克斯在巴黎死于西班牙流感。一直到死他也不曾知晓，那条用红色铅笔任性地在地图上画出的折线，会令多少人付出生命和自由作为代价。❏

（参考资料：Scott Anderson, *Lawrence in Arabia: War, Deceit, Imperial Foll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T.E.Lawrenc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Arthur Goldschmidt Jr. & Lawrence Davidson,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等）

一名自由摄影师的中东记录

文/图 李亚楠

作为一名自 2013 年起每年至少去中东一次的自由摄影师，我曾不止一次问过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迷上那里？答案并不很确定。可能仅仅就因为那里是中东，那里和我日常所处的世界截然不同。

最初听到“中东”两个字，我和大多数人的印象并无差别，会觉得那是一系列战乱国家的总称。记得在小时候，总能在收音机和电视新闻中听到“中东”这个地理术语，仿佛全世界都是一台稳定运行的机器，只有那里是故障最多的零部件，经常影响着机器整体和局部功能的运行。虽然这个“零部件”总出故障，但多少在我心中埋下了一些伏笔。不太安分的我想要有一天去体验一下什么是真实的中东，虽然它很远——不仅是距离上的远，更是一种心理上的远，但我依然想去看看。

过去喜欢的很多国外摄影师，都曾有拍摄和报道中东事务的经历。那里的冲突、矛盾、日常生活以及丰富的历史背景，在“二战”之后就不断成为全世界的焦点。全世界最有新闻理想、最有表达欲望、最有责任感的一批记者和摄影师，例如著名的玛格南图片社的许多成员，都曾踏足过中东，我所喜爱的 Paolo Pellegrin、Josef Koudelka、Jorome Sessini、Christopher Anderson、Newsha Tavakolian 等无一例外。他们通过相机去追寻中东地区各个国家的各种历史事件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并加入自己的影像表达。对我自己而言，去中东会让我有一种站在第一线的感觉，从行动上效仿了那些先辈，也能和他们一样用相机去记录和表达我的所见。

踏上五年旅途

2013 年是我第一次去往中东。那时刚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没什么经验，脑子一热就上路了。打算从北京出发，经陆路前往伊朗，并且热血沸腾了好一阵子。我期待着一路上能遇到的景致和经历，让我用自己的眼睛和镜头去看看这片神秘的天地。从北京一直赶赴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交界的城市白沙瓦，在这里我受到了第一次阻拦。最终，我不得不返回伊斯兰堡，乘飞机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再从喀布尔飞抵伊朗。





大马士革老城南方的一条小巷内，一位年长的穆斯林慢步走向附近的市场



1



2

在这一地区的行走，使我第一次亲身体会到了“塔利班”武装的存在，一切行动安全都受着“塔利班”的影响。行驶在中巴友谊公路上的长途大巴会在吉尔吉特结队前行，前后都有武装护卫，以防“塔利班”攻击。进入阿富汗，从陆路前往任何一个城市都是比较危险的事。能亲眼看看喀布尔已经算是不错了。

从飞机降落在伊朗什叶派穆斯林圣城马什哈德开始，一切都变得美好和放松起来，再也没有走在喀布尔街头的那种紧张气氛，取而代之的是浓重的宗教氛围。这一点让我很震撼，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太大的不同。最后我走访了伊朗几个著名的大城市，最后从伊朗北部的南高加索国家亚美尼亚飞回北京。

这一次的中东之行让我对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以及中东地区有了最初的印象。它的特点非常鲜明，一切都不是我读过的书、看过的新闻所描述的那样碎片化。只有将这一切结合起来，才更像是一个完整和真实的中东：除去宗教、冲突和战争，那里的日常生活才是中东地区最本质和朴素的一面。

时隔一年，2014年，我再度出发。这一次的目标也很明确：我看到了新闻中叙利亚内战的惨状，大受震动，但暂时还不能直接进入叙利亚。因此，我在叙利亚周边的国家中寻找与叙利亚有关的人和故事去拍摄。这些人也就是逃出叙利亚的普通百姓，

我们习惯称他们为难民。

我选择的第一个目的地是约旦，因为我知道这里有全世界最大的叙利亚难民营。不过作为自由摄影师，我没有获得任何拍摄许可，因此虽然在约旦停留了半个多月，最终却并未真正接触到难民。不过在约旦期间，我却增长了很多经验，比如如何寻找拍摄线索，如何设计拍摄路线，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可以帮助自己更好地拍摄，与什么样的被摄对象打交道会呈现更好的表达……很多自己在摄影上尚觉得懵懂的问题，都在约旦的这半个多月里积累了很多实质性经验。

最终，我离开约旦，去往黎巴嫩。在黎叙边境的贝卡谷地，我真正接触到了大量叙利亚难民。也是在那里，我真正在足够近的距离上接触到了中东地区近几年最突出的问题——叙利亚内战。而后在2015年，全世界舆论的眼光都被一张溺亡在海滩上的叙利亚难民婴儿的照片所吸引，中东局势彻底成为热门话题。

在黎巴嫩拍摄完叙利亚难民后，我返回了巴基斯坦和伊朗。在伊朗时，我有意避开了那些著名的旅游城市，前往两伊边境，寻找当年两伊战争留下的历史印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两伊边境还残留着大量战争时期废弃的坦克和未引爆的雷区。那天下午，在一辆废弃的坦克上，来了一群附近学校的



3

伊朗女高中生。她们爬上废弃的坦克，摆出各种造型相互拍照。我看到一个女孩张开双臂站在炮塔上，正好朝着伊拉克的方向。于是，我拍摄下了那一瞬间。这个场景让我有些莫名感动。随后，这张照片在2015年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人物类比赛中赢得了一个奖项，也使那个美好的下午具有了更多的纪念意义。

再往后的几年，我多次去到中东地区的国家，包括伊朗、约旦、黎巴嫩、埃及、土耳其、阿联酋等。这五年时间里，我很庆幸自己在拍摄中东的过程没有受过意外伤害，又能进一步深入了解这一地区。我总是戏称，中东见证了自己在大学毕业之后真正的“黄金时代”。这么多年来，认识了许多人和许多朋友，了解了许多事情，许多拍摄内容已经成为自己的长期专题。比如最近用 xpan 宽画幅相机，从画面上做更为纯粹的表达，展示中东地区，这一人类变动最为剧烈的地区，它暂时的支离破碎，是一种无法改变的现状和难以扭转的常态。

阿富汗的日子

阿富汗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有人认为它在中亚，有人把它定义为南亚，也有人认为它属于中东。无论怎么定义，它都处在一个不容忽视的位置上。

阿富汗是我目前去过的次数最多的伊斯兰国家，从2013年到现在一共三次。我自己很喜欢这里，而且如果把阿富汗算作中东国家的话，它是我在中东地区朋友最多的地方。不过我眼中的阿富汗很小，小到只有喀布尔。不断变差的局势，每一次当我到达那里，能去的城市都会变得越来越少，现在几乎只剩下了喀布尔。

每当提起喀布尔，我脑中很快就能浮现出黎明时分，客机盘旋在荒山间、贴近地面，经历强烈的颠簸后降落在机场的跑道上，跑道边停满了美军的“黑鹰”直升机和“悍马”吉普。走出机场，空气中满是浮尘，初升的阳光穿过尘土，现出淡淡的粉红色。去往市区的道路两边到处都是防爆墙，这些冷冰冰而又整齐划一的水泥块将喀布尔分割成了一个一个的区域。街角到处是坐在“悍马”上的美军和阿富汗士兵，还有不同装束的安保人员荷枪实弹地坐在丰田 Hilux 皮卡车后呼啸而过。空中的高处飘着三个探空气球，用以监视全城，那些“黑鹰”也在空中不断画着圆圈监视着喀布尔城的每个角落。

在喀布尔我有一群中国朋友，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在阿富汗进行商业活动。有的人开工厂、有的人干工程，因为各种原因汇聚在喀布尔，并组成了华人商会，经常汇聚在红姐开的唐人饭店里。很难想象在阿富汗这样的战乱国家竟然有中餐馆，厨师

1. 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一处叙利亚难民营，一位母亲和她的两个孩子站在全家人寄居的帐篷前

2.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街头，驾驶汽车的穆斯林妇女

3. 贝鲁特街头，摆摊出售气球的黎巴嫩老人

贾师傅是很好的朋友，每次去阿富汗我都住在这里，每天吃他做的正宗中餐。

第一次去阿富汗，我在街上拍摄照片时往往蹑手蹑脚，会有一种紧张的气氛萦绕在周围。这里的外国人特别少，尤其是东亚面孔的中国人，走在街上无论在哪里都会被人盯着看，这是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不过，普通阿富汗百姓是非常朴实的，他们乐于与我打交道，并用眼神和微笑交流。

战乱国家的共同特点就是负责安全的人员太多，拿相机拍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好在我的相机体积一直很小，不会让周围人觉得我是记者。毕竟在这里，记者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身份。

时隔两年之后，我又去了阿富汗，这次是我拍摄照片最多的一趟。喀布尔市区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比如喀布尔河周围的市场，破损的皇宫，古老的清真寺，沿山而建的贫民区……很多地方我都很感兴趣。每天住在唐人饭店让我有一种很安逸的感觉，白天一起床，我就乔装打扮一番，穿上当地人的传统衣服，戴上一顶羊皮帽，远看不会认为我是个外国人。再将相机藏好了，背在胸前，钻进出租车里，消失在喀布尔拥挤的车流中。这一次，我走访了喀布尔很多地方，拍摄了大量照片，包括一家意大利人运营的公益战地医院和中国人开设的商业性质医院。在中国医院里，我认识了几个会说中文、并且在中国留过学的阿富汗本地学生，她们都来自喀布尔大学，这让我们在阿富汗的语言障碍变得更小了。

我没有见过冬天的阿富汗，于是在2016年冬天再一次去了阿富汗。喀布尔战后重建工作非常快，街上那些残垣断壁战争痕迹早已不复存在。每天随着当地人朋友穿行于街巷中，看到很多我自己永远无法寻找、并且不可进入的地方。由于她们都是女孩，我甚至随她们进入了一次女性美容院：在伊斯兰国家，这里是男性的禁地。每家美容院都用厚厚的帘子挡住门窗，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进入之后的场景并没有太出乎我的意料：和所有的美容院没有差别；唯一不同的是灯光的色彩，她们喜欢用非常浓郁的绿色、蓝色等让人看上去很不舒服的灯光。

沿山而建的贫民区被称为禁地，那里会有抢劫发生，也可能有“塔利班”分子出现。可是这些房屋的结构和位置实在吸引我，我希望朋友们可以带我去。冬天的喀布尔天黑得很早，还没到晚饭时间，

太阳已经躲在山后。它的光射在喀布尔灰蒙蒙的空气中，又呈现出一种让人感觉温暖的绯红色。山脚下是喀布尔最繁忙的一条街道，车流行驶缓慢，和所有城市的傍晚一样，万家灯火、内心怡然。无论在北京、东京、巴黎、纽约，还是在喀布尔，都会得到这份宁静的感觉。离开这样的傍晚后，我扎进车流返回唐人饭店，在天台上看着月亮。此时“黑鹰”呼啸飞来，发动机发出巨大的声响，震着玻璃嗒嗒作响，才将我拉回了现实。

叙利亚的诱惑

叙利亚是现在中东最不安定的国家，几乎难以踏足。拍了这么多年中东，接触过很多叙利亚难民，给我最大的感觉是：叙利亚人相对于其他阿拉伯人来说，显得温文尔雅，很有教养。我很难想象一个常年战乱的国家竟然有这样的性格，因此更想去看。

真正去往叙利亚之前，我了解到叙利亚政府对于新闻的把控非常严。我们这种拿着商务签证进入叙利亚的“游客”，想要拿相机拍照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没有拍摄许可的人，可能会有不小的麻烦。经过再三考虑，我把三台相机中的两台留在了黎巴嫩，只带了很少的行李和一台相机，坐上了贝鲁特去往大马士革的出租车。

在大马士革待了一周多，回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对这里无比想念。这里与贝鲁特截然不同，虽然两地相隔只有100多公里。贝鲁特我去过三次，还是看不懂那里。每次来贝鲁特都觉得这是一个奇怪的存在，所有人都处于欢愉的活动中，假惺惺地庆祝着虚幻的现实，而这一切我觉得很快就会消失。在黎以战争的废墟里，常常拔地而起一些奢华的现代建筑和商场，每个人的精神面貌都很欢快，阿拉伯人张扬的性格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贝鲁特市中心往南走3公里就是巨大的贫民区和巴勒斯坦难民营，那里和贝鲁特仿佛没有任何联系。在这里我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甚至走在街上都提心吊胆，但我并不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我甚至讨厌这种虚的浮华、假的热情。这里和地中海的蓝色一样，看上去让人觉得生腻。即使来了三次，我依然觉得和贝鲁特有距离感，甚至不如在贝卡谷地和叙利亚难民共处的那一小段时间来得热络。

大马士革则截然不同。每天早晨，我都会在沙



大马士革倭马亚大清真寺内，一群穆斯林妇女围绕在供奉有施洗约翰灵柩的神龛旁

姆宫宾馆楼顶的旋转餐厅俯瞰这座城市，在大厅里和不多的外国人寒暄，互相猜测对方的身份。在沙姆宫住了一些来访的伊朗歌唱家，有一晚，我们在大马士革城西的文化中心听他们演唱《Time to Say Goodbye》，内心甚是翻腾，总有落泪的冲动。这里像极了“二战”中的卡萨布兰卡饭店，各色人都在这里出没，打发无聊的日子。每天起床后在旋转餐厅享受着舶来的法式服务，通过落地窗就能看到东郊不远处因交战而不断腾起的黑烟，这是一幅极具反差感的画面。

大马士革的生活每天都带有这种强烈的反差感，它的白天和夜晚也有着不同的魅力。白天的大马士革，总能看到热闹的市场里挤满了人，购买一切需要的生活用品和食物，穿插在人群中到处都是警察。2014年开始，大马士革每个门店的卷闸门都整齐划一地画成了叙利亚国旗，如同叙利亚随处可见的阿萨德家族画像一般。

大马士革的夜晚我特别喜爱，尤其是在老城往东的那些街区，在传统的中世纪街巷内，到处藏匿着酒吧甚至夜店。这里是大马士革年轻人每

晚必来的地方，他们喜欢在这里聊天、聚会，释放压抑的情绪。叙利亚是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并且高度世俗化，让年轻人能够获得一种基于战乱之下的自由。年轻人们拿着酒瓶坐在路边，背后是古罗马时期的石质宫殿废墟，像极了真正的罗马。我记得在大斗兽场旁，也有这样一条热闹街道，年轻人汇聚在这里聊天喝酒，一切都是他们该有的样子。在叙利亚竟然也能找到这样的场景，让我很是惊讶。

但表面和平的大马士革却是我拍摄照片最困难的一个地方。刚进大马士革的前两天，我觉得满眼都是画面，却不能用相机拍摄，那种感觉如同坐监狱。后来我想：不能放弃这样的拍摄机会，于是将相机很好地隐藏了起来，直到寻找到了合适的拍摄时机才突然拿出来。中间被警察盘查过几次，运气还算不错，没有被过分为难。

这一次的叙利亚之行有太多遗憾，想去的其他城市没法到达，想拍的很多画面没法拍摄，但无论如何，真实的大马士革让我甚是想念，我想我还会再回去。✍

定向降准的含义

主笔 / 谢九

央行此次定向降准虽然并不代表货币政策已经转向，但至少意味着货币政策继续紧缩升级的可能性已经不大。

9月30日，央行宣布对部分商业银行实施定向降准，在当前货币政策持续趋紧的背景下，央行此举引发了“货币政策是否转向”的猜想。

按照央行的细则，此次定向降准主要是为了扶持发展普惠金融。对于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以及农户生产经营、创业担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助学等贷款，人民银行决定统一对上述贷款增量或余额占全部贷款增量或余额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实施定向降准政策。凡前一年上述贷款余额或增量占比达到1.5%的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可在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档基础上下调0.5个百分点；前一年上述贷款余额或增量占比达到10%的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可按累进原则在第一档基础上再下调1个百分点。

简而言之，也就是如果商业银行对于小微企业、农户、低收入人群等普惠金融对象的贷款达到一定比例，就可以享受央行的降准待遇。按照估算，此次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政策可覆盖全部大中型商业银行、约90%的城商行和约95%的非县域农商行。以此来看，名义上虽然是定向降准，但事实上基本可以理解为一次全面降准。

央行降准决议公布之后，正值内地股市休市，正常开市的香港股市对此予以积极回应，尤其是内地的银行股更是暴涨，工商银行港股大涨8%，建设银行港股大涨6%，在内地银行股和地产股的带动下，香港股市在国庆节期间大涨，恒生指数超过28000点，创下近10年来的新高。

为了避免市场产生误解，央行表示此次定向降准政策并不改变稳健货币政策的总体取向，目的在于促进金融资源向普惠金融倾斜，优化信贷结构，属于一种结构性政策。同时，此次定向降准并不会马上执行，而是从2018年开始正式实施，这种延时降准也算是央行调控手段的创新。

今年下半年以来，由于经济数据不及预期，市

场开始呼吁央行应该通过降准释放流动性，央行此次采取延时定向降准的策略，一方面回应了市场的关切，同时又不至于在总体上破坏当前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同时，也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扶持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一些当前还不满足降准条件的银行，在今年剩下的三个月时间里可以将贷款资源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等领域倾斜，从而在明年可以达到央行定向降准的标准，享受更多的流动性支持。

央行此次降准的力度相当谨慎，一方面采取结构性的定向降准，同时还要在明年才开始正式实施，因此，如果仅从降准本身来看，释放的流动性对于市场的影响并不会太大，但是如果考虑到今年年初以来货币政策不断收紧的大背景，央行此次降准还是具有很强的信号意义。

今年的货币政策从稳健转向稳健中性，尤其是二季度以来，去杠杆成为金融体系的主旋律。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国内的流动性不断缩紧，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持续创下新低，继5月份跌破10%之后，今年8月份更是跌破9%，不断刷新历史新低，流动性缩紧带来资金利率全面上升，对于实体经济难免会带来冲击。从今年上半年来看，中国经济的各项指标表现不错，流动性紧缩的冲击暂时还没有显露出来，但是进入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各项关键指标迅速回落，7月份的工业增加值仅为6.4%，大大低于预期的7.1%，8月份的工业增加值更是只有6%，除此之外，7、8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发电量等关键指标均全线下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8月份的民间投资增速再度出现下滑。2016年，国内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雪崩，全年增速只有3.2%。进入2017年以后，民间投资开始有所回暖，但是今年8月份再度回落，对于当前中国经济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由于民间资本一向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难题，在当年去杠杆的主旋律之下，小微企业面临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9月2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强化对小微企业的政策支持和金融服务，会议决定，采取减税、定向降准等手段，激励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9月30日，央行扶持普惠金融的定向降准正式出台。

央行上一次采取定向降准是在2014年，当年4月份，对县域农村商业银行降准2个百分点，对县域农村合作银行降准0.5个百分点。6月份，对“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降准0.5个百分点。在连续两次定向降准之后，当年11月，央行实施了一次降息，2015年更是连续实施了5次全面降准和5次降息。

如果从央行的历史操作来看，定向降准可能不会仅仅是一次孤立行为，而更可能是一系列操作的开始。从短期来看，这一次定向降准还不能说是货币政策转向，但是至少意味着货币政策紧缩继续升级的可能性已经不大。而未来货币政策会如何发展，主要取决于明年的经济走势，如果中国经济的关键指标继续恶化，不排除定向降准转向全面降准的可能性。

今年上半年，由于国内经济增长表现尚可，一些乐观派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迎来了新周期，但是，随着8月份国内的主要经济数据全面回落，预示着当前的经济增长并不乐观。从下半年乃至明年来看，中国经济依然面临诸多挑战，房地产调整带来的压力将会逐渐显露，去年的最严调控实施一周年之后，一线城市的销售遇冷，但是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全面开花，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房地产调控的影响，而随着近期房地产调控开始向三、四线城

市蔓延，在严格的限购和限售政策打压下，预计三、四线楼市也会逐渐降温，随着国内楼市全面转冷，对于经济增长的压力才会真正显现出来。除此之外，租售并举成为房地产调控的长效调控机制，大量政策开始向租房市场倾斜，房地产销售市场在短期之内将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从国际市场来看，特朗普政府近期公布了大规模的减税方案，如果税改方案获得通过，将会对中国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冲击，在美国优惠税率的吸引下，大量资本将会转移至美国市场。即使在美国税改之前，美国的税收体系已经对很多中国资本产生了吸引力，如果特朗普减税方案获得通过，中美之间资本转移的速度将会进一步加快。当前中国经济已经面临巨大的投资回落压力，如果大量外商和民营资本出现大规模转移，将会对中国经济增速带来较大冲击。

在内有房地产回落，外有美国税改冲击的背景下，未来的货币政策可能需要更多的灵活性来面对挑战。此次央行实施定向降准，也可算是货币政策灵活性的体现。去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今年的货币政策从稳健转向稳健中性，由此拉开了今年货币政策收紧的序幕。明年的货币政策将会如何定调，也还需要等到年底才能真正确认。■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 (传真)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7年第十期要目

封面话题

涂鸦，足球，老建筑……
当我们谈论大提琴家穆勒—肖特，我们在谈论什么

热点·观察 贝多芬在哈瓦那
斑狐说乐 我的歌在家里，我的家在歌里——纪念宗教改革500年(中)
话题 布列兹谈《女武神》
吉尔·克莱默：谁让他是大师呢
略谈扎克演奏普罗科菲耶夫《第二钢琴协奏曲》

爱乐笔记 柴科夫斯基访谈
涂鸦马勒(下)

早期音乐 珀塞尔家族中的音乐家(四)
20/21世纪音乐 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阿多诺—韦伯恩：
一个复杂的心理社群(上)

译文选萃 谱线上的风景
吾辈同瓦格纳今日之关系

浮生碎乐 离家五百里
戴鞋爱乐 游行图志
作曲家与作品 对勃拉姆斯《四首严肃的歌》
和理查·施特劳斯《最后四首歌》的解读
波兰指挥家斯克洛瓦切夫斯基访谈录(下)

人物 20世纪西方歌剧物语(一)
歌剧物语 维也纳歌剧院观剧记
音乐之旅 约翰·施特劳斯在1961年萨尔茨堡音乐节
唱片说明书 舒伯特与施莱格尔兄弟：浪漫主义的黎明(九)
资料库 英式巴洛克和古典主义音乐(下篇)
听购收 真实的托斯卡尼尼(八)
专题 北大爱乐故事(六)
爱乐往事

《爱乐》2018年订阅须知

2018年《爱乐》月刊，每期160页，全年12期，
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8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
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



天猫旗舰店



官方微信

银行汇款：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莎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账号：0200012709201646336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之后，控枪会有进展吗？

文 / 晓小



左图：2017年10月5日，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民众举行烛光集会，悼念在日前枪击案中丧生的警察查尔斯顿·哈特菲尔德

右图：10月2日，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幸存者丹妮和家人在医院



美国人将持枪视为宪法第二条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利，然而，屡屡发生的枪击案的恐惧却是持枪自由的代价。合法持枪降低了犯罪率，但持枪又极大增强了犯罪的杀伤力，提高了杀人的效率。每一次沉痛的枪击案之后，舆论总是不断争论：杀人的究竟是枪，是人，还是制度？但在美国，每一次争论之后，不要说禁枪，控枪政策的推进也都困难重重。

中国人民正沉浸在国庆长假的欢乐气氛中时，当地时间10月1日，美国拉斯维加斯一场音乐节上发生的枪击事件震惊了所有人。一位64岁的当地居民，用很可能是自己改造的连射机枪，从高处疯狂地连续扫射了音乐会的人群，造成至少59人死亡，500多人受伤。这个死亡人数，刷新了美国时不时就发生一次的枪击案的死亡规模纪录。

美国各州的枪支管理法律不同，拉斯维加斯所在的内华达州是控枪最松的州之一，对买枪的数量没有限制，对在一部分州禁止出售的大容量弹匣也没有限制。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凶手斯蒂芬·帕德克的酒店房间里已发现了42支枪和几百发子弹，在他内华达州的住宅里还发现了额外的19把枪和数千发子弹，几乎“有一座小军火库”，但都不算违法。尽管如此，内华达州的法律也不允许将公开出售的半自动枪支改造成可以连续射击的自动枪支。美国枪支管控中，“扣一下扳机打一发”的半自动枪支和“按住扳机扫射”的全自动武器的管控力度差别很大，但内华达警方也没有什么有效措施来对后者进行更严的控制。拉斯维加斯都市警察局称，枪手房间



(视觉中国供图)

里发现的 19 支枪支中至少有 12 支装备了“撞火枪托”（Bump Stocks），杀伤力大幅加强。“撞火枪托”可以将半自动武器改装为全自动武器，将子弹发射速度从每分钟 45 到 60 发提高到每分钟 400 到 800 发。这项装备最初是为了帮助手部移动困难的人在半自动的情况下点火而不需要扣动扳机，美国步枪协会在 2010 年裁定该装备合法。这样，把半自动步枪改装成全自动步枪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

枪击案的惨烈再次引起了美国舆论对禁枪和控枪问题旷日持久的讨论。一位从现场逃生的幸存者在推特账号上发言，决定放弃多年来对宪法第二条修正案坚定不移的支持，而呼吁禁枪，因为他目睹了子弹强大的威力。他写道：“我们之中有人有持枪证，公交车上也有合法枪械，但这些一点用都没有。我们不敢碰枪，怕警察把我们当成暴徒的同伙，向我们射击。”然而，拿到数量惊人的武器的人，“一个人就能蹂躏整个城市”。子弹的威力太强，让持枪“完全超出了控制”。他的这条推特得到了热烈的响应，被转发了数万次。

枪击案发生后的 10 月 4 日，加州长期反对武

器改装的民主党参议员迪安娜·费恩斯坦即拟定提案，禁止制作销售“撞火枪托”和其他可以加速半自动步枪的装备。1994 年，国会曾在费恩斯坦的提议下通过了杀伤性武器禁令，但这条禁令 2004 年已经过期；2012 年，费恩斯坦再度在国会提议通过禁令，而且在新的提案中包括了对“撞火枪托”的禁令，当时未通过。这一次，一向在枪支管控上持保护个人权利自由立场的共和党也做出了表态。共和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表示，国会将研究对“撞火枪托”的管控，以防止将半自动武器转化为很久前就被禁止的全自动武器。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表示，总统特朗普亦欢迎对“撞火枪托”的审查，尽管就在 4 月，特朗普还出席了在亚特兰大市举办的全国步枪协会年会，宣布民主党过去 8 年“对枪支拥有者的侵犯已经结束”，“你们在白宫有一位真正的朋友和支持者”。就在枪击案之前，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正准备对一项更便捷购买枪械消音器的提案进行投票，特朗普政府正考虑把手枪等小型枪械的出口监管从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国务院让渡给商务部。这些放松枪支管控的消息都提振了枪械制造商的股价涨幅。



(视觉中国供图)

左图：2016年1月5日，美国华盛顿的K&W Gunworks枪支商店里，销售人员手拿一把手枪进行讲解

右图：2016年7月4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因弗内斯的民众参加5英里（约合8公里）的持枪游行，声援合法持枪

自1871年成立以来，美国步枪协会曾被列入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院外游说集团”，常年在国会展开庞大的游说攻势来主导政策走向，也是近年来让枪支管控立法在国会屡受挫折的主力之一。这一次，美国步枪协会也呼吁审核“撞火枪托”，也许可以在美国控枪政策上往前推进一小步，以避免更全面和更严的管控。10月5日，步枪协会发表声明，呼吁美国烟、酒、枪及爆炸物管理局立即审核拉斯维加斯枪手使用的枪支是否符合联邦法律，对管控枪支的改装配件“撞火枪托”表示支持，但强调禁枪不能阻止悲剧发生。

拥有武器是美国的历史传统，可以追溯到12世纪的英国。当时的英国国王通过法令，要求人民购买武器保卫国家，这个传统延续下来，随着“五月花号”轮船到达美国。美国的建国者认为，为防止政府作恶，应允许人们持有武器，以让人民有反抗强权政府的可能，但这并不是写入宪法修正案的内容。在美国19世纪末才结束、持续了100多年的西部大开发时期，枪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美国人的必需品。然后是南北战争，第二次科技革命，新式武器不断涌现，美国军火企业开始起步，直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工企业彻底

强大起来。整个19世纪，美国政府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从法律上限制使用武器，拥有枪支是很寻常的事情，在美国被认为是“秩序的象征和保守主义的图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并没有一个好的时机来禁枪，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枪支管控才在民意、利益集团和两党政治的裹挟下，进进退退地迂回展开。20世纪60年代，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和黑人民权运动家马丁·路德·金相继被枪杀，枪支管控问题开始成为美国社会热议的焦点，美国国会通过了《1968年枪支管制法》，禁止跨州购买枪支，禁止未成年人、吸毒者、精神病人、罪犯等人群购买枪支。这个控枪法案也引发了反对枪支管控者的“抵抗”。1980年，美国步枪协会所支持的共和党候选人里根当选总统。几年后，国会通过了《武器拥有者保护法》，放宽了对枪支销售者和购买者的限制。1980年，美国的50个州中有46个州是严格控制枪支的，公民或完全不允许在公共场合公开或隐蔽配枪，或只有经过执法机构特别批准，才能携带枪支，只有4个州允许公民通过枪械考试后佩枪；到了1986年，控枪州与开放州的比例已经变成了41：9。比尔·克林顿任总统期间，在1994年签署生效了《攻击性武器联邦禁令》，是民主党的

控枪支持方在 1968 年之后难得的一次逆袭，但此后，民主党在国会失去了维持了 40 多年的多数地位，这项禁令在 10 年后到期，延长有效期的努力和新的控枪提案均告失败。

2008 年和 2010 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两个著名判例，哥伦比亚特区诉海勒案和麦克唐纳德诉芝加哥案，强化了美国人的持枪权。联邦最高法院先后判决，哥伦比亚特区的禁枪令违宪，芝加哥的禁枪法律无效。今天，美国人普遍认为“持枪权”来源于对美国联邦宪法第二修正案。这条修正案的原文是：“纪律严明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安全之所需，人民保有及佩戴武器之权不得侵犯。”从逻辑上说，“持有武器权”不等于“持枪权”，“持有武器的权利”也不能推导为“持有所有种类武器的权利”，否则也可以得出结论，可以自由拥有坦克和核弹。但联邦最高法院在 2008 年海勒案的判决中，解释了手枪不应被禁的理由为：“手枪是美国人民最流行的家庭自卫武器，所以彻底禁止它是无效的。”也就是说，现在手枪仍然是一种流行程度很高的必备品；但如果未来手枪不那么流行了，也不再是必需的家庭自卫武器了，那又可以对宪法中“武器”的定义做出新的解释。这也是为什么，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美国一直禁止私人持有自动枪械，但并未侵犯“持有武器权”的原因。2008 年也是一个枪击惨案频发的年份，但保守的最高法院仍然在海勒案里做出这样的判决，可见美国人对限制持枪有多谨慎，持枪是被视为一项权利，甚至一种核心价值观来对待的。

10 月 2 日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桑德斯也提到，现在“讨论政策”为时尚早，并举例，去年芝加哥有 4000 多人成为涉枪犯罪受害者，但芝加哥有全美国最严格的枪支法律。桑德斯称，“我们最不想做的就是制定不能阻止这类事件发生的法律”。这也是在拥有枪支已经非常普遍的美国进行枪控的两难困境：在一个枪控已经松懈多年的地方，加强管控，是不是就会减少危险、增加安全呢？芝加哥的确是个突出的例子：作为全美禁枪最严格城市之一，它却是全美枪击案最高发地区，仅 2016 年一年，芝加哥死于枪击的人数就达 752 人，受伤人数达 3000 人以上，远远超过了美军在伊拉克的伤亡率。芝加哥的南城尤为混乱，每年谋杀率达到每 10 万人 35 起以上，非常惊人。部分原因是，对一个严格控枪地区的居民来说，如果无法阻止黑枪从周边拥枪州（如印第安纳）流入，那么持枪的人面对这些受到更严格控制的人，就有恃无恐了。如果周围

都不禁枪，孤立禁枪的州反而更无法提供相应的安全保证；而美国各州在全国系统内建立枪支登记管理一直无法达成共识，也没有建立联网系统，即使是管控比较严格的民主党州，也无法阻挡其他州非法枪支的流入。有人打了一个很生动的比方，如果你是一个暴徒，想出门抢劫，左拐是完全禁枪的伊利诺伊州莫顿格罗夫，右拐是每家必须有枪的乔治亚州肯尼索，你会去哪儿呢？当然是去无枪区。这样，肯尼索人不需要拔枪开枪，枪的作用已经体现了；而三十几年来，这两个城市犯罪率的变化确实如此。同理，枪击案频频发生的场所——电影院、小学、酒吧、演唱会，恰恰都是法律禁止携带枪支或人们不会携带枪支的场合，这反而让持枪的暴徒有恃无恐。而对芝加哥南城来说，这些越需要警力维护治安的地方，却因为供养警力的财政独立核算，不由联邦、州甚至市政府管，稍有财力的人纷纷搬离，这里也就越因贫穷而失去警力的覆盖，进入愈加骚乱的循环，持枪成了自卫的方式。

所以，一个矛盾的现象是，大规模枪击事件发生后，一方面，人们激烈地讨论控枪甚至禁枪，但另一方面，美国的枪械制造商个股又出现普涨，枪械的销售也通常会有两三个月的涨幅。据报道，斯特姆-儒格公司（Sturm Ruger）上周一股价最大涨幅为 6.2%，一举扭转了今年以来的颓势；前身是美国最大手枪军械制造商史密斯威森（Smith & Wesson）的 American Outdoor Brands 最大涨幅达到 7.7%。枪击案发生后，个人习惯性地倾向于认为，需要拥枪来加强自身安全，也担心州和地方的拥枪法案与监管日后更改，反而加速了枪支购买和销售。去年 6 月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夜店发生枪击事件后，美国枪支销量也明显见涨，创下年度纪录新高，这种恐慌购枪的情绪到特朗普胜选才告一段落。

2015 年，美国爆发了超过 270 起群众性枪击案。2016 年，奥兰多枪击案后，国会未通过禁止向“恐怖分子观察名单”上榜者售枪的提案。今年 2 月，国会两院投票废除奥巴马时期赋予社会安全局录入购枪者心理健康信息的权利。在禁枪和控枪这件事上，美国人面对无数“血的教训”，做起抉择来仍然举步维艰。现在美国民间有不少于 2 亿把私人枪械，如果真的要上缴，这个退出的过程是很不可控的，往往是遵纪守法的人失去了枪支，不安分的坏分子反而获得优势，伺机作乱。而对于控枪，美国的邻国加拿大就以更严格的控枪措施和更好的治安为它提供了一个样本。■



绘画·阿梗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阅读之美

生活周刊

每周一出版 全年52期 多样便捷的订阅方式
邮发代号:82-20 拨打11185上门收订
零售单价:15元 零售年价:780元 订阅单价:10元 订阅年价:520元 全年净省260元
读者服务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邮箱:dzfw@lifeweek.com.cn



北京大栅栏社区“胡同花草堂项目”启动当天，游客向社区达人学习花草种植

寻找旧城更新的密码

记者 / 丘濂

大数据时代，旧城更新有了新的视角。

数据观察：胡同里的设计周

杨梅竹斜街119号的院子门口，赵大妈正拾掇着苗圃里的花花草草。这个巴掌大的地方被她打理得有声有色：蓖麻长得高高大大，紫苏和薄荷的叶子盖满了泡沫箱，架子上还爬着豆角的藤蔓。不时有路过的邻居赞叹她家花草喜人的长势，也有穿着时髦的年轻人驻足询问那些植物的名称。赵大妈善于侍弄花草，她家门口的小天地也是2017年北京国际设计周里，大栅栏社区“胡同花草堂”项目的一个展陈空间。这个项目由一个叫作“无界景观”团

队的志愿者联合胡同里的“种植达人”一起，引导居民们在庭院、夹道和隙地上养花、种菜，通过这样的形式促成邻里交流，生成“家园”意识，从而进行社区营造。

这是大栅栏社区连续第七年和北京国际设计周合作，在以杨梅竹斜街为核心的区域里布置展览和开展活动。大栅栏更新计划的负责人贾蓉见证了区域的蜕变：2009年，“大拆大建”的旧城改造方式在包括大栅栏在内的前门以南一带遭遇困境，作为改造实施主体的北京广安控股有限公司想要尝试新的模式。协议腾退的前提下，胡同里出现了隐蔽、零星的空间，如何利用便成了难题。研究了国外的案例后，他们发现文创类的业态最是“酒香不怕巷子深”，于是便想到了借着每年9月底、10月初的国际设计周来吸引人才。最早是艺术家，随之而来

是设计师、建筑师和规划师，这里逐渐成为讨论和展示旧城有机更新理念的前沿阵地。咖啡馆、餐馆和设计小店等优质业态也随之落户。今年，大栅栏设计周杨梅竹的主题是针对于本地居民居住环境改善、文化生活丰富的“安住”；针对于外来商户能够共建和共享社区的“安驻”；以及老城软硬件环境如何构建、胡同不同利益主体如何构建跨界共生网络生态的“安筑”。每年的大栅栏设计周就像是一种汇报，告诉公众这里的有机更新到达了哪一个阶段。

设计周的活动为大栅栏更新带来了新的思路，也逐渐改变了人们对这片区域“鱼龙混杂”“充斥着廉价旅游纪念品”的印象。一个特别的观察来自于城市规划师茅明睿，他专门用数据来分析城市。在设计周“老城复兴的中国之道”的论坛上，他分享了用微博数据分别做的大栅栏和设计周的影响力曲线。他发现在2015年之前，大栅栏和设计周曲线的波峰是重合的，但在2015年大栅栏的曲线呈现出双峰，“也就是开始摆脱了对设计周的依赖，成为一个成熟的游览目的地，甚至反过来成为人们来设计周的原因”。

为什么要从影响力的角度来研究？茅明睿说，是因为旧城改造的方式发生了质变。曾经的旧城更新的核心是空间变现，通过资金来改造空间实现，这种方式就意味着必须要有增量，拆掉旧的房子就一定要提升容积率，无论是层数增高，还是增加建筑密度，就像是北京金融街地区改造前后的样子。而当城市里面激进的“大拆大建”成本过高而行不通后，始自2009年以大栅栏为代表的“微更新”，则增加了两个重要元素，一个是内容，一个是影响力。让空间承载内容，用内容定义城市空间，通过内容产生影响力，利用影响力再去招募新的内容，由内容来变现。内容和影响力成为旧城更新的驱动。

所以除了影响力外，茅明睿也评估内容。去年的大栅栏设计周中，茅明睿所在的城市象限公司联合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院的数据研究者在街道上的一些重要展点布置了WIFI探针、高清摄像头、红外热感计数器等传感器，对来到设计周的人群进行了人流和驻足情况统计，性别、年龄、情绪等外在属性的记录，以及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来进行兴趣偏好等内在属性的画像，也有一些有趣的结论。比如设计周对女性、对19岁到25岁之间的年轻人更有吸引力，还有“设计周中，中性情绪的人（即面无表情者）只有58%，之前则为95%，所以

设计周显著提升了到来者的快乐感”。贾蓉告诉本刊，有机更新这种方式让大栅栏片区的发展更加复杂、许多变化难以描述。“规委也会做旧城评估报告，针对显而易见的成果。因此茅明睿和他的团队所提供的量化指标，对于设计周如何布展，以后招募什么样的内容有着指导意义。”

大栅栏和设计周结合的成功，也让北京其他历史文化保护区纷纷效仿，借此摸索有机更新的方式。今年旧城中的展场还有白塔寺、史家胡同、什刹海三个。“一共5000多个展点，可以说中心城区的市民身边不远处都有展区，两万多人在坚守展位。但是设计周的影响力因此就和规模成正比吗？”根据团队布置在各个展区的传感器所收集的数据来看，这一点是值得反思的：大栅栏每天3000多人的稳定客流，高峰出现的时间相似。与之相比，其他片区客流则是忽高忽低。你会发现，如果有论坛或者讲座活动，人数就多，否则形成不了持续人流。这其实可以和设计周的微信指数相对应，传播最广的设计周文章阅读量都不到一万。这都共同说明了一件事——设计周还是局限在规划设计圈子里的活动，大家来看腕儿、看有质量的专业论坛，广大市民缺乏参与热情。

在内容和影响力的营造上，不同历史街区也因为境况不同而面临不同挑战。“和大栅栏腾退出来的细碎空间不一样，什刹海有几处高品质完整的四合院。如果仍然来做文创经营，无法有良好的收益；如果来做民宿或办公空间，又像是个拼贴进去异托邦的东西，不能和社区产生互动关系。这种空间的用途也还在讨论之中。”

数据思维：旧城更新的另类探索

对胡同设计周的监测，并不是数据分析在旧城更新中的第一次应用。茅明睿曾经在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院（简称北规院）的规划信息中心工作了16年的时间。他所知道数据支持老城更新的第一个案例是1983年一个代号为8301的工程，全名叫“北京市航空遥感综合调查及应用”，当年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里面一个‘脑洞大开’的做法是什么呢？那时没有卫星和GPS，就是通过空中俯拍的遥感影像，首先进行物体几何特性识别，认出老城中的建筑屋顶。接着再根据光谱特性识别建筑物上的杂草。以杂草的覆盖程度，来评价房屋的破败程度，

再定修缮等级。”

遗憾的是这种数据分析传统在城市规划实践里就断掉了。“北规院 80 年代的信息中心非常强大，40 多个人，来自经济、情报、物理、计算机等多元学科，是超前于时代的人员配备。但规划设计一直以来都是建筑设计背景的人推动的，手画图为主，规划者并不依赖于遥感技术，两批人无法对话，慢慢这个部门也就解体了。”北规院重新构建数据库是从 2000 年左右，建设数字城市地理信息公共平台。“不过这个数据是空间数据，关于地块房屋的大小、文物和古树名目的分布等等，都是静态的。”茅明睿认为，这些数字城市阶段的数据还局限于规划领域，公众和媒体往往不会感兴趣，但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现在所谓的大数据是行为数据，帮助理解城市是如何运行的，一下子每个人都觉得和自己有关联。“就像我们现在所在的咖啡馆，占地面积多少没人关心，但是你要说我告诉你每个人会在里面停了多久、有多少人喜欢喝摩卡、在这里喝咖啡的人心情如何，这就能调动你的好奇心。”

茅明睿为“大数据”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高频的数据就是大数据，低频的数据再大也是小数据。“假设城市里有一块土地，我把土地划成 100 多块图斑，这个数据很大，划成 1000 万个像素，这个数据更大。但是这个数据放在这里一年才更新一次，并不是大数据。你给我一个咖啡馆都每小时都在产生的客流量，这个是大数据，尽管可能总数据量不如 1000 万的像素的图。”

大数据从哪里来？现有的开放数据基本都是小数据，那么得到大数据一种是人肉数据，包括现场计数、轨迹记录、行为跟踪、日志记录；第二类是通过布置 Wifi 探针等各种传感器获得；第三是社会感知。茅明睿说，用传感器采集数据是种快捷有效的办法。“一个传感器 1000 块钱不到，再加上电费和网费，回报则是一个以秒来构建的高频数据资产。”茅明睿展示的设计周期间什刹海人流大数据监测平台上，有关于访客的画像，关于职业和兴趣偏好的关键词，这难免引起对于隐私的不安。茅明睿解释，当 Wifi 探针发现一部试图连接它的手机时，就会得到手机的 IP 地址。互联网公司掌握日常这部手机的线上行为。这是一种付费的对应，互联网公司会将数据脱敏后交给购买者。而今年 6 月出台的数据交易管控法规对这种交易增加门槛，比如一个超过 100 个人的大群体才能画像，不能泄露个体信息等等。

另外像是安装摄像头，茅明睿认为城市里本来就分布有不同机构铺设的摄像头，完全可以和铺设主体沟通，做到数据资产的活化利用。他们最近在通州采用公安“雪亮工程”收集的数据来研究城市活力，就是一次尝试。“安保是把人预设为罪犯，拍到了，再排查一遍。这其实是一种侵犯。我们是想用它来提供一种积极的服务，解决城市问题可以用更积极的方式，因为良好的街道活力是可以预防犯罪的发生的。”

数据支持为旧城更新提供了新的思路。茅明睿曾经北规院的同事龙瀛在 2013 年发起了一个叫北京城市实验室 (Beijing City Lab) 的定量城市研究网络，2016 年在清华建筑系教授研究生“数据与城市规划”的课程。茅明睿出来做数据应用公司“城市象限”之后，两人成为密切的搭档，研究和实践得以相互转化。茅明睿担任“数据与城市规划”一门课的期末大作业评审，对其中一组学生组合做的“五道营历史街道建成环境对步行行为的影响研究”颇为推崇，称它是“小而美”的当代案例。与 8301 的数据历史项目相对，茅明睿称它为 532，那是五道营胡同的长度。

五道营胡同同样是一条经过招商和改造的胡同。这组学生企图用这个项目探讨怎样提升历史街区的风貌才是恰当的。他们用人肉感知的手段得到了两方面的认知数据。一是临街建筑的建成环境，包括立面构成、建筑材质、与街道相连的过渡空间、商品陈设等等，然后将各种要素来量化，比如红色代表中式元素为主的建筑，绿色是现代元素为主的建筑，紫色代表设有过渡空间的建筑；另外一方面是行人的步行行为，他们在哪里驻足、停留的时间、行走的轨迹。然后将两组数据来对应，看每个建筑都获得了多少关注。最后他们得到一些初步结论，比如现代和传统融合的建筑关注度最高、带有过渡空间的店铺也很受欢迎等等。

“你可以说他们的研究有不少瑕疵，就像大家停下来可能是因为这里很吵，或者房间里飘来了香气，总之他们不一定是在看建筑。但是这都不妨碍这是一个好点子。数据大小、技术手段不重要，关键是数据思维，我们完全可以有更广泛和更精细的调查，控制好变量。”茅明睿说，“现在旧城就在做基础研究，企图驱逐掉那些现代元素。这个研究可以告诉你老百姓真正喜欢什么风格的风景。它比问卷调查那些更精准的是，问卷经常只有有闲工夫的

大爷大妈才会来填，它忽略掉了那些年轻人，和对这条胡同同样保持关注的外来者。这种数据分析的有偏性小得多。这么好的研究，为什么不去使用呢？”

数据未来：以人为尺度的理想城市

在茅明睿看来，土地财政的结束，从增量时代进入存量时代，意味着在规划设计中真正能够对人的个体保持尊重，这是建设理想城市的前提。“增量时代，人是成本，规划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政府和开发商。市民在大多数规划项目中，并非规划的客户。因为一级开发、征地拆迁，他们当中大多数会被搬迁异地安置。在增量时代，尽管我们喊出了以人为本的口号，但我们不需要了解规划范围内的人群结构、偏好、行为模式，只需要统计在此户籍人口有多少，每一户安置补偿标准是多少，算算大的经济账。由于开发的产品还没有上市，未来这里的住户会是谁、在哪里都是不确定的，那么他们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消费偏好、行为模式也很难成为规划考虑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找不到明确的利益相关人。”在谈到规划转型的文章中茅明睿这样说过。

但是在存量时代，人则成为客户。“由于规划项目多半都在建成区内，以城市更新、社区营造为代表的新的规划类型使规划的主要客户变成了项目范围内的居民，规划为他们而做——至少部分是，规划的目的是提升城市品质和活力，所以规划范围内的市民特征、需求、偏好、行为模式等等都是规划必须了解的刚性内容。它需要回答‘人’的问题——人是谁、人的分类、人的需求、人的出行、人的消费。在这个过程中，规划还要能带来经济效益。”

茅明睿认为两种类型的规划师才能适应存量时代的要求。“一类是下得去社区，扎扎实实做公众参与，平衡政府、开发商和居民的三方利益，利用专业知识和设计能力开展社区治理的；一类是具有跨学科能力，玩得转数据，能够用城市数据科学解决城市问题。”他把“下社区，玩数据”描述为自己开创城市象限的初衷。

去年在国际设计周上，茅明睿和同行一起做的改善北京步行系统的建议就是基于社区参与和数据收集两种感知方式。他们在展览地点悬挂了大幅北京地图，请访客用蓝色和红色来扎针，蓝色代表很好走的路段，红色代表交通极不畅通的路段。同时他们还在另外一个名叫Cityif（城市规划云平台）



城市规划师、城市象限 CEO 茅明睿

的网络平台上放出电子地图请大家扎针，最后收集了1560个扎针地点。接着规划师用还原街景的方式，每隔45度来抓取一张图片，再人工将这些点位按照可达性、无障碍性、停车占道、设施占道等九个维度来分类，去除掉和访客评价的极端不一致的点位，剩下的就是需要来做改善的道路，以及存在的问题。

“好的设计一定不是规划师自己完成的，而是跟生活在那里的居民共同完成的，是由市民共同参与的。”茅明睿这样说。茅明睿的同行还做过一个关于社会感知的实验。所谓的社会感知就是在互联网上将微博、贴吧、论坛和游记等的有关的语料全部抓下来，然后对语料进行分析，从而看到某个社区所需要提升的地方。由于担心社会感知会忽略无法上网的老年居民，他们同时还造访了该社区，让老年居民将意见写成众多小纸条，诸如“停车管理混乱”“公共环境破坏”。结果通过对采集样本语料进行文本聚类，发现在很多的领域，互联网上所反映的跟公众所反映的是一样的。不仅是问题反映出来，甚至反映问题的比例都一样。“基于大数据的城市规划优势就在于它都是以市民数据为对象来进行的研究。即使没有线下调查，我们通过数据感知到一个社会活动，其实这个市民就参与到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当中。‘感知即参与’，这就是我们居民能够参与到公共治理的一个好办法。”



1

平等与质量并重的加拿大教育

记者 / 苗千

加拿大航空公司的客机载着我从伦敦西斯罗机场起飞，跨越大西洋之后降落在渥太华麦克唐纳—卡蒂埃国际机场。走出机场时天色刚黑下来，这里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9月的天气，英国已经开始转冷，我穿着一件伦敦街头常见的被称作“Blazer”的西装外套走在渥太华街头，没过多久就觉得这样的装束不合时宜，被热得满头大汗。渥太华的温度高出英国许多，街头不见正装，满眼短袖短裤。人们说话的发音在我听来也更加婉转，与英国发音大异其趣。这里是另外一块大陆，这里是北美，这里是加拿大，我此行的目的是要了解加拿大的高等教育，或许也可以为很多志在出国学习的中国学生解答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要不远万里来到加拿大读书？



2



3

1. 麦吉尔大学被认为是加拿大最优秀的大学之一

2. 麦吉尔大学内的一处实验室

3. 蒙特利尔大学一景

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

中国驻加拿大总领事馆毗邻渥太华大学，在使馆工作的驻加公使衔教育参赞杨新育女士为我们介绍了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的基本情况。截至2016年，仅凭中国使馆的不完全统计，在加拿大留学的中国学生、访问学者，加上来接受短期培训的人数就已经达到了18.6万人。中国留学生大多集中在大城市里，加拿大东部的多伦多就有大约7万中国学生，光是总共有7万名学生的名校多伦多大学就有1万名中国学生就读；西部的温哥华有大约5万人，其余也大多集中在蒙特利尔和渥太华等城市。中国留学生占到加拿大留

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很多人最初选择来加拿大留学，是因为其高质量的教育水平以及加拿大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而实际上，过于集中在大城市中学习和生活，竞争也可想而知会更加激烈。杨新育女士介绍，据统计毕业之后能够在加拿大本地找到工作的中国留学生大约只占到总人数的1%左右。

虽然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的就业比例看上去不高，但从中国来加拿大留学的中国学生的人数仍然一年高过一年。目前在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有大约45%就读本科课程，而越来越多的小留学生来加拿大是从中学开始读起，其中加拿大的9年级（相当于中国的高中一年级）又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在加拿大的12年义务教育系统中，从9年级入读可以免除测试英语能力的雅思考试。这固然可以让很多中国孩子的留学准备工作相对轻松，却也造成了很多小留学生在出国之前语言能力太差，对加拿大的教育体系一无所知，之后难免会遇到各种挫折。

中国学生在加拿大留学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语言问题，很多人的英文水平都不过关——杨新育女士说出她为中国留学生服务的一些感受——虽然加拿大是英语和法语双语国家，但实际上只有包括渥太华大学在内等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实行双语教学，在大部分地区都是使用英语教学。即便如此，很多从小就学习英语的中国学生对于语言的准备仍然不充分。即使是生活在加拿大，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也更喜欢生活在一起，多数时间仍然生活在纯粹的中文环境中，并不能感受到加拿大独特的多元移民文化。另外，杨新育女士说，很多小留学生的家长也应该意识到，并非所有人都适合留学，在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并非每个留学生都能感到如鱼得水。学生和家長在留学之前都应该充分了解加拿大的教育体制，并且做好独立生活的准备，增强安全意识，做出理智的衡量和判断。

这里是北美

想要了解加拿大的教育体制及其特点并不容易。这个国家曾经是英法两国的殖民地，各方面都深受英国和法国文化的影响。而我在加拿大的时间里，不断地听到一个词“北美”——这又意味着在这片新大陆上，虽然其主流语言文化源于古老的欧洲，但也早已与英法分道扬镳，不能再用看待老欧洲的眼光看待加拿大。在北美，加拿大的教育系统受美国体制的影响更大，或者说加拿大与美国的教育体系早已自成一格，有别于欧洲各国。

渥太华大学(University of Ottawa)并不算是加拿大最优秀的大学，但作为一所首都大学，它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也最有加拿大特色。这所大学坚持使用英法两种语言教学，对于学生，尤其是国际学生的语言能力要求极高。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渥太华大学总共4.7万名学生中，1700名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并不算太高。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会有一些国际学生特地选择来这里学习，作为提高自己语言能力的理想场所。几位渥太华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介绍说，他们当时在国内上的是外国语中学，都选择了法语作为第一外语，而后也有人

曾经去法国留学过一段时间。但一方面为了锻炼自己的英语能力，另一方面还能够保持法语能力，于是选择来到渥太华大学继续学习。这些人算得上是加拿大中国留学生中的少数，身边的中国同学极少，大多生活在一种“国际氛围”之中。

渥太华大学作为一所首都大学，不仅为加拿大培养了众多的公务员，还拥有令人自豪的法学院，在这个加拿大最大的法学院里，学生有机会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两套法律系统间进行选择。作为加拿大研究型大学“U15集团”(U15 Group of Canadian Research Universities)中的一员，位于首都中心的渥太华大学有多个学科排名加拿大前列，除了法学院之外，它的医学院也颇为出名。

在加拿大大学里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他们一方面会为自己学校的成就感到骄傲，另一方面又会下意识地回避充满竞争性的有关大学排名的话题。实际上绝大多数加拿大大学都属于公立学校，因此加拿大并不像英、美等国家一样注重打造“名校”品牌，更为注重的是各个学校之间从投资到教学资源等方面的平均分配。从学生到学校，彼此之间感觉差别不太大。可能也正是这样的情况，让加拿大学生更喜欢留在本国学习，很少有人选择出国留学。所谓的“U15集团”也并非类似于英国的“牛剑”或是美国的“常春藤联盟”之类的精英高校联盟，它包含了加拿大15所研究型大学，在只有3000多万人口的加拿大，这个集团已经包含了这个国家大部分研究型公立大学，加拿大70%的博士学位都是从这个集团中诞生。

加拿大最重要的财富是加拿大人

加拿大联邦政府并没有设置教育部，但在加拿大国际事务部(Global Affairs Canada)中设有国际教育部门。在我们到达加拿大的第二天，与国际教育部门的几位官员进行了一次圆桌会议，由他们来介绍在加拿大学习的国际学生的基本情况。几位官员在列举过一些统计数字之后，气氛稍有些平淡。

“想象一下，如果你们并不是政府官员，而是推销员，你们的工作是向从来没有走出过国门的中国学生推销高质量的加拿大教育，但是同时你们也有着很多的竞争对手，比如英国、美国，欧洲其他国家，还有日本、韩国等等，那么请问加拿大教育最独特的地方在哪儿？你们要怎么样才能说服中国学生来加拿大上学呢？”我这样问在座负责国际教育的官员们。

“首先是在语言方面，我们同时讲英语和法语。去英国或者美国读书的学生会完全沉浸在英语环境里，但是如果他们来到加拿大的一些区域学习，比如渥太华、魁北克等等，他们就需要同时运用两种非常重要的世界语言，这对于很多人日后的生活和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而这样的机会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找不到。”

“我们对国际学生有过一些调查，因此我们了解国际学生们对加拿大教育有什么样的看法。在2016年进行的一次调查中，国际学生来加拿大读书的前三个理由分别是高质量的教育水平，具有包容性的不歧视的社会环境，还有就是作为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的声誉。在这个调查里，有95%的学生建议把加拿大作为首选的留学国家，而且其中51%的学生打算在毕业之后申请加拿大的永久居留权，并且希望成为加拿大公民。”

“选择来加拿大留学也和一些具体的教育项目有关，比如说中国的一些行业正在快速增长，但是相关的教育水平却跟不上，所以有一些中国机构会联系我们进行联合培养。另外在加拿大留学一个很大的吸引力就是可以获得在加拿大工作的经验。我接触的很多中国学生都希望在毕业之后回到中国，但是他们也希望在回国之前在加拿大工作一段时间，这样的机会同样非常难得。”

“来加拿大留学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个国家的广阔。它非常大，同时也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学习项目。一个国际学生在这里不仅能够找到适合他的教育项目，也能够找到适合他的人生经历。当我自己选择大学的时候，我不仅会关注大学本身，也会关注一所大学所在的城市。加拿大有很多大城市，也有很多小乡村，学生可以自己选择在不同的环境中学习——这些都会是学生非常难得的人生经历。而加拿大几乎所有的学校，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小乡村，它们的教育水准都非常高，而在其他一些国家里，不同学校之间教育水平的差别可能会相当大。”

“在加拿大可能没有哈佛或是牛津这样的大学，但是加拿大的所有大学都有非常好的连贯性。加拿大各省对于教学质量，还有对于教师和教学环境的要求也都非常高。就算是有的人原本为了看熊或者观鲸顺便来到加拿大读书，他们仍然能够接受到非常高质量的教育。”

“加拿大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国家，一个中国学生来到加拿大读书，他可能会发现校园里的同学们说着20种以上的语言，他不仅感受到了加拿大，

也感受到了全世界。”

“谈到推销和竞争者，实际上教育和其他的商品有着很大的不同，很多学校并非是以营利为目的进行教育。在加拿大读书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相对合理的价格。加拿大本国学生的学费很低廉，因为有政府的补助，国际学生的学费相对更高一些，但是学校并不是把学生单纯地看作前来消费的客户而已，这些国际学生本身就是加拿大的一部分。”

“有很多学生选择来加拿大读书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加拿大人，而超过这里的自然环境因素、安全因素等等。他们在加拿大感觉像是在家一样，感觉自己被欢迎，也很安全。这不仅是指人身安全，也包含他们被人对待的方式。”一位官员这样总结道。

是的，很多学生出于不同的原因选择到加拿大读书，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会认识到，加拿大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加拿大人。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乡村，开放和宽容的环境造就了多样化的加拿大人，又为他们赋予了谦逊与和善。“我们都是加拿大人，只是到达加拿大的时间不同而已。”——这个观念在加拿大相当普遍。正如渥太华大学的助理副校长加里·斯莱特（Gary Slater）教授所说，加拿大并没有标准的口音，因为每个人说话都有不同的口音，而且在向别人自我介绍的时候永远需要拼写自己的名字。

如果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越来越多，是否会影响加拿大的留学环境？一位加拿大国际事务部的官员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她解释说，确实有理论说明，要想保持一种文化的独特性，那么另外一种文化混杂于其中的比例不能超过30%，但中国学生的数量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比例；另外一方面，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国际学生进行中和，来实现一种国际环境的平衡态。

虽然中国学生占到加拿大国际学生总数的34%，但中国留学生数量的增长趋势确实不算快，在2014至2015年间的增长率只有11%左右，而占加拿大留学生总数14%的印度留学生的增长率则达到了28%。目前对于加拿大的留学市场来说，尚不存在人满为患的风险，大多数学校都欢迎更多的留学生。

独特的魁北克，多样的加拿大

魁北克省（Québec）以独特的法语文化闻名世界。在魁北克，有78.1%的人以法语为母语，相比之下只有7.7%的居民以英语为母语。根据加拿大宪法，魁



左图：加拿大东部城市魁北克街景

右图：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校园

北克省可以自行制定自己的教育制度。在魁北克省教育部，国际事务顾问阿莱克·让-布劳（Alec Jean-Blouin）先生向我们介绍了魁北克省独特的教育制度。

相比于在加拿大其他省份中通行的12年义务教育制度，魁北克省所推行的是“6+5”的11年义务教育制度。在完成了义务教育之后，学生们可以选择在职业教育学院接受为时一到三年的技术训练，或是为了进入大学而参加一种准备课程：两年时间的大学准备（Preuniversity University）。这种为了准备进入大学而专门设置的课程，在我看来颇为类似法国教育制度中的“大学预科班”（Prépa）。但是当我向让-布劳先生提问，魁北克省的教育制度是否学习和模仿自法国的教育制度时，得到的却是否认回答。在他看来，魁北克的教育制度虽然与加拿大其他省份有所不同，但仍然属于北美教育体系，与欧洲并不相同。那么，加拿大教育体系最大的特点是否是更加民主化，让大多数学校的教学质量都相当呢？让-布劳先生稍微思考了一下后回答

我：“是的，我们的教育制度更加民主，根据各个学校不同的需要，我们会对各个阶层的学校都提供帮助，为每一个人提供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

或许是因为语言的关系，单单看魁北克省的留学生人数，中国学生的总数不及法国学生（排名第二）。在2016年，有4000多名中国学生在魁北克省攻读大学或是以上的学位。因为语言和文化的特殊性，魁北克省的中国学生相对稀疏，而对于有意在留学结束之后申请加拿大永久居留资格的国际学生来说，魁北克省的移民制度也相对宽松。在获得大学学位之后，只要在一年之内达到法语B2级别，就有资格申请永久居留，这与在多伦多、温哥华等大城市中国际学生们为了每一个工作岗位艰苦奋斗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

魁北克省最大的城市蒙特利尔坐落在该省的西南部，城市里混杂了英法和北美等多种文化元素。作为世界上仅次于巴黎的第二大法语城市，在这里使用英语同样也可以畅通无阻，这座城市中英法两



种语言的使用达到了一种完美的混合程度。魁北克省乃至加拿大国内最优秀的几所大学就在这座刚刚被评为“全球最佳学习城市”的市区内。

蒙特利尔高等商学院 (HEC Montréal) 与蒙特利尔理工学院 (Ecole Polytechnique de Montréal) 比邻而居，这两所原本是以法语教学为主的加拿大商科和工科名校为了能够更加国际化，接收更多的国际学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英语授课项目。作为 1907 年成立的加拿大第一所商学院，蒙特利尔高等商学院和中国各个高校已经有了超过 30 年的合作，一些与之有“2+2”合作项目的中国大学会选拔学生来到这里完成最后两年的大学课程。对于在这里读书的中国学生来说，最大的挑战就在于适应法语教学的课程。即使是在研究生和 MBA 课程中，蒙特利尔高等商学院也会使用双语（英语和法语）甚至是三语（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教学，这种教学方式虽然对学生的要求极高，却也更有助于培养真正的全球化人才。

蒙特利尔理工学院已经有了 144 年的历史。在

工程领域，这所理工科学校在加拿大 43 所大学工程系中排名前三。它与蒙特利尔大学的关系若即若离，虽然曾经从属于蒙特利尔大学，但是目前这所学校获得了单独招生、独立运行的权利，已经具有了实际上的独立地位。在学校总共的 8200 名学生中有 30% 是国际学生，但同样出于语言问题，目前只有一名中国学生在这里读法语授课的本科课程，另外 70 多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在大多数时间都只需要使用英语和导师交流。

被认为是加拿大最优秀的大学之一，麦吉尔大学 (McGill University) 也坐落在蒙特利尔的市区内，明明在校区外就是一条喧闹的马路，可一走进校园马上就感到一种学府特有的静谧氛围，显露出名校气象。麦吉尔大学的入学标准极高，在英国教育组织 Quacquarelli Symonds 的最新世界大学排名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中名列第 32 位，仅仅落后排名 31 的多伦多大学一位，位居加拿大第二。在我们与这所加拿大名校来自各学院的教授的

会谈过程中，他们却更希望解释清楚加拿大大学体系与美国大学体系的不同之处。在加拿大的公立教育体系中，人们更看重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而不在意塑造所谓的名校形象。也是在麦吉尔大学里，我第一次听到一位教授谈到要对学生们进行“博雅教育”（Liberal Arts）——这种通才式的多元教育方式，在讲求公平和实际的加拿大公立教育体系中，不失为一个长远且富有勇气和雄心的目标。

务实的一面

与麦吉尔大学相隔不远的拉萨尔学院（LaSalle College）又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在这里体现出了加拿大职业教育务实的一面。加拿大众多以职业教育为目标的学院（College），大约相当于中国的高等职业学校。与众多大学毕业生在职场上的苦苦挣扎不同，因为加拿大的职业教育学院目标明确，课程的针对性强，其毕业生反而更容易在就业市场上找到工作。加拿大很多职业教育学院的研究项目和资助本身就来自于一些中小型企业，使学校和毕业生与就业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些学院虽然不如大学的名气响亮，但对于一些急于找到工作或者实现移民目标的国际学生来说，不失为一个更好的选择。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加拿大考察的时间里，经常听到有中国学生从职业教育学院毕业工作多年后再进入大学学习，或是从大学毕业之后又进入职业教育学院学习以求找到一个理想工作的例子。

拉萨尔学院就是一所典型的职业教育学院。这所原本私立的学院如今大多数资金已经是来自于政府的资助。经过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虽然它已经可以授予本科文凭，但在学校里最受欢迎的课程项目仍然是实用性极强的职业教育课程。例如时尚设计、时尚营销专业是这个学院的传统强项，另外诸如酒店管理和旅游、餐饮管理等专业也受到学生的欢迎，目前最火爆的专业则是游戏设计。在这所外观平淡无奇的职业教育学院的4000多名学生当中，有25%的留学生，其中三分之一来自中国。

如果说多伦多和温哥华代表了加拿大的大城市文化，魁北克省是加拿大法语文化的象征，那么在最东部的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大约可以代表加拿大的乡村文化。在这个位置极东、面积极小的省里，除了首府哈利法克斯之外，没有闻名遐迩的大城市，也没有世界闻名的大学。即便如此，新斯科舍省仍然容纳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以

当地独特的风气让留学生感受到了不同的加拿大。

新斯科舍（Nova Scotia）在拉丁语中意为“新苏格兰”，据说最早登陆此地的殖民者大多来自于苏格兰和爱尔兰，时至今日，此地仿佛仍然留存着苏格兰和爱尔兰深厚的宗教传统和淳朴的待客习惯。当地人开玩笑，在新斯科舍省人们彼此之间关系紧密，待人淳朴，即使是在你排队的时候，你身边的一个陌生人也可能向你倾诉出他一生的故事。

新斯科舍省除了有政府教育机构，还有一个由政府授权的名为“Edu Nova”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为加入其中的10所大学、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7所高中提供会员服务。在这样一个通常不为人所注意的省份，除了留学费用相对低廉（在新斯科舍省留学平均每年的总花费为2.9万加元），还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当地除了圣西维尔大学（St. Francis Xavier University）、戴尔蒙斯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圣玛丽大学（St. Mary's University）等传统公立大学多有中国留学生在攻读商科或是工程科学等学科之外，在一些职业教育学院和社区学院里也不难看到中国学生的身影。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与教师的关系更容易变得非常紧密，有很多毕业生的工作就是由其教师介绍；在竞争不是太过激烈的条件下，留学生的创业空间也更宽阔。

短短一周对于加拿大教育和留学环境的考察，对于我来说只能算是走马观花。我长居英国，对于欧洲的教育体系相对来说更加熟悉，首次踏足北美大陆，对我来说不亚于另一次的“文化冲击”。从一方面来说，欧洲象征着古典与品位，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欧洲则象征着老旧和等级森严。加拿大从英法的殖民统治中脱胎出来，但其教育模式并不以欧洲为标准，相反建立了更加民主、更注重效率和实际的北美教育体系。另外与私立大学占主导地位，虽然总体水平世界第一，但是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的美国相比，加拿大的公立教育制度虽然没有孕育出哈佛、牛津这样有历史底蕴的世界名校，却让大多数学生都能够享受到公平、相对便宜的公立教育。

相比于欧洲，加拿大教育系统的资金更加丰富，奖学金项目繁多，国际学生更容易得到资助，不需要在学习过程中为金钱而烦恼。加拿大大学所缺少的“历史底蕴”，也正是加拿大这个年轻的国家前行的动力。不向往名校的名气，更注重教育质量和就业机会，是很多来加拿大留学的国际学生的选择。这个移民国家正是凭着这种讲求实际的精神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年轻人。■

在麦吉尔，追求杰出就在 DNA 里

——专访麦吉尔大学建筑学院主任马丁·布雷萨尼教授



马丁·布雷萨尼教授

麦吉尔大学 (McGill University) 成立于 1821 年，坐落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中心，被认为是加拿大最好的大学之一。作为一所加拿大标志性的大学，它有哪些特点和传统，与欧洲和美国的名校又有哪些不同之处？这所大学希望给自己的毕业生留下哪些印记？麦吉尔大学建筑学院主任马丁·布雷萨尼教授 (Prof. Martin Bressani) 讲述了他心中的麦吉尔大学。

三联生活周刊：这几天我们走访了加拿大的好几所大学，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加拿大高等教育的优势，例如双语教学的环境，不同大学之间的相互合作等。麦吉尔大学通常被认为是加拿大最好的大学之一，你能不能专门谈一下这所大学，是什么特点让它成为这个国家最好的大学，另外加拿大的大学相比于其他国家的来说又有哪些不同呢？

布雷萨尼教授：加拿大大学最重要的一个特殊之处就在于它们都是公立大学。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可能认为麦吉尔大学和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一样是私立大学。实际上我们的大学是公立大学，并且得到政府的大力资助。而麦吉尔大学作为一所魁北克省的大学，得到的政府资助就更多了。比如说对于本国学生来说，他们每年的学费只要 3000 加元左右，对于国际学生来说大约是 1.8 万加元左右。和哈佛大学每年大约 5 万美元的学费相比，麦吉尔大学的学费就显得实在是太便宜了，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收到很多来自美国的申请，因为麦吉尔大学是加拿大最好的大学之一，而它的学费和美国的私立大学相比又非常便宜。

关于麦吉尔大学为什么会是最好的大学之一，这很难回答。麦吉尔大学有着追求杰出的传统。在大学里，你必须尽力发挥自己，表现你自己。比如说，即使是对于大学里的教授来说，他们的工资也是随

着表现来决定的，并不总是一个固定的数字。在这所大学里我们必须都表现得非常出色才行。而且在大学里，教学和研究同等重要。我们不常利用校外的教师，所以本校教授都需要经常进行教学，当然本校也有一种鼓励教授进行研究的氛围。这所大学的反应也很快，一个学生如果有一个项目，他总是能够找到人来帮助他。可以说杰出的传统就在这所大学的 DNA 里。麦吉尔大学是一所北美大学，但实际上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教育系统都比较接近，法国、意大利、德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就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了。当然麦吉尔大学的博士项目相对来说比美国更短一些，这一点更接近英国大学。

三联生活周刊：谈谈你自己吧。你在麦吉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巴黎索邦大学这几所不同国家的世界名校都学习过，现在你又是麦吉尔大学建筑学院主任，能否谈一谈这几所名校的不同？

布雷萨尼教授：我可不想说索邦大学的坏话，不过法国的大学教育系统确实不大好，而且财政状况很糟糕。我当时去索邦大学是为了和一个教授合作，我当时已经有了终身教职，但我还是带着妻子和孩子去了法国读博士学位。在巴黎大多的时间我是做自己的研究，和大学的联系并不太紧密。法国的大学系统更加松散。

在麻省理工学院时的训练对我非常重要，我读

了三年的硕士课程，他们的建筑学院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建筑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系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系，但是麻省理工又是一所相对较小的大学，我在那里的时候大约只有8000名学生，4000名本科生，4000名研究生。一切都非常的集中，因此到处都有非常热烈的研究氛围。麻省理工是一所非常强、非常注重研究的大学，它不像哈佛更注重人文教育，每个人都注重社交方面的发展，麻省理工学院的每个人都更注重自己的工作。这两所学校的风格非常不同，但是两所学校又可以相互受益，因为两所学校的学生可以相互选择对方学校的课程。在麻省理工学院有非常集中的思想氛围，这非常重要。我在麦吉尔大学读的本科，这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学院，但是又很为学生着想，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很紧密，这是我的教育的基础。我很难把麦吉尔大学的建筑系和麻省理工学院相比，因为麻省理工的建筑系非常大，有上百名教授，但是基本上，这两所学校建筑系的精神是相同的，麦吉尔大学的建筑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数量也基本相等，大约各有150人，因此在这里也有很强的研究氛围。

而麻省理工学院和索邦大学就完全不同了。在索邦，你需要更“自治”。这和北美选择一个课程项目，非常密集地学习这门课程的风格完全不同。索邦的风格对我来说很合适，因为当时我和我的妻子孩子在一起，我有自己的研究领域，但是我不会把这种学习氛围推荐给所有人（笑）。当然法国和加拿大的教育系统有一个相似之处在于大学都是公立系统，我在索邦大学的时候没有付过任何学费，这很了不起。当时法国教育即使对于国际学生来说都完全免费，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但是他们相信免费的教育。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什么会选择学习建筑学？你能否简要介绍一下这门学科的精髓是什么？有人说建筑学是关于科学与美的结合，它作为一个研究项目又是怎样的呢？

布雷萨尼教授：我从小就对科学比较擅长，我想建筑是一种社会性的艺术，建筑是一套让你创造出自己所处社会环境的规则，它也是一种艺术形式，但它也嵌入到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你所建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最为吸引我。当然了，建筑也会涉及大量的金钱，都市的外观。社会性的、政治性的、经济性的等等，各个维度都会与之有所关联。它和文学、绘画或者音乐等艺术形式都完全

不同，建筑深刻地嵌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它影响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与科学的结合很紧密，科学技术在建筑学中所占的成分也更多。方方面面的联系让这门学科非常困难。一个作家、一个画家可以只面对自己的小说或者画作工作，而一个建筑师却必须去和人、和经济打交道，而且这些交集通常会让人感到沮丧；另一方面，这又让这门学科非常的丰富。与其说它是科学和美的结合，不如说它是科学与技术和社会的结合。我个人对于建筑学史论非常感兴趣，思考建筑规则在历史中的演变，同时它也受到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三联生活周刊：能够解释一下建筑学和建筑史论的区别吗？这是否相当于科学和人文的区别？你的研究方向在什么领域？

布雷萨尼教授：我个人更关注关于建筑的历史研究，这是一种思考建筑如何发挥其自身作用的思维方式。运行一个建筑学院，就需要努力地操作一种平衡，你需要了解最新的电脑软件，最新的科技、材料，但同时也要对文化和历史情况有所理解。我们教育学生理解文化，可以对建筑做出文化上的判断，同时他们也需要对新型建筑的各种可能性有所理解。这很难达到。比如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能总是维持这样的趋势，古老的北京城基本上已经消失了——我们建造的新建筑怎么样才能和过去有所关联？现在这在中国是一个被热烈讨论的话题，有些中国的建筑师会在乡村进行试验，看看新型建筑怎么样才能和乡村相融合。建筑学是一个很广阔的领域，你必须决定自己想要在具体哪个方面进行工作。有些人喜欢有历史感的构造，有些人喜欢在郊区完全没有任何束缚地创造新型的建筑，这取决于每个人。

三联生活周刊：蒙特利尔这座城市有着相当复杂的历史和建筑风格，这是否是一个学习建筑的理想城市？这样的城市风格是否会影响到你的研究？

布雷萨尼教授：在我们建筑学院，我们为学生准备的设计工作室。学生们可以有自己的空间，或者说办公室，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去他们自己的空间，建造他们自己的作品。大多数这样的空间都在蒙特利尔，这是一种活跃的实验室氛围，学生们可以借此花很多时间来理解蒙特利尔，这正是我们教育学生的一种方式。蒙特利尔这个城市很有特点，因为它同时具有英国和法国的风格，它的老城区被保护得很不错，也有一些很有特色的郊区。蒙特利

尔城区里有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它也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城市，人们的活动空间很多，人们喜欢徒步活动。在这方面蒙特利尔更加欧洲化，而不是过于北美化。在很多北美城市里，人们可不会像这样在街上走，都是开着自己的车。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杂志有一个惯常的报道题目叫作“大学的精神”，这可能有一点抽象，但是对于你来说，麦吉尔大学的精神是什么？你希望这所大学给它的毕业生打下什么样的印记？

布雷萨尼教授：麦吉尔有大约4万名学生，这是一所很大的大学。但是你的问题其实不是那么的抽象，恰恰相反它很具体。大学的精神很难描述，因为你看不到它，但是在麦吉尔大学，人与人之间进行相互交流非常方便。即使它有很多学生，它仍然是一个小机构，大家总是感觉在一起。这种氛围和美国的“常春藤联盟”很不一样，它更民主化。麦吉尔大学是一个杰出的中心，在民主背景下，人们感觉彼此更轻松。在哈佛那样的大学里，你一年要付5万美元的学费，加上它非常严格的入学标准，你会感觉自己飘在半空里。麦吉尔大学不是这样，这里更加轻松。我们在城市中心，我们会觉得大家

团结在一起，我们在一个友好的、热情的环境里一起做事。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中国学生有什么印象？对那些身在中国，但是梦想来到麦吉尔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你有什么建议？

布雷萨尼教授：我现在有两个中国硕士学生。中国学生说话都很温和，语气也都非常尊敬，他们会非常认真地听你说话。我发现新一代的中国学生更加国际化，更复杂，对国际事务有更深入的理解，更喜欢挑战老师，这是非常好的变化。他们喜欢挑战，有批判精神，同时他们也很尊重自己的老师，很努力，这是一种很好的混合状态。我们这里很多最好的学生都是来自于中国。

对于那些直接从中国来这里学习的学生，他们可能需要学会独立思考的能力，学会公开地表达他们的想法，并且能够和导师进行对话，积极地进行对话，而不是只会闷头学习。老师和学生的对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学生和应该相互学习，我经常说有一半的学生比老师更聪明，他们需要学会问出有意思的问题。他们需要添加自己的声音，他们需要被听到。这对于中国学生是非常重要的。■

《读书》2017年第十期目录

冯 时 考古学中的“暗物质”
刘宗迪 《山海经》与怪物阐释学
夏继果 从全球互动到“人类世”
伍 斌 黄柳霜的夹缝人生

短长书

“空折梅花寄所思”（刘跃进）“五四”
纪念：被赋予的意义（凌云岚）“胎记”
与“烙印”（叶诚生）

罗岗等 基本收入·隐私权·主体性
张宝明 诗意的人文与人文学的
失意

王 璞 青春的旅程与时代的变奏
何 涛 加尔文：专注此世的神学
政治

石 芳 写作，斗争，还要创造财富
卜 键 盛世的漠视与疏失

张 晴 多重时间

品书录

年代记忆中的近代史（郑培凯）·反
“古典共和主义”的孟德斯鸠（童群
霖）·再现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整体
进程（王东）

苏 力 从历史到理论 著译者言
朱存明 图像汉学展新知
江弱水 微言一克的重量
桑 农 《千里江山图》中的历史
密码

读书短札

漂亮文章 拾读抄（月庵）·《史记索
隐》“淖盖”是人名吗？（孙利政）·唐
宋“书学”北窗读记（刘涛）



生活需要读书，
《读书》丰富生活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读书》邮购部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发展科学研究就是我们的教育方式

——专访加拿大国立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阿伯·克劳德博士



阿伯·克劳德博士

加拿大国立科学研究院 (Institut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是一所总部设在魁北克市的研究型大学, 这所大学在魁北克、蒙特利尔、拉瓦尔和瓦雷恩共有四个校区, 没有本科生课程, 只有硕士和博士项目。一所研究型大学为什么有这样特殊的设置, 这对教学和研究又有哪些影响? 我们采访了执行院长阿伯·克劳德博士 (Dr. Arbour Claude)。

三联生活周刊: 能否请你介绍一下加拿大国立科学研究院, 它更像是一个研究所还是一所大学?

克劳德: 我们是一个国立研究所, 但也是一所大学, 目标是培养合格的科学家。我们希望可以开展政府部门感兴趣的研究, 同时也进行基础研究工作。国立科学研究院是一所大学, 但它是一所只有研究生项目的特殊大学。我们没有本科学生, 进行科学研究就是我们教育研究生的方式, 我们是加拿大最好的研究型大学之一。

我们有很多教授和学生, 同时也授予学位。世界上有很多种类型的大学, 比如有的大学更注重本科教育, 而我们更注重研究生教育, 通过研究来教学。我认为这种教育模式非常成功, 应该在魁北克省, 甚至是全国加以推广。学生们在实

验室里获得的不仅是知识, 还有研究经验, 这应该成为一个教学的榜样。我们并没有开展本科教育的计划, 但是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教授和学生, 因为我们有能力提供非常优秀的研究环境。我们的实验设备都是世界一流的, 学生们在这里可以学习到最前沿的技术。

三联生活周刊: 在加拿大进行科学研究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克劳德: 在加拿大, 最重要的优势在于资金很充足。政府非常注重在这方面的投资。而且对于一个有志于从事科研工作的学生来说, 在加拿大很容易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特点的大学或研究所, 我们的设备和研究项目都很好, 这些都是吸引全世界杰出研究者的特色。

三联生活周刊: 加拿大的教育体制非常民主, 而且教育投资也大都来自于政府, 这是否有可能导致大学和研究所的研究项目更加偏向于应用科学, 比如说, 只研究纳税人感兴趣的课题?

克劳德: 在过去十年里, 我们的研究确实更偏向于应用。但是最近有一份政府报告显示, 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对于加拿大来说同样重要。如果我们不进行这样的研究, 我们可能会落后于其他国家, 这也会影响我们进行应用技术的研究。所以政府的态度现在正在转变, 目前进行基础科学研究的资金也很充足了。而且政府不只是资助大的实验室, 同时也会资助小实验室, 因为有价值的思想不止来自大实验室, 杰出的研究者会来自各个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 目前大概有多少中国学生在这所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项目? 他们是否适应这样的教学方式?

克劳德: 目前大学里总共有大约 60 到 70 个中国学生, 大多数都是在学习博士课程。我们和中国的多所大学都合作项目, 我们很多最好的学生就是来自中国。他们很多都是获得了政府奖学金来学习的, 即使有的学生没有拿到政府奖学金, 我们也会为国际学生发放奖学金, 我们不希望学生会为经济问题发愁。

实验室里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越多, 就越容易

营造出一种国际化的多文化环境。我们的实验室里有来自 25 个国家的学生，对学生们来说是一种很有趣的环境。我们建议学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这样就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研究，而不用花费很多时间写一份硕士论文。很多学生毕业时只是把发表过的学术论文集中起来作为学位论文发表，因为没有必要把写过的东西再写一遍。对学生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集中精力进行科学研究。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所大学科学家们能否开展所谓的“大科学”研究？例如关于粒子对撞、天文学之类的项目？

克劳德：我们当然会做“大科学”研究。我们的设备很先进，也和其他学校有很多合作项目，所以人们可以进行自己想要的研究。这样的情况对于我们的研究人员来说开展工作就会容易很多。

我们的大多数资金来自联邦政府，但是魁北克省也会给我们很多资助。省政府的资金要匹配联邦政府的资金，这就让我们不需要为资金发愁。比如说，美国的大学教授在夏天的假期时间是没有工资的，而我们这里的教授全年都有工资。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资金状况是非常好的。作为一所大学，我们的规模还不算大，但是对于研究所来说，我们的规模就相当大了。

在研究和教学方面我们更接近一所美国大学而不是欧洲的研究机构，因此我们需要不停地说服别人，国立科学研究院是一所大学而不是一个研究所，我们学校的名字里也有“研究大学”（university of research）的字样。这里的研究人员同时也是大学教授，他们不仅要进行科研工作，还要进行教学。这正是我们的独特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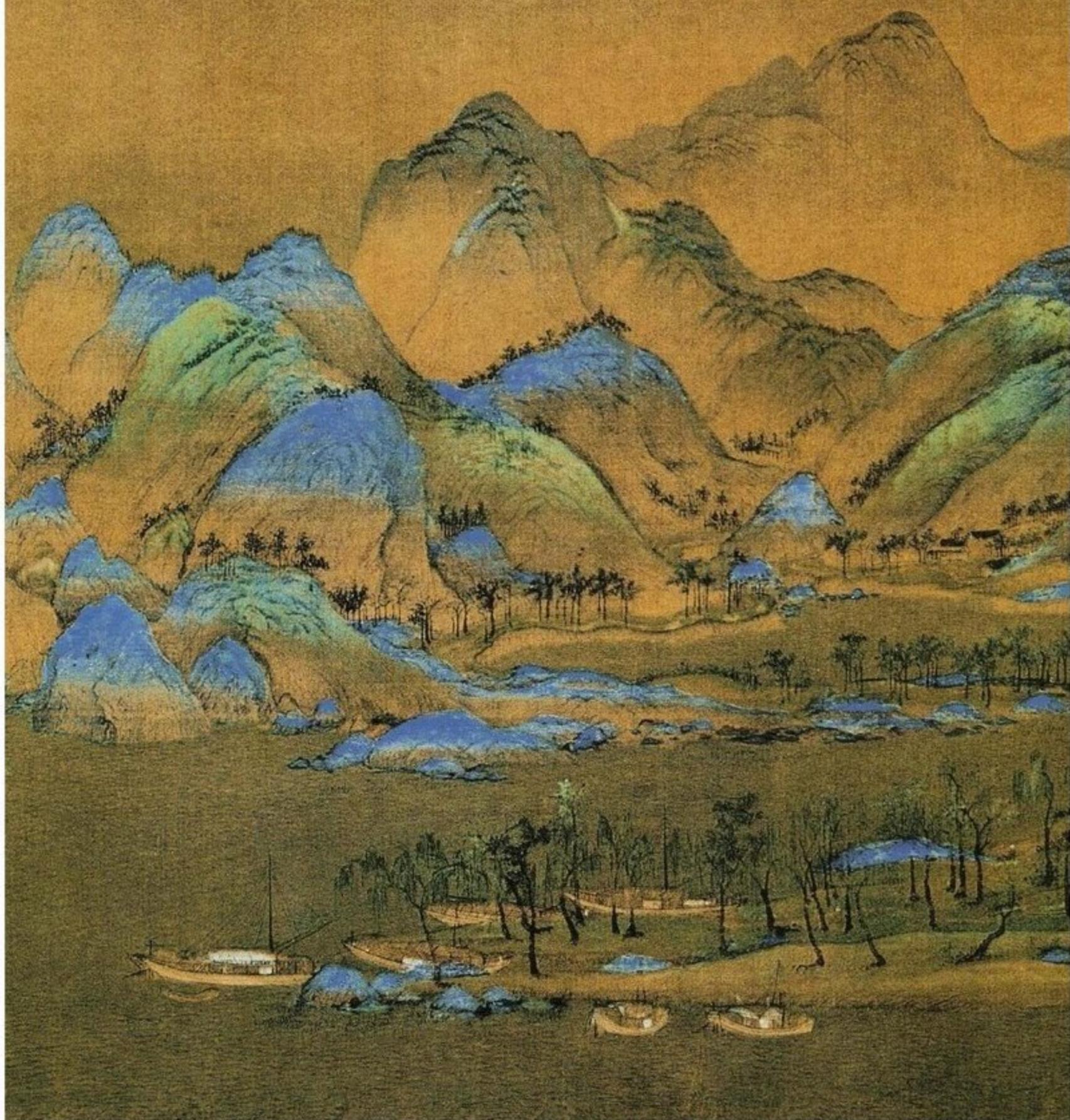


加拿大国立科学研究院的研究人员

《千里江山图》何以“独步千载”？

文 / 薛芃

在此次故宫午门的特展中，《千里江山图》被放置在了最重要的位置，整个展厅都笼罩在它耀眼的光芒下，颇有众星捧月的意味。在青绿山水的发展史中，它是一座无法翻越的巅峰，在感慨、赞叹它的无与伦比之余，还有很多谜团等待学界抽丝剥茧，一一解开。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局部)

“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开幕的第一天上午，故宫午门前的广场上就挤满了前来观展的人。中午11点赶到，需要排上4个小时的队，才能一睹《千里江山图》的风采。由于人流量大，每一个参观者只能在这幅近12米的长卷前驻足几分钟，刚被它的气势和绚烂迷了眼，还没缓过神来，就得带着遗憾匆匆离开了。

这就是一件“明星展品”的魅力。上一次故宫引起连夜排队观展热潮的“明星展品”是2015年“石渠宝笈特展”中的《清明上河图》，这次的《千里江山图》创作年代略晚于《清明上河图》几年，也是同一时代的作品，但面貌迥异，成为北宋不同风格绘画的两座巅峰。

王希孟其人

《千里江山图》，北宋宫廷画师王希孟绘，绢本大青绿设色，纵51.5厘米，横长11.9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由于是长卷卷轴，观看的最佳方式是随着卷轴的缓缓打开，画面空间逐渐推移，一点一点将形色收入眼中，所有细节起伏最终汇成一个壮观的场面。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1999年和2013年，这幅画曾四次公开展出过。在以往的几次展览中，由于展陈条件有限，作品都只是部分打开。由于这次特殊的展览，故宫为《千里江山图》定制了新的展柜，使这件作品首次全卷打开，以全貌展现在公众面前。

视觉上的冲击与震撼之外，绘者王希孟的传奇人生成了《千里江山图》最神秘的注脚。王希孟究竟是谁？他为何能受到宋徽宗的亲自指导？这幅巨制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创作的？又为何英年早逝？王希孟的人生包裹着重重谜团，很多疑问至今在学界都没有定论，甚至无从找寻线索，这些后世拼凑出的零星故事又为这件作品的传奇增添了新的维度。

“18岁的天才画家”成了王希孟的标签，因为除此之外，人们并不知道他更多，而这个标签又如此惊艳。如今谈到王希孟的身世，都会从《千里江山图》上蔡京的跋文入手。这也是唯一的入口，目前可考的有关王希孟的直接记载只有这几十字的跋文。在此之后，所有有关他的评述也都是在此基础上推演得出的。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员，也是本次“青绿山水画特展”策展组组长王中旭在接受本刊专访时强调了王希孟的特殊性：“他跟其他画家

不一样，他这个人只是通过一张画流传下来，而不是通过画史流传下来的。”

蔡京是北宋权臣，《宋史》将他列入《奸佞传》中，后世对他的评价也都是负面居多。从熙宁三年(1070)开始入仕为官，历经宋神宗到宋钦宗，蔡京几度沉浮，四次出任朝中宰相。政和二年(1112)，蔡京再次出任宰相，辅佐宋徽宗赵佶，这一年，也是记载中王希孟完成《千里江山图》的一年。次年，徽宗就将这幅十分满意的巨制赐予了蔡京，这时蔡京的官职全名叫作尚书左丞相右仆射，位高权重。

蔡京在题跋中写道：“政和三年润四月一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千里江山图》没有题款，这短短不到百字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王希孟的一生，然而蔡京只是写到“希孟”，这更像是字而非名，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人知道他姓什么。

关于他的名字，学界有几种说法。一说姓“希”名“孟”，这一推测最不可信，因为百家姓只有“郗”字，并无“希”字；一说姓“赵”名“希孟”，因是同姓，才得到皇帝特别关照，至于“希孟”两字，更像是字而非名。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杨新在《关于〈千里江山图〉》文中考证说，清代官员、收藏家宋莘在朋友梁清标家里看到《千里江山图》后，写下一首《论画绝句》：“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亲传笔法精。进得一图身便死，空教肠断太师京。”这个名字也就沿用至今了，我们姑且叫他“王希孟”。

根据蔡京的记载，他收到这件作品时，王希孟已经18岁了，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画完了这幅长卷，再加上装裱、呈上的时间，王希孟作画的时候也就17岁。在重重谜团中，可以确定的是，这件巨制是宋徽宗亲自调教出来的，也是希孟按照宫廷趣味和徽宗喜好创作的。王希孟初入画学当学徒学画，“画学”相当于宋徽宗创办的“皇家艺术学院”，虽然仅存世23年(1104~1127年)，但为中国绘画的发展贡献了不少人才。根据河南开封市艺术博物馆保存的地图文献来看，当时的画学虽在宫城之外，但紧邻宫墙，设在都城开封内很核心的位置。画学的成立也与蔡京有关，1104年，在他的督办下，“画学”“书学”“算学”“医学”四学成立，成为当时宫廷兴办教育的一桩好事。

大约1110年，经过三年的“画学”学徒生涯，



上图：宋徽宗《瑞鹤图》(局部)

下图：李唐《江山小景图》(局部)

王希孟并不是出众的学生，并没有进入翰林图画院，而是被分到了文书库，这是整理中央赋税档案的库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余辉的《回到王希孟作画的历史现场》一文指出，王希孟在这里每天的工作就是“用大纸做长卷”，不停地抄写档案。这时练就的“长卷抄功”，某种程度来看反倒有助于日后希孟把控长卷作画的基本功。

在文书库期间，王希孟将自己的画作数次呈献给宋徽宗，徽宗觉得他画得一般，但有潜力，值得一教，便亲自“诲谕之”。《千里江山图》很可能是徽宗交的一个“命题作业”，王希孟在半年之内，拼命赶工，大概是得到了御批，才得以放下文书库的其他工作，专心作画。

虽然画作出自他笔下，宋徽宗却是最大的幕后推动者。王中旭解释道：“在宫廷书画的创作中，宋徽宗的干涉性是很强的。他会干涉这个画家该怎么画，运用什么风格，甚至表现什么，他有很强的主导权和控制权。”而王希孟又是一个竭力想有所作为

的年轻人，因此会努力揣度圣意，贴合皇上的想法和审美趣味。如此看来，所谓亲自“诲谕之”也并非就是好事，或者说，王希孟就是宋徽宗手中的笔，画下了帝王心中的山山水水。

《千里江山图》完成之后，徽宗非常喜欢，石青、石绿的大气典雅正是皇家偏爱的面貌。而王希孟画出《千里江山图》的1112年，也是宫廷绘画的黄金时代，李唐、朱锐、胡舜臣正当年，张择端刚画完《清明上河图》和《西湖争标图》（失传）不久，宋徽宗自己也画出了著名的《瑞鹤图》。然而，本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大有作为的王希孟，英年早逝又成了另一个谜。

宋莘在写下那首诗的同时也写下一段附注：“希孟天姿高妙，得徽宗密传，经年作设色山水一卷进御，未几死，年二十余，其遗迹只此耳。”二十出头就去世，成了王希孟传奇的终结。一种说法是，他成于《千里江山图》，也死于《千里江山图》。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完成面积近60平方米的画作，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耗尽了体力和精力，日夜加程，在完成两三年后病故。另有一说，在《千里江山图》之外，王希孟还画过一幅《千里饿殍图》，内容大概类似《流民图》，流民失所，食不果腹，体现当时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破败不堪，与《千里江山图》的恢弘气派完全相反。画好之后，进献给了宋徽宗，宋徽宗看过之后勃然大怒，下令处死了王希孟。

种种推断和故事都是基于蔡京的题跋和清代的零星记载得来的，加上宋徽宗、蔡京等人的相关史料丰富，后世从这些材料的夹缝中，依稀拼凑出了王希孟的轮廓，形成现在“18岁天才画家”的传奇人生。

然而，学界还有另一些声音对此画提出了更大的质疑。比如，艺术史学者曹星原认为，这幅巨制可能是清代梁清标拼凑伪造而成的。原因一是蔡京的跋，其宽度和高度都与原画比例不相称，且跋的下部有明显破损痕迹，可能是后世拼接而成，蔡京题跋的并非这幅画；二是梁清标的印盖在了几处跋与画的相交处，类似“齐缝章”，以掩盖拼凑的痕迹；并且这幅画由一个十几岁的学徒少年在半年内完成，宋、元、明都没有人提过王希孟，清代也论述甚少，疑点重重。

王希孟和《千里江山图》留给了后世太多想象空间，至今很多问题都没有定论。在此之前，我们姑且按照学界主流的说法，将这幅画看作是王希孟的传世杰作，因为就目前来看，真迹的证据更胜一筹。

且不看那些身世疑云，这幅画从各个方面来欣赏都是异常精彩，值得仔细品味。

何以“独步千载”？

元代浦光在《千里江山图》的题跋中写道：“自可独步千载，殆众星之孤月耳。”他认为在青绿山水中，这是一幅众星捧月的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评价高得足以把王希孟放在独孤求败的位置，那么这幅画究竟好在哪里？为什么如此重要？

抛开传奇性的因素，以一种客观学术的眼光来看，王中旭认为有以下两个重要方面：第一，它是青绿山水中面貌最出色的一件。整件作品设色以石青、石绿为主，着色面积大，饱和度高，这在所有传世的青绿山水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过了900多年，颜料依然保持很高的纯度，使整个画面鲜亮，透着皇家的辉煌气质。从绘画表面的一些细微剥落的地方可以看出，石青、石绿的颜料是很厚实的，这与传统的中国水墨或浅绛都差异很大，可以说是与水墨画法反向的另一个极端——将色彩用到极致。

如今看来，这样经久未衰的色彩得益于宋徽宗的赏赐。石青和石绿是矿物质颜料，造价成本极高，即使是达官显贵也不会舍得将它们用在一张十几米的绢布上。王希孟绘《千里江山图》，所有的绘画材料都是宋徽宗赏的，当然也包括这块价值不菲的“宫绢”。据余辉分析，《千里江山图》与宋徽宗自己绘的《瑞鹤图》相比，两幅绢的高度、材质和色泽几乎是一样的，而同一时期的《听琴图》、李唐的《江山小景图》等几件重要的宫廷绘画的画绢都几乎一样，都出自当时统一规格的织机织出的上等宫绢。

御赐的顶级颜料和宫绢为这件作品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好在王希孟没有辜负。他以高纯度的青绿色彩来表现山石结构、山势起伏，并非易事，尤其是以色彩表现山的阴影，这不是中国山水画擅长的方式，在这一点上，王希孟技法精妙，拓展了青绿设色新的可能性。

第二个重要因素在于，它是一件出色的江山图长卷。“江山图”无疑是帝王喜爱的，宋徽宗虽然不擅治理江山，但他对于如何用艺术的方式表现江山是个行家，眼界也很高。通常认为，《千里江山图》表现的正是徽宗“丰亨豫大”审美观在山水画上的完整体现。虽然“丰亨豫大”是蔡京蛊惑宋徽宗坐享天下财富的说辞，致使朝野腐朽不堪，但在艺术创作上，

它成为当时的一种审美取向，这种气势恢弘的宫廷趣味，有别于徽宗对细腻的写实风格的追求，反而是在后世美学研究中常被忽略的一种审美趣味，这一点恰恰在《千里江山图》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长 11.9 米，高 51.5 厘米，如此巨大的尺幅，站在绘画者的角度来看，也是难以驾驭的。找一件参照物对比，比《千里江山图》略早数年的《清明上河图》长约 5.28 米，高 25 厘米，不到《千里江山图》的一半。王希孟要作此画，就要做到胸中有丘壑，所有山水的走势、屋舍人物的分布如何连贯统一，大概是对一个经验并不丰富的年轻画师最大的考验。

王希孟将整个画面统一在初夏时节，瀑布高悬，溪水涌泉，阳光初照，满山吐翠，一场暴雨刚过。据学界推测，画中应该是江南山川景象，看似山与山相似，千篇一律，其实也是有规律可寻的。山峦整体由七大组群山构成，每组皆有一座主峰，诸多辅峰簇拥在周围，其间点缀着屋宇、行人。在卷首一组“序曲”之后，第一组和第二组山峦之间以长桥相连，将观画的视线自然而然地引向另一组山间深处。其后的群山之间，或以江中摇曳的小舟为连接，或留较大一片水面空间，给整体画面制造出疏密的节奏感。第五组的主峰达到全画最高的顶点，而后逐渐和缓下来，到了第六组、第七组，画面中已是水面占据大半，山势不再那么陡峻，远山显得更清雅温润。

从“序曲”到结尾，王希孟仿佛在用青绿色彩创作一场交响乐，正如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讲到山水画应有的体裁样式：“高山而孤，体干有仆之理，浅山而薄，神气有泄之理。此山水之体裁也。”意思是说，高山倘若孤立，山体便会有扑倒的可能；浅山倘若单薄，就少了精神气韵。高低远近错落有致，有主峰的巍峨，也有辅峰的陪衬，才是一幅有精气神的山水画。

试想，当宋徽宗第一次缓缓打开卷轴，看到面前这幅绚烂的“江山图”时，应该是非常激动的。作为帝王，他欣慰坐拥这样的江山，作为书画爱好者，这幅画足以让他看到一个年轻人的才气，和自己治下画院、画学的丰硕成果。

约 1110 年，宋徽宗完成了《雪江归棹图》，描绘冬日的寒江雪色，有“李郭”山水画的影子，这也是现存宋徽宗唯一一幅山水图卷。从《千里江山图》的山石走势来看，王希孟想必是见过徽宗这幅山水图的，以传统的散点透视法，略带俯视的角度横向

展开一幅全景式大山大水。余辉认为王希孟在《雪江归棹图》的构图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山脉的走向，“全卷群山绵延，远近高低各不同，若即若离，变化丰富而不凌乱”。

《清明上河图》和《千里江山图》两幅巨制创作年代相差不多，描绘的都是繁华盛世，却又都是给帝王看的“繁华盛世”，虽有相似的背景，但两者面貌完全不同。王中旭向本刊解释了两之间本质的差异：在《清明上河图》中，桥梁、码头、茶馆、货郎都清晰可辨，“它本质上是一幅风俗画，大家可以看到街这边有一家卖肉的，那边是卖丝绸的，每一个细节都能看懂。但《千里江山图》相对来说更雅致，欣赏的门槛也更高一些，得有更高的知识储备和审美趣味”。

因此，从写实的角度来看，《清明上河图》胜在事无巨细的细节刻画，力图像照相机一样，还原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的繁荣市井生活，对后世来说，这不仅是一件珍贵的艺术作品，更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翔实史料。相比之下，《千里江山图》要理想化得多，它不是场景还原，更不是面景写生，而是有原型为依托的理想型山水。亭台、寺观、磨坊、院落，赶驴的商队、玩耍的孩童，这些细节也有所体现，但不是主角，它们有节奏地散落在大山大水之间，成为画面的点缀，让山水更有灵气。此外，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傅熹年在《〈千里江山图〉中的北宋建筑》一文中指出，这幅长卷是宋画中表现住宅和院落全景最多的一幅，在这一点上，《清明上河图》并未提供很多住宅全景和布局的信息，因此，透过《千里江山图》，可以更细致地梳理出北宋的民间建筑形制。这两件作品，一幅是现实主义的巅峰，一幅是“丰亨豫大”的理想景象，也恰好是北宋末年宫廷绘画的两个方向。

流传与保存

“与其他传世名作相比，《千里江山图》的流传是相对隐秘的。”王中旭说。宋徽宗收到这幅画后，欣喜把玩没多久，就赏给了蔡京，也就有了那段著名的题跋。然而好景不长，1126 年，宋钦宗赵桓登基，严惩了“京师六贼”之一的蔡京，蔡京被抄了家，《千里江山图》在蔡京手上 13 年之后不知去向，但可能还是在某个达官显贵手中。百年之后，这幅画流到了南宋内府，卷前可以看到宋理宗“辑熙殿宝”的

朱文铃印。

到了元代，浦光和尚成了它的主人。浦光是内府昭文馆大学士，通过他的题跋，我们得知他曾独自看过这幅画上百遍，“一回拈出一回新”，每看一遍都有新收获，画中景致、笔法、用色都了然于胸，他描述此画“设色鲜明，布置宏远”。他还打趣说，若是同以青绿山水见长的王希孟前人赵伯驹见了此画，想必都会“短气”，因为太精彩了，最终给出“独步千载”的高度评价。浦光圆寂后，该图易主，但是整个明代这幅画在谁手中至今都不得而知。直到清初，藏书家、文学家梁清标将其收入囊中，他的很多朋友也见过此画，之后就被收入清宫内府，著录在乾隆时期《石渠宝笈·初编》中。乾隆在画上题诗又盖印，留下了很多痕迹，又派了两名宫廷画师临仿，可见他的喜爱非同一般。

1922年，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盗走了这幅画，转移到他在长春的“小白楼”里存放。也正是因为溥仪将画盗出宫，使它没有在1933年为避战火，随故宫文物南迁最终运送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去。1945年抗战胜利时，溥仪落荒而逃，在沈阳北陵机场被苏军擒获，“小白楼”里的古董文物也被伪满洲国宪兵哄抢而空，《千里江山图》流入民间。新中国初期，这幅画又在北京的文物市场上露面，经辗转到了古董商靳伯声的手里，后来在国家的政策环境下，他将画作捐给了国家。1953到1954年，国家文物局将这幅画调给故宫博物院收藏，直到现在。

平日里，《千里江山图》被存放在故宫博物院的库房，对于它的日常维护，故宫的工作人员采取的是“自然保存”的方式。王中旭向本刊介绍，很多中国古代绘画辗转多次受到损坏，都属于不可逆或不可修复的损伤。因此，为了维持其最佳状态，尽量少动作品，少改变环境，是对其最稳妥的保管方式。针对《千里江山图》这样的重点文物，故宫有一个很明确的使用规定，简单来说，就是“展一次开一次卷，展一次至少休三年”。在“休三年”期间，工作人员会把它卷起来，存放在库房里不再打开，至少三年，有的需要休息更长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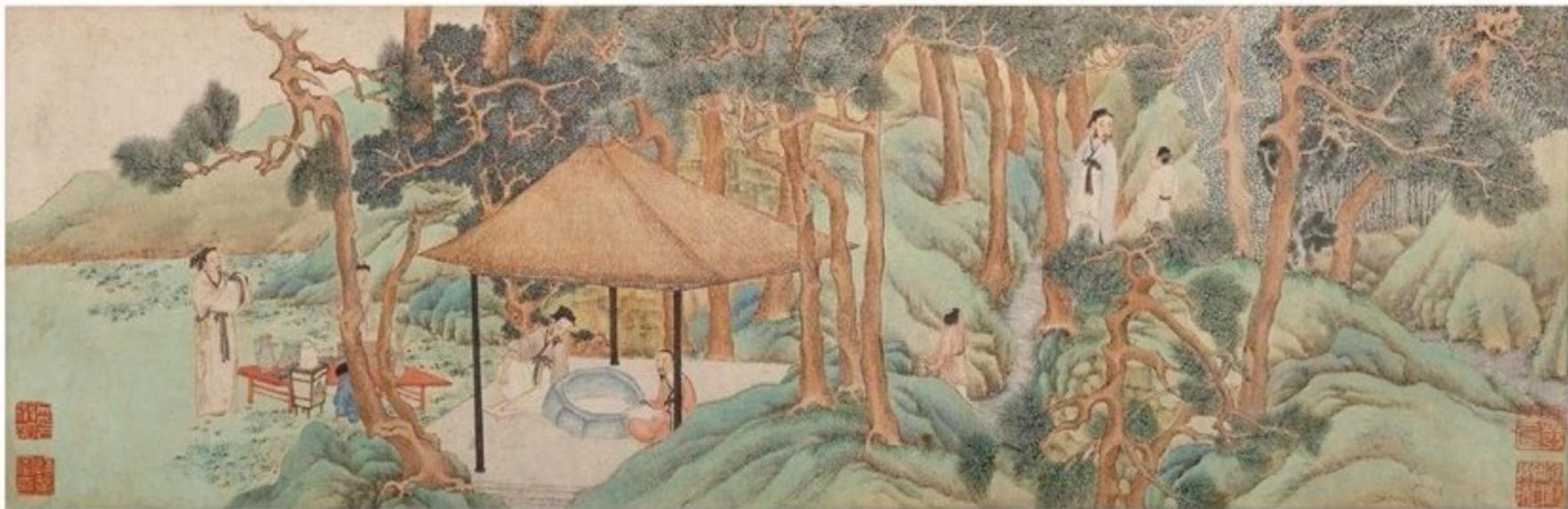
保存这些作品的库房是恒温恒湿的，库房和展厅的温度和湿度都经过严格控制，温度在18至20摄氏度，湿度是50%~60%，包括展厅内的灯光亮度也是在科学的数据范围内，并且24小时不间断保持。与水墨、浅绛绘画或书法作品相比，青绿山水的保存难度更大。因为其特殊的绘画颜料和局部的

厚涂技法，石青、石绿的颜料更易剥落，也由于矿物质成分的细微差别或研磨制作方式有别，随着时间的沉淀，有些设色甚至会出现色相上的细小变化，这种问题在水墨作品中并不存在，而在对青绿山水作品的保存和修复上，都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早期至宋的青绿作品。

在保存古代文物的职责之外，现在的故宫更是担起了向大众普及古代艺术和古典文明的职责，因此也有了这次展览。在每件文物的休展期中，它们静静地躺在库房，大多数保存完善的作品每隔几年都会展出一次，构成不同主题展览，久而久之，达到“润物细无声”的美育作用。为了更好地保护作品，此次《千里江山图》的展期仅有一个半月，之后下半期的“青绿山水特展”中，将由一幅乾隆时期的宫廷画家王炳的纸本《千里江山图仿本》代之展出。

在故宫，现藏有两幅该画的仿本，都是清乾隆时期的宫廷画家所作，一位是王炳，一位是方琮，两位都师从宫廷画家张宗苍。在当时，让宫廷画师临仿是保存古画的一个重要手段。画师在临仿时，必须不加入个人的主观表现和创造，尽量忠实于原作，做到一模一样、难以分辨最好，这样才能达到保存原作样貌，使之流传久远的目的。但对于临仿者而言，这种要求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即将替换本尊展出的王炳版《千里江山图》虽然基本忠于原作，但面貌上仍不免有差异，王炳这幅画作于乾隆三十年（1765），他突出了勾勒山石的轮廓线和侧皴笔法，波纹线也比原作更深，石青、石绿等颜色的对比强烈。据乾隆内府的记载，王炳也是一个很有天分的画家，入宫廷学画，然而学成后没多久也去世了，留下这幅仿本。这也与王希孟的传奇形成了一个巧合，可惜这并不是一个很圆满的巧合。

另一方面，王中旭强调了仿本在绘画史上的重要性。很多原作不在了，都是通过仿本流传下来的。比如著名的《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唐代韦偃的原作不在了，流传下来的是北宋李公麟的摹本，它的价值就超出了一幅单纯的临仿品的价值。而《千里江山图》的特殊性在于，我们现在不仅可以看到清代仿本，还能看到原作，且不说王炳、方琮的绘画技法是否逊于王希孟，但清代仿本的面貌明显装饰性趣味更强，不如原作雅致大气。倘若是元代临仿或当代临仿，可能又会是另一番模样，所谓审美趣味的时代特色，在不同时代的临仿作品中大概会体现得更清晰，这一点也十分有趣。■



青绿山水：中国绘画的色彩篇章

何为青绿山水

在中国传统山水画中，分水墨、浅绛和青绿三种。这三个概念，既是从绘画所用的原材料而来，“水墨”即水和墨，“浅绛”是水墨勾勒皴染的基础上辅以赭石为主的淡彩山水，“青绿”即石青、石绿，又指向画面最终呈现出的样貌，水墨呈现墨色焦、浓、重、淡、清的韵味，浅绛素雅通透，青绿则色彩丰富，明艳动人，这三种画法支撑起了中国古代山水画的发展。

然而一直以来，由于文人画家对水墨的偏爱，浅绛也在近代山水画中流传甚广，这两种山水画成了人们更熟悉的方式，青绿山水总是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研究相对较少，也不像水墨那样深入人心，这与青绿山水在中国绘画上的重要程度颇不相符。近日在故宫午门展厅展出的“千里江山——历代青

绿山水画特展”，在万众追捧的《千里江山图》之外，也试图呈现一次深入梳理，让青绿山水这种艺术形式更为人熟知。

在国内的博物馆中，故宫博物院是青绿山水作品收藏规模最大的。但要弄清楚存世青绿山水作品的大致数量，其中一个难点在于，如何定义青绿山水？策展组组长、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王中旭解释说，传统意义上，我们将以石青、石绿为主色山水画归至青绿山水门下，通常唐宋时期的青绿山水都符合这个特征。随着文人画的兴起，唐宋的青绿山水画法逐渐与文人画合流，通过各种文献记载和作品分析可以看到，“青绿”不再拘泥于矿物质的石青和石绿颜料，画中出现了更多能与水墨相融的植物性颜料，如汁绿、花青、螺青、合绿等颜色。因此，现在对青绿山水的定义有了更进一步的拓展，将以



1.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局部)
2. 赵伯驹《万松金阙图》(局部)
3. 文徵明《惠山茶会图》(局部)
4. 赵伯驹《江山秋色图》(局部)

矿物质或植物性的青绿颜色为主色调的山水画统称为“青绿山水”。

虽然早在唐宋时期，青绿山水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占据重要位置，但“青绿山水”这个说法直到元代才出现。元庄肃在《画继补遗》中称南宋画家赵伯驹“善青绿山水”，在此之前，画史中提及这类绘画多用“着色”的说法——北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说五代山水画家董源“水墨类王维，着色如李思训”，王维和李思训分别是唐代文人水墨和青绿山水的两个代表。与青绿山水相近的另一个概念是“金碧山水”，是在石青、石绿的基础上，在石脚、沙嘴、霞彩等局部点缀“金泥”，这样画面看起来更显得金碧辉煌，气宇盎然。

故宫此次青绿展分上下两期，从9月15日开展至10月30日为上期，共展出83套作品，总计200多件。展览以青绿山水发展的历史轨迹为线索，分为“东晋唐宋：金碧辉映”“元至明中期：墨色清趣”“千里江山”“明晚期至清中期：仿古脱古”“近现代：借古开今”五大部分，梳理出青绿山水发展的风格演变和每个时代的经典之作。这也是故宫第

一次将这么多青绿山水作品汇集到一起，做一个主题性的展览。

鼎盛与合流

这次展览的策划和展品的选择，依赖于现在学界比较通用的对青绿山水发展阶段的划分。第一阶段是魏晋南北朝至宋代，这个阶段时间跨度很长，历经多朝多代。这是青绿山水“从无到有，从最开始发展到宫廷绘画发展顶峰的阶段，也就是在职业绘画上青绿山水达到巅峰的阶段”。尤其是在唐宋时期，青绿山水有很高的成就，明显高于水墨山水，也是宫廷最为认可的一种山水画方式。

展览的开端并非名家之作，而是四幅敦煌壁画的复制品。王中旭解释道：“中国山水画从最开始产生的时候，不是水墨山水，它应该是着色山水，但也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青绿山水。青绿山水是从着色山水中慢慢发展而来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山水画真迹了，而同时期的敦煌壁画较完整地保留了当时的样貌。画中

山水石树的笔法、用色、比例、与人物的关系也都是当时中原绘画的影子，所以从敦煌壁画中，可以看到隋唐青绿形成的雏形。而且莫高窟从十六国时开凿起，一直延续下来，中间没有长时间的间断，这种风格的延续性和演变过程也反映得更明显。“虽然莫高窟是佛画，山水只是其中的背景，但它是早期山水形态最可靠的资料。”展览中选取的第285、217、103、159四个窟的壁画，分别是西魏、盛唐和中唐时期的作品，可以明显看到山水在画中比例逐渐增多，这是一个从以人为主到以山为主的变化过程，色彩也越来越鲜亮艳丽。

早期青绿山水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是现存风格最为古拙的山水卷轴画，这也是故宫的镇馆之宝之一。画中山水“空勾无皴”，施以青绿重色，局部用金线勾勒，人马虽小，但形态宛然，点缀在山水之间，明代詹景凤在《东图玄揽》中说这幅画是“殆始开青绿山水之源”。

到了唐宋，这时的青绿山水是宫廷贵族的专利，最有名的李思训、李昭道父子是唐朝宗室；北宋王诜娶了公主是个驸马，赵令穰是赵宋宗室，王希孟是个宫廷画师，赵伯驹、赵伯骕也都是南宋宗室。这些擅长青绿山水的有名画家，几乎没有人是出身平庸的，都具备深厚的艺术修为，再加上绘制青绿山水的材料昂贵，只有这些王宫贵族才能肆意使用。不夸张地说，青绿山水是唐宋即奢华又高雅的艺术门类，也是一种身份和品位的象征，普通人是难以接近的。

待10月30日换展之后，下期将展出一件传为南宋赵伯驹的《江山秋色图》，但王中旭认为这应该是比赵伯驹年代更早一些的作品。与《千里江山图》相似，这也是一幅“江山图”，长3.23米，绘千里江山壮阔之景，山势陡峭变化，连绵不绝，山间有村落寺庙、车舆舟棹、行人商旅、文人墨客等，与《千里江山图》的秀丽壮阔相比，这幅更多了几分肃穆和庄严，体现了秋山明净兼肃杀之气。赵伯驹与赵伯骕兄弟二人并成为“二赵”，故宫博物院研究院胥瑞崑认为他们所绘青绿山水“是对宋代皇家画院审美意趣的继承，既具唐‘二李’与宋王希孟富丽堂皇的格调，又散发着文雅的气息”。

从魏晋至宋，虽然历经千年，但青绿山水始终集中在宫廷这个极小的范围内发展，也由于年代久远，流传下来的作品相对不多。在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真正开创金碧山水体之后，唐后期的张藻、王维等人也发展出了重视笔墨趣味的水墨山水，这也

是后来人文水墨的鼻祖。青绿和水墨逐渐开始形成一种对立抗衡的关系，无论是绘画技法、构图布局、审美趣味都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这也为后来青绿山水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第二个阶段是从元至明代中期，这是“青绿山水与文人画合流”的一个重要阶段。进入元代，在赵孟頫的大旗下，文人水墨成为山水画的主流，唐宋时期宫廷式的传统青绿山水逐渐走向落没。对青绿山水的探索，一直在如何将唐“二李”系的青绿着色与五代“董巨”（董源、巨然）系的水墨山水相互融合的问题上进展。由于异族统治，这时的青绿山水也不得不走出宫廷，走进文人圈。元初的钱选、赵孟頫都试图以青绿设色体现“士气”，从晋唐“古意”中汲取养料。

展览中钱选的《孤山图》绘湖山平远，一文士在岸侧屋内凭栏眺望湖面，屋外有鹤及梅花，表现宋代诗人林逋隐居西湖梅妻鹤子的典故。山石多勾斫，染以淡青绿色，笔法充满拙趣，突出了文人隐逸的趣味。画心右侧还有一首钱选题的小诗：“一童一鹤两相随，闲步梅边赋小诗。疏影暗香真绝句，至今谁复继新辞。”虽然一部分学者认为这件作品是元人仿钱选风格之作，但仍可从中看出元代青绿山水的变化：一是带有强烈的文人气质，宫廷作画很少讲求个人情趣，更不会像钱选这样题一首淡雅清趣的小诗，二是设色不再浓重艳丽，构图也更加悠远宜人。

明代早期存世的青绿山水不多，主要是带有元人特色和南宋画院“院体”遗风的作品。到了明中期，以沈周和文徵明为首的吴门画派在苏州画坛崛起，他们不仅继承了“元四家”的水墨逸趣和文人气息，又重视唐宋宫廷的青绿趣味，在元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青绿与文人画相融合，形成了“墨色清趣”的面貌。

王中旭指出，这一时期的“合流”是一种主动的合流，也就是说从王诜、赵令穰开始，到钱选、赵孟頫、吴门画派，他们对青绿山水的态度都是比较积极的，借鉴或学习其设色方式，一种类似“拿来主义”的态度。比如，文徵明就认为水墨和青绿两种绘画方式是没有优劣之分的，“青绿早出，可谓神品，水墨晚出，可谓逸品”，两种方式都好，只是面貌不同，神色相异。他既学“董巨”，也学“二赵”，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文徵明仿赵伯骕后赤壁图》，虽是对南宋青绿的临仿，但能明显在画中看出明中期更清雅可爱的艺术趣味，文徵明的个人风貌也是明代青绿发展的一个高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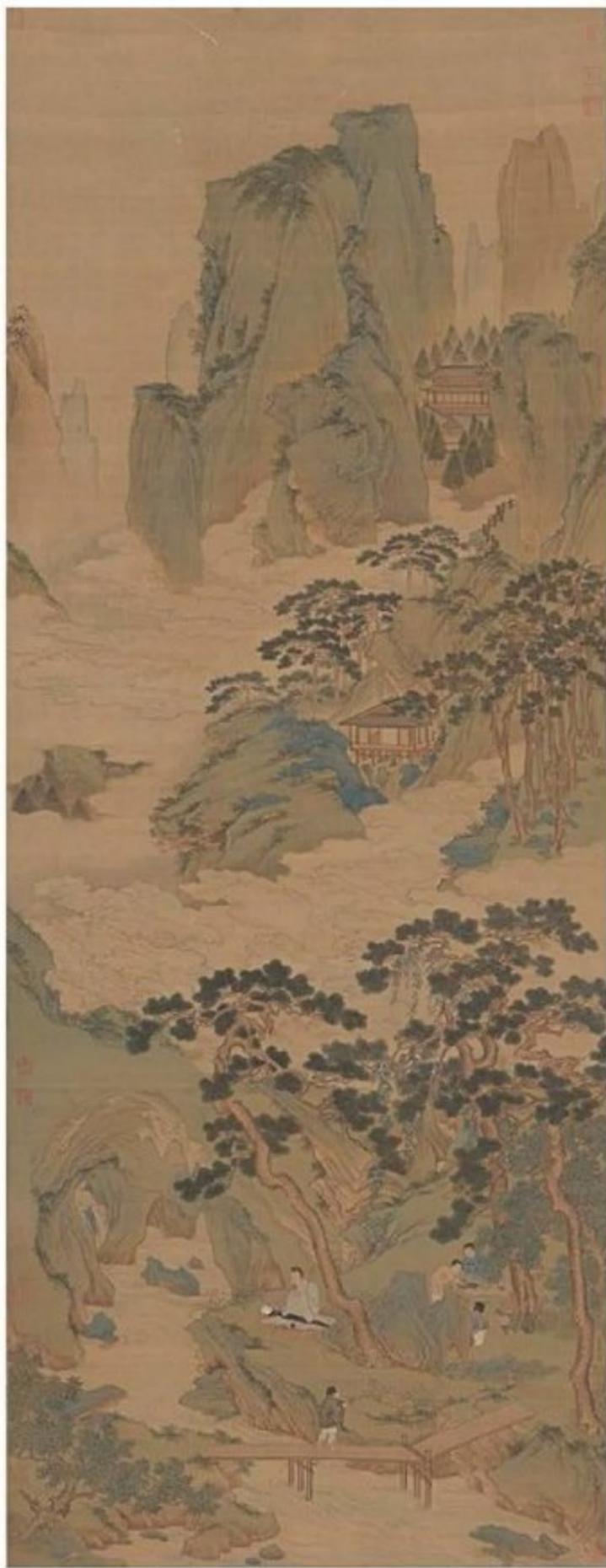
“缺位”与质疑

在对王中旭的采访中，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青绿山水的“缺位”现象。“在中国绘画史发展中，青绿山水不像水墨山水一样有一个严密的系统，画家一直都有延续，有很明确的师承关系，基本没有间断过。青绿山水经常是隔一段时间冒出几个大家，隔一段时间再冒出几个大家，它的延续性不如水墨画，会经常性地出现‘缺位’。”至明以后，这种“缺位”现象变得更加明显，对青绿山水的认知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造成这种“缺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与文人画兴起后的话语主导权有关，一些有分量的文人画家的言论主导着整个绘画走向。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董其昌。董其昌是明晚期的旗帜，他的绘画见解也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在他的“仿古”理论影响下，从明晚期到清中期被划至青绿山水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一个“变异”的过程。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许彤在研究明代青绿山水的文章中指出，董其昌笔下的青绿山水，“一是淡青绿兼浅绛设色，具有元人和明中期吴派的文人笔调；二是借仿古之名，改造了‘没骨山水’。这两种风格都影响了晚明时期多位重要画家”。在董其昌著名的“南北宗论”里，推崇以王维、董源、巨然、“二米（米芾、米友仁）”、“元四家”为代表的“南宗”，他们都是文人画家，善水墨山水，有手工士气；不被推崇的“北宗”则包括“二李”父子，他们“风骨奇峭，挥扫躁挺”，传至宋之赵伯驹、赵伯骕以及南宋以后的马远、夏圭、戴文进、吴小仙等人。唐宋青绿山水的领域人物无一例外，都被董其昌打入了“北宗”阵营。

在董其昌看来，“南宗”文人画出于顿悟，而“北宗”出于“渐识”，也就是说只是勤习苦练总能有成就。因此，自晚明以来，传统的青绿山水被看作很匠气的艺术，不如文人画那般泰然自若，追求内心与自我。董其昌虽然否认了宫廷青绿的成就，但他并未完全否认青绿山水。他也将青绿带入文人画的创作中，认为“赵令穰、伯驹、承旨（赵孟頫）三家合并，虽妍而不甜；董源、米芾、高克恭三家合并，虽纵而有法；两家法门如鸟之双翼，吾将老焉”（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提出三赵系统青绿山水和董源系统的水墨山水是如鸟之双翼的两家法门，青绿山水的具体创作方法是要合并赵令穰、赵伯驹和赵孟頫三家笔法。在董其昌这面大旗的倡导下，那



仇英《玉洞仙源图》(局部)

种大青大绿的青绿山水彻底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小青绿”的新面貌。

清末至近现代，青绿山水进入第四个阶段。在西方文化和西洋绘画的冲击下，青绿山水又发生了转变，走向雅俗共赏的格调，但绘画水平已经很难再与前代精品媲美。■（本文图片由故宫博物院供图）



(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供图)

1



(袁扬 供图)

2



(陈宗器 供图)

3

1. 1927年5月20日, 大队乘骆驼向茂名安旗(百灵庙)进发, 26日到达百灵庙以西40公里处的哈那郭罗, 全体人员在此会合。图为袁复礼(左)与外方团长斯文·赫定(中)、中方团长徐炳昶(右)

2. 1961年, 袁复礼的女儿、登山运动员袁扬(右)在公格尔九别峰上

3. 1933年12月5日, 陈宗器在温音乌苏做测量

西北科学考察团，西行纪念 90 年

记者 / 艾江涛

90 年前的西北科考团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从历史图片上可以复原这样一幅场景：在中国广袤西部的漠漠黄沙中，一队由三四十人、近 300 头骆驼组成的队伍正在慢慢行进着。队员们个个脸色黧黑，衣衫不整，疲惫的神情中却透露着一丝昂扬。这支队伍既不是过往的商队也不是猎奇的游人，而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与外国学者组成的联合科考团——西北科学考察团。

两年前，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策划新文化运动百年展览时，一位专家在论证会上指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是民主与科学，西北科学考察团是科学史上的大事，展览内容不包括这个，不太合适。也是从那时起，该馆展览部副主任秦素银开始关注起这件事情。幸运的是，位于当年“北大红楼”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本身便藏有一批当年的资料，秦素银越读越感动，于是有了 2017 年 9 月的“万里向西行——西北科学考察团九十周年纪念展”。

收集材料的过程中，秦素银结识了不少当年考察团成员的后人，其中就有考察团中方团长徐炳昶的女儿王忱。王忱从 1985 年便开始陆续收集相关资料。由于历史原因，当年的西北科学考察团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外国考察团，而随着资料不断被发掘，当年团员的后人和学者们一起，逐渐聚合成一个民间性质的研究会，尽力去梳理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

90 年前的那场科考究竟是怎么回事，又何以成为中国科学史的大事？一切都与著名瑞典探险家、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密不可分。

“与外人订约之新纪元”

1926 年 11 月 20 日，斯文·赫定从柏林出发，

穿越西伯利亚大铁路，经由哈尔滨和沈阳到达北京。那时候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摇摇欲坠，南方的北伐军节节胜利，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则即将登上他最后的权力顶峰。

这是斯文·赫定第四次来中国探险。1894 至 1908 年之间，在中国新疆、西藏境内的亚洲腹地的三次探险，尤其是楼兰古城的发现，使他成为享誉世界的探险家。而他在 1926 年此行的目的，是受德国汉莎公司的委托，计划在德国与中国之间开辟一条途经中亚的空中交通走廊，为此他要从北京出发，经内蒙古、新疆展开一次包括气象、地质、考古在内的探险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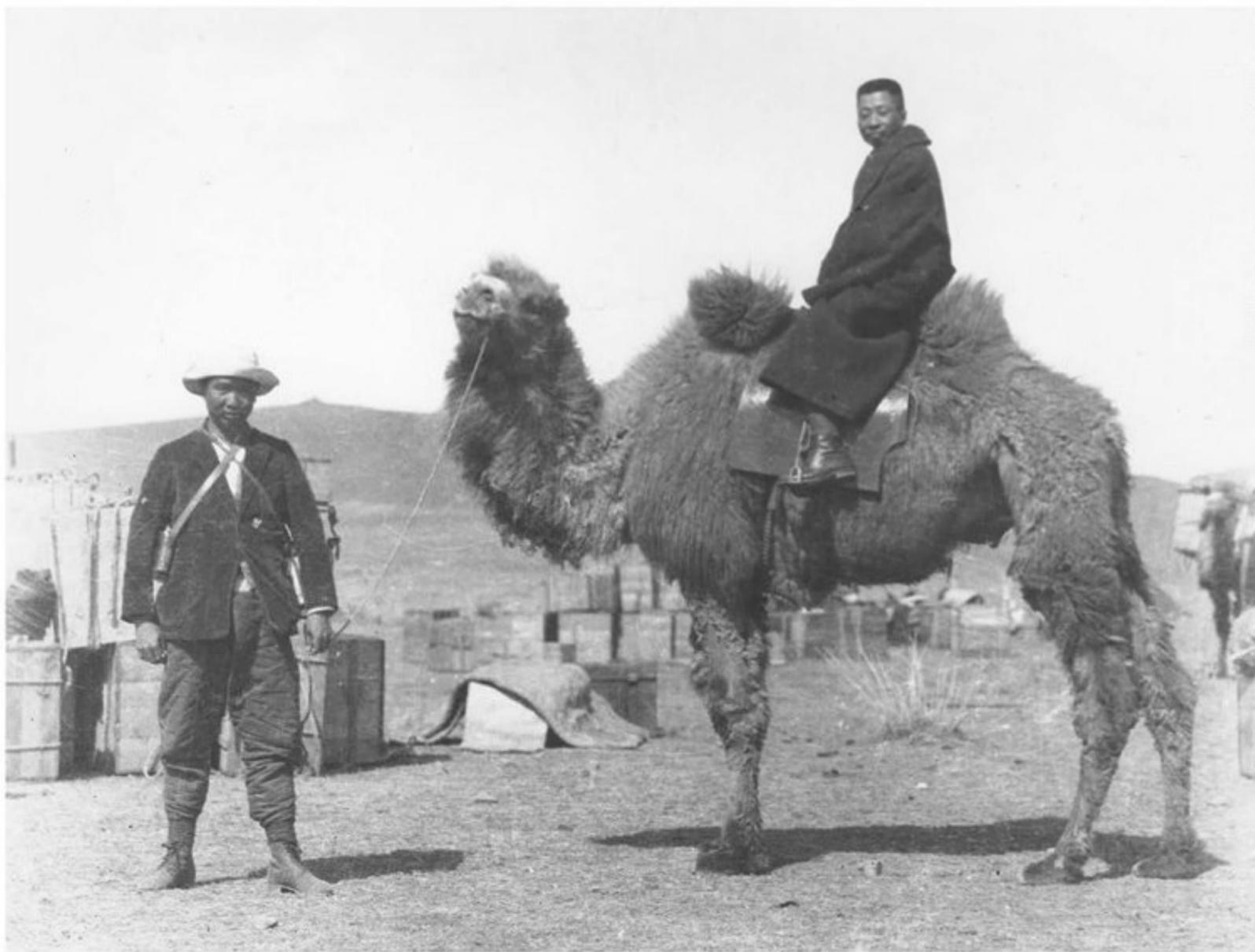
在北京，斯文·赫定首先见到了中国地质调查所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 G. Andersson），后者以主持仰韶文化的发掘而知名。拥有丰富人脉和高超外交手腕的赫定，不断拜会中国学者和外交官员，甚至还从张作霖那里要到一封写给当时新疆督军杨增新的信。一切进展得颇为顺利，1927 年 2 月，经过多次会谈后，由翁文灏代表地质调查所与赫定签订协议，很快，瑞典和德国的队员也陆续到了北京。3 月 4 日，一切准备妥当之后，赫定给在包头的瑞典团员拉尔生（F. A. Larson）打电话，指示他购买 200 匹探险用的骆驼，后者曾在蒙古待了 34 年，谙熟蒙古语和探险生活。

3 月初，“翁—赫协定”经新闻界披露，很快引起轩然大波。北京的学术界对协议内容强烈不满，其中最突出的两条：只允许中国二人参加限期一年；全部采集品先送回瑞典研究。学界的反应尤为迅速，3 月 5 日，包含北京大学研究所考古学会、清华研究院、京师图书馆在内的 11 家学术团体开会讨论此事，在北大教授刘半农、沈兼士、马衡、马幼渔的联合主持下，会上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并制定了六条原则，提出“消极方面，严重监视外人，不准随意购买或假名窃取及发掘我国古物及学术上稀少之物品；积极方面，互相补助，采集保存学术

1. 黄文弼先后在额济纳、天仓北、巴丹吉林沙漠考察，采集到不少古物，图中骑骆驼者为黄文弼

2. 2000年，陈宗器的小女儿、画家陈雅丹在楼兰古城大佛塔前，1931年1月19日，她的父亲和霍涅尔曾经拜访楼兰

3. 2000年，陈雅丹所拍摄的楼兰古城遗址



（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供图）

上之材料”。

学界的激烈反应并不奇怪，事实上正是对晚清以来西方学者和探险家不断从中国窃取挖掘文物不满情绪的一次集中爆发。在赫定的老师、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Rihofen）和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斯基（H. M. Przhevalsky）的中国西北探险之后，在1906至1908年之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 Pelliot）、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 A. Stein）和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P. K. Kozlov）又几乎同时来到中国西北，带走大量珍贵的敦煌文书与西夏文书。尤其是伯希和和斯坦因偷买运走敦煌文书，极大地刺痛了国内学者，正如史学家陈寅恪所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就在斯文·赫定这次到来的一年前，1925年2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派陈万里协助哈佛大学考古队赴甘肃考古，途中陈万里便阻止了美国探险家华尔纳（Landon Warner）对敦煌文物的进一步盗窃。

斯文·赫定显然也意识到情况发生了变化。更

重要的是，在当时的爱国热潮下，北方政府也不敢公然对抗民意，建议斯文·赫定先与反对的组织谈好。赫定之前的想法还是，“但中国政府已经批准了我的先期探险，同样，也只有中国政府才有权否决这一决定，因此这里进行的一切讨论当然只能是多余的”。现在他转而正视中国代表们的建议，起草了一份新的协议，核心问题是承诺“所有的发掘物都不能被带出中国，并要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有关的一切事务”。

就这样，在汹涌的舆论面前，双方经过了多次谈判，终于在1927年4月26日签订了一份包含19条细则的新协议。此次科考活动被置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名义之下，其全称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理事会督查团内一切事务，并委任中外团长各一人，外方团长为斯文·赫定，中方团长则为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哲学系教授徐炳昶。考察的一切费用由德国汉莎公司来出，考古发掘物将统一交给中方保存，地质发掘物则可以将



(陈雁丹 供图)

2



(陈雁丹 供图)

3

一份副本赠予斯文·赫定。科考团的成员除了18名外国团员（瑞典6名、丹麦1名、德国11名）外，还包括10名中国团员，除了团长徐炳昶外，另有留美的地质学家袁复礼——他在1921年曾协助安特生在河南发掘仰韶文化；年轻的北大国学门助教黄文弼与地质系助教丁道衡；华北水利委员会工程师詹蕃勋；北京历史博物馆的摄影师龚元忠，以及刚刚招收的四名气象学生崔鹤峰、马叶谦、李宪之、刘衍淮。

对于中国学界来说，这当然称得上一次难得的胜利，无怪刘半农后来在一次大会上兴奋地说：“开我国与外人订约之新纪元，当此高唱取消不平等条约之秋，望我外交当局一仿行之。”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科考与中国文物保护关系重大。1928年成立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首批成员即主要来自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

不仅如此，某种程度上，西北科考团也建立了此后对待西方探险队来华探险的模板。但其他的合

作却很难如此顺遂。曾在中国从事多年探险活动的美国探险家安德鲁斯（Roy Chapman Andrews）便在书中以他自己的立场评论：“但显然，接受这些荒谬的条件使得其他探险队在进行活动时将面临极大的困难。”1929年，因为不接受类似条件，安德鲁斯宣布放弃他的探险计划。1931年成立的中法科学考察团虽然接受了条件，却由于法方态度恶劣，甚至发生殴打中方团员的事情，科考团最后中途废止，团员刘慎鄂转而加入西北科考团继续工作。

回头来看，西北科考团能最终成行，斯文·赫定本人的态度至关重要，他后来在记录此次科考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一书中便写道：“我的目的与他们不同，我不为任何博物馆收集藏品。”

万里向西行

1927年5月9日，科考团的大队人马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乘专车前往包头，等待在那里的，是事先前往购买装箱物品的瑞典和德国团员。

由于雇佣骆驼、购买物资、办理手续还需要一些时间，大队迟至5月20日才从包头出发。20多名团员，还有20多名驮夫包括采集员、杂役在内的近60人，骑着雇佣的232匹骆驼，载运400多箱约两万多公斤行李、食品与仪器，加上由包头司令官派出30名护送兵，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斯文·赫定后来回忆出发时的情景：“简直不能说是一个旅行团，是十个或五个骆驼联络而成的许多小团列成了的一个大团。……这样灿烂、庄严、重大的，一列远征队。”

几天前还在包头探寻古迹的徐炳昶，此刻打着裹腿，背着望远镜和水壶，举着手杖在驼背上摇摇晃晃地前行，感慨油然而生：“现在虽然还没有求得知识，然而也像个求知识的样子。从前多少年的人，想求得知识，却专在斗室故纸堆中绕弯子，那怎么能行得了！人类的使命，就在征服自然，并没有其他的话说！”

一路上是单调的景色和破败的村庄，旅途并不太平，匪帮横行，夜晚宿营时，警戒工作不可缺少，赫定挑选了2名欧洲人和4名卫兵守夜，兵士们请大家不要离开营地，以防被绑票或被流弹击中。不久，不甘落后的中方团员便和赫定商量，共同承担守夜职责。

由于担负沿途考察的任务，考察团与一般走“口

外”的老规矩完全相反,选择“昼行”“不走大路”“不怕损失”,旅途自然格外辛苦。经过一段时间的跋涉,5月28日,大队抵达内蒙古茂明安旗的哈那郭罗驻扎下来。团队在那里休整了一个多月,将雇佣骆驼遣回,自购骆驼做好西行准备。

气象测验是考察团的一项重要工作。出发之前,赫定便计划沿途设立4个永久气象站,带来的4个中国学生便计划一人分配到一个气象测候所工作。到哈那郭罗的当天,一座气象测候所便落成了,每次测试四次温度。此外,来自德国的气象学家赫德(Haude)还要定期放出氢气球测验风向。氢气球的下面写着小纸条,请拾到的人将拾得日期、地址还有附近人口的疏密及距离大路远近详细记录,然后寄到北京,回报是10元奖励。

为了扩大考察范围,全团决定分为三队西进。7月1日,瑞典地质学家那林(Norin)率领北分队出发,成员有丁道衡、贝格曼、海德、马森伯、哈士伦、生瑞恒及采集员靳士贵,另有3名工人、25匹骆驼。7月4日,袁复礼率南分队出发,成员则有詹蕃勋、龚元忠,采集员白万玉及3名工人,15匹骆驼。7月22日,剩下人员在赫定和徐炳昶的带领下,共购292匹骆驼,雇用30多名驼工出发了。队伍之间靠骑着快脚骆驼的蒙古苦力传递信息。

此刻,西行的磨难才刚刚开始。拉尔生新购的骆驼虽然非常强壮,但从未工作过,野性难驯,大队在出发当天驼队便受惊溃散,不得不将行程延迟一周。不久,斯文·赫定的胆结石发作,不得不暂留途中。9月28日,大队终于到达额济纳河驻扎下来。气象组的成员很快在沿岸的葱都尔设立第一座气象台,2个多月后,马叶谦和生瑞恒留守在那里持续观测。等待队员采购粮食的时间里,赫定和哈士伦乘坐用两根胡杨木制作的独木舟,沿着额济纳河考察索果淖尔。

而在此前,全团已经取得一系列振奋人心的考察成绩:7月3日,丁道衡发现白云鄂博铁矿;10

月25日,黄文弼在额济纳的一个土堡发现了最早的几枚居延汉简;沿途采集的石器更为丰富,11月7日,崔鹤峰已经押送第一批采集品往北京走了。

11月8日起,队伍开始陆续前往新疆哈密,那里是经历一段荒漠之后的第一个绿洲。这段路程也是科考团所走最为艰难的一段。暴风把帐篷吹得稀碎,对面几乎都看不清人,队伍被耽搁了不少时日。派出采购粮食的队伍在新疆边界被扣留,不得不留下骆驼和钱落荒而逃。饥寒交迫的大队在1927年1月8日才到达哈密,徐炳昶在日记中写道:“初离额济纳河时,计四十日左右即可到哈密,沿途因风雪及骆驼的疲乏,迁延至六十余日,中间并有四十八日不见人烟,减食及杀骆驼为食,始能挨到二架胡桐及大石头,团员之疲乏与困苦略可想见!”

尽管旅途艰难,团员的士气却依然高涨。德国人马学尔(Marschall)养的一只黄獐笛克(Dicky)是大家的宠儿。赫定则为自己最初骑的骆驼起名“茶花女”。负责拍摄记录电影的李伯冷(Liberenz)因为没有拍摄到骆驼惊散的镜头,恨不得让骆驼队再溃散一次。

到新疆以后,由于时局紧张,治理新疆17年之久的督军杨增新对内地人士非常猜忌。他们抽检到一封团员李宪之表弟写来的家信,信中“团里有二百打手,又有何怕”这样的戏言令对方多疑,再加上四散的谣言,杨增新便怀疑科考团是另一军阀冯玉祥派遣的先头部队,因此调兵遣将,集结在新疆边界,而且扣留了团里事先派往迪化(今乌鲁木齐)取款的队员,不准科考团在哈密设立气象测候所。待到1928年2月27日大队到达迪化,见面解释以后,新疆方面的疑虑才渐渐打消。

很快,来自甘肃方面的谣言又起,由于误把科考团携带的氢气管当作炮筒,认定他们是张作霖派遣攻打甘肃的部队,甘肃方面便将科考团设立在额济纳气象台的团员带到兰州关押起来。后来经蔡元培向冯玉祥解释,才允许他们继续工作。

然而,由于斯文·赫定向新疆政府提出的航空计划未被允许,德国汉莎公司不愿续约,考察团的经费遂成问题,赫定不得不于5月6日与大批德国团员返回柏林商议。几个月后,回到迪化的赫定带回消息,瑞典政府愿意出50万瑞币解决经费问题。

与此同时,科考团的工作仍在继续。袁复礼和白万玉出发去天山北麓继续发掘,气象组在迪化、若羌、库车陆续建立气象站,并在当地招人培训。

由于担负沿途考察的任务,考察团与一般走“口外”的老规矩完全相反,选择“昼行”“不走大路”“不怕损失”,旅途自然格外辛苦。



1931年1月8日，终于到达孔雀河畔后，陈宗器（左）和霍涅尔合影。从霍涅尔膝盖处破损的裤子及陈宗器褴褛的衣衫可以想见旅途的艰辛

始料未及的是，7月7日，新疆省政府发生政变，杨增新遇刺身亡。继起的督军金树仁朝令夕改，对科考团的工作设法阻挠，几乎让科考中途废止。徐炳昶据理力争，在回函中写道：“科学家对于国防有重要的责任，所以各国政府对于科学家的研寻，无不竭力帮助，现在新疆对于异国人之游该处则并无任何取缔，而对于本国科学家乃严加限制，殊属闻所未闻！”12月17日，徐炳昶与斯文·赫定取道西伯利亚回到北京，此刻他们需要报告的政府已经是北伐胜利之后的南京国民政府了。

徐炳昶回京后，袁复礼出任中方代理团长。1929年，科考团成功延期两年后，包括中央研究

院物理研究所助理员、地磁学家陈宗器在内的6名第二批团员被派往新疆。陈宗器几经波折，终于在10月下旬奔赴内蒙古考察。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科考团不得不在与新疆政府的斗争中艰难地进行考察，1930年12月，陈宗器和瑞典地质学家霍涅尔（N. Horner）被迫从敦煌西行，悄悄进入罗布泊。

此后科考团再度延期两年，直到1933年5月终止。1933年8月，斯文·赫定在面见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时，提出中国政府如欲保住新疆，应该修建两条通往那里的公路。他的提议受到重视，斯文·赫定随即被聘为铁道部顾问，组织一个由中国

政府出资的绥新公路勘察队。原西北科考团成员陈宗器、贝格曼、赫默尔和生瑞恒接着参加了此次勘察，直至1935年3月结束。很多时候，人们也把后两年的公路勘察视作西北科考团的一部分。

轰动世界的发现

尽管在出发伊始，斯文·赫定将气象与地磁考察作为首项任务，地质与考古是其附带研究，但后两个领域的发现却更具轰动。

科考团的第一个重大成果要算丁道衡1927年7月3日发现的白云鄂博大铁矿。在哈那郭罗的第一个集合地跟随北分队出发没两天，丁道衡一早去沿途的北部山岭白云鄂博查看，很快便发现散布山间的铁矿矿砂。他随即给中方团长徐炳昶写信报告，说发现一地方有望成为北方“汉冶萍”——汉冶萍是包括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的中国最早的大型铁煤混合企业，早在辛亥前夕便可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丁道衡兴奋地写道：“矿质虽未分析，就其外形而论，成分必高。且矿量甚大，全山皆为铁矿所成……全量皆现露于外，开采极易。”大队随即派出詹蕃勋前往支援，测绘出二万分之一的地形图。蒙古人对白云鄂博极为迷信，每年杀牲祭奠，并在山顶用矿石堆积成包，以祈求神灵赐福。1930年结束考察回到北京的丁道衡，在给北平女师大的演讲上曾讲到科考团在内蒙古勘察研究的困难：由于担心神灵迁怒，害怕团员拿走他们的镇山之宝，蒙古人禁止人们动他们垒在山间的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鄂博。直到给喇嘛解释之后，情况才稍稍好转。

事实上，就在丁道衡发现白云鄂博铁矿不久，8月5日南分队的袁复礼在喀托克呼都克也发现铁矿，也就是现在的白云鄂博西矿。但是袁复礼仅在日记和地图中记了一笔，并未发布，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协助一支地质调查队找到铁矿。袁复礼的

贝格曼测量完一处烽燧边的房屋废墟时，钢笔掉落地上，在弯腰捡钢笔的一刹那，意外发现旁边有一枚完好的汉代五铢钱，往下挖掘，木简很快出现了。

女儿袁扬后来也学习地质普查，她回忆自己曾问过父亲为何当时没有公布结果，她父亲的回答是，后头有外国人，很可能是日本特务。当时日本人对中国蠢蠢欲动，派出勘测矿藏的特务很多，“父亲在这方面的警惕性特别高，归谁发现并不重要。”

1927年10月25日，黄文弼在额济纳附近的土堡发现几枚汉简，并推测如果细掘，收获必定很大。1930年7月，年轻的德国考古学家贝格曼又在黑城附近发掘出土900多枚汉简，沉浸在汉简发掘的喜悦中，他甚至婉拒了斯文·赫定让他和霍涅尔去罗布泊考察的命令，改由陈宗器和霍涅尔一起前往。到1931年4月，贝格曼带着采集员靳士贵在额济纳河黑城附近的破城子大湾等遗址上先后发掘两汉木简万余枚，就是后来声明远扬的“居延汉简”，同时还在那里出土了一支汉代毛笔。

贝格曼的发现其实颇为意外。他在测量完一处烽燧边的房屋废墟时，钢笔掉落地上，在弯腰捡钢笔的一刹那，意外发现旁边有一枚完好的汉代五铢钱，紧接着搜寻到一个青铜箭头和另一枚五铢钱。贝格曼尝试往下挖掘，木简很快出现了，上面用墨写的汉字依然清晰可见。在他后来写的《考古探险手记》中，记录了当时在一个老鼠洞旁发现大量汉简的情景：“这些老鼠洞非常有趣，里面有稻草、丝绸碎片、碎绳子和削下来的碎木头。很明显，在写了字的木简不必保存时，就用简便方法把有字的表面削掉再重新写字。老鼠把这些削下来的碎块拖回洞里，成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

考察结束后，1931年9月，贝格曼携带家属一起到北京住了两年，参加居延汉简的整理研究。一起参与研究的还有瑞典人高本汉（Karlgran）、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和中国学者刘半农、马衡。1934年，科考团理事会从北京大学文学、历史专业挑选4名毕业生作为马衡的助手，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汉简研究专家的劳干。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这批珍贵的汉简被辗转存放于香港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最后保存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由于美国人之前就在内蒙发现了大的恐龙化石，出发之前，地质界朋友就提醒袁复礼留意恐龙化石。最早的恐龙化石发掘地在距离三德庙不远的喀拉托罗盖（红头山），9月4日，袁复礼判断那里的玄武岩下会有化石，但由于携带的粮食不够，未能发掘，便写信给后面的丁道衡。丁道衡后来在那

里发掘出三具鹦鹉嘴龙。

1928年4月抵达乌鲁木齐不久，袁复礼便在天山南麓展开考察。从9月中旬到10月末，袁复礼带着采集员白万玉和靳士贵，在三台南5公里的大龙口一共发现采掘兽形类爬行动物42个个体，包括7个比较完整的个体和一个恐龙蛋，化石中包括二齿兽、水龙兽、袁氏阔口龙、袁氏三台龙等。在二叠—三叠纪地层中发现如此数量的完整的爬行动物，在中国尚属首次，比以前的发掘时代提早了一亿多年。这一重大发现经科考团公布后，很快轰动世界，一名瑞典地质学家对斯文·赫定说：“你们费巨款，做考察，即使只得此一件大发现，已属不虚此行。”

后来袁复礼又陆续发现赫氏水龙兽、奇台天山恐龙等完整个体，前后一共发现72个爬行动物个体。1930年12月，为了挖掘修复后长10多米、高4米多的奇台天山恐龙，袁复礼在天寒地冻中连续挖掘32天，不幸把脚冻伤。回到乌鲁木齐手术后，休养了3个月方才痊愈。

在第二批派遣团员中，1929年10月出发的陈宗器是唯一一名中方团员。10月底，陈宗器顶替原定的贝格曼，作为霍涅尔的助手前往罗布泊（罗布淖尔），负责绘制北返的罗布泊新地图。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罗布泊作为一个行将消亡的湖泊闻名于世。1876年，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在考察罗布泊之后，曾宣称清政府绘制的地图上标明的罗布泊位置与他实地考察的结果足足差了一个纬度，清朝地图必须重新绘制。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却认为俄国人所见到的并非罗布泊。争论延续到他们的学生科兹洛夫与斯文·赫定。1900年，斯文·赫定不但发现了楼兰古国，而且在考察完罗布泊后，证实普尔热瓦尔斯基看到的卡拉库顺湖只是一个新的终端湖，位于罗布荒原北部的罗布泊则已经干枯。按照赫定提出的“游移湖假说”，罗布泊有一天还会离开卡拉库顺湖北返。令人惊讶的是，据当地土人讲述，1921年罗布泊果然如约北返，得知消息的斯文·赫定自然迫切地希望证实这一幕。

由于金树仁的新疆政府对科考团并不合作，霍涅尔和陈宗器只能从甘肃偷偷进入罗布泊。经过一段艰苦跋涉，两人终于在1930年12月30日见到了有水的罗布泊，见证了科学史上的重要一幕。陈宗器随后在罗布泊做了大量堪称当时最完整的地磁学、地形天文测量与研究。两人测量的准确的罗布泊位

置与形状大小，被证实与1973年美国卫星测量的数据安全一致。

穿越历史的风尘

90年前的西北科考团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原本研究历史与哲学的徐炳昶和黄文弼，此后都醉心于考古，成为考古学家。李宪之、刘衍淮由于表现出色，被斯文·赫定推荐到德国柏林大学深造，之后成长为有名的气象学家。袁复礼和陈宗器则被授予了“瑞典皇家北极星骑士勋章”。1936年，斯文·赫定出资并推荐陈宗器到德国和英国留学，陈直到1940年在抗日战火中回国，日后成为中国地磁学的奠基人。

前后长达8年时间的科学考察，也让这批中国学者与广阔的田野建立起深厚的情感，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抛家舍业，完全将心思放在了科学研究上。连续在外考察5年的袁复礼，大女儿在他出发途中出生，再回来时女儿已经五岁了，为了纪念那段旅程，他为女儿起名袁疆。

陈宗器在外考察期间，母亲和父亲先后去世，他都未能按期奔丧。为了纪念斯文·赫定和科考团岁月，他给儿子起名陈斯文，小女儿起名陈雅丹。如今已经75岁的陈雅丹，是一名画家，她像父亲一样喜欢野外探险，去过南极，并先后两次深入罗布泊，追寻父亲当年的足迹。她还记得小时候问父亲自己为什么叫雅丹，父亲告诉她，雅丹是罗布泊那里一种常见的风蚀地貌，他希望女儿同样能够经受住风霜。

袁扬印象中，父亲袁复礼在家很少说话，总是坐在那里看书。反而是在课堂上，他才会情不自禁地讲起当年科考的事情。

陈雅丹在退休之后开始翻阅当年的照片和书信，逐渐弄清照片上的那些人事。很多年过去了，那些照片仍然让她感动。“我爸和霍涅尔经过14天基本没有水草的旅途，到罗布泊后，膝盖都是破的，霍涅尔冻伤的手上还套着自己缝的方口袋，但他们的精神非常昂扬，让我非常感动。”指着一张扫描后放大的历史照片，陈雅丹说。■

（本文写作参考：《长征记》，斯文·赫定著，李述礼译；《考古探险手记》，贝格曼著，张鸣译；《高尚者的墓志铭》，王忱编；《走向有水的罗布泊》，陈雅丹著；《西北科学考察的先行者——地学家袁复礼的足迹》，袁疆、袁刚、袁扬、袁方、袁鼎编著。感谢徐十周等人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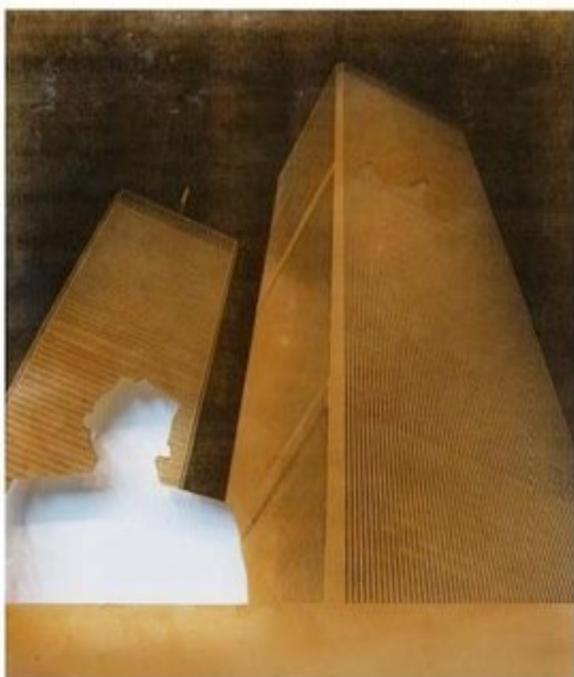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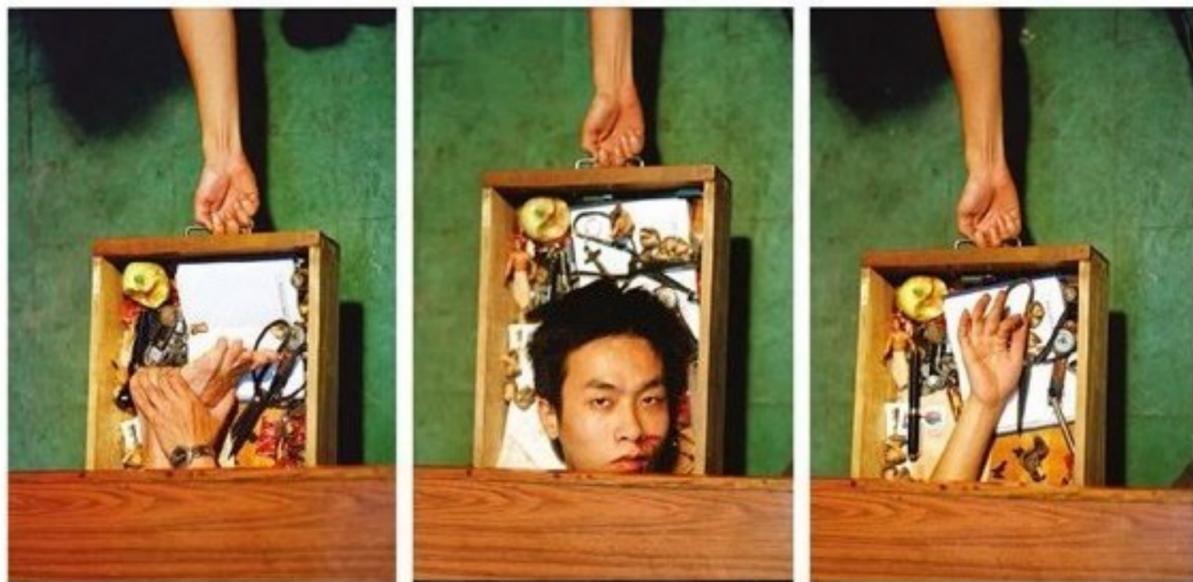
- 1. 黄永砫,《世界剧场》, 1993
- 2. 王兴伟,《新北京》, 2001
- 3. 张宏图,《纪念曾广智》, 1991
- 4. 陈箴,《福倒/福到-佛倒/富到》, 1997



3



4



蒋志,《匣中物》, 1997

世界剧场： 面对争议的古根海姆和中国艺术展

文 / 虞凡 (发自纽约)

刚刚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开幕的“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非常庞大——是有史以来在北美最大规模的一次中国当代艺术展览。

风波

参展的近 150 件作品来自 71 位艺术家或团体，呈现于美术馆的螺旋主厅和两个塔楼展厅。展览由古根海姆三星亚洲艺术高级策展人孟璐 (Alexandra Monroe)、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 (Philip Tinari) 和罗马 21 世纪当代艺术国立博物馆 (MAXXI) 艺术总监侯瀚如三人共同策展，筹备耗时三年；以“不许掉头：1989”“新刻度：分析情况”“5 小时：资本主义、城市主义、现实主义”“不确定的快感：感性行动”“别处：穿越中间地带”和“谁的乌托邦：2008 前后的行动主义和替代方案”六大主题，梳理了 1989 到 2008 年间中国观念艺术所经历的变化发展。

主策展人孟璐非常清楚展览的受众——“这不

是为中国观众创作的，而是为美国观众”，她希望用一个庞大细致且兼备多重角度的展览来呈现这段跨越 20 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史，不过展览开幕前的风波让这个初衷显得事与愿违。

艺术家黄永砷的《世界剧场》、孙原和彭禹的《犬勿近》以及徐冰的《文化动物》三件涉及动物参与的作品引发来自动物权益保护人士的不满，Change.org 组织了要求移除作品的请愿并在短短几天内收集到超过 50 万人次的签名。美术馆方面先是做出简短的公开回应，“希望观众能考虑为何艺术家这样创作，并且他们如何去表达全球社会环境和世界复杂性的本质”。这些言辞对反对者毫不奏效，古根海姆的社交媒体 Instagram 账号被群起攻击，留言一面倒地表达了对美术馆的愤慨和责难，诸如，“残忍地对待动物是犯罪不是

艺术！”争议以灾难性的速度持续蔓延，迫使古根海姆于4天后重新发布官方声明，“出于对员工、参观者和参与艺术家安全的考虑”而决定不在展览中展出这三件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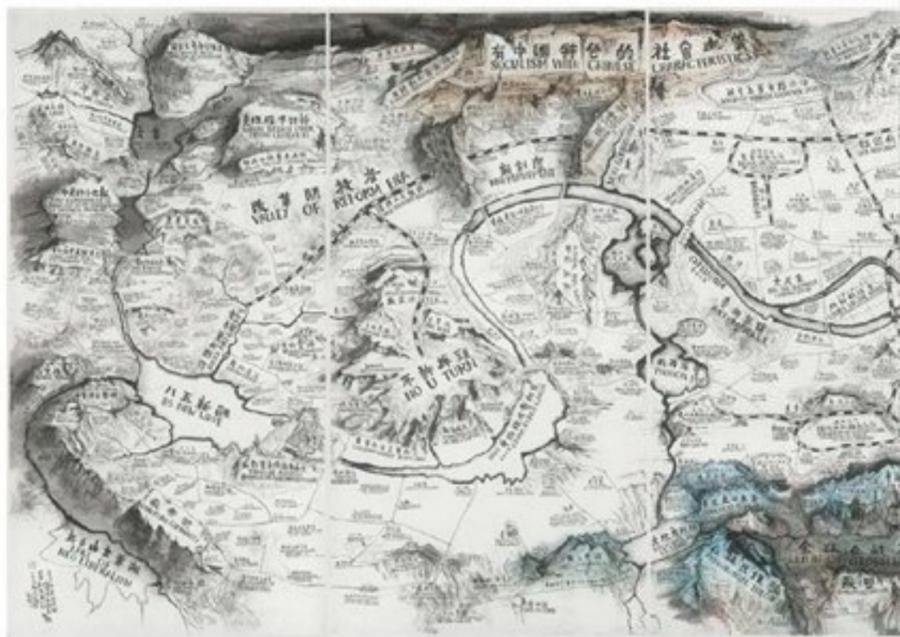
这个决定让古根海姆又陷入了一种新的双重尴尬。一方面，捍卫言论自由的人们极度不满美术馆的软弱妥协。在类似的面临公众指摘的事件中，艺术界向来具有坚定立场。最近的例子是在今年的惠特尼双年展中，一件表现被处以私刑的黑人青年的绘画作品遭到了抗议，反对者不满白人艺术家利用黑人的不幸参展获利因而扬言要将作品销毁，但主办方还是坚持展出了作品。而因为在阿布扎比开设分馆带来的雇佣廉价劳工的问题，古根海姆近年来也多次遭遇抗议示威，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撤销任何修建计划。另一方面，愤怒的动物保护者并不买账“安全考虑”的解释，在他们看来美术馆方面理应更进一步，进行公开道歉。

纷争聚焦在近150件展品中的其中3件，是仅占全貌2%的冰山一角，而风波折射出的负面反馈也让人深感中西方之间彼此理解的鸿沟尚存。因为三件作品就断定中国人不善待动物的西方观众，对artnet艺评人Ben Davis的不同观点或许是忽略不见的：“（中国）关于动物权益的想法已经与我们自己（美国）的趋于接近，但这种趋势只是在近几年比较明显”，他在评论文章里援引《国家地理》杂志今年七月刊中动物权利专家所提供的数据来肯定中国对待动物态度的改善：中国现在“至少有200家主张动物福利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注册机构——这其中还不包括数以百计的动物庇护所和救援活动”。

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下，这场展览还未开始就已经被舆论和误解架空，成为一个可以任由观看者投掷偏见的空洞容器。展览对于国内和海外的受众而言，各有需要小心避开的雷区，大家的痛点不同但模棱两可和断章取义的表现又如此一致，确如标题所示，是一个上演跌宕剧情的“世界剧场”。

世界和剧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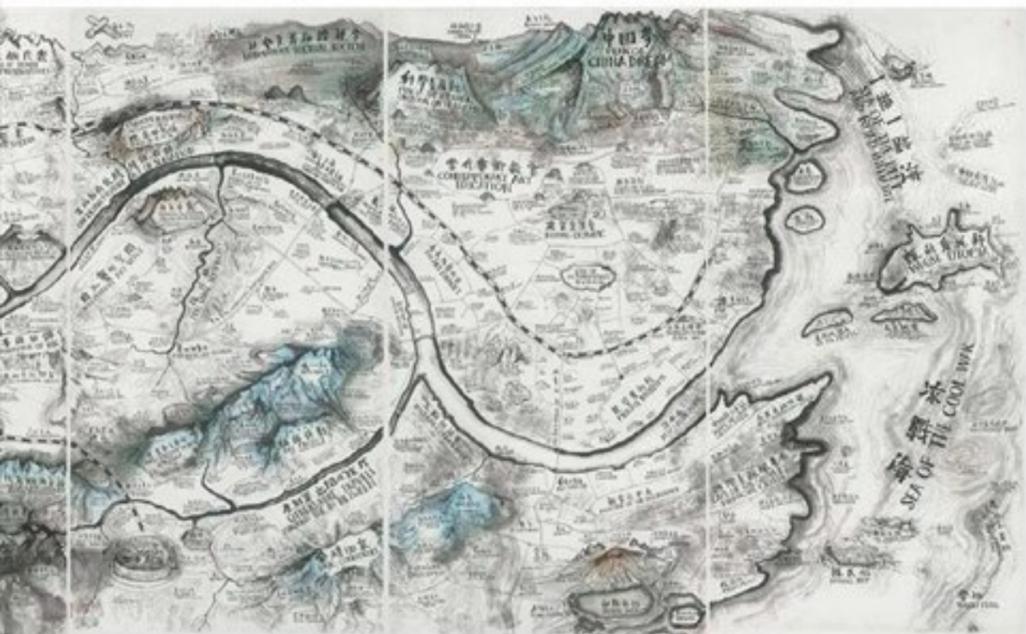
《世界剧场》是艺术家黄永砵创作于1993年的一件大型装置，它是本次展览标题的出处，也是纷争聚焦的三件作品之一，像一枚巨石切片那样呈现出层层叠叠积压在一起的多重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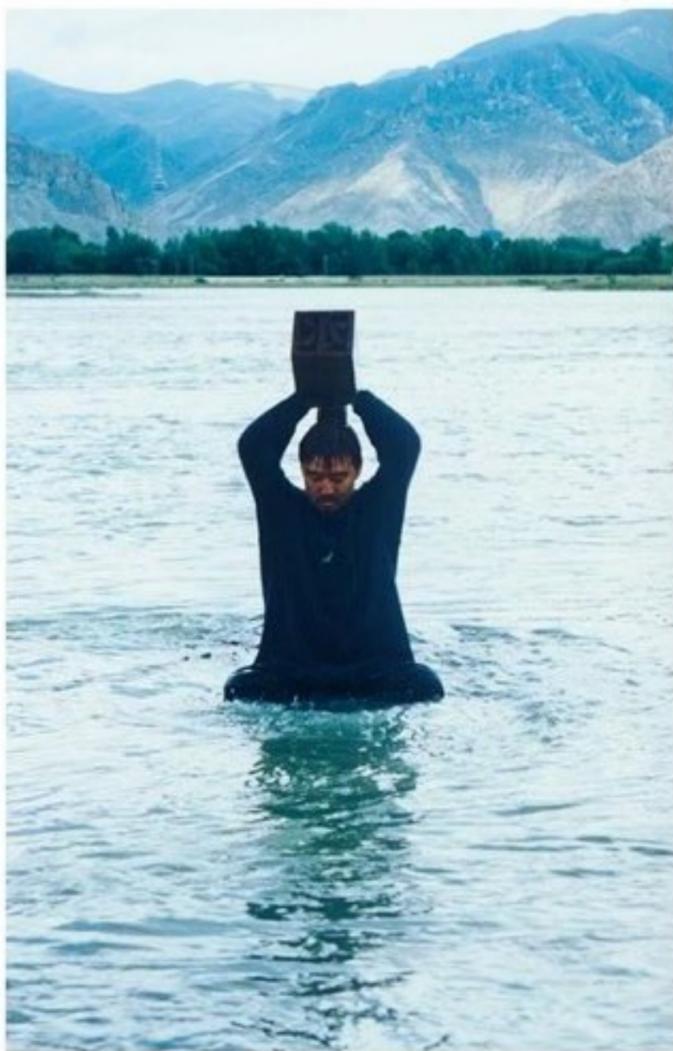
黄永砵是“厦门达达”艺术群体的核心成员，他们1986年11月将自己刚结束的群展“厦门达达现代艺术展”的所有作品拆卸到厦门文化宫门前的广场上付之一炬；1987年黄创作了日后被奉为经典的《〈中国绘画史〉和〈现代绘画简史〉在洗衣机里搅拌2分钟》；1988年“厦门达达”又在草图上规划了“拖走中国美术馆”的计划……这些早期创作都悉数呈现于1989年2月5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上。作为“85新潮”艺术运动中最为激进的代表人物，“厦门达达”借鉴了1917年诞生于苏黎世的欧洲先锋艺术团体“达达”的“反艺术”主张，试图在作品中消解由美术馆、艺术史和展览所构成的权威体系。



1



2



3

1. 刘丹,《天地玄黄》, 1994~1995
2. 邱志杰受展览委托新创作的《地图》系列
3. 宋东,《印水》, 实施行为作品, 1996

1989年5月18日,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展览“大地魔术师”,其中囊括了黄永砷在内的三位中国艺术家;此后,黄便留居法国并入籍。1993年在斯图加特驻地期间,他为当地的独寂城堡学院(Akademie Schloss Solitude)创作了《世界剧场》。在古根海姆,这个龟背形笼子的大桌与黄永砷两年后创作的蛇形长条笼子结构的《桥》并置在一起,占据着紧邻入口的挑高展厅,作为整个展览的开篇。

《世界剧场》的本意就是要设计成一个真正的笼子:五只活龟和十条真蛇,还有一些青铜制的神兽摆件被放置在《桥》中;龟形笼桌的《世界剧场》里则是成百上千只活蟋蟀、蟑螂、蜥蜴、甲虫和各

类爬行动物。在黄永砷1994年的笔记中,他自述这件作品想要提出的问题:“这是一个有关‘虫’的动物园?一个自然界物种间相互吞食的试验?一个观察‘虫’的活动的空间?一个封闭系统的建筑形式,如斗兽场的缩小?一个模拟全景敞视监狱和民间巫教养虫的混淆?一个隐喻人的不同种族间的斗争?还是中文中古老词汇‘蠱’的现代体现?”

以上皆是。黄永砷在《世界剧场》中浓缩了许多或相对或互补的象征:龟桌与蛇笼彼此分离又密不可分,来自龟蛇同体的“玄武”形象;祈福摆件对活物龟蛇的模拟,衬出了民间巫术与现代养殖之间的对照;龟桌中边沁式全景监狱的微缩斗兽场,赋予其人类观看者一种似乎能掌控全局的上帝视角;

徐冰对纷争的回应是让屏幕在展览中保持全黑，他在展墙文字中向观众提问：“子非猪，安知猪之性之乐？”

还有斗兽场中诸虫大战过后的幸存与死亡，既是对种族斗争的直接隐喻，又将人类置于更宏大的自然之中。

这件作品是犀利、冷酷、黯黑且深刻的，有美国艺评人认为它唤起了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对荒野生活的描述：“肮脏，野蛮和短暂。”

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黄永砷承袭了欧美达达艺术的衣钵，将其虚无主义、反艺术的突破、破坏式的建构与来自东方文化背景中炼金术士、易经风水、佛法道教的哲思都融合在一起。侯瀚如在作品的解读中提到福柯式的“生命政治”，那是一系列共存演化发展而来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弱肉强食的直白类比。这也呼应了孟璐为美国观众解释时提及的中国毒药：“被放置在同一个陶罐里的五只剧毒活物”最后“生存最久的动物被认为是权力的吞噬者”，因为它“消化了其他四种物种的有毒力量”，所以黄永砷作品中的动物“不仅互相杀害，并且互相滋养”。

展览原计划聘用专业的动物护理人员全程看护，并且在作品中呈现本来就宠物模式喂养的动物，但对于动物权益保护者来说，要他们眼见一场百虫厮杀是绝对无可容忍的。最终的妥协方案是，《世界剧场》与《桥》仅展出龟桌和蛇笼的框架部分，而不涉及任何动物。

这番待遇并不全然出乎艺术家的意料之外。在飞往纽约参加展览开幕的飞机上，黄永砷写下了对事件的回应。他提到作品1994年在法国以及2007年在加拿大两次遭到类似的反对而没能完整呈现的先例。他同样提到了霍布斯：“是的，这件作品重提了托马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确切地说是‘一切虫反对一切虫的战争’。但人们往往忽略这件作品的构架：笼子的结构、精心计算的铁丝网大小（不让小虫爬出）、环绕四周的独立抽屉、

中心开放的空间、全光谱的灯光……这难道不是霍布斯所描述的与自然野蛮相对的文明国家的‘微缩景观’？”当然，黄永砷也再次表达出一种以禅宗虚空观念为底色的开阔：“这件作品产生于西方（我当时已经在欧洲生活了四年），并被查禁于西方（在巴黎、温哥华、纽约）……‘世界剧场’未揭幕就落下帷幕，未开始就已经结束，这种不圆满性正好表示一种圆满性？这叫作‘幕间’，两场表演的中场休息。1924年René Clair的‘幕间节目’使所有幕后人员均在镜头前亮相，‘幕间’有时比剧场表演更有意思：人们可借机逃离这一剧场。”

黄永砷的声明写在法航的呕吐袋上，像一件参展作品那样被透明展盒护罩着，放置于空空如也的《世界剧场》旁边。这次“倾吐”、这一“借机逃离”、这种用动物的不在场来宣告现实中“残酷”之在场的表达，或许是艺术对被架空的观看所能做出的唯一反击。

第二件被迫撤出也是最受动物保护者抨击的作品，是来自艺术家孙原和彭禹的视频《犬勿近》，拍摄于2003年，记录了八只被拴住的美国比特犬在跑步机上飞奔的场景。在作品极具侵犯性外表之下的是大量普通观看者无从获知的细节：这些斗犬来自“省级犬类驯养繁殖中心。彼此互占地并具侵略性，所以它们与驯养员分开，并被八辆独立豪车运送至展览现场”；“表演被分为三个七分钟：第一个七分钟开跑，下一个七分钟休息，最后的七分钟再起跑”；“照顾这些狗的过程，跟表演同样重要。在休息间隙，驯养员辛勤地照顾它们，给它们喂水、抚摸它们以缓解它们紧张的肌肉，对待它们就如同呵护星级运动员”；而且“狗的驯养员发现这些机器对于训练它们很有效，在展览过后从艺术家那里购买了四台跑步机！”这些描述来自《动物作品在中国》的作者郑美玲(Meiling Cheng)。但两位艺术家并没有像黄永砷那样对观众做出更多的解释，他们只是将视频定格在出现标题的那一帧。

另一件1994年的视频作品《文化动物》，纪录的是艺术家徐冰让两头背上分别印有罗马字母和徐冰所创“天书”汉字的猪当着观众的面交配。徐冰对纷争的回应是让屏幕在展览中保持全黑，他在展墙文字中向观众提问：“子非猪，安知猪之性之乐？”并在声明的末尾表示：“当代艺术的作用也许就是敏感地给人类即将面对的问题提出警示。”

这让人难免联想起去年四月艺术家马克·迪翁 (Mark Dion) 在一间切尔西的画廊中呈现的作品——“纽约鸟群图书馆及其他奇观”。当时的巨大鸟笼中有 22 只活鸟栖息在笼子中央的一棵白栎树上,不过这“鸟语花香”的景致得到的大多是赞美。用艺评人安德鲁 (Andrew Goldstein) 的话来说,美国人“不想知道他们的汉堡包来自超市以外的任何地方”。

正视的目光

如果动物议题是无法回避的引人注目,那么展览中最后一件作品《2009-05-02》相对而言的不受重视则凸显出了一种奇异的失衡。

这件作品出自被栗宪庭和费大卫称为“中国最重要艺术家”的顾德新,标题简单地以作品第一次展览的日期命名,艺术家在作品中毫不停顿地重复写下 11 句话:“我们杀过人我们杀过男人我们杀过女人我们杀过老人我们杀过孩子我们吃过人我们吃过人心我们吃过人脑我们打过人我们打瞎过人眼我们打烂过人脸”。顾德新写下的句子直接呼应鲁迅的《狂人日记》,这其中的“我们”确如策展人孟璐所说,是一种“适用于任何人,适用于新世纪所有的道德失败”的泛指。顾德新本人在这件作品之后完全停止了自己的艺术创作,他对艺术持怀疑态度,他的放弃既可视作某种失败,又更是不为新兴艺术市场笼络要挟的决断。

展览还呈现了许多表达更为内敛但同样意味深长的作品。徐冰的《何处惹尘埃》是将收集于 9·11 倒塌之后的尘土挥洒在展厅中,任其落定之后隐隐显出提前写下的六祖慧能偈语“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英译,这是一句抛向巨大悲恸的质问,又是跨越了东西方文化而能让彼此达成共鸣的感慨。大尾象成员之一的林一林,其行为录像《安全渡过林和路》纪录了艺术家以一己之力挪动砖墙缓慢靠近建筑工地的过程,将“世界工厂”背面的劳苦与危险演绎成一种西西弗斯式的荒诞。上海艺术家徐震的早期影像作品《彩虹》曾经入选 2001 年的威尼斯双年展,这件 3 分钟左右的视频用近景聚焦一节被抽打出红色印痕的人的后背,抽打的声音回旋在展厅,而暴戾的痕迹被诗意地称为“彩虹”。

许多参展艺术家的共识是避免“中国”的标签,

而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个展览都在力图为中国当代艺术正名,曾经红极一时的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的作品几乎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策展人将这个时间段内中国及其发生的艺术置于一种全球化概念主义的背景当中:展览在黄永砵和顾德新等人身上看到了杜尚式的遗产,比如顾德新的退隐就像杜尚当年退出艺术创作而致力于国际象棋期间的“非视网膜”艺术一样;展览为以邱志杰、耿建翌、张培力等聚集在杭州、受过社会写实主义训练的艺术学家们找到了“莫斯科观念主义”的近邻,而称其为“杭州观念主义”;展览在 1999 年发起于北京的“后感性”展览及其后续发展中看到了 YBA (年轻英国艺术家) 的身影,也看到了不同于 YBA 的中国新生力量;展览管窥出基于珠三角地区的大尾象艺术群体在艺术实践中对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所说的“加剧差异的城市”的呼应,城市化和资本进程带来的快速迭代烙印在这些创作当中;展览提及了包括碧山计划和长征计划的乌托邦尝试,以及上海比翼艺术中心的替代性实践;展览还非常清楚自己或有偏颇的海外视角,而在专门的篇章中呈现了像蔡国强、谷文达这样长期活跃于海外的中国艺术家,以强调这种观看先天自带的偏差。

这个被观看的中国,既复杂多变又极富凝聚力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既体量庞大无从观看又有无数详尽的档案支撑,既以类同西方当代艺术的语汇映射出处于世界中的中国又处处充满难以翻译的文化独特性。而这些千头万绪尽管只是引爆于“动物保护”的议题之上,但难掩西方对中国越来越多的好奇,以及越来越无法挪开的光正的目光。

想到展览画册中提及的一则陈年轶事。在 1989 年那场希望消解欧洲中心主义的展览“大地魔术师”上,50 位颇有建树的西方艺术家的作品与 50 位来自地缘政治背景相对偏远艺术家们的作品一起穿插着出现在巴黎的蓬皮杜。极负盛名的美籍华裔艺术家白南准,在展览开幕式上初见三位来自中国的艺术家顾德新、黄永砵和杨诩苍,他跑向他们,面露喜色地说:“欢迎!”

将近 30 年过去了。古根海姆展览的开幕式上,大部分亲临现场的中国艺术家与策展人并排站在那道著名的螺旋坡道上,他们有立场地容纳了风波和争议,对着人群微笑,跟这个世界打招呼。■

(图片由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提供)



贾樟柯作品《时间去哪儿了》剧照

贾樟柯：《时间去哪儿了》的现实追问

记者 / 宋诗婷

贾樟柯监制的《时间去哪儿了》，为观众呈现了来自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的五部短片，金砖五国导演以“时间”为主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直面共同的困惑与焦虑。

作为第二届金砖国家电影节的开幕影片，《时间去哪儿了》的政治背景显而易见。这是一部集合了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五国作品的短片合集，参与项目的五位导演都在各自国家享有极高的声誉。

邀请著名导演合作创作短片集是很多国际电影节的传统，多数受邀导演都把拍摄短片当成一次实验，在没有压力的创作环境下总有惊喜之作诞生。

作为中方导演和《时间去哪儿了》的监制，贾樟柯把这个项目定义为一次“话题创作”。他不赞同把“金砖五国”视作政治背景，认为那不是创作者的

心态，相较之下，他更愿意把五个国家的现状视作一种共同的社会背景。“眼下，五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很像，这几个国家的人口加起来有几十亿，又都处于快速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作为导演，我们生活在各自的国家，却有共同的困惑和感受。”贾樟柯说，在确定主题时，大家讨论范畴很宽泛，除了宏大的命题，超市、铁路等具象主题都曾在讨论范畴之内，“但谈论最多的还是时间和时间感，这是在我们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最容易产生共鸣的话题”。

最终，主题被设定为“时间去哪儿了”，在共同的主题下，五个国家的导演自由创作，交出了一部集合了科幻、灾难、惊悚等五种不同风格的短片集。

“时间”的意义

在为《时间去哪儿了》物色导演时，贾樟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三四年，沃尔特·塞勒斯曾来中国拍摄纪录片《汾阳小



子贾樟柯》，两人因那部电影结下了友谊。事实上，两人的交集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的巴西圣保罗电影节，他们第一次见面讨论的就是关于“时间”的电影和话题。“这次的主题也是关于时间，自然第一个想到他。”贾樟柯说。

除了私人交情，贾樟柯更看重的是这位老友的导演能力。早在1998年，塞勒斯就凭《中央车站》斩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他导演的《摩托日记》《在路上》等电影也早已流行于全世界。

在“时间”的命题下，塞勒斯选择讲述一个建立在真实历史背景之下的个体故事。2015年11月5日，处于巴西腹地的米纳斯吉拉斯州遭遇了巴西史上最严重的社会环境灾难。一家私营矿区发生了溃坝事故，泥石流淹没了沿线650公里的区域，成千上万人或死伤或无家可归。

这是几乎每个发展中国家都会遭遇的发展代价，在这个大背景下，塞勒斯和编剧加布里·埃尔·阿尔梅达共同构思了一个小家庭的故事。少年古托的父亲在灾难中消失，古托与母亲卢恰娜搬到避难所中。两人以不同的心态面对灾难后的生活，古托认为父亲终究会回来，而母亲准备接受现实，努力寻找新生活。

塞勒斯把这个21分钟故事命名为《颤抖的大地》，他说，片名是当地村民描述寻常生活发生巨变

时所用的词汇。

塞勒斯的短片不以结构和氛围取胜，而是跟长片作品一样，在叙事上从容不迫。贾樟柯认为，这是真正的大导演才有的心态和控制力。在《颤抖的大地》中，塞勒斯把时间视作对悲观和伤痛的反抗。他承认，这部短片有向他最喜欢的伊朗导演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致敬的成分。后者1991年上映的作品《生生长流》拍摄于伊朗西北部大地震之后，展现了灾难之下普通人的生活状态。

“不幸中永远都有不经意间出现的光明。”塞勒斯从奥维德和但丁的诗歌中得到启示，并把这种对于生活的态度用于理解电影《生生长流》，又进而用在了《颤抖的大地》的创作中。

相较于沃尔特·塞勒斯冷静从容的叙事，印度导演马德哈尔·班达卡的《孟买迷雾》就节奏明快很多。导演选用了最能表达“时间”概念的角色——老人和小孩。退休后的钱德拉康特住在大房子里，衣食无忧却孤单寂寞，一次偶然的的机会，他结识了10岁的拾荒男孩查理，两人结下了隐秘却深厚的友谊。他们给予了彼此当代印度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时间。

《孟买迷雾》是个发生在大都市中的故事，这让它拥有了可以脱离印度文化而存在的普适性。马德哈尔·班达卡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自己真实的生活

感受。孟买是印度的不夜城，永远处于高速运转和变动中。都市让生活便捷而舒适，却也让人在忙碌中失去了对彼此甚至是自身精神世界的关照。“每当回想10年前，我们都觉得过去比现在美好，而这就成为我拍摄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班达卡带着对逝去生活的怀念创作了这部电影。

作为监制，贾樟柯觉得，班达卡镜头下的印度打破了他个人对于印度和印度电影的惯性认知。《孟买迷雾》没有歌舞片段，场景和人物状态也更具现代感。“它揭下了印度的面纱，不再神秘秘，这个故事放在上海、广州、北京都成立，人类的当下生活太相似了，这是很可怕的。”

在面对同样的“时间”命题时，俄罗斯导演阿历斯基·费朵奇科把目光投向了荒野。这部名为《呼吸》的短片为观众呈现了一个白雪皑皑的世界。采购物资的妻子吉娜乘坐破旧的小火车回到山中，丈夫见到吉娜并不开心，在酒精的作用下，他的孤独和猜忌心被放大了，竟怀疑吉娜与火车司机有染。两个常居野外的彪悍夫妻把彼此激怒，丈夫摔烂了司机送给吉娜的手风琴，追着妻子跑向荒野。在疯狂的怒吼和追逐中，男人从结冰的木梯上摔下，动弹不得，吉娜不得不紧急救治危在旦夕的丈夫，她把丈夫的喉管切开，给手风琴连上管子，手动为丈夫输氧。

随着手风琴一开一合，丈夫每一次维系生命的呼吸都伴着悲怆的琴声。“我还有多长时间？”丈夫问妻子。“我便是你的时间。”妻子回答。在阿历斯基·费朵奇科的故事里，“时间”被具象为一把伤痕累累的手风琴。

在贾樟柯看来，《呼吸》是五部影片中最符合观众对短片期待的作品。它构思精巧，有悬念，这是短片电影最讨巧的创作模式。和追求普世性的沃尔特·塞勒斯、马德哈尔·班达卡不同，阿历斯基·费朵奇科极力为观众呈现的是一个地域性强、能带来视觉奇观的作品。作为威尼斯电影节费比西奖得主，费朵奇科的作品向来影像风格独特。无论是获奖作品《沉默的灵魂》，还是后来的《苏维埃的美丽任务》，费朵奇科的电影质感都是冷酷的，冷酷中又兼有古典油画的唯美，个性鲜明的影像让《呼吸》在五部作品中尤为抢眼。

南非导演贾梅尔·奎比卡是五位导演中年龄最小的，他的作品《重生》也最让人意外。这位热爱嘻哈文化的南非导演拍了一部寓意深刻的反乌托邦

科幻片。在一个虚拟的未来世界里，每片雪花都有标码，每滴雨都会说话，每个人的人生都被设定，一切生命体都没有选择的自由。像《美丽新世界》里脱离既定程序的觉醒者一样，人生被设定为劳动女工的诺宝米 SX1 意外知晓了整个世界的运行规则，她不甘心被摆布，决定冒险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为真正有血有肉的人。

作为当下南非备受关注的黑人导演，他在《重生》里展现了自己的企图心。电影在好莱坞式类型片的结构中融入了非洲神话和民间传说，又将未来与传统嫁接，可见，奎比卡正在尝试将本土文化转译成世界通用的电影语言。“将流行体裁改编成非洲内容一直都是我的激情所在。”贾梅尔·奎比卡似乎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电影创作方式。

贾樟柯《逢春》

作为项目的统筹人和导演，贾樟柯为《时间去哪儿了》贡献了短片作品《逢春》。《逢春》里有贾樟柯一贯的表达方式和永远用不尽的故乡元素，作品保持了惯有的水准，但也缺乏惊喜。

一直以来，贾樟柯都有创作短片的习惯，他多数时候把这种创作形式视作影像实验。从他既有的短片来看，多数作品都有着很强的话题性。2008年，他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创作了短片《黑色早餐》。电影以赵涛饰演的女摄影师视角，带观众漫无目的地游走在山西大同街头。满街戴着口罩的人和蒙着黑色煤灰的馍为世人展现了一个污染严重的城市，影像背后是他对环境问题的洞察与思考。2015年，贾樟柯拍摄了另一部争议很大的环保主题电影《人在囧途》，那部短片以身份、地位悬殊的两个家庭为线索，展现了普通人被雾霾影响的生活。贾樟柯自己也是雾霾的受害者，按他的说法，离开北京回故乡生活，雾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年多前，贾樟柯果真回到了故乡汾阳生活，故乡的日常和同乡的面孔又重新成为他唾手可得的创作素材。去年，他为金马奖创作了短片《营生》，电影以三个失业的山西矿工找工作为主题，全程大量使用无人机拍摄，在创作主题是回归，但在影像上却是一次大胆的实验。

这次以“时间”为题，贾樟柯交出了这部反映当下二胎问题的作品《逢春》。38岁的涛姐和丈夫梁子平在平遥古城工作，每天为游客表演明朝武打场



(视觉中国 供图)

贾樟柯

面或宫廷戏码。国家放开二孩政策，两人因“再生一个孩子”的冲动回忆起伤心往事，一度争执、冷战，但最终又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把时间拿走的东西一点点拿回来。”贾樟柯借底层小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对于时间的温和态度。

“拍短片常常让我有冲动拍些平时不太拍的东西，比如家庭生活、夫妻关系，我很少拍。”在电影创作上，贾樟柯一直保持着开放的心态，除了剧情长片，纪录片、短片都是他或记录时代或自我表达的通道。在《逢春》里，贾樟柯不仅涉猎了家庭题材，他还拍摄了自己一直感兴趣的武打场面。电影一开场就是一段三分的打戏，这实际上是一场戏中戏。梁子和同伴正在扮演古人武斗，一场打戏过后，手握自拍杆的游客纷纷凑上前合影留念。这种因时间、空间错位而产生的荒诞感会让人想起他早年的作品《世界》。十几年过去了，如今在平遥古城谋生的男男女女和当年被困在世界民俗村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

《逢春》和《营生》是贾樟柯在《山河故人》之后的两个短片作品，这两部片子都再次把目光投向了故乡，投向了故乡人的日常琐事。贾樟柯说，他把回故乡视作一种回归，生活上的回归，也是艺

术上的回归。“艺术做久了，会对日常现实熟视无睹。回家生活对我理解人有帮助，在北京，我们每天谈很多形而上的东西，却很难理解一个普通人和他面临的生活困境，更不能理解是什么填充了他的精神世界。可能只是这个月忙孩子上学，下个月忙单位考核，谈形而上的时候我们无视这些，如今，我尊重这种生活，尊重后才有理解。”

除了独立创作，贾樟柯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作为监制统筹和协调五国导演。在筹备《时间去哪儿了》之前，他担任过多部影片的监制，合作的都是年轻导演或新人导演。“找钱、投钱，找录音师、美术指导、摄影指导……帮新导演搭个好的制作班底，以往的监制工作主要是这些。”贾樟柯说，这一次，工作方式完全不一样。“大家都是成熟的导演，创作和制作上完全不需要操心，我要做的就是协调时间，盯进度，做好最后五部片子的整合工作，最大限度地保护每位导演的创作自由。和之前的监制经历比，这次简单很多。”

主导制作金砖五国合拍片似乎是一个信号，贾樟柯正借由自己的影响力，更多地参与到国际电影的运作和推广中。✎

万方的 20, 40, 60

记者 / 驳静

《新原野》首演谢幕时，编剧万方从观众席被请上了台，在两位女主演和立陶宛女导演拉姆尼中间，显得格外小只。

60，每天能写两小时

1952年出生的万方，独自住在北四环，名叫乖乖的狗与她为伴，从她丈夫罹患癌症那年收养，已有十多年。最近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的话剧《新原野》就在这里写就，前后花了大概三个月。万方每天上午写作，8点多起床，坐下来开始写，“写到差不多涣散了，就停了”，大概能持续两个多小时。

《新原野》原著小说是万方自己创作的《杀人》，1994年发表在《收获》上，还是头条。那时《收获》主编是李小林，巴金的女儿。万方的父亲曹禺跟巴金关系很好，从前李小林从上海到北京来，还会住在曹禺家，跟比她小6岁的万方住一屋，两人在一个被窝里卧谈，已经是大姑娘的李小林就给小万方讲很多“大人的世界”。万方的第一部小说《星星离我们并不遥远》就是从李小林手里发的。当然她也退万方的稿，有一篇小说8万字，李小林拿到稿子，让她必须删到6万字，“她强迫我进步”。

所以《杀人》能发在《收获》头条，万方激动得不得了，但也没提前跟父亲曹禺透露一句，“那时候年轻人争强好胜，乐意自己成功”。杂志拿到手了，万方带着去北京医院，放在父亲病床边，那是曹禺几乎连续住院的第六年。第二次再去，万方记得父亲一看到她眼睛就亮了，伸出手来说：“小方子你来。”他就抓着万方的手，挺激动，说：“你的小说我看了，你真成，你真的能写。”算是头一次正面直接地肯定了万方的创作。

万方这时候已经没那么激动，因为反正自己不能写，她已经知道了。每个写作者都有或者但愿都有这样一个时刻，“就像解谜，不知道什么时候谜底解开了”，万方的这个时刻就发生在创作《杀人》期间。她开始写时，知道这会是个好东西，写到将

近1万字，越写越灰心，“我写出来的东西，跟我心里面的激情不匹配。如果只能做这样一个写作者，那就太没劲了”。

多年以后，万方已经记不清她当时刚写完一段什么，无外乎就是女主角六团的某种心境，“突然就觉得成了，迈上那个台阶了，这个感觉我一生都不会忘”。果然，《杀人》之后得到的认可证实了这一点。比如那部《星星离我们并不遥远》，曹禺也看了，但跟万方说的则是：“你啊，以后能够站得再高点儿，不要只看自己身边的事。”

《杀人》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一个相对封闭的农村，女主角六团，婆婆服仙，作为丈夫、儿子的鞠生想要离婚却被两个女人拒绝，纠葛几十年，每个人都活在痛楚里，最终以悲剧结尾。以此改编的《新原野》基本遵循这一故事框架。而这个故事的部分内容，其实也还是来自身边的事。

万方小时住的院里有一位声乐老师，平常特别美，见到谁都是言笑晏晏、温文尔雅的。有一天万方先是听到她屋里在吵架，还有哭叫声，接着就看到她几乎是光着身子，从一个屋里冲出来，一头跑进另一间屋子。万方当时只有五六岁，震惊地望着这个画面。后来才知道，原来她跟丈夫过不到一块儿去，想离婚，对方却死活不同意，就这样耗了20多年。“想离婚而不得解脱”这样一个故事就留在了万方记忆里。

这部悲剧色彩浓厚的现实主义小说改编为剧本后，最终定名为《新原野》，但跟曹禺的代表作之一《原野》并没有故事渊源上的承接性，两个剧本唯一相关的，可能是万方自己。近60岁开始，万方才真正把创作精力放到话剧上。“从开始写话剧后，我就想写个像《原野》那样有强烈爱恨情仇的故事，终于能动笔改《杀人》了，就干脆叫成《新原野》吧。”

导演此剧的拉姆尼(Ramunė Kudzmanaitė)是立陶宛人，她将舞台气氛掌控在悲伤与活泼之间，同一个舞台巧妙涵盖时空里的几十年，同一片麦场，可以变作水捧入洗脚盆，可以作边界化为闺房，同一口水缸可以舀水，可以用来投井。一开场是血色黄昏，在黄灿灿的圆月映照下，背竹篓、持竹竿、



(央华时代供图)



(央华时代供图)

上、下图：由
万方编剧的话
剧《新原野》
首演剧照



上世纪80年代，万方和父亲曹禺（右）

戴斗笠的6个人影佝偻而现，为悲剧奠定一个并不压抑的调子。实际上现场观众的笑声也不少，特别是冯宪珍扮演的服仙，在收到远游儿子数封家信时，那头叫声“娘”，那头就回一句节制却充满信息量的“嗯呐”，每一声都有变化，化解掉许多悲怆。

40，飘

30多岁时，万方经历了一次情感变故。她遇到了后来的第二任丈夫，开始谈恋爱，要跟第一任丈夫离婚，就像她自己笔下所写，也像是曹禺跟他第一任妻子离婚，都不太容易。这种婚姻与家庭的关系，成为她后来好几个剧本的主题。例如2009年的《关系》，讲的就是一个男人跟妻子、长期情人以及第三个女人的故事，就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演出，主角是“人艺五虎”之一丁志诚。

离婚需要父亲同意吗？“所谓需要，其实并不需要。但是当时离婚需要单位领导签字，我当时还在《剧本月刊》工作，领导就是我爸爸。”所以万方

平常在闹些什么，他总知道。

曹禺的四个女儿里，只有万方子承父业，曹禺有没有因此而偏爱她？“他没有明确说过。但他曾经表达过，‘四个女儿里，你最像我’。他走后，我就越来越感觉到如果这世上有一个人值得我把自己全身心地去告诉他，那这个人就是我爸爸。我说的什么，他都懂，他说的什么，我都懂。”

“比如别人听了可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90年代会有那种香港来的刊物，比如《Playboy》这样的杂志，在年轻人之间传来传去，传到我这里，我觉得我爸想看，我就给他了，我爸啥话都没说就拿走了，而且我给他一点障碍都没有。这个特说明问题，一般不会吧？女儿会这么做吗？但是我知道，我继母有所表示，她觉得不太合适，但我一点都没觉得呀。”

90年代初，整个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股经商大潮。“大家都在热烈讨论做生意的事，人人都经商，在那个潮流下，我就觉得，这也不是不可能的，我为什么不能也试一试？居然也被这样的事情吸引。”

万方给朋友弄的开关厂投了1万块钱，“后来我才知道，我根本不是干这个的。但我40岁以前，真的不知道生活是什么，也写东西，但还是会被潮流席卷，可见生活没有目标，飘。”

后来她又调去中央歌剧院。工作职责说是写歌剧，总共写过两个，一个叫《热土》，另一个改编了《天云山传奇》，后者还演过两场。这份工作的好处是，歌剧院也不给任务，因为排一个歌剧很不容易，真写了，它就得面临你天天问什么时候演出的压力，所以干脆也不要求出作品。所以那个工作，万方就是每周去开次会。

虽然也一直在写小说，但还是会被各种事吸引，不停地参加各种聚会，呼朋引伴的。甚至儿子苏蓬出生，也没有给她造成那种“一夜间长大”的效果。“我真算不上特称职的母亲，我基本就是按照学校老师要求孩子的标准来要求儿子，做该做的。”所以曹禹那时就常在信里批评她，“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写写写，还贪玩儿”。

后来有一个朋友说他在写电视剧，万方就跟着也开始写，一写就是十多年。“这事儿不难，但是痛苦，没有乐趣。唯有《空镜子》写得还比较有意思。”《空镜子》也是万方根据自己的同名小说改编，2001年在北京台播出，杨亚洲导演，陶虹和牛莉主演。这部讲述一对姐妹爱恨情仇的电视剧当时播出效果很好，以至于万方还会在路上被人认出来：“我特别喜欢你写的《空镜子》。”

“40岁以后，慢慢我才知道别的路走不通，一门心思开始写电视剧，也写小说。可在那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我究竟要干吗。”

20, 野

上世纪60年代，万方初中毕业，到东北农村插队，一伙人住在废弃的小学教室里。生产队长每天一早天未亮，就到村口怪叫，权当公鸡打鸣叫醒整村人。万方在清晨的困倦中无数次听到这个叫声，像野兽，仔细分辨又是人，后来写《杀人》，她就琢磨那个场景，广阔田野里大概有什么东西驱动着他，用本能在宣泄。

每天她就是在这个半人半兽的嚎叫声里迷迷糊糊起床，去田里干活儿。捋粪、施肥、锄地、种地，冻得手烂了，就拿小刀刮。小米、棒子面儿，成天就吃这些，有时就商量着去干点偷鸡摸狗的事儿。

有一回俩男生各自往腰里捆上一把大铁勺，说是要饭去，走了也就十来分钟，从隔壁村拎回来两只鹅。这厢他们张罗烧水烫鹅，那边村民就找过来了，另一个姑娘拉起手风琴，大家开始唱起革命歌曲，后头剁鹅的声音就给遮盖了过去。

那鹅老得直烧到半夜还是咬不动，但总算吃上肉了。那晚的炕就无比热，烧了七八个小时能不热嘛，大家就往炕尾睡，被子一床床都堆在炕头。总算能睡了，不知睡了多少光景，就有人喊“不好了，不好了”。万方一睁眼，身边火苗已经蹿得老高。要灭火，水缸里空的——烫鹅用光了，着急忙慌地开门散烟，结果一遇到新鲜空气，火苗更欢了。万方一瞧屋顶，还都是些熟秸秆，这要是燎着了教室就算是完了。所幸，那床着火的被子被拖到屋外，叫一铁锹土给盖灭了。

这类惊心动魄的事没少发生。但万方和她的同学们一样，不仅不觉得苦，还觉得特自由。要知道，在去那儿之前，万方一进自家院儿，大门上就贴着标语，“打倒反动权威、反革命文人曹禹”，在学校她是“黑五类”子女，不许进教室，不许说话。这一对比，乡下就好太多了。

在吉林这个叫作三岔河的屯儿里生活了两年，给《杀人》打了基底。1970年，沈阳歌剧团去招人，歌剧团政委自己也搞创作，是曹禹的粉丝，嘴上不好说，可心里崇拜他，听说万方是曹禹之女，“大作家的女儿想必也是能写的”，就招了她去当创作员。20岁上下那些年，万方全在东北度过。

在歌剧团虽说也写，那还称不上真正的写作，但是看了很多书。本来图书馆都是封闭的，但万方是“创作员”，竟然能自由进出，就挑那些大部头经典来看。冲击最强烈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三大本，读了就到处跟人在信里谈，谈人的命运，激动得不行。

能读别人读不到的书，还能写信谈，万方觉得是自由。实际上从小在家里，曹禹向来对孩子也是极自由，从来不说你不能做什么。万方三四岁，看到父亲在那儿看书，就顺着他胳膊往上爬，爬到肩膀上坐下就开始玩儿，拿他头发当草，玩拔草除草的游戏。“他不是那种有威严的父亲”，连带着，万方从小野，自由散漫，没什么禁忌。所以当时从女十二中毕业，在兵团和农村之间选择了后者，但后来还是去了兵团，当炊事兵，过那种集体生活。“说老实话，这种生活，我不喜欢。”

作为曹禺的女儿，也作为自己

——专访《新原野》编剧万方



作家、剧作家万方

三联生活周刊：《新原野》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当晚，现场有很多笑声，导演拉姆尼对剧本的处理很活泼，这种活泼有没有削弱作品的悲剧性？

万方：的确有好多人提出这个疑问，包括王姬（六团扮演者）也对导演提过。但排练时我一次都没有去。编剧如果老在旁边，对导演会有影响。在这之间，演员们多少也跟我表达了一点看法，但同时，也有演员很赞赏，比如扮演鞠生的闫楠，他觉得新鲜，打开了一扇门。我就沉住气，等到首演去看，结果是好的。拉姆尼以喜讲悲，从创作思路来讲，跟我很投契，反着表达。换作国内导演，有可能会顺撤，

照着剧本里的沉重、悲伤去诠释，当然可能也是另一种效果。排练之前，在鼓楼西剧场有过一次读本会，我也在场。我记得第三天，有个小女孩在里面演个角色，读到刨坟、控诉，我看她整个脸都皱成一团，太可怕了，我写东西喜欢打到比较疼的地方，有些的确太可怕了。

三联生活周刊：最后一幕的“游鱼”处理，算是个光明的结尾吗？

万方：小说的结尾并不光明，六团把婆婆推到河里，就完了，舞台上的确有一点。读本会最后，我突然想起来，就给导演拉姆尼说，要在最后加一个孩子们在河里游戏的场景。导演特别敏感，她立刻让我和所有的演员都变成鱼，做出鱼游动的样子。她说她喜欢我小说原来的结尾（即婆婆服仙被六团推入河里）。于是把这两个想法一结合，六团和小伙伴以及服仙，都变成了鱼在河里游戏。我想，这也算是给六团一点慰藉吧，她曾经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最后仍有对自由的渴望。

三联生活周刊：从《杀人》到《新原野》，中间隔了几十年，为什么才改成剧本？

万方：很长一段时期，我的戏剧观里，现实主义都是最高明最正统的。《杀人》写六团从17岁到40多岁，时空分散，要改成一个现实主义的话剧，我觉得很难。大概从2006年起，我写了几个小剧场的戏，不时地就会想起来改编《杀人》。但按我原来的戏剧观，就老想不通，所以就拿起想一想，想不通了再放回去。在这期间，不断有国外的戏剧来中国演出，我越看眼界越开阔，心也越开阔，很多戏给我启发。

三联生活周刊：怎么样的启发？

万方：印象最深刻的是德国的《大门外》，就是一个歌手，一直拿着麦克风在台上唱。我是第二场去看的，进场前还发了一棉花球。原来头一场，观众因为受不了声音提出意见来。原著是一首诗，看了戏我还找了诗来读。我就豁然开朗，连诗这样一种形式的文字，都能在舞台上得到这么好的呈现，看得我掉眼泪。不断有这样的启发，有个俄国的戏《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写的是一个醉鬼的旅程，

还有荷兰戏剧《小鹿班比》，舞台上三个男人在一间厨房里无声地争斗。很难明确地说出这些作品在讲什么，可就是被触动，我的戏剧观就发生了彻底改变，我觉得戏剧是非常自由的。我想通了一件事，没有人在写作的时候就想创作一种主义，而是找到最淋漓的表达渠道，哪管它是现实主义还是象征主义。所以啊，思想解放真是特别重要，有了这个之后，从前积攒的愿望和能力，一下就得到释放。

三联生活周刊：父亲曹禺对你创作上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万方：时刻观察生活，观察人。有一回我陪父亲遛弯儿，那时他已经上了岁数，走着走着，我回头一看，他已经落在后面，十米远。我走回去，就听到他在那儿感慨，哎呀，青春真好啊。因为他看到一对情侣从他身边走过。我估计那对孩子确实很美。另外，他有好多小本儿，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儿和人，都要记下来，他留下了很多活页本，按人物、对话分着类。我模仿了这个习惯，到现在还在实践。

后来我改编他的《日出》成电影，因为电影需要很多细节，我就时常去问他。我就发现，他对自己笔下人物之了解，剧本里没写，可问他什么他全有数。参加牌局，胡四、陈白露都是什么习惯，他全在脑子里。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就创作本身会互相交流吗？比如告诉他你在写什么，请他提点儿意见。

万方：我们会就共同看过的一出戏或一本书沟通想法，但我从来不就我具体在写的东西跟他交流。唯一跟他讲过一次。那时候他岁数很大，住在北京医院。我去看他，推着他在走廊里走。他问我最近在做什么，我说在写一本小说。他就问，啊，写什么的？我就把情节给他讲了讲，就像给小孩子讲故事。讲完了，他就问，后来呢？我就现编剧情，再给他讲几句。他又问，还有呢？你再多说两句。我就接着给他编情节。那次我印象特别深，我推着他在走廊里来回走，走得格外长，想想既难过，又温暖。我想，他是通过我给他讲，在重新温习回顾他曾经创作时的感觉，感受写作的乐趣，晚年他写不出东西，又因此长时期地痛苦，这对他是种安慰。

三联生活周刊：你写的第一个没有演出的话剧作品《谁在敲门》，讲的就是这种痛苦。是以曹禺为原型吗？

万方：我爸晚年写不出东西的痛苦，我看得太多，看得透透的。我看他坐在桌前翻手边的东西，毫不相干的杂志，又走到书柜前漫无目的地找书，读出一本本书的名字；他在屋子里东走西走，脸绷得紧紧的。我于是试图写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人，曾写过很棒的东西，后来创造力消失了。所以的确是以我父亲为原型，可他又不是孤例，他的同学钱锺书，那一代人好多都是这样。戏只有两幕，一幕是“文革”前，一幕是“文革”后。写完后，我拿去给当时北京人艺的院长于是之看。很快就是1989年，这部戏就不了了之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写作的时候会考虑观众吗？

万方：我就是为观众写的呀，当然想到观众。一个戏也只有观众来看，才能证明站得住。所以观众又特别重要，要吸引他们。《冬之旅》这部戏就是两个老头儿在舞台上说，按说没那么好看。我还是想各种办法，增加悬念和冲突。当然，更重要的是尽可能生动地描写人生存的境遇、困境，写得透，写得鲜活，就能吸引住观众。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以后看戏的人会越来越多吗？

万方：从更长远来说，比如以十年为一个单位，我觉得看戏的观众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作为个体的存在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这当然是我跟我过去经历的那个时代作对比，年轻人可能还体会不出来，但放到长的时空里去看，差异的确正在慢慢得到更多的尊重。这是戏剧发展的空间。■

父亲曹禺对你创作上的影响是怎么样的？时刻观察生活，观察人。

不一样的《福斯特医生》

文 / 悦涵

这部有着浓郁白葡萄酒气息的英剧，它所叙述的，远不止出轨、家庭、手撕小三这么简单。



英剧《福斯特医生》剧照

2015年让人印象深刻的英剧《福斯特医生》，最近刚更新完第二季。故事叙述了英国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郊外小镇故事。福斯特医生——杰玛，她事业成功、家庭美满，某一日，突然发现了丈夫围巾上一根金色的头发，从此以后，一切都天翻地覆。而“福斯特医生”也进入了一个和丈夫、小三、小三全家斗智斗勇最终夺回自己生活的过程。

第一季结尾以西蒙（Simon）破产，灰溜溜带着大肚子的小三离开他从小出生、成长的小镇为最终结局，福斯特医生完胜。刚刚更新的第二季则讲述离婚两年后，西蒙带着小三和刚满两岁的女儿，组成了一个新家庭，重回故地。他们买下当地一所豪宅，曾经远离西蒙的故友又势利地重新聚回。在暖房派对上，两年来一直没有新约会的杰玛显得相形见绌。西蒙开始挑拨儿子汤姆和杰玛的关系，并暴露了他要将儿子从杰玛身边抢走以及将前妻永远驱逐出这个镇的野心。

乍一看梗概，这似乎是一个普通的出轨剧。但

是，在英国创造了多个收视纪录的《福斯特医生》（第二季仅全英就超过720万人观看，第一季800万人），当然远不止这么简单。这部一、二季豆瓣评分分别为9.0、8.0的剧，在出轨这个题材上为何能高出一筹，得到东西方女性群体不约而同的喜爱？

《福斯特医生》高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从阶级角度叙述了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坍塌以及重新构筑。该剧最被广为称誉的片头，首先就定下全剧基调：夏敦埃酒的液体浸润中，默默划过车钥匙、领带、口红、手表、精致内衣……这些代表中产阶级的寻常物件，凸露了平静下的压抑。

据劳伦斯·詹姆斯的《中产阶级史》，理想型的英式中产阶级生活是：夫妻各拥有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大多为专业人士；他们恩爱，但不在公共场合过分暴露情感；子女呈现出适度的社交性，且大都学业优异，拥有无限前途。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诞生的典型的中产阶级，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确立的理性、文明、专业性的一种人物典型。它也一直影响着英国今天的生活。

福斯特医生刚出场的时候，拥有英国中产阶级女性可以希冀的一切美好：刚37岁就成为当地医院的高级合伙人，身材紧致苗条，外表仍富有魅力；她拥有令人羡慕的家庭，夫妻和睦、儿子可爱。可是接下来，编剧却将这一切全部打破。一方面揭示了郊外温情下的虚伪——杰玛平时所自以为是的朋友，全都对自己有或多或少的背叛；一方面又让人看到这虚假背后如何抓住真实：一切只能是自救。

如果是一般的滥俗出轨剧，剧情在发现小三之后就会刻画女主角怎样打闹、撕扯，最后心碎地离开；或是叙述女主角怎样平静、冷静，斩钉截铁地离婚，最后找到真实自我。

但《福斯特医生》两者都不是。在接下来的四集半，我们看到一场别开生面、险象环生的高智商女性重夺自己生活的故事。为什么说《福斯特医生》的两季，是将典型的英式田园诗打破的过程？是因为正如英国偏保守派报纸《卫报》所言，正常的中产阶级价值观从不鼓励报复、降低身份、跟踪、欺骗、利用、恐吓。而这一切，福斯特医生都用到了。

杰玛在镜头前充分暴露自己的缺点：作为一个医生，她是冲动、不计后果的。在第一季我们看她几乎丢了自己的工作；在第二季时，我们又继续看到她在上班的时候就突然翘班离去，甚至肆意买醉、性生活活跃。这是以往英国中产阶级电视剧不可能出现的一种女主角形象。《每日电讯报》认为，《福斯特医生》的“现代性”正在于它集中刻画的是被出轨的妻子，而不是以往的丈夫或情妇。

如果说“颠覆中产阶级”是这部出轨剧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作为其间重要场景的小镇，就对剧情的营造至关重要。剧中小镇帕敏斯特（Parminster）是一个虚构地名，它的真实拍摄地是赫特福德郡的希钦（Hitchin），一个7世纪的集市小镇，人口约3万多人。这个小镇既有着英国典型的郊外景观，又有一个繁忙、优雅的镇中心，便于剧中广场场景和夜店酒吧场景的拍摄。

《福斯特医生》第一季成功后，也将它幕后的编剧麦克·巴特利特（Mike Bartlett）带到一个更为人知的位置。他创造复杂女性的才华也从戏剧舞台到电视屏幕，被更广的观众群认可。巴特利特以前的作品多为戏剧，《福斯特医生》被认为是他试图将戏剧舞台的优点融入电视剧的一个成功尝试。与他合作多次的英国戏剧导演鲁伯特·古尔德（Rupert Goold）认为巴特利特不仅擅长描写女性角色，作品中还有一种难得的“人文主义感”，属于很走心、很有灵魂的一种创作。作为一个编剧，巴特利特并不喜“评判角色”，这也是为什么《福斯特医生》总给人一种难得的客观感。剧集中除了福斯特医生，还叙述了很多其他人对于出轨和爱情的态度，有赞成的，有默许丈夫出轨的，有被家暴后重新和男友和好的，在这部剧里我们看到的都是客观阐述，而没有过多评判。

与过往庸俗的出轨剧不同，《福斯特医生》系列被英媒评价融入了一种希区柯克式的恐怖和惊悚氛围。这使得该剧在肤浅的婚外情题材中脱颖而出，让人欲罢不能。充满主观色彩的全剧摄影（局限性和偏见性，从每个角色的个人视角出发），惊悚片格调的灯光和晃动镜头，无不凸显迷恋、焦虑、恐惧、

紧张。剧集同时充斥过分夸大的哥特式手法，比如福斯特医生的很多妆容，睫毛膏糊了；以及他们居住的那所房子，有时在光线的营造下宛如一座哥特式老宅（当然大多情况下还是阳光明媚的）。

这部剧的大热，功不可没的是其中女主角福斯特医生的扮演者苏兰·琼斯（Suranne Jones）。这个今年39岁的女演员，曾在英国经典电视剧《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中扮演凯伦。《加冕街》是一部1960年就开播的电视剧，到现在仍是经典，被英国人爱称为“corrie”。苏兰·琼斯之后在《重案组女警》中饰演的女警瑞秋（D.C. Rachel Bailey），就似乎有了如今福斯特医生的影子——第一集刚出场，男朋友把她甩了，她完全不接受，并用非常规手段为自己赢得了一套高档公寓。

作为与众不同的英式出轨剧，《福斯特医生》的镜头也处处透露出BBC对于“细分目标观众”的用心。2015年，该剧第一季曾因被安排在《英国家庭烘焙大赛》后播出，被认为是有意聚拢女性观众。可是近两年来，纵观《福斯特医生》《苹果园》《代班》……发现BBC似乎总喜聚焦中产阶级女性生活，着力刻画她们的挣扎和恐惧、强大和弱点。英国版《GQ》称观看《福斯特医生》某段时间已成为众多英国女性的“个人迷恋”。一部剧，能达到一个群体显而易见的喜爱，除去剧本身的成功，也反映了当下社会呼之欲出的心态。英国历史上，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人始终认为，他们最有资格监督国家的文化和教育生活，引导国家走向文明。他们一直认为存在一种“优质的”文化，这种文化应该得到提倡。这种信念产生于19世纪，直到今天，虽然这种想法已经很冲淡或不再被明言，但还是似有若无地体现在BBC剧的理念中。所以正如主演苏兰·琼斯告诉《星期日镜报》的那样，她希望观众看完《福斯特医生》后，会对出轨这件事三思再三思，意识到出轨后所带来的痛苦和伤害。——BBC推出的电视剧不仅是“愉悦无知”，还希望对这个社会起到正面的引导作用。《福斯特医生》不仅是一部劈腿剧，更带出各种价值观，探讨婚姻的意义、人的尊严，社会和生活的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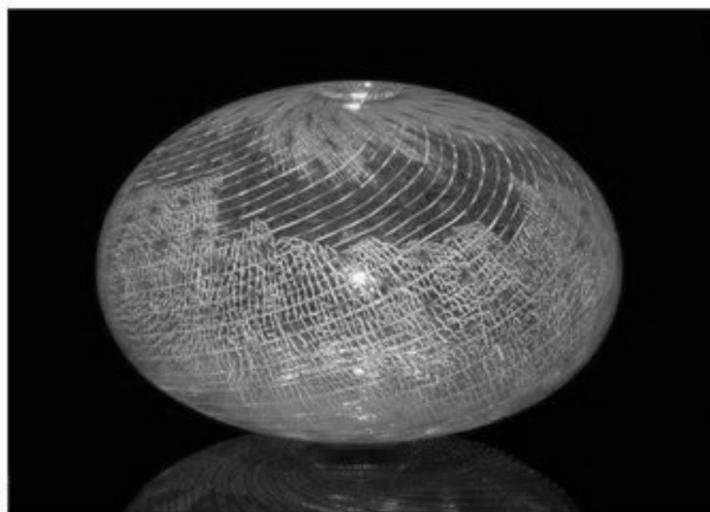
飞翔的玻璃

文 / 钟和晏 图片提供 / Lino Tagliapietra

塔亚彼耶德拉的玻璃艺术存在于抽象和具象的交会点，一种他称之为“运用威尼斯玻璃技术的印象主义画派”。

利诺·塔亚彼耶德拉 (Lino Tagliapietra) 第一次透过穆拉诺一家玻璃作坊的窗户，看到吹制玻璃的情景是6岁的时候，他出生在这个著名的威尼斯玻璃小镇，这个年幼的小男孩当时就决定将来要成为一名吹制工。他11岁辍学到玻璃工厂当学徒，到如今已经与玻璃共事超过70年，他用一生的时间完成了与自己的约定。

从9月份到明年3月份，琉璃工房为这位今年



1



2



3



4



5

1. 《非洲》，2015

2. 《富士》，2011

3. 《毕尔巴鄂》，2001

4. 威尼斯玻璃艺术家利诺·塔亚彼耶德拉2015年创作的《中心》，意在唤起古代地中海神话中“世界中心”的概念

5. 《约旦佩特拉》，2012

84 岁的世界知名玻璃艺术家举办作品展，同时在台北松山文创园区和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展出。策展人、琉璃工房的创始人之一张毅将展览标题定为“再也不会有的利诺·塔亚彼耶德拉”，他的解释是，“威尼斯玻璃的传统工艺已经发展了近千年，那些魔术般的技法为玻璃艺术创造出其他媒介无法效仿的视觉效果。如果说生命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时间，面对塔亚彼耶德拉的作品，难免令人联想到‘最后的威尼斯玻璃艺术’”。

在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的展厅中，10 只色彩各异的玻璃小船从天花板悬挂下来，形状像是威尼斯的刚朵拉船，又像是被抽象化的飞鸟，手工吹制的玻璃呈现出细腻优美的线条。这件名为《努力》的



雕塑装置起初是受美国一所大学图书馆委托的公共作品，塔亚彼耶德拉认为图书馆是“知识的通道”，所以，玻璃船也就有了载着研究者驶向突破性想法的象征意义。

紧邻这件装置的墙壁上书写着塔亚彼耶德拉的一段名言：“玻璃是一种奇妙的材料，为什么？因为玻璃是活生生的。即使冷却下来，它仍然在变化。它与火连接，与水相连，与自然息息相关。所以，玻璃是我的生命。”

展出的 40 多件作品中，奇妙的、多彩多姿的几何图案从玻璃内部透射出来，让人真实感受到威尼斯玻璃传统技法的辉煌。这些技法大多可以追溯到 16、17 世纪，比如为了模仿古罗马花瓶的拼花镶嵌工艺（Murrino）、将金属微粒嵌入玻璃中形成闪光效果的砂金石工艺（Aventurine），著名的线纹装饰（Filligrana）是将白色或彩色玻璃丝在透明玻璃中扭曲缠绕成蕾丝状，而冰纹玻璃（Ice Glass）来自把热玻璃型坯在冷水和窑炉之间往来，反复几次之后在玻璃表面产生的不规则分裂纹理。

塔亚彼耶德拉的玻璃艺术存在于抽象和具象的交会点，一种他称之为“运用威尼斯玻璃技术的印象主义画派”。通常，他在一个同名系列下制作多件雕塑作品，这些系列或者以他到过的城市命名：大阪、西雅图、毕尔巴鄂等，或者来自它们易于联想的造型。《马赛》系列中孔雀羽毛般的修长造型是基于东非马赛族人使用的盾牌，《富士》系列显然受到日本富士山形状和不断变化色彩的启发。《凤凰》系列中，瓶口盘旋向上的动态线条同时代表了飞鸟和吞噬凤凰的火焰，抽象地唤起凤凰涅槃的飞升轨迹。

2015 年创作的《中心》系列中，塔亚彼耶德拉用长长的彩色玻璃细丝，沿着椭圆形做同心旋转，然后在中心点聚拢，以此代表古代地中海神话中“世界中心”的概念，那是地球生命的起源。在这个“世界中心”内部，密布着橙色、蓝色、黄色等不同色彩的无数细丝。

玻璃制造在威尼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代，早在 8 世纪，融合罗马经验、拜占庭帝国技能以及东方贸易的威尼斯就已经成为著名的玻璃制造中心。到 12 世纪末期，玻璃制造成为城市的主要产业，成立了为工匠制定规章制度的“玻璃制造商会”。为了维护贸易秘密，确保行业的盈利能力，1271 年威尼斯法律禁止进口外国玻璃或雇用外国玻璃工人。1291 年通过了更激进的法律，以避免火炉



利诺·塔亚彼耶德拉在他的名为《努力》的雕塑装置前

蔓延到木结构建筑上为由，用于玻璃制造的所有炉子从威尼斯被转移到穆拉诺，为穆拉诺成为欧洲首要的玻璃制造中心奠定了基础。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这项法律的真正动机是将玻璃工匠集中到无法透露商业秘密的地方。

另一方面，为玻璃贸易工作的穆拉诺工匠在那里享有特权，他们的女儿们被允许嫁入最富有、地位最高的威尼斯家庭。威尼斯政府以这种强硬方式，在威尼斯这一东西方交叉路口的便利位置上，长达数百年垄断着整个欧洲优质玻璃制品的制造和销售。

沿着传承近千年的玻璃吹制工的职业轨迹，塔亚彼耶德拉从11岁起师从穆拉诺玻璃大师阿基米德·塞古索（Archimede Seguso），到21岁掌握了各种复杂技法和风格，被授予“主吹制师 Maestro”的称号。1989年，他成为一名完全独立的艺术家。

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威尼斯的范围，波及到美国的玻璃艺术界。1968年，他在穆拉诺结识了美国知名玻璃雕塑家戴尔·奇胡利（Dale Chihuly），两人相互分享着想法和技巧。1979年，奇胡利邀请他到华盛顿斯坦伍德的皮尔丘克（Pilchuck）国际玻璃艺术教育中心教学。美国从上世纪60年代兴起玻璃工房（Studio Glass）的艺术运动，塔亚彼耶德拉将威尼斯吹制技法与创新的美国能量融合在一起，

发展出高度个人化的风格。可以说，这两者的结合决定了他的成功。

在皮尔丘克学院，他向年轻一代玻璃艺术家慷慨传授曾经被视为国家重要机密的威尼斯吹制技法和玻璃配方，这样的披露遭到一些穆拉诺同行的排斥与非议。不过到后来，即使穆拉诺也采取了开放的态度，2002年穆拉诺成立阿贝特·萨内蒂（Abate Zanetti）玻璃学院，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传授他们的古老技术，塔亚彼耶德拉自己也曾在那里教书。

虽然塔亚彼耶德拉一直与美国知名艺术家有诸多合作，他仍然是一位非常直觉化的工匠。在开始创作之前，他甚至不会将设计画在纸上，更愿意让玻璃直接引导他。他说过：“我不用铅笔而是用玻璃作画，我需要玻璃才能实现我想做的东西。事实上，玻璃在很多方面可以帮助你，你必须给它表达自己的机会。”

他的工具仍然古老而简单——空心吹管、修剪刀、拉伸玻璃的钳子等。他将吹管浸入2000摄氏度的玻璃溶液中，通过管子轻轻吹气，透明的玻璃泡滚过装有彩色玻璃颗粒的托盘，粘附在上面。然后用不锈钢镊子，剪切、拉伸和拖曳，最终创造出想要的形状。他就像一位玻璃炼金术士，只不过他的奇迹是真实的，他可以吹出一个内在色彩斑斓的完美玻璃圆球，就像小孩吹一个肥皂泡一般轻松。✍

《恐龙》/ *Dinosaur*, 2016年

《恐龙》系列中，塔亚彼耶德拉以大幅度使用牵引的方式，在吹制玻璃中拉曳出修长、曲线型的瓶口设计，唤起对这种灭绝动物形象的模糊回忆。窄小的玻璃瓶底座挑战着整件作品的重心，一不小心就会粉碎。瓶身包含着层次丰富的色彩与图案设计，这是通过一次次烧熔与冷却获得的结果，这样的复杂技法并非每一位玻璃吹制者都能准确掌握。



《鹦鹉螺》/ *Nautilus*, 2007年

《鹦鹉螺》系列灵感来自这种著名的海洋软体动物，它的贝壳螺旋中暗含了斐波拉契数列，也就是黄金分割螺线。塔亚彼耶德拉发现这种特殊的形式“非常具有挑战性，因为很容易失误，如果从一个小失误开始，就会不断扩大。起初我不敢去做，但后来终于找到了出路”。



《天使的眼泪》/ *Angel Tear*, 2015年

《天使的眼泪》是塔亚彼耶德拉的标志性作品，结构对称的瓶身底部狭窄、中间较宽，颈部仍然非常细窄。如同标题所暗示的，下垂的中心线在瓶中形成泪滴状的体块。塔亚彼耶德拉在这里运用了套色、花丝等多种装饰技法交融各色线条，粗细条纹与横轴纵轴的色彩对比形成令人惊艳的视觉效果。

吃饭倒时差

文 / 袁越

刚刚去国外度完国庆假期的朋友们，有两个消息等着你们。坏消息是：倒时差不但会很痛苦，而且有害健康；好消息是：2017 年度的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颁给了三位研究时差问题的美国科学家，他们发现了生物钟的生理机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倒时差。

这三位科学家通过对果蝇的研究，找到了控制其昼夜节律的基因。该基因负责编码一种周期蛋白质 (PER)，该蛋白每天晚上都会被合成出来，到了白天再慢慢地被降解掉。这个 PER 蛋白本质上就是一种基因调控因子，能够影响很多基因的功能，果蝇就是通过它来调控昼夜节律的。

科学家们此后又在很多生物体内找到了类似的生物钟基因，人类的版本主要在大脑中的一个名为视交叉上核 (Suprachiasmatic Nucleus, 简称 SCN) 的地方起作用。该基因编码的人类版 PER 蛋白能够影响至少一半的人类基因的活性，生物钟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解剖学研究发现，从人类的 SCN 处延伸出两组神经束，一组神经束和视网膜相连，太阳光每天都通过它来对人类生物钟进行校准。如果你想尽快倒时差的话，可以每天早上去户外走走，让眼睛接受强光的刺激。另一组神经束和大脑中的松果体相连，后者在接收到相应信号后会分泌褪黑素 (Melatonin)，人类就是通过它来调节睡眠节律的。同理，如果你因为时差的关系睡不着的话，可以试试蒙上眼睛，或者吃点褪黑素。

早年的科学家们相信 SCN 就是人体内唯一的生物钟，它就像交响乐团的总指挥一样控制着每个乐手，也就是人体内各个不同的组织和器官的昼夜节奏。但后续研究表明，几乎每个人体细胞内部都有自己的生物钟基因，它们虽然原则上都受 SCN 的控制，但这种控制有个滞后效应。于是，当我们跨时区旅行归来后，SCN 可以迅速通过光照强度的改变而被校准，但其他组织或器官则要滞后一段时间，导致人体内的各个生物钟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这就是倒时差会让我们感到难受的原因所在。

换句话说，如果人体内的所有生物钟步调一致，只是缺乏睡眠的话，问题倒也不大。就怕各个生物钟

步调不一致，有的想睡觉有的想起床，问题就来了。

要想将人体内的各个生物钟迅速校准到同一时间，我们就必须找到除了光线之外的另一种生物钟校准机制。日本山口大学的生物学家佐藤美保猜测食物就是能够影响生物钟的因素之一，或者更准确地说，进食后大量分泌的胰岛素很可能也具备校准生物钟的功能。

为了验证这一假说，佐藤教授和她的同事们研究了培养皿中的小鼠细胞，发现一部分细胞确实会对胰岛素有反应。之后，研究人员又用活小鼠进行了研究，发现如果用一种药物抑制小鼠的胰岛素分泌，那么这种小鼠倒时差的速度就会变得很慢。相比之下，胰岛素没有被抑制的对照组只需 4 天就完全倒过来了。

佐藤教授将研究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著名的《细胞》(Cell) 杂志的子刊《细胞报告》(Cell Reports) 上。佐藤教授表示，如果人类也和小鼠一样具备这种功能的话，那就说明我们可以通过吃饭来倒时差。比如，如果你刚刚从欧洲回来，那么你的生物钟将比北京时间晚六七个小时，佐藤教授建议你可以在早饭时多吃点，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这样倒起时差来可能会更快。✍



中读专栏

三联生活
传媒有限公司

骨董时光： 谁在收藏中国

全球顶级博物馆的
另一种打开方式



主讲人

刘越

古董鉴定专家

加入他的朋友圈
全面升级你对

中国传统美学的认知



每周三、周六更新



宣德青花龙纹梅瓶
现藏于美国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音频

图文

私享会

体育让政治走开，别开玩笑！

文 张斌



9月25日，美国亚利桑那州格兰岱尔市，素有“美国之队”之称的达拉斯牛仔队全队球员及球队老板琼斯在奏唱国歌前相挽跪地，致意特朗普

大多数人一向惧怕体育与政治纠缠在一起，仿佛是魔鬼上身。其实呢？愿望不过是愿望罢了，无论是挺身而出，还是祸及自身，体育始终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立场。此番是特朗普与媒体和职业体育界的一次酣战，《体育画报》俨然变成时政周刊，封面上美国的体育面孔并肩而立，标题让人心跳加快——《国家分裂 体育团结》，一副要与总统决战到底的架势。

特朗普依旧是 Twitter 治国的方略，从不避讳个人观感，不惜与职业体育和传媒最有权势的人物对立起来。批评 ESPN 的主持人的左派立场，直斥 NFL 赛场内反种族主义的先锋们为“婊子养的”，特朗普很容易就陷入到“白人至上”的泥坑之中。

职业体育可以很有风骨，勇士主帅科尔发表在《体育画报》的那篇文章在中国的朋友圈中都可以掀起阵阵声浪，直抵人心。文章最后一段写道：“记着，总统是为我们工作的，而不是反过来。是我们选举了他，他不是仅仅为了他的选民和他的基础工作的，他是为了每一个市民工作的。一旦你接受了那份工作，你就必须为整个国家着想。当然，你会和你的政党制定政策，但这不是重点。尊敬的特朗普先生，关键在于：你才是总统。你代表了所有人，不要分裂我

们。”科尔提醒特朗普，他自己以及效力过的冠军球队曾经在白宫与四位美国总统会面，共同为运动而荣耀，但并不意味着与总统本人之间就没有政治立场的差别。而特朗普时下的逻辑有些粗暴，道不同，便分裂，因此才会悍然取消对于勇士队进入白宫的邀请，这实在是有些褊狭了。不过是，库里较早前表达拒绝觐见白宫，总统府便以库里“在犹豫”而索性关上了大门。

怒怼总统，毫不留情。科比在 Twitter 上也毫不客气：“美国总统的名字造成了分裂与愤怒，他的发言鼓励了争吵和憎恨，这是断然无法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在那没有社交媒体的古旧年代里，体育场一直是表达政治立场的重要场景。如今，NFL 球员用奏国歌时下跪来强烈抗议种族歧视，瞬间这一举措便会传遍世界。而 1960 年 9 月，同样发生在职棒联盟赛场上的国歌事件则往往会被世人忽略掉，孤独的抗议者、克里夫兰队的格兰特拼尽全力在高唱国歌时对歌词进行了修改——“这不是一块自由的土地，我不会去密西西比。”1968 年墨西哥奥运会，领奖台上，国歌声中，那高高举起的黑手套，为尊严而做着坚决的反抗。1971 年，尼克松总统跑到华盛顿红人队的训练场展现风采，与球员一一握手，但就是有些球员坚定地站在场地的另外一侧，他们只是想用拒绝握手的姿态来表明，坚决反对越战。尼克松很无奈，他始终没有跨过场地中线，谁也不想自讨没趣。

球员表达立场完全是个人选择，关键是联盟的态度。美国职业体育联盟大多会尊重球员个体，持续捍卫联盟中每一个人自由表达政治立场的权利，因此不惜与总统和政府处于情绪的对立之中。但对于体育传媒的雇员是否拥有自由表达对于社会事件观感的绝对权利则经历了微妙的演变历程，2012 年，ESPN 几名主持人和记者在 Twitter 上发文支持被警方射杀的黑人少年马丁，起初 ESPN 官方认定此种表达有悖于新闻伦理，后来态度有变，对于此类社交媒体的表达变得宽容起来，但会时刻提醒雇员们在直抒胸臆的同时要顾及雇主的立场和利益，并提醒在身为新闻人的同时，不要陶醉于成为社会舆论的制造者，两者之间是有着清晰的界限的。■

中国军舰首访伦敦杂感

文 / 宋晓军

10月3日~10月8日，中国海军“黄冈号”“扬州号”054A型导弹护卫舰与“高邮湖号”补给舰首次驶入泰晤士河对伦敦进行了访问。鉴于英国是迄今为止靠海军实力称霸全球时间最长的国家，因此英国媒体对中国海军舰艇先进性的“赞扬”自然就成了国内媒体和网络上的热门话题。其间也有媒体朋友问我有何感想，我说我首先想到的就是1982年的马岛战争与中国海军首艘搭载中国版“飞鱼”导弹的护卫舰。

1982年5月4日，在英国与阿根廷的马岛战争中，英海军最先进的42型驱逐舰“谢菲尔德号”被阿空军用法国的“飞鱼”反舰导弹击沉。而几乎就在同时，中国研制装载中国版“飞鱼”反舰导弹护卫舰的筹备工作也展开了。这款被称为053H2型的导弹护卫舰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将首次搭载中国版的“飞鱼”——“鹰击-8”(C-801)反舰导弹和首次采用与国际水平接轨的全封闭、全空调、长桥楼结构，而且还在于它是中国军工产品第一个试行经济合同制的大型配套装备。作为试点项目，其艰巨性和复杂性不仅在于053H2护卫舰本身是一项大型系统工程项目，还在于试行的经济合同制是在原有的国防工业经济管理体制尚未作任何变动的前提下试行的。也就是说，参与研制护卫舰十一大系统的上百家协作单位要尝试着分为主承包商、一级分包商、二级分包商等多个既受法律

保护又受法律约束的责任方。

1983年11月4日，各级“承包商”经过调研、论证、协调审定方案和技术规格书、技术协定书的签订，以及报价、审价等一系列流程后，终于以海军为甲方、以沪东造船厂为乙方（主承包商）签署了建造2艘053H2导弹护卫舰的合同。作为中国大型军工产品的第一个经济合同，其中不仅涉及到了数量、质量、周期、价格、验收、技术服务、奖惩规则等多项合同目标，而且还要尝试着为一些处于研制阶段的装备和所需采购材料的价格浮动留出时间余量及资金余量。总之，在首批2艘053H2上不仅装载了中国版的“飞鱼”反舰导弹，还为日后海军舰艇及大型军工产品的研制留下了无数非常值得细数的经验和教训。几年后，首批053H2及后续舰不仅加入了中国海军，而且还从1988年开始陆续向泰国出口了4艘。而具有标志意义的053H2首批2艘舰“黄石号”和“芜湖号”，也在2014年3月1日正式加入有英国海军“血统”的孟加拉海军序列。

说到这儿，我们再从1982年马岛战争时英国海军说起。根据今年4月2日英《每日电讯报》记者修斯(Laura Hughes)在一篇题为《与福克兰群岛战争时相比皇家海军弱爆了》的文章中透露，1982年时英国海军有包括60艘驱逐舰、60艘护卫舰和12艘核潜艇、2艘两栖舰、3艘航母的137艘舰艇，而到了2017年，英国海军仅剩下了7艘核潜艇、13艘护卫舰和6艘驱逐舰（在建的航空母舰尚未服役）。而中国海军从1982年开始尝试筹建初具“国际范”的053H2导弹护卫舰，到现在仅是首访伦敦的054A型导弹护卫舰就已经有了25艘。从这个意义上看，英国媒体和国内媒体的“感慨”就不奇怪了。

其实关于中国军舰首访伦敦的杂感有很多，但最后我还是想用中国驻英大使在中国军舰首访伦敦时发表的欢迎词中引用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一句话来概括：发挥潜能的关键是不懈地努力，而不是力量或者智力。当然，在引用海军鼎盛时期担任过海军部长的丘吉尔的这句话之前，大使先引用了2000多年前中国思想家荀子说过的话：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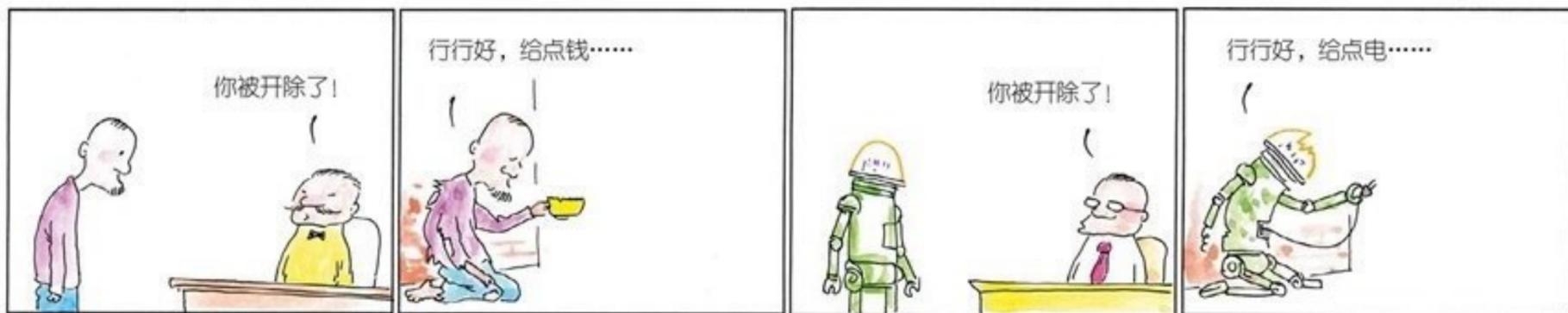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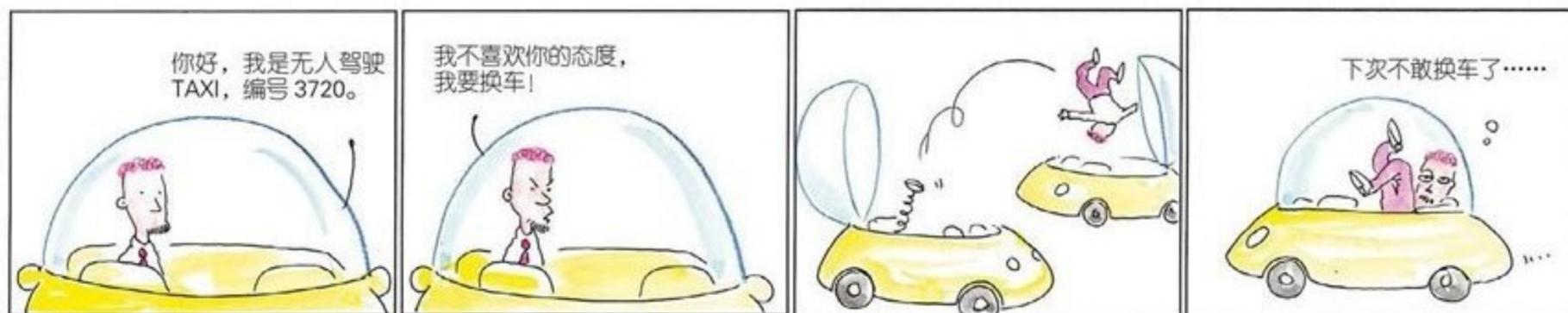


10月3日，中国海军第26批护航舰队抵达英国伦敦西印度码头，这是中国军舰首次访问伦敦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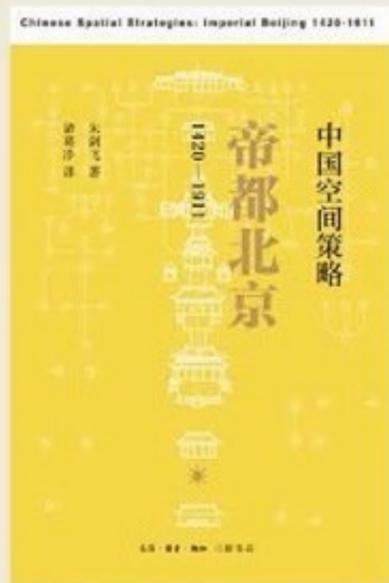
季剑青 著 定价: 56.00元

如何看待、处理和安置北京的“历史与记忆”，相关讨论、争议贯穿了整个民国乃至共和国初建时期。在大量典籍、诗文、建筑、城市规划、民族国家等问题的“书写”互动下，作者既结构化地呈现了古都北京逐渐消逝的气息，又在现代性理论上做出推进的尝试。

中国空间策略:帝都北京1420—1911

朱剑飞 著 诸葛净 译 定价: 53.00元

在明清北京，城市建筑与朝廷政治是如何联系在一起？长城、大运河、帝国京城及紫禁城宫殿的建造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它揭示了权力的运行、美的形式，还是关于人的存在的世界观？本书以考察明清北京的建筑为基础，并探讨了中国传统的空间布局方法。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十四篇历史特写(增订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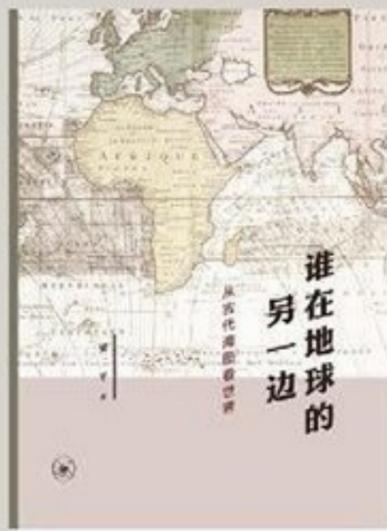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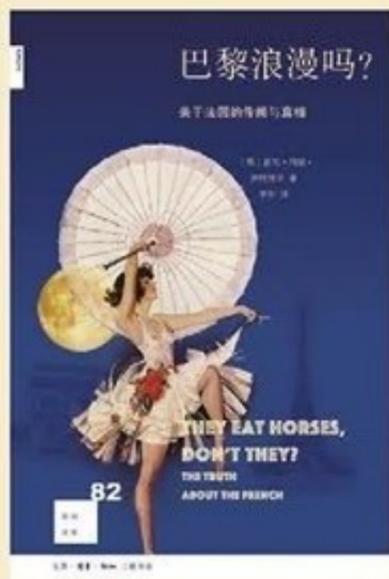
斯蒂芬·茨威格 著 舒昌善 译 定价: 50.00元

茨威格回顾了人类历史上若干个群星闪耀的时刻——这样的时刻对世代代产生不可挽回的影响，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三联增订版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完整的版本，将历史时刻特写从原来的12个增加到14个，增补了西塞罗和“一战”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巴黎浪漫吗? 关于法国的传闻与真相

[英]皮乌·玛丽·伊特维尔 著 李阳 译 定价: 48.00元

我们经常对法兰西抱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美好憧憬，然而真相又如何呢？伊特维尔以其幽默晓畅的文笔为我们带来了一次从地下铁到婚外情的无所不包的法国奇妙之旅，探索了45个贴在法国人身上的“刻板印象”，以“正史”不载的种种细节还原出一个活色生香的法兰西。



谁在地球的另一边:从古代海图看世界

梁二平 著 定价: 100.00元

通过150多幅经典古代海图，描述了人类海上交往的历史进程，以及由大航海所带来的大发现；同时，也可以看到由黄金、白银、香料、瓷器、黑奴贸易等引发的大侵略、大移民、大变革。这些记录历史、创造历史的古代海图，构成了一部色彩迷人的另类世界史。

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

李大兴 著 定价: 38.00元

作者说：“历史应该是个人书写”，这是因为个人的微观史是时代宏观史的真实映照。他的书多为阅世、阅人与阅读的人生自述，视野广阔，思虑深远，涵盖文学、史学、美学、诗学与音乐；时而平实晓畅，时而诗意充盈，新奇驳杂、舒展有致。



病房故事

文 / 徐蓉 图 / 陈曦



中午时分，苏北医院血液病房8号楼6楼走廊，苏江洲站在病房门口，自己数着自己的手指头，安安静静地自己和自己玩，没有一点声音。

苏江洲看着不像病人，除了个头瘦小、脸色略有些苍白以外，他的头发几乎没有掉，这让他显得和平常的八九岁小男孩一样。而且他看着那么干净、神情安然，只是有些寂寞。

中午的病房，大多数血液病患者都在午休。说实在的，即便不是中午时分，病人们也大都在病床上静静躺着。得这个病的病人精力都很差，治疗期间尤其如此。

用一位医生的话讲，相比实体瘤，血液病的化疗是催毁式的，血液里的好坏细胞全要杀到最低点，用药之后细胞不跌不行，跌了之后涨不起来也不行。细胞在低点徘徊的期间，感染和出血的风险如影随形。进院时好好的一个人，也许就是出不了院。昨天好好的一个人，也许今天就走了。这样的命运，迫使每个病人既要忍受病痛，还要不陷于绝望。每个人都静卧在床上，抵抗着命运的磨难。

苏江洲生病，一直是妈妈陪在医院，奶奶做饭送饭，爸爸跑货车挣钱。可是，就在他生病后的第二年，爸爸出了车祸去世。在这之后，奶奶和妈妈都信了教。

奶奶是在教友家做饭，做好了用大大的提箱拎到医院。在我的印象中，信教似乎并不要人吃素。他们却是吃素，而且是严格的纯素，连牛奶和鸡蛋也不吃。其中，苏江洲对自己的要求最严格。妈妈说连自己有时候都会犯馋，想吃一些不能吃的东西，比如零食，肉啊、蛋啊，可是在妈妈对苏江洲讲了吃素对他治病有好处之后，苏江洲就从不犯馋。

有一回，护工帮他们买了份韭菜炒鸡蛋，苏江洲不注意吃了口鸡蛋，立刻吐了，很紧张地问妈妈有没有事，妈妈安慰了他好久，他才放心。听了这个，不知怎么的我觉得有点儿心酸。以前看到苏江洲那么淡然，你会以为孩子太小，他还不懂得死亡，可是连吃一口鸡蛋都这么担心，你就可以知道他心底是多么希望自己的病能够治好。

苏江洲的妈妈告诉我们吃素对血液病治疗的好处，我表示对她介绍的营养食谱感兴趣。第二天，苏江洲的妈妈就特地复写了一份菜单送给我，上面手写的大约是她的字迹，非常秀丽。

中午我到病房的时候，看到父亲病房里就放了一张这样的菜单，还搁了两个手工折纸，折的不是千纸鹤，而是我们小时候经常折着玩的小衣服、小裤子，还附着一张小小的卡片，上面写着一行字——“我想和爷爷做朋友”，这是苏江洲送给我父亲的礼物。父亲近70岁，与他年纪相差很大，没想到苏江洲心里会想与自己并不熟悉的爷爷做朋友。

当时，父亲对自己的病情还不明知，可心情十分低落，夜间睡眠很差，必须吃安眠药才行。看到苏江洲的卡片，父亲心里挺高兴，也挺安慰的，在病房里一直念叨这个人家和这个孩子的不容易以及他们难得的好处。

为了表示感谢，我特意去了苏江洲的病房看看他。他住在是30号病房里的加床，靠着窗户，加床非常的窄小，可对瘦小的苏江洲而言似乎也够了。苏江洲的妈妈，靠着窗户空气新鲜。那一晚，我们谈了许久，谈了苏江洲的病，他的治疗，苏江洲的父亲和他们信仰的宗教。

这期间，苏江洲一直安安静静地倚在妈妈的怀里。这几天他打了针，细胞却还没有往下掉，似乎他对这一次治疗的药水并不敏感，但为了防止感染，他已经戴上了口罩。

他看着那样弱小，却有着超出年龄的安然，对于命运所给予他的，这个孩子已经学会了全盘接受和忍耐。孩子也信了教，虽然并不太懂，不过，他已经会安慰妈妈说：“妈妈，如果哪一天我死了，你不要太伤心。我是先到天堂里去，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堂里再见面的。”苏江洲的妈妈这样转述的时候，一样的恬淡和安然。✍

大吉岭头摘 庄园级限量红茶



翻越喜马拉雅,从中国到印度
6000公里寻茶路,拜访11座茶庄园
39款茶样比较,17轮精挑细选
最终确定这款**庄园级**头春头摘红茶
从茶山到茶杯,全程监控
让我们开启**纯正**大吉岭的味道

扫码购买



传奇，系出经典



——葡萄牙系列万年历腕表，型号5033：
葡萄牙系列腕表与航海先锋们的光辉传奇和非凡勇气遥相呼应，这款典雅的时计即是出色的例证之一：将万年历与月相显示的复杂功能成功精缩于一枚机芯，配备7天动力储备，双向上链的比勒顿系统确保高效能，腕表可运行至公元2499年。

一枚时计，方寸间尽显未来。

IWC. 专为男士而设。

机械机芯，比勒顿自动上链系统，52610型自制机芯系列，上满链可提供7天动力储备。具有日期、星期、月份、四位数字年份及万年历月相显示。双面防反光凸状蓝宝石玻璃表镜，透明蓝宝石玻璃表底，防水达3巴，表壳厚度15.3毫米，直径44.2毫米，Santoni鳄鱼皮表带。



微信扫描二维码
即刻访问IWC万国表
微信专卖店

IWC万国表专卖店：北京芳草地 北京SKP 北京东方新天地 上海南京西路 上海IFC 上海东方商厦 上海尚嘉中心 上海新世界大丸百货

如需更多表款详情或索取限量精致目录，敬请联系 400 0642 999 infochina@iwc.com

www.iwc.com

IWC
SCHAFFHAUSEN